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吕磊 著

钱乘旦 主编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吕磊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2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7-214-03653-3

I. 美... II. 吕... III. 新保守主义—影响—美国 IV. D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6752号

书 名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著 者 吕 磊
责任编辑 花 蕾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江苏苏中印刷厂
印 刷 者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页2
印 数 1—3 130册
字 数 275千字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653-3/D·553
定 价 19.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总 序

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它是从中世纪的商业行为中发展出来的,商业是早期资本主义的重心。资本主义转变成以工业为中心的时候,它释放出一种新的生产力,而且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这时的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也就是我国教科书上经常说到的那种“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以动力机器和工厂组织形式的出现为标志,在社会结构方面则构造了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工业资本主义崇尚“自由”,主张不受约束的生产与交换,经济活动只应该服从一只“看不见的手”,为此,就必须有绝对“自由”的私有财产。由于这个原因,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被称为“自由资本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到19世纪末就开始变化了。马克思有许多判断非常准确,他说,生产的无序状态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看不见的手”造成了社会的混乱;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社会对生产与分配实行干预。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从这一判断推导出来的。以此为理论基础,就出现了后来的国际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世纪末,还有很多人也看出了“看不见的手”造成的危害,他们也认为社会应该实行干预,但干预应该由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来进行,因而主张一种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造就始于这个时候,但变化的过程十分

缓慢,观念方面的阻力可能与惰性有关——“自由”现在是金科玉律,不可触犯;但实际利益方面的阻力也许更实在:如果社会实行干预,私有制是否还能存在?

进入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变化加快了,原因很多,其中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对资本主义造成压力。二是在 20 年代末出现世界性经济总危机,这充分说明了生产的无序状态终究会导致何种后果。为避免资本主义体系发生总崩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它现在必须修正自己。人们开始形成共识,即不受约束的“自由”最终会毁灭资本主义,而解救的方法恰恰是: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社会干预,包括对私有财产进行重新分配(但不是消灭)。应该看出,这是价值观念及社会建构的重大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一直不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逐渐增多,观察问题的方式也不断改进。近年之中,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了,出了不少成果,但这些研究仍然不够,需要做的工作仍然很多。真正的了解需要对一个个问题进行有深度的发掘,需要作个案研究。我们这套丛书就旨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若干个案问题作专题讨论,希望每个专题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反映一定的共同性。我们希望这些研究能帮助读者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至少对我们讨论的这些专题开始有真正的了解。中国的学术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愿意在漫漫长路上艰难举步。

钱乘旦

2002 年 12 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战后自由主义共识及其挑战者	5
一、考察的视角和层次	6
二、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12
第二章 动荡的 60 年代和新保守主义的缘起	28
一、纽约文人:从批判到拥抱“美国和美国文化”	29
二、60 年代和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瓦解	41
三、对动荡的最初反应	59
第三章 70 年代:“危机”时期的新保守主义	91
一、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	92
二、文化危机和解决办法	105
三、对外事务中的新保守主义	119
四、走向共和党和保守主义阵营的开始	141
五、共识、差异和影响	149
第四章 保守主义思想基础设施网络的建立 和结构	166
一、大公司保守主义的政治动员	168
二、《鲍威尔备忘录》	175

目 录

三、“后台老板”及其意识形态	179
四、保守主义迷宫的结构	186
五、案例：打造“明星”和培养下一代	210
第五章 从冷战到文化战争：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臂膀	221
一、冷战和观念战争：新保守主义的黄金时代	223
二、文化战争：寻找德性与捍卫美国的中心	252
第六章 新里根外交和伊拉克战争	336
一、新里根外交	338
二、何处是家园	356
三、伊拉克战争和新保守主义者重塑中东的计划	363
后 记	387

导 言

本书探讨的对象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近两年来,由于小布什政府内外的一帮新保守主义者在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和中东问题上的巨大影响,使得新保守主义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新保守主义者的批评者常说,新保守主义者“劫持了”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他们要对伊拉克战争、“邪恶轴心”论和美国的反恐战争负责。虽然大多数批评者都知道,现在的这帮新保守主义者是提倡输出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军事鹰派,但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新保守主义者还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于有的人来说,它意味着犹太保守派;其他人则认为它仅意指鹰派,还有人说它代表伪保守派或前自由派。《华盛顿邮报》的米尔班克(Dana Milbank)说,新保守主义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在缓和与如何对付苏联问题上的分裂,新保守主义者是共和党内反对党内权势集团(establishment)的强硬派(里根属于此派,而老布什则属于权势集团一派)。从新保守主义阵营转入左派阵营的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在英国《新国务活动家》杂志上,则说新保守主义者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裔美国人托洛茨基运动的产物,而2003年5月份《纽约时报》的报道,却认定他们并非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是斯特劳斯主义者。^①以上说法虽均有一定道理,若不加区别地“照单全收”显然无助于我们认识新保守主义这一“隐而复显”的“思想现象”。为此,我们需要考其源流、察其流变、观其影响。

跟传统保守主义一样,新保守主义并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最初的出现是对20世纪60年代所谓自由主义“过度”的反动;新保守主义者最初的大部分核心成员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才移居美国的东欧犹太人子弟,在纽约长大,属于三四十年代一度站在左翼激进立场、战后转为自由主义阵营中坚力量的“纽约文人集团”。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思想文化界的名流,有著名学者(大多数是社会科学家),也有著名的政评家和社会评论家,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及其妻子格楚德·希默尔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 M. Lipset)、诺曼·波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及其妻子米奇·迪克特(Midge Decter)、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 Moynihan)、本·瓦滕堡(Ben Wattenberg)、珍妮·科琶翠克(Jeane Kirkpatrick)、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马丁·戴蒙德(Martin Diamond)、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亚伦·维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理查德·约翰·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等。

②
新保守主义者是一个内部有着极大差异的群体,也是一个历时而变的群体。粗略观之,这种差异和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存有分歧,而且有些分歧随时间越来越大。有些人在社会问题上始终是自由派,支持政府对经济事务一定程度的干预,如科琶翠克和克里斯托。但另一些人则是不折不扣的社会和文化保守派,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保守性越来越强,如波霍雷茨夫妇在妇女权利和同性恋权利等社会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保守。在外交政策上,新保守

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也很大。有些人一直提倡进攻性的干预主义外交政策,如波霍雷茨夫妇,但另一些人主张在使用美国的力量时应该更为谨慎,应认识到美国力量的局限,如贝尔。在他们都十分关心的中东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的立场也不完全一致。他们虽然都站在以色列一方,但在如何对待巴勒斯坦人问题上,到20世纪80年代时,他们像以色列的政治家们一样分成了两派。贝尔、格莱泽、维达夫斯基和李普塞特公开支持以色列政府中主张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的鸽派,而迪克特、波霍雷茨和克里斯托则倾向于支持强硬的鹰派。其二,随着国内外大势的变化和意见分歧的加深,有些人如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莫伊尼汉在80年代先后退出了这一阵营;但同时,新保守主义阵营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面孔。这些新人或是第一代新保守主义者的学生子弟和追随者,或是新保守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融入主流保守主义之后所吸引的新“同盟”。他们在90年代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思想舞台上颇为活跃,他们对“9.11”之后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较大影响也使得90年代中期后一度从大多数人视野中消失的新保守主义一跃而成全球世人关注的焦点。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分析和理解新保守主义呢?笔者以为,我们最好应该依据其基本关切的变化来探讨新保守主义的流变,观察每一阶段中新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共识和差异,再进一步探究到迄今为止的新保守主义中,是否存在着一些一贯的因素。

在本书的探讨中,我们把新保守主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时间上大致涵盖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新保守主义兴起并成为美国政治思想和政治舞台上一支独特的力量。第二个阶段包含整个80年代和冷战结束后的几年,在这一阶段中,新保守主义逐渐与主流保守主义合

流。第三个阶段就是目前主要关注外交政策的新保守主义。

当然,要更好地理解新保守主义,也不能脱离美国政治思想和政治舞台上的另两支力量——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尤其是前者。所以,本书还拿出了一定的篇幅来考察战后美国的保守主义。

① Jonah Goldberg, “State of Confusion: Brouhahas—intellectual and otherwise”, *National Review Online*, May 16, 2003,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goldberg/goldberg051603.asp>; Michael Lind, “The Weird men behind Georgh W Bush’s War”, *new Statesman*, 16/751 (April 7, 2003), pp. 10—13.

第一章 战后自由主义共识及其挑战者

“从20世纪末的观点来看,人们很难想像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保守主义的艰难处境。当时在许多人心目中,保守主义与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以及导致大萧条的经济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阴谋诡计、反犹主义和笃信等级制的精英主义观点也是一丘之貉。”纽约文人的杰出代表之一莱昂内尔·屈瑞林(Lionel Trilling)在1950年就此写道:“此时在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主导的思想传统,甚至也是惟一的思想传统。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今通常传播的思想中并无保守主义或反动观念的一席之地。”不过,在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屈瑞林看来,自由主义在美国的独大并不利于自由主义的真正强大。在引用穆勒的论断——只有敌对思想的挑战才迫使人去检验自己观念的弱点——后,屈瑞林指出,保守主义的怀疑与悲观有益于自由派知识界反省历史,批判自身的浅薄与乐观。如果自由主义长期缺少保守思想的压迫性挑战,将会逐步丧失批评与鉴别功能,结果导致文化思想领域内乌托邦和过激倾向蔓延。屈瑞林的这番忠告当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矫情之语,只是他“现代文化均衡构想”的反映。^①不过,他还是低估了保守主义的潜在能量,高估了自由主义特别是自由主义朝着健康方向调整自身的能力。当然,1950年时的屈瑞林更不可能预见到“大环境”(circumstance)的变化,而正是这个大环境孕育了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在某时某地的具体形态和实际表现(包括政治表现)。

一、考察的视角和层次

迄今为止,对美国保守主义的考察有三种范式或基本视角。^②

第一种范式以美国经历和传统的“例外论”(exceptionalism)为基础,我们或可称之为“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有些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美国并不存在19世纪、20世纪欧洲的那种意识形态纷争。因为美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普遍的自由主义社会,所以美国并不存在保守主义。也有些学者认为,美国存在保守主义,但美国的保守主义是保守主义的例外(exceptional)一类。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在战后美国以路易斯·哈兹(Louis Hartz)和克林顿·罗塞塔(Clinton Rossiter)为代表的共识派史学家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认为,美国的传统就是一以贯之的洛克式自由主义。哈兹在其经典名著《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明确地断定,美国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传统;美国人通常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自由主义已经深入到整个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自由主义之于美国人民就像空气一样使人深深浸染其中而不自觉并认为理所当然。所以,美国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传统,美国所能有的只能是“不真实的”保守主义。克里克(Bernard Crick)更为大胆地断言,由于美国的民主自由主义者没有保守主义传统可供攻击,因此,被迫发明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保守主义传统;正是虚构的自由主义者对保守主义的攻击使得被攻击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就是保守主义者。但由于美国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传统,保守主义因此与美国政治和社会问题完全不相干(irrelevant)。^③罗

塞塔做了稍稍复杂的考察,他区分了两种保守主义,一般的保守主义和伯克式的保守主义。他认为,美国有的只是前者。他说:“至少一百年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一直是美国传统的思想囚徒,……美国的政治思想一直是自由主义,因为变革和进步一直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必定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第二种范式是“美国保守主义的非例外论”,其核心主张是存在着普遍的保守主义真理,这种真理是超越时间、空间和环境的。持该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战后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他认为,伯克提出了真正的保守主义原则,只有找出美国经历中与伯克所说的那些普遍原则和政治实践的一致之处,才能理解美国的保守主义;美国革命是保守主义革命,其精神正是光荣革命的精神;目标和原则的持续性不仅存在于英美保守主义之间,也存在于英美的历史经历之间;因为毕竟美国的传统主要来自于英国的传统,比如对精神秩序的信念、对政治自治政府的信念、对家庭的信念等等。

以上两种范式都是对具体(concrete)的历史经历的抽象,前者肯定自由主义的普遍意义以及在美国传统中的普遍性,后者则强调保守主义的普遍意义。尽管抽象的重要性和价值是非常大的,也是必要的,因为人们正是首先通过抽象才能为所观察对象描绘一个大致轮廓、范围,确定其主要性质的一部分,但是,抽象往往会夸大对象的某些特征,舍掉甚至否定其他的实质性特征,将无比复杂的具体现实简单化。就“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而言,他们对美国传统的辨识虽然极具启发性,但其观点的根本缺陷在于他们将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视为“持久的或单一维度的思想”(consistency or one-dimensional mentality)。即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美国的传统是自由主义或洛克式自由主义

的,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只有一种具体的自由主义,更不是自由主义不会发生变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不仅表明同一种自由主义传统中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分支,而且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亦历时而变。就前一方面来看,从美国革命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自由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实现保守主义目的的激进手段。革命事实上开创了两种主导美国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其一为杰弗逊和潘恩倡导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他们相信,一旦镇压的力量被释放出来,自由和正义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他们主张削弱政府的权威,颂扬人民的意志。从某种程度上,这一分支是自由主义的激进一脉。同时还存在着消极一脉,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他们相信镇压的力量根植于社会存在的性质之中,必须通过制衡机制(checks and balances)控制人民以免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前者珍视个人的自由、自主和自足,后者则更看重国家的权力、稳定和效能。一位学者曾恰当地评论说:“个人主义为美国人提供了追求其利益的手段,而多元主义则为美国人提供了保护自己的手段。”^④从自由主义的变化来看,艾里克·方纳(Eric Foner)对自由内涵变化的考察、波尔(J. R. Pole)对美国个人主义和进步观念之间关联变化的简短回顾、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对20世纪自由主义重大变化的透视、威廉姆斯(Leonard Williams)对美国自由主义变化的理论研究等,都有助于我们认识自由主义或其组成部分、核心观念的嬗变。^⑤

柯克的想法问题更严重。首先,他对英国社会、政治性质和英国保守主义的理解是非历史的,也就是说,在他的头脑中,英国似乎永远停留在他以伯克为透镜所观察到的英国。虽然我们和萨拜因一样认为,在伯克之前不是没有保守主义,但肯定没有保守主义哲学,换言之,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自觉的政治

哲学正是始自伯克。我们也承认，“迄今为止所有对保守主义的论述都是对伯克的注解。”^⑥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伯克以后的英国保守主义随着英国社会和政治性质的变化也在变化（更何况伯克的思考也不能完全涵盖英国的保守主义）。柯克看法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他将英国保守主义看作是普遍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的保守主义基本上是一种“英国”现象（English phenomenon），英国传统赋予它的适度（moderation）、妥协（compromise）和含糊性（muddling）使它与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截然不同。^⑦即便在受英国传统影响极大的美国，虽有一些和英国相同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实践——代议制政府、政治共同体、地方和私人权利——具有同样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柯克显然混淆了语言的相似性和意义的相似性。

抽象既然是不够的（作者需再次强调，抽象是必要的），就必须回到具体当中。界定任何具体的政治传统，都必须从一般到具体，从理论到历史。这就是第三种范式的思想风格，由于它强调历史情境，可称为历史情景范式。努尔·奥苏利文（Noel O'Sullivan）1976年的《保守主义》一书堪称其代表。奥苏利文认为保守主义因时因地而不同，虽然任何一种思想流派都非某一国家所独有，但每一哲学流派都可以在某一或某些国家中找到其最明显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具体流派可被视为那一或那些国家政治传统的典型。奥苏利文特别强调，从一般的意义上看，与19世纪的保守主义相比，20世纪西方的保守主义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其一，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外部敌人即苏联；其二，还有一个共同的内部敌人即劳工和国家机构的集体主义目标。正是这种变化使得20世纪的保守主义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关切；而19世纪各国的保守主义则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亨廷顿更为明确地假设，保守主义总是反动性的（reac-

tive)。在195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将保守主义称为“情景意识形态”(situational ideology),是针对“对现状的具体挑战”(specific challenges)而作出的反应。更明确地说,美国的保守主义并非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缺乏对未来的设想(vision of the future);保守主义的冲动来自于摆在理论家面前的社会挑战,而非他背后的思想传统。当人们因为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突然间不复存在而感到害怕并力图反应时,他们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⑧

本书作者在一般的意义上接受第一种范式的主张,更明确地说,我认为相对于欧洲而言,美国的传统大致是自由主义的;但另一方面,这种自由主义传统内部有不同的分支,且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此外,与后来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一样,美国的保守主义同样主要从自由主义传统特别是从自由主义传统的消极一脉中汲取思想养分。从思想方式上,作者基本接受第三种范式,也就是把所考察的具体的保守主义主要视为对某些变化的反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不相信存在着统一的或单一的保守主义主张,或者说保守主义并非一系列永恒的法则(a permanent set of formulae)。事实上,保守主义所反对的正是那些自称掌握着“放之四海而皆准”之永恒法则的意识形态。正如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所言,保守主义很少以箴言、法则或目标来表达自己,其本质是不善于表达的,即使被迫表达,其表达也是怀疑论式的。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保守主义对人类事务之复杂有着清楚的认识,因为保守主义坚持的价值观念是不能为乌托邦理论的抽象清晰(abstract clarity)所理解的。^⑨保守主义的原则来自于一些本能的直觉(instincts),特别来自于三方面的直觉:

1. 对乌托邦思想和大多数重建人类社会的现代思想的怀疑;
2. 尊重传统,倾向于相信传统所包含的智慧远比任何个人的更

伟大;3. 对国家、教会和家庭的尊重。^①

虽然我们认为不存在单一的、永恒的保守主义主张,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存在着驱动保守主义者行动的保守主义思想、一系列信条或原则以及对社会的一般看法。我们知道,政治的现实是行动,但行动或多或少地来源于思想,连贯的行动更是需要一贯的思想。根据斯克鲁顿和艾略特的看法,思想和行动之间存在着一个“类型的分级”:哲学(philosophy)或“沉思层次”、教义(dogmatics)或“前政治层次”和政策(policy)或“政治小卒子层次”,这三者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有时切合、有时不同甚至相互抵触,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化约为一系列永恒的法则。保守主义的政策是指意在促进或捍卫保守主义者利益的政治实践;保守主义的教义是信念、偏见和承诺(commitments)的体系,它完全贯穿于保守主义的政策之中或被用来证明保守主义政策的合法性和正确;保守主义的哲学是表达保守主义论断、观点之合理性和内在一致性的尝试。^②在本书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探讨中,著者主要关心的是第二、三个层次,但偶尔也会涉及到“沉思层次”。这里,还需要提请读者诸君注意的是,人们在现实政治中和思想领域中所遵循的是根本不同的逻辑。不是说某人相信的东西就会完全反映到他的实际政治行为中,也不是说某位政治家打着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旗号,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就完全被贯彻在他的实际政策当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谨记19世纪英国保守派政治家迪斯累里的话:“一个政治家本质上是注重实践的人物;当他被请出任职时,他并不会探究对此事或彼事可以有怎样的看法或没有怎样的看法;他只需确定采取那些必须采取的,并且有利的也是最为可行的措施。”^③当然,这也不是说政治家的政策完全不受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总会受到实

际政治考虑的“折中”。

在说明本书的考察层次后,我们需要回到具体和历史当中。因为考察任何具体的政治传统、思想或意识形态,都必须从一般到具体,从理论到历史。

二、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就它们在美国本土的思想渊源上说,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兄弟,或至少是堂兄弟。我们上面说过,美国革命事实上开创了两种主导美国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今天的自由主义更为切近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但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其间经过数次演变。泛泛而论的话,今天的自由主义根源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对个人主义的重视经久未变,但是对政府的认识已发生变化。过去的自由主义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始终把政府看作是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威胁。今天,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则将政府视为个人免受各种非政府力量(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商业决定等)危害的保障。换言之,自由主义相信政府应当在维护正义和机会均等中起积极的作用。现代自由派希望保留个人权利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但他们也更愿意接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医治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弊病。在较为哲学的层面上,自由派一般相信进步的可能性。他们相信事情能够解决,未来会变得更好,障碍能被消除。而今天的美国保守主义则更多地从过去自由主义的消极一脉中汲取思想养分,保守主义者对政府作用的看法与自由主义恰恰相反,他们要维持一个小政府,国防领域除外。另一方面,与自由派相比,他们对人性的看法更为悲观,所以他们又坚持认为大多数人需要强有力的

权威、严格的法律和传统道德规范,以使人们的欲望受到控制。保守派还认为那些失败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因此要为解决自己的问题承担起主要责任,而不要指望政府。大多数保守派反对新政和20世纪60年代的“向贫困开战”计划,反对由联邦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换言之,他们反对福利国家制度,更愿意支持教会、家庭、志愿组织、基金会和地方政府去担当这项任务。¹³

上述意识形态分野并非一直存在,因为当代的保守主义主要作为对新政“自由主义”项目的反动而出现的,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一支政治力量。

从主导公共政策的思想看,直到20世纪初时,美国的主导思想仍是自由放任主义。自由派支持个人自由、人类进步和个人对合理的个人私利的追求,认为这些是自由社会的基础,坚决反对给国家过多的权威。这种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设想了一个流动的、变化的社会,国家不会保护现存的财富和特权模式,个人能够自由地追求他们的目标并依照其成就而获得发展。但就在此时,内战后开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到20世纪初已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和经济面貌。工业社会的特征越来越不合乎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图景:拥有史无前例的财富和力量的巨型公司出现了,这些新的权威中心看起来阻碍了个人追求他们经济私利的自由,许多自由放任的支持者开始认为维持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私人机构的力量。同时,由于经济活动的扩张、交通的发展和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的出现,社会的规模扩大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社会”(national society),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政治管理格局不再能适应新的情况。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中产阶级精英开始寻求一条介于自由放任主义和危险的社会主义之

间的“中间道路”。他们认为,对于一个正在工业化的国家来说,不论自由放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所欠缺,自由放任主义无力回应新的政治经济提出的挑战,而社会主义又太过激烈,大大背离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和企业家传统。20世纪初时持这种见解的人自称为“进步主义者”(progressives)。1916年,进步主义者的领军人物赫伯特·克罗利、沃尔特·韦尔和沃尔特·李普曼打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号。自此,“改革”自由主义就成为“进步主义”的同义词,它致力于驯服工业主义的过度,对资本主义施加一定的社会控制措施。改革者们开始保护个人、共同体和政府不受过度的公司力量之害,通常通过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向公民提供基本生活所需和尊严。^④

一战后20年代的繁荣使得进步主义者的改革热情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但其后的大萧条又促使改革自由主义以新的面貌出现。1932年在大选中获胜的民主党总统罗斯福,为了挽救全面瘫痪的经济,在上台后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实行“新政”,运用国家权力对工业、农业、贸易、财政和金融等各方面进行广泛的干预和调节。虽然新政版本的改革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以致我们可以说新政标志着美国改革历史上激烈的新开端,但是从许多方面来看,新政也可以被认为是进步主义传统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从人事方面说,罗斯福本人和其他许多新政推行者和支持者在一战之前都曾是进步主义者;新政推行者和进步主义者一样希望利用政府机构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并干预经济的运转;新政推行者还完全接纳了克罗利等进步主义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建议——从中央出发进行组织、行政和管理。^⑤

新政是一系列相当实际、相当温和的项目和改革,其意在矫正大萧条的经济灾难。它并没有像许多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那样

建立一个普遍的福利国家制度,也并不激进。但它在三个方面改变或帮助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其一,它导致了内战以来美国最大的政治“重新结盟”。在罗斯福的领导下,民主党从一个地方主义和强调州权的少数党(从1860—1932年的72年间,共和党执政的年数为53年)“转化成为了一个包括农场主、产业工人、具有改革意识的城市中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崇尚白人势力至上的南部势力在内的广泛政治联盟,所有这些党内群体都决心使用政府的干预力量来重建经济,为美国人提供社会保障”。^⑩正是凭借这一联盟,民主党才确立了其后多年内对共和党的优势地位。其二,新政扩大了联邦政府的规模和权力,并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国家观念的改变。联邦政府规模和权力的扩大不仅表现在大规模的开支和不平衡的预算上(这尽管带有凯恩斯主义的味道,但罗斯福在二战之前并不赞同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采取这两项措施纯粹是对迫在眉睫的经济需要的反应),还表现在人们对政府职责的认识和期盼上。在进步主义时期,人民认为,政府的职能是利用政府权力来阻止大的私人机构对个人的剥削。而到新政时期,“新观念已经取代了旧观念,人们认为,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安全以对抗生活中主要的危险:失业、事故、疾病、老年和死亡等。立法已经从仅仅防止非法和不正当行为的消极舞台,转入了直到企业活动并控制其形式的积极舞台。”^⑪其三,与以上两种变化相关,新政促成了美国政治舞台上第一次较为明确的保守与自由分野。反对新政的人被称为保守派,支持新政的人则被称为自由派。尽管新政的反对者中有一部分民主党人,但由于大部分共和党人在最初反对新政,所以,人们常把保守主义与共和党划上等号,它的主要立场是支持自由放任主义、反对罗斯福时期行政权力的扩张。1938年,在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领导下,共和党内的

新政反对派和一批代表中西部银行与工业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组成了美国政治史上第一个自称为右派的团体。当然,共和党内的新政反对派也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包括两大集团。一派是历史悠久、财力雄厚的东部上层阶级集团,他们反对新政、反对大政府和大工会。但另一方面,他们与东部大企业的密切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大企业家,如洛克菲勒家族)使他们实际且现实,如有必要,他们愿意接纳新政。此外,在外交政策上,他们一直都是国际主义者,因此他们支持罗斯福积极干预国际事务的对外政策。由于他们在战后接受了新政自由主义,也被称为共和党自由派。共和党保守派的另一大集团是中西部和西部的保守派,他们不仅反对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干预社会和经济,认为积极作为的政府是集体主义的(他们认为,国家程度日大地参与组织、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趋势就是集体主义),且有滑向社会主义的可能;还恪守孤立主义立场,反对美国介入国际事务(主要是欧洲事务)。由于东部权势集团的国际主义立场和他们随时准备与新政妥协的态度,也由于党内竞争之故,中西部和西部保守派也讨厌可恨的东部权势集团。^⑩

由于新政并未能结束大萧条,保守派对罗斯福“独裁”愿望和新国家官僚机构的“暴虐”的攻击越发猛烈。到二战开始时,新政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已处于守势。政治上的困难迫使新政改革者们重新评估他们最初的自由主义观念,特别是以政府力量改革资本主义的想法。美国参加二战帮助新政自由主义完成了转变,战争缓解了华盛顿对公司的敌意,自由主义者对政府改革资本主义能力的信心降低了;同时,战时经历亦有助于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合法化(和平时期,罗斯福政府 70 亿美元的最高预算就曾使人们怨声载道;但在战争期间,人们对超过 800 亿美元的最高预算熟视无睹),加强了政府社会福利的责任,创造了

对于“充分就业”政策的广泛支持。^⑨到战争结束时,新政自由主义已经完成了转变,并成为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两大支柱之一。英国史家戈弗雷·霍奇逊曾将这种共识称为“自由保守主义”,他指出,这一颇为奇特的混合式共识包括五项基本原则:1. 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是民主的,它创造了富裕,并且为社会公正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2. 这种可能性的关键在于以私营企业和政府支持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它使得所有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3. 满足大众需求将导致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各阶级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必要和过时,工人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成员;4. 像工业问题一样,社会问题也能被解决,经济能得到很好的协调,福利国家能根治贫困;5. 对这种仁慈的制度的主要威胁来自共产主义,因此,美国及其自由世界的盟友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的同时,必须与共产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归结起来,这五项原则涵盖了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信奉基于私有企业的民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即坚持由干预主义政府调控的自由经济制度;二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一致拥护在国外遏制苏联威胁的对外政策。^⑩更明确地说,战后自由主义共识有两大支柱,一是改造后的新政自由主义,一是遏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冷战自由主义。正是由于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存在,使得新政的反对者在60年代之前不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对。

战后之初,新政时期的议题已经不再是美国政治中争论的最主要问题。整个50年代的民意测验都表明,外交政策问题已取代经济成为美国人民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由民主党总统杜鲁门提出的遏制政策为两党所接受,遏制国际共产主义成为第一要务。大多数保守主义者也加入了外交政策的共识阵营之中,孤立主义已没有市场。政治上的保守派更多地是在外交政策上

挑战民主党和冷战自由主义,指责民主党对苏联过于软弱,倡议对苏联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其极端的表现就是麦卡锡主义。但麦卡锡主义只能肆虐一时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稳固。50年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局面使得党派的差别模糊起来,正因为缺乏极化的议题,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才能从罗斯福联盟那里得到选票。1952年,艾森豪威尔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其进入白宫后几乎全部起用共和党的东部权势集团成员以及他奉行的中间道路即所谓的“现代共和党主义”^④等都说明,中西部和西部的保守派在共和党的党内竞争中处于下风,东部权势集团主宰着共和党的大方向。随着美国公众和共和党政府接受社会保障、赤字开支以及与失业斗争、肩负全球责任的外交政策,新政时期的保守主义立场再也没有市场。

在共和党内外的保守主义者眼中,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表明共和党的东部权势集团已经完全向新政集体主义投降。他们认为,要想让保守主义能在美国政治中取得进展,必须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他们必须清楚地界定自己的主张,以使保守主义的声音让美国公众听起来与战后自由主义共识明显不同,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把自己的观点重构为一种意识形态。第二,他们还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运动,动员保守主义的潜在支持者以重新获得对共和党的控制。在这两大方面,围绕在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及其于1955年创办的《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周围的战后新一代保守主义者都起着关键性作用。

就前一方面来说,虽然保守主义的核心关切自新政以来并没什么变化,但50年代的保守主义者从两个方面改变了他们对集体主义的反对:第一,在国际问题上,从“孤立主义”转向“反共”。应该说,在50年代的重建意识形态之前,保守主义者在

这一问题上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些人虽然认识到孤立主义不再可行,但又鼓吹一种“不干预主义”即使用有限资源的有限度的外交政策,因为他们害怕政治权力及其带来的无法预先料想到的后果。另一些人则要求全面动员,运用所有的资源与共产主义斗争。重建后的保守主义采取的是后一种干预主义,因为能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通过阐明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保守主义者最终能够把他们的政策与最初由民主党提出的“遏制”政策区分开。第二,在国内问题上,保守主义者则改变了他们反对“集体主义”和捍卫自由放任或“质朴的资本主义”的具体做法。他们以前总是批评大政府阻碍了经济繁荣,鼓吹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能对资本主义进行管制,但是自由主义共识和新政以来政府开支的增加恰与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步这一事实使得他们的立场并无号召力。所以在50年代,保守主义者改变了做法:从道德方面批评集体主义,为此他们使用了两种常相互矛盾的保守主义语言: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的自由至上主义;强调道德秩序和共同体的传统主义。^②

战后以来保守主义思想和学术著作在美国的大量出版,^③为新一代保守主义者重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努力提供了思想资源。而他们之所以会采用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主义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语言,主要是因为为他们提供思想资源的保守主义思想本身由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和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两支组成。以弗里德里克·海耶克、路德维格·米泽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几位重量级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强调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现代世界问题的根源在于个人自由的丧失,有限的国家是个人自由的先决条件。主要的自由是经济自由,个人使用其财产、花钱和出卖自己技能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第二,社会是自我引导之个人的结合(an association of self-

directed individuals)。社会本身并非整体,它没有作为一个整体的目标、利益或权利。任何界定一共同利益(a distinct common good)的努力都因其为集体主义提供了可能的基础,而损害个人自由。根据自由至上主义的假设,个人总是有自我控制和自我引导之能力。当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个人目标时,他们在社会中就能和谐地生活。第三,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私有财产、市场、围绕私人获益的经济生活组织——是对个人自由的主要支持,而个人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家对经济生活越来越多的指导。恪守传统主义的思想家和学者有理查德·韦弗、彼得·维雷克、拉塞尔·柯克、埃里克·沃尔格林、列奥·斯特劳斯等,他们的基本主张具有三个共同特征:1. 现代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具有神圣根源的道德秩序的信念的衰败和共同体的衰落。精神价值观的丧失使得人类不再有普泛的目标,生活的理由只剩下欢娱和成功的物质主义目标。像家庭、教会和共同体之类将个人连接在一起的共享信念和制度也衰落了。结果人们尝试以集体主义的政府去填补那些衰败和衰落留下的空白,但集体主义政府只提供了对归属感的虚假替代和非自然的乌托邦许诺。2. 社会并不仅仅是追求私利之个人的结合(association),它是道德或情感纽带、共享信念和公共美德(public virtue),正是这些使社会凝聚为一整体。维持这些共享信念的任务可能落在国家或如家庭、社区或教会之类的中间机构身上。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由需要这样一个社会。3. 信念的衰败和共同体的衰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关联的。由于道德秩序的丧失损害了自我控制的任何基础,人类只能屈从于外在的引导即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④

为了把这两种存在极大差异的思想合成一种内在连贯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国民评论》的编辑弗兰克·迈耶(Frank S.

Meyer)在60年代初期提出了“调和主义”(fusionism)。迈耶解释说,自由至上主义者对个人自由的关切和传统主义者对道德秩序和美德的关切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没有自由,追求美德是不可能的,因为除非可以自由选择,个人的行为不可能是合乎美德的;另一方面,没有更高的目标,自由只是空洞的。因此,在政治领域,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而在道德领域,它只是人类追求善的手段。这一论断能成立的关键在于,必须认为资本主义内在是善的甚或是神的命令。没有这一假设,就只能以唯物质论和世俗论调来证明质朴的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而这在50年代之前已经被证明是不起作用的。只要福利国家的集体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有效,对它的有效反对就只能是抽象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反对。因此,保守主义者基本上寻求使用传统主义的道德秩序和宗教作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他们说,自由和质朴的资本主义与对上帝的信念的衰败是同时发生的。但是,自相矛盾的是,质朴资本主义的世俗和唯物质主义结果一方面被说成是道德衰败的原因,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质朴的资本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并没有放弃它的消极的经济自由观、个人主义的社会观或质朴的资本主义观,它只是把它的论断放在了植根于宗教的道德秩序基础之上。传统主义几乎放弃了所有东西,除了它对道德秩序的强调。所以,最终迈耶的“调和主义”还是站到了反国家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一边。他强调,即便人们没有选择好的德行,他们仍可能是自由的。从思想上判断,迈耶的“调和主义”并没能解决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不过,无论这两者的结合是多么成问题,却为双方都接受了(其标志就是他们都接受了保守主义这一称号),毕竟他们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国内的集体主义和国外的共产主义,也因为调和主义是第一个能有效批判国内集体主义的

论断。据此,新一代保守主义者描绘了这样一幅资本主义图景:对利润和个人成功的追求既不会导致竞争市场的不完美,也不会带来对道德价值观的信仰的衰败。如果现实与此相悖,那也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政策、国家的扩展和不相信宗教的自由主义观念。²²由于《国民评论》在战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重建中的关键作用,我们不妨将重建后的保守主义称为“《国民评论》保守主义”。

在重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新一代保守主义者还积极组建政治组织以与共和党内以纳尔逊·洛克菲勒为首的东部权势集团争夺对共和党的控制权。1953年,弗兰克·绍得罗夫(Frank Chodorov)建立了第一个学生保守主义组织“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the 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Individualists),后更名为“校际研究协会”(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其主要活动是印发保守主义的著作。1960年,中西部保守派出身的共和党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为获得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与洛克菲勒达成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第五大街协议”,引起新一代保守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年轻的保守主义者更是将之称为“美国的慕尼黑”。同年9月,巴克利邀请80名青年保守派到他位于康涅狄格州沙伦(Sharon)的家中,共商如何挽救共和党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命运。会议决定成立“自由青年美国人”(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组织,以便把共和党的领导权从东部权势集团那里夺过来。会后发布的《沙伦宣言》还对整个50年代在保守派圈子里流行的观念进行了总结:自由的市场是“个人自由”的支柱;政府的权力必须被限制在维持秩序、主持正义和从事外交活动的领域之内;“国际共产主义”是对自由的最严重威胁,必须予以消灭。“自由青年美国人”很快就成为新一代保守主义的政治代言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加

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活动的先锋队,自1961年夏起担任“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执行主席职务的理查德·维格里(Richard Viguier)更是利用新的计算机技术通过“直接邮寄”筹款法为戈德华特募得巨额竞选资金。^④

戈德华特竞选活动是战后美国保守主义力量在政治舞台上的首次展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戈德华特是继塔夫托之后的共和党中西部保守派的主要政治代表,尽管他因其极其激烈的言论——比如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历届民主党政府的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甚至在贫困的阿巴拉契亚山区谴责反贫困措施,在老人众多的佛罗里达州攻击对老年人的医疗援助;他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更是让绝大多数美国人感到害怕,他一再宣扬要进行一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十字军远征”,“为了保卫自由”不惜发动一场核战争——而在竞选中惨败在约翰逊手下。但是,戈德华特竞选活动却为保守主义在70年代的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首先,竞选活动加强了保守派之间的联系与了解,培养了一批保守主义政治活动家和骨干分子。例如以后新右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格里和霍华德·菲利普斯(Howard Phillips)等,都以“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领导者的身份,积极支持戈德华特竞选,并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再如新一代南方保守的共和党人也是在戈德华特竞选活动中招募的。其次,竞选为保守主义阵营征集了新的支持者。来自快速发展的南加州和西南部的郊区选民的支持,以及从“阳光地带”的石油工业和航空工业的新贵中滚滚而来的竞选资金,都表明保守主义已经获得了新的选民和资金基础。戈德华特取胜的6个州中有5个位于南方这一事实说明,5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权革命已经重新绘制了美国的政治地图,为以后共和党的“南方战略”打开了大门。再次,竞选中采用的“直接邮寄”筹款法,为保守派日后的发展提供了

有利条件。这种筹款办法使得保守派活动家获得大量同情者的姓名和住址,为保守主义者在共和党内外的独立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美国保守派方面今后一切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基础”。最后,戈德华特竞选的失败也让保守主义者认识到,不讲策略地攻击广受欢迎的“新政”改革,无疑是不受绝大多数美国人欢迎的;保守主义要想在政治舞台上取得进展,就必须调整策略,抓住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②

总之,经过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新一代保守主义者重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参与实际政治活动的努力,保守主义在戈德华特竞选时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和思想力量。只是由于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根深蒂固,保守主义还不能取得更大的政治成就。不过,随着“动荡的 60 年代”的到来和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不满于动荡而与自由主义阵营决裂,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瓦解和保守主义在 70 年代中期后的东山再起指日可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德华特在选举中被击败的确是“保守主义黎明前的黑暗时刻”。^③

①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429 页;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dImagination: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0); pp. ix-xii. 屈瑞林的文化均衡观念起源于英国 19 世纪思想家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1822—1888)。阿诺德是英美文学现代传统的开创者,又是美国文化的“精神教父”,对美国高雅文学传统和新人文主义学派产生过巨大影响。屈瑞林的“自由主义想像”(Liberal magination) 发展引申了阿诺德有关“想像的理性”(Imaginative Reason) 的重要思想。在阿诺德看来,人类从高度统一和专制的封建时代进入“民主世纪”,难免有得有失,即获得思想自由,失去秩序与和谐。因此,民主文化健康平稳的发展“有赖于最优秀

思想的发现和保留”——而文学及其对生活的批评(即诗人和艺术家“想像的理性”)恰是“发掘闪光思想、鉴定良莠的最佳工具”。参见赵一凡《屈瑞林与纽约文人时代》,《读书》,1987年第8期。

② 关于这三种范式,主要参见 Arthur Aughey, et. al., *The Conservative Political Tradition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Printer Publishers, 1992), pp. 1—12。以下对三种范式的阐述除另有注明外,均出自该书。

③ Bernard Crick, “The Strange Quest for American Conservatism”, *Review of Politics*, 17/3 (1955)。

④ John Patrick Diggins, *The Lost Soul of American Politics: Virtue, Self-Interest, and the Foundations of Liberalis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 5。

⑤ 《美国自由的故事》; J. R. Pole, *American Individualism and the Promise of Progre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Alan Brinkley, “Liberalism’s Third Crisis”, *The American Prospect*, 6/21, March 21, 1995; Leonard Williams, *American Liberalism and Ideological Change*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⑥ George H. Sabine,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37), p. 606; Rab Bennett, “The Conservative Tradition of Thought: A Right Wing Phenomenon?” in Neill Nugent and Roger King, *The British Right: Conservative and Right Wigh Politics in Britain* (Farnborough: Saxon House, 1977), p. 14。

⑦ *Ibid.*, p. 11。作者认为,与大多数美国人将英国保守主义的特征归结为有机主义和社会演化论不同,除了怀疑主义和讲求实际(pragmatic emphasis)之外,在英国保守主义传统中,不会发现任何单一的一以贯之的(unifying)观念。

⑧ Samuel P. Huntington, “Conservatism as an Ideolog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1/2 (June 1957)。

⑨ Roger Scruton, *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 (London: Macmillan, 1980), p. 11。

⑩ Godfrey Hodgson, *The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A History of the Conservative Ascendancy in America*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66), p. 13.

⑪ 艾略特的层次划分参见罗伯特·尼斯贝,《保守主义》(邱辛晖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3—4页; Roger Scruton, op. cit., p. 11; Rab Bennett, op. cit., p. 20。

⑫ 转引自《保守主义》,第3页。

⑬ 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尔塔森和托马斯·E·克罗宁,《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261页、264—265页。

⑭ Alan Brinkley, “Liberalism’s Third Crisis”; 奥利维尔·如恩斯,《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闫循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11—12页。另见《美国自由的故事》,第7章。

⑮ 关于新政和进步主义传统的异同,详见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264页。

⑯ 《美国自由的故事》,第280页。

⑰ 转引自《改革时代》,第257页。译文略有变更,次序亦经过调整。其实,普通美国人对于新政的态度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希望在危难时能得到政府的救助;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政府的力量过大对他们的生活干预过多。1935年盖洛普的第一次民意测验表明,60%的人认为政府用于救济的开支太多。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实在是因为新政和联邦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以缓解经济困难的观念在美国不同寻常。1923—1929年间担任总统的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曾这样评价大萧条之前联邦政府的作用:“如果明天联邦政府停止运转,至少在6个月时间内,普通美国人毫无察觉。”那时的联邦政府在国内问题上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发发信函、发行联邦债券和向退伍军人支付退伍费等,而大萧条一来,这一切都改变了,也难怪对任何政府权力一贯抱有怀疑态度的美国人感觉不习惯甚至会反对新政。

⑱ Godfrey Hodgson, op. cit., pp. 48—50.

① Alan Brinkley, *The End of Reform: New Deal Liberalism in Recession and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5)。

② 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③ 关于现代共和党主义,参见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1986》,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21页;Alonzo L. Hamby, *Liberalism and Its Challengers: FDR to Reaga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19—139。

④ Jerome L. Himmelstine, *To the Ri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29—53。

⑤ 对战后新一代保守主义起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和著作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该书于1944年在美国出版,并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理查德·韦弗1948年出版的《观念有其后果》、彼得·维雷克1949年出版的《重温保守主义》;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保守主义著作大量涌现,主要代表之作有拉塞尔·柯克的《保守主义精神》、埃里克·沃尔格林的《新政治科学》、小威廉·巴克利的《耶鲁的上帝和人》、列奥·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和历史》、约翰·哈洛韦尔的《民主制度的道德基础》、罗伯特·尼斯贝的《求索共同体》、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等等。此外,柏克和托克维尔在战后美国思想界中的“复活”也极大地影响了新一代保守主义。

⑥ Jerome L. Himmelstein, *op. cit.*, pp. 45—53。

⑦ *Ibid.*, pp. 55—62;《美国自由的故事》,第432—433页;Godfrey Hodgson, *op. cit.*, pp. 86—90。

⑧ Godfrey Hodgson, *op. cit.*, pp. 93—95;《美国自由的故事》,第434—435页。

⑨ 刘绪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241页;另见Godfrey Hodgson, *op. cit.*, pp. 108—113;《美国自由的故事》,第437页。

⑩ 语出Godfrey Hodgson, *op. cit.*, p. 92。

第二章 动荡的60年代和 新保守主义的缘起

尽管“《国民评论》的保守主义”使那些对自由主义感到厌倦的部分青年学生耳目为之一新，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也象征着美国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东山再起，但战后的自由主义共识并未被撼动。令他们意想不到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美国的动荡和衰颓不仅为他们事业的成功带来了新的机遇，还为保守主义阵营增添了新的力量。其中一彪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人数虽不多，但个个都是文化名流、社会科学名家和论战高手，这些人在全国性新闻媒体中享有突出的地位，又善于通过在知识界乃至企业界有着重大影响的出版物宣扬自己的观念；而且，和许多满足于在观念世界中生活、学习和写作的老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直寻求在公共政策及作为公共政策之思想基础的观念舞台中乃至政治舞台上扮演更活跃的角色，因此，他们的思想和政治影响均十分巨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么一群人原本都是自由主义阵营的顶梁柱，其中一帮被称为“纽约文人”的知识分子在皈依自由主义之前，还曾是左翼激进派。用新保守主义者米奇·迪克特的话说，新保守主义是“一场思想运动，既包含对社会主义和过于活跃(hyperactive)的自由主义的强烈失望，也包含高度的爱国主义。我们中的许多人是前自由派或社会主义者，我们自认是力图使美国恢复思想和精神健康的人”。^①当他们从内部批判或攻击自由主义，并最终“叛出”或被迫“叛出”自由主义阵

营时,一直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公共哲学所受到的打击程度远甚于来自老保守主义的外部攻击。

一、纽约文人:从批判到拥抱 “美国和美国文化”

新保守主义的许多核心成员——如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及其妻子格楚德·希默尔法伯、内森·格莱泽、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诺曼·波霍雷茨及其妻子米奇·迪克特等——都属于于20世纪30年代初次亮相的“纽约文人”(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的第二代。纽约文人堪称美国的知识分子“权势集团”,战后一直代表着美国文化思想的主流。^②

大多数纽约文人是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才移居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的子弟(1881—1924年,移居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总数在240万,其中绝大部分聚居于纽约),20年代后期,像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屈瑞林夫妇、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菲利普·拉夫(Phillip Rahv)、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等第一代纽约文人已经入大学读书,正期盼着能大展宏图。赵一凡先生以生花般妙笔为我们描绘了这些“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的群体肖像:“这些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和纽瓦克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奋发读书上进,尽早脱离愁云惨雾弥漫的犹太社区,进入摩天大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和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③经济危机却碾碎了他们的希望。衣食无着,革命浪潮又风起云涌,^④向往革命也是自然之事。他们在奋力求生之余,忘不了以手上的笔来抒发心中的苦闷、对革命的向往,渴望为自己

也为他人找到出路,拉夫和菲利普斯主编的《党派评论》^⑤(*Partisan Review*)是他们的主要阵地。贝尔、克里斯托、格莱泽、李普塞特和欧文·豪(Irving Howe)等第二代,当时虽尚在弱冠之龄,但同样期盼革命。贝尔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在回忆中说:

1932年我13岁时,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the 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社青团是美国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的青年组织。我在纽约的贫民窟长大,母亲在一家服装工厂工作,从早忙到晚;我尚在襁褓之中时,父亲即已去世。周围能看见的一切就是“胡佛村庄”(Hoovervilles)——东河码头附近的铁皮屋,失业的工人住在临时搭建的房子里,在垃圾船里四处寻找食物。晚上稍晚时,我和一群男孩跑到西区(West Side)的蔬菜批发市场,去偷马铃薯或在街上捡撞破了的西红柿,……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⑥

30

不过,纽约文人虽然向往革命,却几乎都反对苏联的斯大林政权。^⑦30年代后期4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常春藤盟校采取了限制犹太学生的措施,贝尔等人先后进入学费全免的纽约城市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纽约贫民子弟中最聪明者的学校、“无产阶级的哈佛”——就读。在大学期间,这帮家境贫寒、天才过人、求知欲极强的少年并非仅是死读书,他们这帮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学生经常在学院的餐厅中集会,探讨人生、政治、哲学和社会之大问题,并与拥护斯大林主义的左派学生论战。他们经常阅读《党派评论》,并向第一代纽约文人求教。正是这种思想环境使他们糅合了犹太思想传统和俄式论战技巧,发展出让所有论敌都胆寒的,以凶狠、精确和深邃为特色的纽约

文人风格。^⑧

在30年代美国的知识界中,纽约文人虽资历尚浅,却较为独特。当时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三支: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他们忠于美国共产党、苏联和斯大林;进步主义者(Progressives),他们想急剧改变美国社会,愿意与共产党人及其组织合作;比较温和的自由派,他们支持社会和经济改革,而且在进步主义思想和新政改革的影响下。很多温和自由派曾希望对资本主义经济作更大的改革,甚至重构资本主义,不过他们对斯大林政权充满疑惧,这也使得他们不太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纽约文人的立场大致介于进步主义者和自由派之间,他们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他们既信奉马克思主义,又是现代主义文化观念的忠实信徒。“他们认为,造成人类痛苦和精神狂乱的最大根源,不是私人利润制度或资产阶级的暂时特权,而是现代生活中似乎难以摆脱的暴力和非理性。因此他们愿意致力于艺术表现和个人道德问题。”莱昂内尔·屈瑞林提出的“敌对文化”(adversary culture)观念更为精辟地概括了这一点。他写道:“任何研究现代文学的历史学家都认为作为现代文学之根本特征的敌对观念——事实上是颠覆观念——是理所当然的,他认识到他的明确目标是使读者远离大的文化强加的思想习惯和感情,为读者提供一个基础和视点,使读者从此基础和视点去评判和谴责,还可能是倾覆那个塑造他的文化。”相对于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而言,知识分子的敌对性是必然的,因为知识分子没有批判就没有创造。他们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对美国社会的激进批判都出于此一点。他们之所以反对斯大林主义,“不仅因为它导致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和长期恐怖统治,而且因为它鼓励‘现实主义的’小说和戏剧。”而“他们坚决认为,要建立一个真正高尚文雅的社会主义社会,艺术实验和知识自由的价值观是绝对的先决条件。”

同时,颇为矛盾的是,一方面他们自一开始就支持罗斯福总统和民主党的新政策,另一方面又反对当时美国自由主义的根本信念即相信工业发展和实用主义的改革,在他们眼中,这种观念不仅阻碍了革命的进程,而且其中的“功利主义意图有利于中产阶级平庸肤浅的艺术鉴赏力的形成。”他们蔑视美国对物质增长的崇拜,“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首先是道义上的;他们愿意在一个充满了庸俗的市侩作风、卑劣思想和政治操纵一切的时代为文学标准和知识分子的理想大声疾呼”,批判美国社会和中产阶级文化的庸俗和空虚。⁹

纽约文人激进立场的这种独特性,与他们的犹太身份和他们对美国文化的疏离感有莫大关系。作为移民子弟,他们视自己为外来者,与美国文化和社会的主流距离很远。他们发现自己游离于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第二代纽约文人欧文·豪(Irving Howe)所描绘的“父辈的世界”,这是一个他们永无法回归的世界;另一个是他们自感无法完全融入的美国社会。贝尔曾描述过身为犹太人永远游离于移民社区和美国社会之间的“双重意识”：“你总有生活在两个世界的感觉。异化一词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异化是现实的,这并不是说异化让你对这个世界感到愤怒,而是说你并非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不过,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他们心底里又渴望融入外部世界。正像文学批评家、第二代纽约文人艾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后来在回忆中表达的那样,他们既忠于民族的根子和激进主义的本能,又暗地里渴望走上波霍雷茨所谓的“世界上最漫长的旅程”——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的旅程(即从移民区进入美国主流、上流社会)。“这种心理上和文化上的紧张状态日益加剧,……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逃离犹太区的强烈愿望与对美国之梦的本能的和持久的尊重交织在一起。……对《党派评论》的一些先后同

人来说,从事写作不是为了保持自己激进主义渊源的信念,而是作为寻求‘通向外部世界的道路’的一种手段。”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大运动的国际主义视野对于力图超越自己生活的狭窄世界的他们来说,自然颇有号召力,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毕竟只有它们看起来有希望能为他们提供“通向外部世界的道路”。³⁹

正因如此,当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束了美国的萧条,而战后的长期繁荣和稳定亦使纽约文人们能循正常途径顺利地踏上“通向外部世界的道路”并最终完成“世界上最漫长的旅程”时,激进色彩的消退自然就可以理解了。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的教育科研机构一直迅猛发展,为文人学者提供了优厚待遇和发展基地,一度对犹太人封闭的学术机构大门敞开了。即使像贝尔等没有正式博士学位的年轻才俊也可以在大学里谋得教职,贝尔和格莱泽进入了芝加哥大学,豪进入布兰代斯大学。他们的长兄们同样不是被大学聘去,就是被全国性刊物所招募。同时,他们在《党派评论》等刊物上发出的声音也越出纽约,他们也被知识界承认为独特的一群:按照豪的说法,他们是美国的第一批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读书人群体,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政治关切。他们部分是街头斗士,部分是学者,他们的风格合工人阶级的街上悟性(street savvy)和思想玄思(sophistication)为一体。20世纪50年代,才能和活力所向披靡的他们事实上已成为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界的中坚力量,他们“占领着文化高地,界定文化争论的术语和范围”。随着他们倡扬的现代主义支配“高雅”文化,纽约文人正远离左翼激进立场。现代主义及其屈瑞林所说的“敌对文化”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美学现象,失去了它曾有的政治色彩。⁴⁰

纽约文人的转变也受战后整个自由主义知识界趋于“保

守”的影响。这种保守性主要表现为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并参与缔造了战后的自由主义共识。在缔造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过程中,两位对纽约文人影响极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起了最突出的作用:神学家、社会批评家、政治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hbur)和哈佛年轻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e M. Schlesinger, Jr.)。就国内的大政方针而言,随着战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强调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积极和有效的方面,支持改良运动。40年代后期,大多数自由派已经视自己为冷静的、讲究实际的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们接受资本主义的存在,拒绝革命变革,支持逐步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使体系的受益面更大、更平均。小施莱辛格在1949年出版的《生死攸关的中心》一书中的看法可以代表大多数自由派的想法。他说,自由主义者应该首先避免愚蠢的反动和空想的激进,去寻找政治生活“生死攸关的中心”。小施莱辛格认为,由于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生效,美国经历了一场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此,他写道:“新激进主义的预言家是凯恩斯,而不是马克思。”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已不同于老的资本主义;它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消弥了阶级冲突,使社会问题能像工业问题一样得到合理解决。^⑫

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在美国战后该如何处理它与战时盟友苏联的关系方面,自由主义知识界主流最初并无一致看法。从30年代到二战末期,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苏联的态度一直游移不定,往往随着所发生的事件而摆动:大清洗时,斯大林政权是邪恶的极权主义;西班牙内战时,苏联又变成了惟一个抵抗纳粹的国家,是进步力量的惟一希望;苏德签约后,苏联又成了与法西斯德国沆瀣一气的坏蛋;美国参战后,苏联却俨然成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斯大林式翻版,斯大林也再非杀人如麻的魔王,

而是整日叼着烟斗、眯眯笑的“乔大叔”。在战后之初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大辩论中,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茫然不知所从。抛开对他们根本无任何号召力的孤立主义不论,他们不知道是该支持杜鲁门政府内部大多数官员——以“遏制之父”乔治·凯南为代表——日渐强硬的对外态度,还是该听信罗斯福辞世后新政派的领袖亨利·华莱士要求保持同苏联合作共处的主张。正是在这个时候,被乔治·凯南称为现实主义“众人之父”的尼布尔开始站在凯南一边。尼布尔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坚决维护民主制度(原因是他认为,只有民主实践才鼓励人们揭穿假象),由此衍生出他著名的民主政治定义:“民主政治是对不可解决的问题的最近似的解决。”所以,在面临纳粹威胁时,他坚持:“尽管我们的文明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仍然有权利和义务去捍卫它,使它不被更坏的选择代替。”^③虽然,尼布尔在二战期间对苏联的态度和大多数自由派一样游移不定,但他1946年9—10月间的欧洲之行特别是在德国苏占区的所见改变了他对苏联一度抱有的温和立场。他从欧洲回来之后,立刻加入了当时反苏阵营的大合唱。他坚持认为,美国必须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但同时必须防止核战争。他认为,尽管立宪民主社会有各种缺点,但它与少数人掌权的共产党社会相比,则显然是一种优越的政治组织形式。尼布尔在当年10月那一期的《生活》(Life)杂志上,撰写了名为“为德国而战”的文章,批评了美国自由派中的混乱情绪,同时指出,自由派混乱和焦虑的根源在于他们的不完美。尼布尔以更为简明的语言表达了他在以往两部著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和《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中的哲学观念:“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都不像它显现的那样美好”,任何追求完美世界的政治都属乌托邦政治,因为人的罪恶本质使得政治上的完美世界是不可能的。但对自己信

念的矛盾并不能成为对敌人软弱政策的借口；即使自由主义是不完美的，自由派也不能放弃他们的“事业”（cause）。随后几年中，尼布尔和小施莱辛格一道不断发表文章，表达对民主和自由主义及其在与苏联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必胜的强烈信心；到1948年时，他们都开始宣扬坚决抵制苏联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1949年，小施莱辛格《生死攸关的中心》的出版，标志着美国文化思想界自由主义对外政策共识的形成，这一共识的基本点就是坚决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¹³

纽约文人从造反革命走向妥协顺应还因为他们理想的幻灭，对斯大林主义的长期批判以及苏联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就贝尔、克里斯托和格莱泽等人的思想转变而言，尼布尔的著作对他们影响甚大。正是尼布尔的思想才让他们开始怀疑一切意识形态的乌托邦，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1988年再版后记中说，当他发现纳粹和苏联的集中营——“一种超乎所有文明人想像的野蛮”——使所有的乌托邦景象都蒙上一层死亡的阴影时，尼布尔的解释足以解他及其朋友的心中之惑。正是尼布尔让他们“从这些可怕的活动看到了周而复始的人性的奸诈，看到了人类的双重性。当现代人越过限定的边界时，他便寻求自我的无限性并以盲目崇拜告终。”克里斯托在1993年说，尼布尔给了他避免落入乌托邦主义的“所有好理由”。在认清激进意识形态的虚妄和乌托邦性质的同时，美国在二战中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以及最终的胜利使他们对“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力量和可能性有了新的认识”，对美国的信念（Americanism）填补了他们因怀疑马克思主义而出现的思想空白，这帮年轻人开始更为赏识美国民主的实际主义（pragmatism），因为美国民主的实际主义并不许诺乌托邦式的目标，而是释放出更大的政治自由。在他们看来，捍卫美

国的政治和文化价值观念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观念才是思想自由的根本。1952年,《党派评论》主办了一次名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研讨会,明确宣称知识分子与国家要建立一种新的积极关系。在发言中,屈瑞林肯定了知识阶级应有的自主意识和社会责任,但责任不在于直接治国参政,而是为社会提供长久价值和思想方向。克里斯托把知识分子比作中世纪神父,因为二者都是社会准则和思想合法化的象征。贝尔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为发展文化、延续传统,必须也只能靠知识阶级作释谜者和监护人。在对研讨会的总结中,《党派评论》的编辑们写道:

美国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用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美国
和美国的制度,……就在十多年以前,美国还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敌视文化和艺术的国家。从那时起,潮流已经变了,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现在觉得他们与国家及其文化靠得更近了。……从政治上看,这就意味着他们认识到美国的民主有着真正的积极价值:美国的民主不仅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神话而是一个现实,我们必须通过反对俄国的极权主义来捍卫这个现实。

纽约文人的新秀波霍雷茨在1967年出版的自传体回忆录《成功》(*Making It*)中写道,纽约文人们,“兴奋异常地发现新的可能性突然以排山倒海之势涌现在他们面前,无论是生活上还是思想意识上,都有新生之感。过去他们对于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似乎都不屑于看它一眼,而现在每个人都摘掉了马克思主义的有色眼镜,蜂拥向前去看看这个被他们鄙弃的世界。”^⑤

总的来说,当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尚“伫立在生活边陲、

渴望着踏入门槛”的“外省青年”一旦“获得新生”，立刻就成了他们过去所鄙弃的世界的坚定捍卫者，成为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支持者。一方面，他们坚持必须对美国社会进行改革，作为大萧条的孩子，他们一直支持民主党和罗斯福的新政。克里斯托在1995年强调他们与巴克利《国民评论》的保守主义之区别时，写道：“我们都是大萧条的孩子，大多数人是在城市长大的犹太人，来自中产阶级下层或工人阶级家庭；对于我们来说，30年代是令人绝望的年代。我们忠于新政的精神，如果不是忠于新政的所有项目和政策的话。我们并不认为新政是对美国民主的国家主义或社会主义威胁。”同时，他们又视自由民主制和美国民主制度为进行社会改革的最佳框架。格莱泽在1970年回忆说：“我们珍视这个国家，珍视它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它处理复杂的国内问题的能力，它维持民主程序的稳定性，它的变革和矫正能力。”^⑩另一方面，由于敌视斯大林政权和共产主义，他们从一开始就支持尼布尔和小施莱辛格的冷战自由主义。过去的激进经历使他们自认更了解“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波霍雷茨在1996年指出，老保守派虽然反共，“但是他们对外来侵略的担心比不上对内部颠覆的忧虑。这似乎是因为企业家从未实际接触过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的头脑中，苏联就是一个巨大的管制机构，拥有核武器的巨型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而新保守主义者对共产主义都有亲自经历，了解它所代表的极权主义邪恶。”在冷战时期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纽约文人们一直是其中的主将。1950年在西柏林成立的争取文化自由大会，是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反共知识分子的国际组织。胡克是这个组织的美国支部“争取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小施莱辛格、屈瑞林、贝尔等都积极参加了该组织的活动。1954年，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机

构为了反击英国左翼刊物日大的影响力,创办了《邂逅》(*Encounter*)杂志,经过挑选和秘密审查后,克里斯托被任命为两主编之一。^⑦所以,当麦卡锡主义大肆迫害前左翼知识分子时,纽约文人非但未因左翼背景遭受株连,反而以攻为守,于万马齐喑之际领唱民主自由之歌,从此当上自由派喉舌、美国民主的捍卫者、既反左又反右的社会中坚。

当然,并非所有的纽约文人都赞同这种转变,毕竟正像豪所说的那样,与其说纽约文人是群体,不如说他们是联系松散的个人。事实上,从一开始,在对美国和美国文化的态度上,纽约文人就分为两个阵营:一是最初由德怀特·麦克唐纳领导的“理想主义”一派,他们自认是永久的持异见者,永远反对主流文化的批评家;另一派是更注重实际的一派,他们最初以西德尼·胡克马首是瞻,认为永远处于反对的位置并无益处,希望以怀疑的眼光肯定文化来重塑世界。贝尔、克里斯托、李普塞特和格莱泽等人与注重实际的一派更为接近,而豪更具理想主义色彩。为称呼之便,我们不妨采纳一位研究者的叫法,将他们分别称为“持异见者”(Dissenters)和“肯定者”(Affirmers)。《党派评论》1952年的研讨会之后,豪在发现自己的旧友都开始肯定美国社会后,指责他们背弃了激进主义和批判精神。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是自始至终地批判社会,批判捍卫美国现状的自由派的反共主义。豪因对《评论》和《党派评论》的政治倾向不满,于1954年创办了《异见》(*Dissent*)杂志。^⑧

尽管这两派在许多问题上有重大分歧,但是在外人来看,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掩盖了他们的分歧:他们考虑同样的问题,面临同样的敌人,有相同的分析风格。40年代和50年代,他们认为斯大林主义者及其同路人是他们最大的敌人;60年代,除了麦克唐纳、梅勒(Norman Mailer)等少数人支持学生的造反运

动,大多数人特别是“肯定者”都坚决反对60年代新一代的激进浪潮。这股激进浪潮的每一个方面——完全背弃了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精神的越发好斗的民权运动、反主流文化的性、毒品和摇滚乐的三位一体、严重削弱美国与共产主义斗争之意志的反战运动、全方位地挑战权威以及更为根本的对美国信心的丧失和对美国信念的摒弃和斥骂——都让他们极不舒服。在他们看来,60年代过头了,同时自由主义的某些关键方面又被放弃了。因此,他们与自由主义的决裂和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开始既是对60年代过度的反动,也是他们坚持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结果。他们既反对新左派的激进要求和行为,也反对自由派对激进的纵容和安抚。他们认为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是民主的过度,而且丝毫不尊重权威。他们认为政府的社会政策过于大包大揽,导致了超载(overload)。他们发现了一个自由派社会工程师(social engineers)的新阶级,这些新阶级正试图通过政府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他们还认为政府中的自由派已经忘掉了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个人自由、冷战自由主义的反共共识。高唱平均主义之歌的政府项目和管制几乎使自由窒息了;自由派已经忘掉了四五十年代的冷战斗争和反对国内共产党影响的斗争留下的教训,越南战争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看起来已经丧失了坚定性和政治意志,由于美国决心的丧失,在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精心培育起来的遏制共产主义的体系很可能崩溃。由此,纽约文人中的肯定者开始了更为趋向于保守主义的转变。

二、60年代和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瓦解

戴维·斯代格瓦尔德(David Steigerwald)说,60年代是现代美国和后现代美国的分界线。无论是否赞同他的观点,恐怕没人会否认60年代是战后美国的转折阶段:之前的50年代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堪称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70年代的美国则饱受经济滞胀之苦,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和军事老大地位也受到挑战,颓丧和普遍茫然不知所措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感觉。这里所说的60年代并非依据时间序列划分,而是如同历史学中大多数时期划分那样(像“漫长的16世纪”、“漫长的19世纪”或“短暂的20世纪”之说),以其发展(developments)的内在连续性和变化以及时代精神而定。据此,60年代应开始于1955年,以1974年尼克松总统的下台为终,为时20年之久。这一“漫长的60年代”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50年代中期到1965年,这10年中发生的大多数重大事件——民权运动、1962年最主要的新左派学生组织“学生争取社会民主组织”(SDS)的建立、1964年选举中民主党自由派赢得国会的多数,《民权法案》和《医疗保健计划》(Medicare)的通过、“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宣战”计划的开始——都使我们有充分理由把它作为“进步主义时期和新政迟来的延续”,换言之,贯穿这10年的主要议题就是社会改革。^①

促使社会改革的直接诱因有二:一是要解决贫困问题。1962年,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发表了《另一个美国》,书中揭示的贫困现象让在50年代曾沉浸在沾沾自喜、歌颂美国普遍富裕的言论氛围之中的美国人感到震惊。为了使

穷人加入美国社会和经济的潮流,美国史上最年轻的当选总统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宣誓要发动一场反对“贫穷”的斗争,约翰逊政府则更进一步“向贫困宣战”,建立一个“伟大社会”。其二,在民权运动的影响下,解决黑人问题(黑人问题和贫困问题在某些方面是重合的)。1955年12月开始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罢乘运动揭开了民权运动的大幕。最初10年间,民权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取消种族隔离、使黑人获得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小马丁·路德·金使用一种弥合种族间的沟壑、将黑人的经历与美国的历史融会在一起的语言,向白人社会讲述了黑人为什么此刻要争取平等权利。他成功地打动了美国白人的良心但又没使他们感到危险或受到威胁,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包括许多南方白人都认为应该结束南方法律上的种族隔离、给黑人以法律上的平等地位。60年代早期,北方大力支持南方的民权运动:福特、洛克菲勒兄弟等大基金会提供资金,而主要媒体提供舆论支持。美国社会的潮流不仅支持民权运动,还支持政府为了解决贫困问题和黑人平等权利问题而进行的社会改革。企业界领导人受民主党政府上台以来的经济繁荣的鼓舞,平静地接受了约翰逊和政府的主要立法倡议。1964年约翰逊竞选费用的3/4就来自企业界,企业界并不反对《医疗保健计划》(只有美国医药协会反对)、积极支持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宣战”计划,他们认为这将为新的私人投资创造需求。当约翰逊“向贫困宣战”计划的一部分“样板城市项目”(Model Cities program)在国会遇到困难时,22家主要大公司的经理站出来为他说话。在支持社会改革方面,企业界还和工会、知识界进行合作。1964年12月,约翰逊任命由来自这三方的人员组成“全国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步委员会”,18个月后,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报告,建议政府实行确保年最低收入的项目和大规模工作培

训项目。国会中的政治力量对比也有利于改革。1958年的经济衰退帮助民主党将在众议院对共和党享有的优势席位从35个增加到129个,8个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失去了在参议院内的席位;1960年的另一次经济衰退帮助肯尼迪赢得大选。1964年大选,民主党自由派自1936年以来第一次控制国会:众议院新当选的91名众议员中,大部分是自由派,长期以来南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国会中结成的保守派联盟被瓦解。选举后不久,众议院就成功地限制了长期以来阻碍社会改革立法的法规委员会的权力。这样,50年代以来的两党政治平衡(更恰当的说法应是赞成社会改革的自由派和反对社会改革的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均衡)被暂时打破,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革的政治条件就有了。^③

这一阶段的总体精神是乐观和对社会改革的信心,我们不妨将之称为“乐观的60年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乐观的60年代”更像自我陶醉和志得意满的50年代的自然延续:“美国拥有无限的力量,它无所不能,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最能代表这种精神的是1964年发布的一份名为“三重革命”(The Triple Revolution)的声明,当年3月,32位社会科学家、科学家、工会官员、企业家、政治活动家将他们联合起草的声明递交给约翰逊总统。声明说,3个独立但又相互加强的革命正在发生:“自动控制革命”,将会带来一个对劳动力需要越来越少的、具有几乎无限生产能力的体系;“武器革命”,将消灭作为解决国际冲突手段的战争;“人权革命”,创造对完全的人类权利的普遍需要。即使是60年代后期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的新左派,同样抱有乐观情绪和对社会改革的信心。哈灵顿《另一个美国》中的政治经济假设和50年代颂扬美国富裕的《丰裕社会》是一样的:正在变得高度自动化的美国工业能够生

产出充裕的物质,但陈旧的政治和经济安排正阻止许多美国人享受它的果实。1962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最重要的新左派学生组织——在发布的《休伦港声明》中,尽管批判了美国社会的体制,认为美国的现行体制充斥着邪恶,但是声明同时也认为对美国社会的道德观和体制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改革完全可行,并提出了建立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改革设想:“我们寻求建立一种个人参与的民主,这种民主由两个中心目标为指导——一是个人应该分享那些决定他生活的质量和方向的社会决定;二是社会应该组织起来,鼓励人们的独立自主,并为他们的共同参与提供途径。”²¹

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富有活力和干劲的年轻总统肯尼迪号召美国人民去开拓“新边疆”;继任的约翰逊则将肯尼迪的万丈豪情转化为建立“伟大社会”的实际行动,以此来大力推进肯尼迪的未竟之业并不断扩大越南战争的规模。肯尼迪和约翰逊当然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般地蛮干,而是躬身求教于专家学者与社会科学家,欢迎他们为建设美国献计献策。美国知识分子本来就一直支持民主党,新政府的姿态愈发鼓舞了他们的参政议政热情。社会科学家们积极响应号召,各显其能,著书立说、办杂志、撰写普及和宣传性的小册子、在报纸上发表评论。一时之间,美国知识界充满乐观的议论,他们对社会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和有用性深信不疑,对美国政府的能力同样深信不疑,认为只要政府认真听取社会科学家的建议,把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就一定可以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全面地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然而好梦难长,现实无情。约翰逊政府的两大举措——“伟大社会”和越战——皆不仅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就,反而“刺激和激发了令天下大乱的力量,使60年代的美国备受折磨”。²²

1965年洛杉矶市瓦茨区的黑人暴动和约翰逊总统将越南战争升级的政策标志着60年代第二阶段的开始。这是一个充满着动荡、激进和叛逆的时期,其最基本的特征用贝尔的话说,就是“被一种共同的叛逆冲动联合起来”的政治和文化激进主义。

政治激进主义,归根结底,不仅是叛逆性的,而且还是革命性的,它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以取代旧秩序。文化激进主义除了在风格和布局中的形式革命外,则基本上是叛逆性的,因为它的冲动来自愤怒。²³

叛逆、愤怒也好,革命也罢,总之这一阶段是“动荡的60年代”。

为了建立一个伟大社会,约翰逊政府在1965—1966年间制定并推动了大量的社会立法:《投票法案》、向穷人和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服务的医疗补助制度和老年保健医疗制度、资助教育、住房和城市发展项目、提高社会保障的受益额度、扩展多方面的反贫困措施,甚至建立了全国艺术基金和全国人文基金来资助文化事业。同时,约翰逊还特别注意民权运动的新发展。1964年,国会通过了取消种族隔离和肯定黑人享有法律上平等权利的《民权法案》后,经济问题上上升到民权运动议程的主要位置。金宣称,美国在“对黑人进行了数百年的刻意剥夺和压迫”之后,现在有责任“为黑人刻意做些什么”。为解决贫困问题颇为急迫的约翰逊也认识到,黑人贫困与白人贫困从根本上是不同的,因为黑人贫困的根源在于“过去的非正义和目前的偏见”,为此,他先是在1965年6月4日霍华德大学的演讲中暗示政府要为黑人提供特别帮助:“我们要争取的……不光是作为一种权利的平等和一种理论的平等,而是作为一个事实的平等

和一个结果的平等。”接着,同年9月24日,他签署了第11246号行政命令,将1961年肯尼迪总统签署的第10925号行政命令和1964年《民权法案》中的反种族歧视与照顾措施确定为更为全面的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该计划要求雇主积极通过广告或特殊的招募方式寻求合格的申请就职的少数族裔,这些申请就职的少数族裔的人与任何其他申请就职者一样平等地接受以不分肤色为原则的挑选。“伟大社会”是联邦政府自重建以来对美国公民权利提出的最重要和最全面的保护,极大地扩展了联邦政府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环保、教育和人文艺术扶植方面的责任和功能。联邦政府介入了许多传统上属于州和地方管理的领域,如中小学教育、地方治安等,还建立了成人职业培训、环境保护监测、社区反贫困以及健康计划等。从其福利政策的覆盖范围、联邦政府对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介入程度和对以后的影响来看,主要由社会科学家参与制订的约翰逊的伟大社会项目代表着60年代中期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顶峰,也反映了战后“增长的自由主义共识”所带有的乐观主义情绪:随着一个不断扩张的经济,美国人“既能创造国内的进步,又能满足起担负外部责任的要求”。^③

尽管约翰逊抱着良好的愿望且投入巨资,但由于不断扩大的越南战争耗资甚巨、项目本身存在的问题(在国会通过的速度过快,不可能对其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其意识形态含义作更为仔细的考察)和项目执行过程中官僚机构的浪费、腐败和敷衍了事,伟大社会的许多项目收效甚微(1967年,伟大社会计划的许多项目由于政府不堪重负而被迫停止实施)。1966年底,公众的不满在当年的中期选举中初露端倪,民主党在众议院失去了47个席位。让约翰逊更为伤心的是,他所着意照顾和安抚的黑人似乎并不承情。1965年洛杉矶市瓦茨

区的黑人发生了骚乱,自此开始到1969年,北方许多城市黑人聚居区每年盛夏都固定地爆发黑人的暴力示威,暴乱人群捣毁商店、掠夺财物、焚烧街道房屋,迫使联邦政府不得不派出军队和警察进行暴力镇压。1968年金被暗杀后,黑人运动更趋激进,许多人变成了暴力起义者。他们认为北方黑人区是第三世界的殖民地,必须采取行动将其从白人帝国主义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²⁵

与此同时,1965—1967年间越南战争的大规模升级,不仅使同时进行消除国内贫困和越战变得越发不可能,做出扩大侵越战争决定的约翰逊亦面临着难以克服的政治困难,还引发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反战运动。随着北方城市贫民窟黑人暴乱的扩展,反战运动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规模,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公然反对和拒绝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美国社会中最遭排斥的成员要求得到享受所有社会福利的完整机会,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断然拒绝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这两种力量交汇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具有爆炸性的联合力量并表现为反对一切现存权威、机构、主流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使美国社会面临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危机。

被称为新左派的白人青年抗议运动(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新左派运动已发展为包括各式各样社会主义团体、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平运动在内的大杂烩,它的参与者、领导者和支持者既有青年学生,也有年龄稍长的知识分子)发轫于大学校园之中,从一开始,这场“现代乌托邦革命”就既批判传统左派,又反对并要求改革美国的现存体制。他们关心的问题不是传统左派所看重的经济贫困、阶级斗争和社会公民权,而是孤独、与世隔绝、异化、在官僚机器面前的无能为力以及富裕生活所无法满足的对真实的渴望。不过最初的学生抗议活动仍是局

部的,真正彻底地将学生抗议运动转化为整整一代人全方位反叛的是越南战争和反战运动。一方面,60年代进入大学的学生满脑子都是这样的信念:美国的使命就是创造一个像它那样的民主世界。但在越南,美国正在支持一个腐败的独裁政府,显然违背了要在越南举行选举的1954年《日内瓦协议》。美国的实际所为和美国理想之间的明显矛盾以及战争中双方的大量伤亡,使他们越发质疑战争在道义上的合法性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冷战共识。另一方面,官方表面上的乐观主义——约翰逊政府为它扩大越南战争规模的借口是“再走一步”美国就会取得胜利——与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不相合,约翰逊政府为了扩大越南战争而不惜欺骗美国公众和国会的做法使学生们不再相信政府,乃至国家。在1965年11月第二次全国性反战集会的演讲中,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主席卡尔·奥格尔斯比强烈批判了美国的总体外交政策,他认为中央情报局对危地马拉和伊朗内政的干涉、美国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约翰逊当年夏天派兵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决定和越南战争一样都来自一种反共偏狂症。他说,有人也许会感到“我的话听起来是反美国的;对这些人,我的回答是:不要为此而怪罪我!怪罪那些出卖了我的自由主义价值的人吧,怪罪那些令我的美国心破碎的人吧”!他进一步明言:越南战争说明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腐败,除了革命似乎别无选择。他后来回忆说,1965年是美国新左派运动“明显放弃改良主义”,开始走向“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的长征的一年。1965年的华盛顿反战游行之后,新左派学生的抗议活动已经成长为全国范围内的学生运动。1966年春,约翰逊政府征召学生入越作战的决定,不仅直接导致学生反战运动转入校园,还促使反战运动带有越来越多的暴力、好斗的色彩。年轻的学生们不愿意去离家万里之遥的湿热丛林中为了一场没有任何道义

合法性的战争浪费自己宝贵的青春,甚至流血、牺牲。反战运动由抗议转为抵制,并在1968年进一步变为政治暴力斗争。1968年1—5月,全国发生10起校园建筑被炸事件。4月下旬,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暴动震撼了美国社会。随着改革美国的梦想在现实面前的破碎,满腹困惑疑窦、忧虑不安的青年学生们一方面寻找各式各样的“英雄”,将第三世界的革命奉为膜拜对象;另一方面,把大学作为社会的象征,将一腔怒火洒在校园里。他们扛着“解放”(liberation)的大旗,藐视权威,横扫传统,罢课游行,甚至捣毁校舍教室,与校方对峙,与警察冲突,终于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学生们的抗议和愤怒与来自其他方面的反抗源流(比如新右派)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后人所称的“反主流文化”——摇滚乐、毒品和性的三位一体以及“另类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意味着对传统价值观的抛弃;拒绝接受传统的行为方式和原则,代之以重视自发性与自我表达;以贬低功利主义,寻求强调自我实现和对社会做贡献的工作来代替传统的职业、成功、金钱的观念。反主流文化的内容并不止于上述那些斑驳陆离的表象,对年轻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个性解放,而这又意味着否定他们前辈所创造的世界,将自己从官僚化的教育和呆板无味的工作、虚伪不实的社会习俗和由大众传媒操纵的政治中解脱出来,最终使自己从那个打着自由旗号而实际上给美国人民、受欺辱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军事化国家中解脱出来。正是越南战争才使得这种广泛的文化冲击以如此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不是战争粉碎和动摇了权威机构的合法性,这种一代人对主流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的反抗是不可想像的。^④

1968年,似乎所有把美国搅得不得安宁的事件——越南战争和反战运动、校园内的暴力、城市骚乱等——都在这一年爆发

了：越共的春季攻势，原本不愿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尤金·麦卡锡在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初选中却凭借反战主张几乎击败在任总统约翰逊，约翰逊退出民主党总统提名，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城市骚乱；学生在校园内的抗议和暴力活动，另一位赞成美国不要在越南战争中升级、并主张给予黑人更多优惠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的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在加州初选中，击败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之后遇刺身亡。看起来，美国正在四分五裂。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在绝望之中对自己的学生说：“美国已经成为地球上使人感到恐怖的国家。”²⁵

60年代的诸般事件导致了战后自由保守主义共识的瓦解。一方面，越南战争和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美国人的分裂和冷战对外政策共识的瓦解。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和60年代早期，美国公众无论是精英还是平民百姓，都心照不宣地支持美国在东南亚的干预。实际上，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越南正在发生什么事，他们并不关心远方的对外政策冒险。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冷战政策对保卫美国在越南的国家利益，促进世界范围的民主、自由和正义是必要的。因此，受到政府和社会中大多数人支持的美国总统如果坚决认为，越南对于美国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它正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若不遏制这种威胁，东南亚的自由国家将会陷落，那么美国人民一定会支持他的。1968年越共的春季攻势之后，大多数美国人已不再支持战争。大多数普通美国人反对政府及其在越南的政策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战争的继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西贡政权的生存对于美国不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不应该为之承担巨大的代价，并损害美国国内的安全、福利及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他们的想法与支持并参与反战运动的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成员

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和反主流文化成员反对社会主流在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反共问题上的舆论一致,认为正是这些信念导致美国卷入越战。在他们的反战宣言中,充满了义愤之词,带有与美国社会制度和主流政治文化对立的激进色彩。越战被他们许多人看作美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产物,美国政府关于拯救南越人民免受侵略和奴役、帮助他们实现民主和繁荣云云全是谎言,美军杀害成千上万的百姓、毁灭村庄和农田,并使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才是越战的真实。他们不仅反对美国的战争努力,而且同情或赞扬越南革命(到后来则演变成将第三世界的各种革命都看成是“为人类自由的斗争”)。激进的反战人士很快就将批评伸展到道德层面:第一,从道德上讲,河内与西贡之间差别实在不大,因此没有必要以意识形态理由去打仗;第二,美国坚持作战下去,不是反映其实际判断差劲,而是美国体系核心的道德腐败。曾访问过河内的海登和激进派历史学家林德(Staughton Lynd)说:“我们拒绝再当反共人士。我们坚信这个字眼已经丧失了它过去具有的明确内涵。它却成为一种主要的抽象思想,美国人用来替其未必高明过强奸的外交政策做辩解。”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越战在国内所遭受的最猛烈抨击倒不是来自这些“毛孩子”,而是自由主义知识界,涉及到在此之前许许多多最忠心维护美国在国际上采取理想主义的人士。美国最主张国家利益的政治哲学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也公开宣称,越南战争证明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加选择地干涉全世界的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明智之举是重估美国的力量,审慎地决定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次序,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反共原则”的关系,改变那种由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和对美国力量的盲目依赖而决定的到处干涉的做法。否则,像越南战争那样将“反共原则”置于国家利

益之上,不仅会损害国家利益,而且战争本身甚至就是邪恶不正的:“当我们谈到违背战争规则时,我们必须谨记住,最基本的违背之举,莫过于从事这种战争,而因此带来所有其他违禁之措施。”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同样认为,美国业已过度扩张本身的实力,遏制政策摧毁了国家目标以及藉以达成目标的资源之间合理的均衡关系:“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以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贏。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此种情势使得后来的一位研究者认为,60年代末期的美国已成为“政治—文化上的越南”,“知识分子游击队员们正在颠覆美国”。²³

在与冷战对外政策共识瓦解同时发生的对外政策大辩论中,出现了三股思想潮流,国际政治学家霍尔斯蒂和罗森瑙分别称之为“冷战国际主义”、“冷战后国际主义”和“半孤立主义”。(另一位政治分析家威廉姆·施奈德则使用了不同的名称:“保守主义的国际主义”、“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和“非国际主义”,名称虽不同,但实质是一回事。)保守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右派一般支持冷战国际主义,其一般倾向是认为苏联指挥下的国际共产主义依然是美国安全和世界秩序面临的最主要全球性威胁,这就要求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存在。不过,对于苏联威胁的严重性及美国应对外交政策战略,他们的看法并不一致。较为极端的一派通常将共产主义视为铁板一块,希望在国内大规模地重整军备,对外部共产主义采取进攻性的击退政策;多数人则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铁板一块,他们强调通过防御联盟和遏制战略来遏制苏联;较为温和的人强调的是苏联作为一个强国对全球稳定的威胁,而不看重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赞同一种有选择地进行遏制的现实政治或实力政治

战略,这就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倡导的政策。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左派则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且相互依赖的世界,他们相信重要的是不仅要致力于对付东西方冲突,也要解决西西问题(包括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和南北问题。虽然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通常都赞成为了促进全球稳定、和平与繁荣,必须减少有关苏联威胁和使用武力的冷战偏见。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通常强调促进美苏关系的稳定,提倡军备控制和其他建立信任的措施,同时强调有必要同欧洲、北美和亚洲建立经济合作关系及发展一种自由经济的世界秩序;他们还往往注重人权、民主以及外交在解决争端和冲突中的作用。“半孤立主义”跨越了不同的政治流派。赞同这一倾向的人承认这个世界变得越发复杂,认为美国要影响这个世界是有困难的。因此,他们主张,除了那些关键地区即西欧和日本以外,美国需要限制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卷入;另一些人则相信美国应削减它在海外的军事义务和军事存在,强调改善美国的国际商业和经济地位。无论持何种具体立场,半孤立主义者都认为美国社会应被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美国政府应致力于解决国内争端和问题。其中许多人还往往赞成给予美国工业和产品以更多的保护。²⁹

与冷战对外政策共识瓦解的同时,在美国体制下进行改革的国内政策自由主义共识亦被60年代的动荡所粉碎,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大致分裂为三派:激进派、温和自由派和保守的自由派。激进的新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现,美国经济并非像社会主流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以让所有人都享受到富裕和充裕为标志的有活力的经济”;相反,美国的社会经济图景实在不妙:财富和收入的极度不平等、城市和农村令人绝望的贫困现象、南方和北方肆虐的种族主义。之所以会如此,根本在于资本主义体制。美国资本主义并非一个竞争但却让多数人受益的体

制,而是一个垄断性企业的经济:大公司通过广告玩弄消费者于股掌之上,通过所谓的“人力关系”新管理技术剥夺其雇员作为人的地位。政府亦非协调企业界利益和公众利益中立的裁判,因为企业界通过院外游说和贿赂对政府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样一个社会显然不是给予每个人以同等机会以实现美国梦的民主社会,由所谓的改革精神推动的福利国家关心的只是社会控制,自由派政府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革不可能彻底,是伪善的。伟大社会的失败、越南战争和不断出现的黑人骚乱都表明了美国自由主义的破产。美国是一个越来越邪恶的国家,繁荣和改革主义愿望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由军国主义者和公司资本家所控制。它拒绝通过根本性的经济重构使穷人和少数族裔脱离贫困,这事实上就意味着对穷人和少数族裔的镇压;军国主义者和公司资本家还通过他们控制的教育机构压制自由思想,从而镇压中产阶级,他们还将一种令人窒息的同一性强加于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在激进派眼中,上述不平等和镇压是由一种叫“公司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的意识形态所支撑的。理查德·弗兰克斯(Richard Flacks)在1969年指出,公司自由主义所支持的美国现存政治体制是这样的:在联邦层面上确定主要的政策议题,专家积极参与政策的制定,通过在全国精英——这些精英“代表了互认为合法的利益和机构”——中间进行的讨论而最终确定下来。换言之,美国是由社会学家、新左派的思想先驱之一米尔斯所说的权势精英所统治,这些权势精英关心的只是既保护企业界的利润,又满足军工综合体所需。在此种政治经济体制下,美国社会真正病入膏肓。出路只有全盘改造乃至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废除间接的代议制民主,建立实质上的直接民主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在1962年《休伦港声明》中建议的“参与式民主”。³⁹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60年代的动荡同样让他们怀疑自由主义,不过怀疑的方向与激进派完全相反。他们对伟大社会计划的失败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认识到伟大社会计划显示出自由主义理论的痼疾和先天不足。他们认识到,一方面对实行此计划所依据的社会现状分析并不准确,计划制定者亦错误地夸大了政府行动的能力、效力。很显然,自由主义或至少是伟大社会版本的自由主义过于狂妄,复杂的社会问题并非仅凭一腔良好愿望、学者们的仔细盘算和政府的积极干预就能解决的。另一方面,他们以为,伟大社会版本的自由主义导致了与美国信念根本相悖的政策和意识。伟大社会强调的是作为结果的平等和群体权利,而美国信念的核心是机会平等和个人权利;不仅如此,伟大社会与新政自由主义的政策亦有重大区别,新政改革者强调以工作来换取联邦福利待遇,而推动伟大社会建设的“福利权利鼓吹者”则拒斥工作要求,从而导致福利受益者中突然出现与过去所有美国传统相悖的“应享意识”(a sense of entitlement)。对自由主义重新评估的结果使他们重新宣扬更为审慎的改革主义立场,在他们看来也就是新政自由主义和四五十年代自由主义的立场,即在进行改革的同时亦承认改革的局限性。对于学生的造反,他们一方面固持大学系自由学术之殿堂的传统观念,认为学校应以理性和辩论为行为准的,应有高度独立的学术精神。他们以为,造反运动有悖于大学的理性精神,信奉自由主义的学者应站出来维护传统的办学观念,反对过激主义。另一方面,劝导青年不要因一时失败而动摇对美利坚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信心;在劝导没有作用之时,则对学生运动及其背后的激进主义大加批判。他们还不同意激进派对美国社会的根本否定,明确表示坚决反对视美国社会为病人膏肓的人,反对所有过激思想及行为,当然也反对他们开出的药方。他

们极其珍视美国的多元主义民主传统,认为民主不仅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甚至本身即为目的。这一派我们可称之为“稳重派”或“保守的自由派”,因为他们希望维持伟大社会之前的老自由主义传统。^⑧

处于这对立两派之间的是人数众多的温和自由派。他们与保守的自由派一样不同意激进派对美国的全盘否定,却又认为激进派提出的许多问题——不平等、贫困——值得重视;与保守的自由派相比,他们更为同情以往受歧视的弱势群体的进一步平等要求和青年的参政要求,更愿意为此而进行进一步改革。作为伟大社会的支持者和策划者,他们认为保守的自由派在坚持有限改革和机会平等的问题上过于拘泥于四五十年代的传统,他们不仅秉持结果平等之原则,还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推进伟大社会的改革,满足弱势群体的进一步平等要求,这在他们看来是完全符合新政自由主义的精神的。此种认识在60年代后期民主党内提倡推行“新政治”的人——主要代表是三位知识分子出身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尤金·麦卡锡和乔治·麦戈文——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政治是20世纪早期进步主义的再现,是“美国中产阶级改革主义传统的最后表现”。和进步主义者一样,新政治的倡导者大多是知识分子和高级职业阶层的成员,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生活富裕、与企业界没有什么关系,具有强烈的“道德主义”色彩(moralistic)。他们认为:“政治是道德和思想的实践,……并自认为是穷人和无组织百姓的保护者、国家利益的判断者、非理性世界中和平与秩序的守护者。”强烈的“道德主义”使他们对美国现实中的所有不公正和黑暗面——战争、种族主义、不平等、贫困等——感到愤怒,同时,他们也反对利用政治机器的老派政治做法。新政治开始于50年代另一位民主党知识分子政治家艾得

莱·史蒂文森将知识分子和职业阶层带入草根政治的尝试,越南战争成为其在60年代后期复兴的催化剂。一直以来,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就厌恶任何没有无可争辩的道德合法性的战争,越南战争加剧了他们的厌恶,并促使他们怀疑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莱特在1966年出版的《权力的傲慢》一书中,就曾指责美国战后对外政策是步古罗马和拿破仑帝国的后尘。越南战争还加剧了新政治倡导者对种族主义和贫困的愤怒,三个方面的原因促使他们认为越南战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场针对美国穷人和第三世界非白种人的不正义战争:黑人士兵在作战部队中的比例过大,美国打击的对象是只希望实现他们合法民族愿望的越南人民,战争开支使得联邦政府可用于国内福利项目的金钱大幅度减少。他们在国会中不仅结成了反对本党总统越战政策的公开反对派,还在1968年、1972年的两次总统竞选中提出反战纲领。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弱势群体的进一步平等要求,同时也是为了吸收新的力量(毕竟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汉弗莱只以不到1%的劣势输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在他们的推动下,以麦戈文为主席的代表遴选和党务改革委员会在1968年后对民主党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人称“麦戈文改革”。其主要目标是改变出席全国代表大会——提名党的总统候选人——代表的方式,要求各州党组织在以后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给予青年、少数族裔和妇女以适当的代表名额,若不照此办理,就取消该州的代表资格。不管普通的民主党选民在初选或地方党组织的会议上如何投票,必须按照这些集团应享的权利,保证他们获得应有的代表性,而不是按选区派出代表。由此形成了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一度居于主导地位且影响一直波及今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派”,这个无定形的

集团由 60 年代动荡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组成,他们的能量表现在他们能够左右选定总统候选人的初选运动;在他们的操控下,作为总统提名机构的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各种“事业”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讲坛。全国代表大会派在 1968 年民主党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的骚乱中崭露头角,1972 年,麦戈文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是它第一次胜利,紧接着是卡特在 1976 年当选。³²

自由派阵营的意见分歧并非局限于国内政策问题,也表现在对外政策观点上。大致来说,激进派和大多数温和自由派持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立场,其中激进派的主张稍稍激进一些,他们提倡更大规模的军备控制和全球裁军,认为需要为减少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暴力作出更大努力,并且关心整治对国际环境的破坏。此外,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正是民主党政府在美国卷入越战过程中起了最大作用)还让民主党内的许多温和自由派得到这样一个教训:美国在干预国际事务时应更为谨慎,能不使用武力就尽量避免动武。此种认识在一些民主党政治家那里还一度表现为“半孤立主义”,1972 年,一贯持鸽派立场的麦戈文在参加总统竞选时就打出“回家来,美国!”的口号。保守的自由派仍坚持原先的冷战自由主义对外政策,这使得他们在对外政策共识瓦解后与保守主义者一起站在“冷战国际主义”这面旗帜下。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的大多数时间内,保守的自由派在具体政治和政策问题上惟所谓的“民主党国会党团”马首是瞻。民主党国会党团是以休伯特·汉弗莱、亨利·杰克逊和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 Moynihan)等参议员为首的一个派别,其成员还包括罗斯托兄弟(Walt and Eugene Rostow)、本·瓦滕堡(原系杰克逊的助手,后为汉弗莱的演讲撰稿人)、杰克逊的

助手理查德·柏尔(Richard Perle)和艾里奥特·阿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汉弗莱的助手麦克斯·坎佩尔曼(Max Kampelman)、肯尼斯·艾德尔曼(Kenneth Adelman),此外,还有一位被认为是汉弗莱的继承人、与莫伊尼汉一样积极参与政治实践的知识分子——珍妮·科芭翠克。在思想上,纽约文人特别是其中的肯定者们则成为倡导坚持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主力军,他们和民主党国会党团一起力求维持民主党的总路线和美国的政策尽量不偏离由罗斯福和杜鲁门所确立的轨道。保守的自由派“像个边境巡逻兵,在国外守卫着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建立的全球领地的疆界,在国内则试图尽力不让诸如民权等等辉煌成果被危险的骚乱所冲垮而付之东流”。^③

三、对动荡的最初反应

面对“动荡的60年代”的种种动荡情势和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瓦解,以美国体制和自由主义共识捍卫者自居的纽约文人肯定者们十分担心。他们发现,新的激进浪潮正在威胁美国的民主体制和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对思想观念之重要性的认识促使他们拿起手上的笔,在克里斯托和波霍雷茨的带领下,以《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和《评论》(*Commentary*)为主要阵地,一方面批判激进派知识分子和学生造反、反主流文化等激进行为,另一方面,呼吁保持冷战共识的必要性,警告美国人民要注意国内激进浪潮带来的危险和国外苏联扩张对美国的威胁。论战之中,又有一些对动荡和激进不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社会科学家如迈克尔·诺瓦克、詹姆斯·威尔逊、爱德华·班菲尔德、罗伯特·尼斯贝(虽然很多人都将尼斯贝视为新保

守主义者,但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他自认是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不过,他强调共同体的思想对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影响颇大,他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看法也与新保守主义甚为相近)、马丁·戴蒙德、爱德华·希尔斯、亚伦·维达夫斯基和彼得·伯格等人加入他们一方。

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自由派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政议政的风潮中,1965年,克里斯托和其老友贝尔创办了《公共利益》杂志。杂志最初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科学家们提供一个论坛,让他们把科学知识转化为政治家们能够理解和运用的政策建议。那时的克里斯托和贝尔都强调以事实作为公共辩论和决策前提的重要性,他们最初对杂志的定位就是主要发表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应当能够促进有益且健康的公共政策辩论。在发刊词中,克里斯托和贝尔写道:“《公共利益》的目标是谦卑的(modest),但也有些放肆。它想帮助我们所有人,在我们讨论公共政策问题时,能让我们稍稍更好地理解我们正在谈论的事情;若能及时地使这些知识起作用就更理想了。”两人在发刊词中表达了坚决反对意识形态的观点,批评了所有对现实抱有先入为主之见的政治派别,包括自由派、保守派和激进派。贝尔后来也说,他和克里斯托创办《公共利益》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对公共政策展开合理的公众争论和客观探索,试图超越意识形态”。虽然,“要是没有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或别的什么先入之见的话,就不可能有人思想和行动,因为是这些先入之见确立了人的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但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点是,他们不仅指定了目标,而且对现存的社会现实一以贯之地提出了某些预见性的解释——这些解释固执地反对所有明智的改进意见。”^③杂志最初四年的资助者“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之所以资助《公共利益》,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则:希望“通

过有思想性观点的碰撞,能出现更为开明和更负责任的公众舆论”。“自由之家”从1965年秋到1968年秋在杂志上刊登的声明中宣称,杂志将对所有的观点开放,并强调:“公共利益并非某种预先存在的、柏拉图式的观念,相反它来源于诸多观点的差异之中,只要这观点是合理的。”⁵⁵

自那时起(即使在贝尔1975年离开后),《公共利益》上的许多文章一如既往地只是报告研究成果或分析某个问题或政治情势,并不表露意识形态立场。但是,伟大社会计划的实施和失败以及随后的动荡局势特别是学生的造反和激进派知识分子的“煽风点火”,使得《公共利益》不可能置身世外。从40年代后期放弃激进立场以来,大多数纽约文人的思想色调是充满怀疑精神的,这种怀疑精神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不相信任何意识形态;与此相关,他们认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并没有一种一劳永逸、万灵药般的解决办法。所以,《公共利益》的调子从一开始就是“怀疑的、讲求实际的和改良主义的(meliorist)”。具有怀疑精神、讲求实际和改良主义使得克里斯托和贝尔都认为伟大社会有过头之嫌或至少隐含着过头的危险,政策制定者虽然意图良好,但过于天真和不切实际。在1995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克里斯托说,他们不满于自由派当时的趋向,“有感于当时冠冕堂皇废话的流行”,感觉需要适度(modest)。作为忠实的自由派,克里斯托和贝尔都感到有必要警告当政的自由派。在波霍雷茨领导下的《评论》于1970年加入他们的阵营之前,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一帮社会科学家就已在质疑伟大社会计划及其背后强调结果平等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公共利益》所刊发的相关文章总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政的自由派所制定的此类政策不仅不会实现既定目标,而且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伤害政策预想的受益对象。对于大

多数《公共利益》撰稿人来说,从伟大社会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太过乐观,并未认识到现实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从而总是天真地以为,存在着对现实问题简单明了的解决方案,只要用心良好、制定并执行正确的社会政策,再辅之以适量金钱,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是结果证明,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不能令人满意,而现实问题要复杂得多,解决的难度也远比当政的自由派认为的大。^⑤

比如“向贫困开战”项目,1964—1968年,用于减贫的联邦政府开支从120亿美元增至270亿美元,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为城市贫家子弟特别是黑人贫民窟的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希望藉此解决当时的城市问题:贫困、“内城的贫民窟化”、学校的混乱、犯罪和骚乱。最初,美国朝野上下都对解决当时的城市问题和城市危机是十分乐观的,人们普遍认为:“只要集中足够的资源和智力,就能解决这场危机。”但从一开始,大多数《公共利益》撰稿人对此项目抱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城市问题过于复杂,许多问题纠缠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现实的态度应更谨慎一些。他们的怀疑不是说他们不愿解决贫困问题,而是怀疑那种带有乌托邦倾向的改革主义热情和大干快上式的解决办法——要通过“赋予穷人以力量”(empowering the poor)提升穷人的精神状态,更快地激励他们脱离贫困,从而绕过漫长、缓慢、传统地攀登经济流动阶梯的过程——能否奏效。他们认为,使人们脱离贫困的可行办法应当是“讲求实际的”(pragmatic);也就是说,做能做到的事情、采取已为过去经验证明有效的措施。最切实、最可行的解贫办法只有两条:一是促进经济增长,把蛋糕做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个人激励(individual motivation),包括获得工作必需技能的个人激励。否则,一味鼓动或直接给钱不仅不会解决贫困问题,只会徒然让人们政府对抱更

高的期望，而政府又无法满足，从而把事情弄得更糟。^⑥

他们的预想应验了，伟大社会自由主义直接导致了以群体为基础的“应享权利意识”的兴起。人们不再主要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发展——即做大蛋糕——和个人奋斗来脱离贫困，而是更多地采取集体行动和斗争向政府施压要求得到蛋糕中更大的一块。当然，对“应享权利”的要求不仅仅来自少数族裔、穷人或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也是社会上所有群体的要求，但从60年代后期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的“向贫困宣战”计划特别是其中的社区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穷人、特别是贫困黑人“最大限度地参与”当地社区各项活动，在地方政治中获得较大发言权——事实上还鼓励或支持了贫困黑人在集体行动中的好斗精神乃至暴力活动。贝尔在后来写道，反贫困方案的实施“为行动主义分子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他们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创造了小型的政治机器，结果他们却利用自己的地位在黑人和穷人的社区里组织活动小组，加剧了政治骚乱。”正是由于有了“向贫困宣战”计划，组织暴力活动的人才得到了进行活动的经费和时间，像黑豹党的两位创始人在进行早期活动的同时，受雇于反贫困方案，都享受着政府发给的薪金。所以，在贝尔看来，民主党政府所进行的消除贫困的战争，“其惊人的战绩之一就是：它促进了一场运动的蓬勃高涨，而这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却增加了对政府本身的政治压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伟大社会计划还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政府的要求范围和期望程度，然而问题是，“当人们忽然间对变革寄予越来越大的希望时，希望的压力就难免会超过现实的承载力。客观的变化也难免会和主观的估计相脱节。譬如说，许多黑人声称他们的条件变得‘更糟’了，然而他们实际的意思却是说他们尚未达到他们所期盼的程度。一个保守的人按照现在与过去的距离来衡量社会的变

化；而一个革命者却是按照将来的某个标志来衡量社会的变化。”期望的升高、改革的无效，两者合在一起变成了维达夫斯基所说的“对暴力的邀请函”（a recipe for violence）。凡此种种，让贝尔等人开始怀疑起伟大社会的自由主义。克里斯托后来说，正是“伟大社会”项目的实施、城市贫民特别是黑人贫民好斗精神的初露端倪以及政府的鼓励才“使我们开始慢慢地、不情愿地远离官方自由主义的最新版本”。因之，克里斯托也把1965年《公共利益》的创刊作为新保守主义的起源。^⑧

如果说伟大社会项目的出台及其结果促使这些过去一直与民主党和官方自由主义保持一致的社会科学家开始逐渐远离官方自由主义的话，那么，学生造反和激进浪潮则是他们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说，倘若后来没有出现激进浪潮和动荡，他们可能不会如此猛烈地批评伟大社会的计划。1996年，波霍雷茨在回顾新保守主义之缘起时，猜测在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转变方面，对反主流文化的厌恶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重要。2003年5月，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乔舒亚·穆拉夫切克（Joshua Muravchik）在为新保守主义“正名”的文章中，同样指出，新保守主义者是“反对60年代反叛的反叛者”。的确，在新保守主义者眼中，所有构成“60年代过度”的现象中，最让他们痛恨的莫过于年轻学生的激进情绪和造反行动了。在他们看来，激进主义不仅威胁到他们最为珍视的现代机构——大学，威胁到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还与反犹主义结合在一起威胁到他们本身。在激进主义的推动下，他们原本栖身的自由主义阵营及其政治表达的主要渠道——民主党——日益滑向左翼，并导致了对苏联扩张事实上的软弱态度和政策。1970年，格莱泽愤愤地写道：“错误和混乱已经包围了激进主义，以致如果我们还想成功地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话，我们的主要任务就必须是与它

论战,彻底戳穿它自诩了解我们问题根源并知道如何矫正的无稽之谈。”⁹⁹

就保守自由派中的纽约文人来说,从他们50年代对“垮掉的一代”——一群聚集在格林威治村的文学青年——的态度已可预见他们对新左派的敌对态度。“垮掉的一代”是一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运动,除了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以外的其他纽约文人或多或少地敌视它。理由是他们认为“垮掉的一代”充满了暴力倾向,带有强烈的非理性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而且,“垮掉的一代”压根就不像它力图显现的那样,它不是真正的激进。1958年,波霍雷茨在《党派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批评“垮掉的一代”只是一群特别幼稚、少不更事和不成熟的左派群体,他们对传统中产阶级道德观念的蔑视已经变成了危险的虚无主义,因此,他们代表的只是“精神贫困和残缺心灵的革命”。与“垮掉的一代”相比,新左派似乎更加危险。虽然“垮掉的一代”推崇黑人街头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采取暴力行为的随意性),蔑视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带有反智主义色彩,但他们根本就不关心社会和政治变革;而从一开始,参加新左派的青年学生就是政治行动主义的。一方面,新左派感到美国掌握在一个志得意满的“自由派权势集团”手中,这个权势集团存在于蔓生的政府官僚机构之中,管理着巨大无比的大学,因此,提出要建立“参与式民主”即希望将政治权力归还给每一位公民,实际上就是要改变美国现行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新左派政治行动的方式是民粹主义(populism)的。民粹主义是一种组织的语言和风格,而非一种意识形态;它主要通过通过对普通人的政治动员,在他们中间建立政治支持来反对精英。起初,在60年代初期时,新左派青年学生一度希望能从他们现在的师长、过去的激进派那里得到指导,《休伦港声明》的起草人汤姆·海登

(Tom Hayden)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的许多领导人在1961年和1963年分别与贝尔和豪进行过短暂的接触,邀请后者做他们的政治顾问,遭到他们的拒绝,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毛孩子们的激进带有太多的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双方当时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在麦卡锡反共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新左派学生们决意反对反共主义,而豪对新左派的不愿反共及他们对卡斯特罗新共党政权的钦佩感到警觉。二是作为新左派指导原则的“参与式民主”。贝尔认为“参与式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善良的民粹主义信念,因为它不仅声称人民应该拥有驾御会影响其生活的决定的能力,并且还天真地断定,“‘人民’是进步的,多少摆脱了‘精英’、‘他人’或其他恶势力的控制。不过,这些激进分子很少面对这样一个道德两难:人民可能是反动的或顽固的。难道因为他们想要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且想要如其所愿地保持其社群,南部的人民就有权把黑人从他们的学校里赶出去吗?并且,如托克维尔曾经指出的那样,这不也将会践踏存在自由的‘多数人的专制’吗?”豪同样反对“参与式民主”这个提法,因为它事实上是对代议制民主的损害,并且让人想起斯大林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拒绝。换言之,“参与式民主”暗含着民粹主义的威权主义的可能。在贝尔看来,新左派的激进并不具有思想性,只是言辞上的激进。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爆发的自由言论运动(the Free Speech Movement)拉开了60年代校园政治抗议活动的大幕,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学生组织参加的这一运动,目的是争取享有在校园内鼓吹政治观念、实行抗议和进行校园静坐的权利。当时在伯克利任教的格莱泽和李普塞特在教员会议上,坚决反对学生在校园从事与学校无关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并批评了新左派。^④

即便许多保守的自由派在60年代前期已经从新左派的学生运动中嗅出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但毕竟此时的学生抗议只是局部的、零星的和和平的。1965—1967年间国内情势的急剧动荡——黑人区的骚乱、学生反战运动的发展、学生激进组织和校园政治抗议活动已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新左派对美国体制的根本性拒斥和攻击——让他们感到极为不安,他们发现他们珍视的每一件东西都受到动荡的践踏和攻击,而他们所害怕和恐惧的东西却正从动荡中浮现出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大学教授,对于他们而言,大学无异于他们的第二家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大学甚至要比他们的家庭更重要:大学于他们是几近神圣的机构,大学保护开放的研究和思想的自由传播;大学正是他们“理想国的缩影:开放、自由、稳定、独立、探究、多样化、高雅文化的宝库”;正像他们视美国为抵挡苏联威胁的世界保卫者一样,他们把大学看作保卫美国,抵挡国内文化和政治中更为危险的非理性因素的阵地。对于像尼斯贝这样终生在为现代社会寻求共同体的人来说,大学也是他整个成年生涯中最为珍贵的共同体。总之,大学于他们而言不仅是安身立命、教书育人之所,更是理想所系。学生的造反恰恰打击了他们价值观的心脏地带,随着学生运动由抗议至抵制再至造反而越发激进,他们感受到的并非仅仅是丧失师长权威的悲叹,还有理想受到破坏之后的愤怒。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美国体制将受到社会动荡不安的致命打击,这一方面表现为学生抵制行动和黑人骚动中实际的暴力行为、以革命和解放之名对暴力的颂扬以及阿尔及利亚革命理论家弗兰兹·法农“暴力解放”理论在美国年轻人中的流行。法农在《大地的苦难》中认为,只有通过暴力的清洗行动,哪怕这种暴力把矛头转向旧压迫者的无辜后裔,黑人才能从殖民压迫的传统中获得解放。另一方面在于体制合法性已经成

了问题,社会稳定受到冲击。克里斯托认为,由于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和激进派的攻击意味着社会体制的合法性正慢慢丧失,美国社会可能无法再保护它自己。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波霍雷茨在1967年表示,无法同意“美国社会已经腐败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之说,他宣布他坚决反对“任何相信我们社会已经病入膏肓的人”,反对所有的过激思想和政策,比如规定雇员定额、反主流文化、新左派、新政治、新阶级等。同年9月,莫伊尼汉在美国民主行动联盟(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的会议上说:“自由主义者必须更加清楚地明白,他们的根本利益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面对当前对稳定的种种威胁,他们必须主动与利益相同的政治保守派结成强有力的联盟。”^④

对于纽约文人中保守的自由派而言,他们之所以反对60年代后期的动荡还有个人原因。由于他们中多数人是犹太人,所以当他们在60年代后期的动荡中发现反犹情绪特别是越发强烈的黑人反犹情绪时,他们为之不安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美国犹太人自20年代起一直极力支持自由主义政治(从狭义上讲,他们投票赞成民主党的新政派;从广义上讲,他们支持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强烈维护国内自由),支持为了被剥夺团体的利益而实行积极的社会立法,以及为帮助美国黑人而进行特别的社会努力,特别是在民权运动中大力支持黑人争取平等地位的活动(犹太人是美国白人中最支持民权运动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当大批黑人移居北方城市与犹太人比邻而居时,黑人和犹太人的关系时有龃龉。波霍雷茨在1963年写过一篇很坦率的文章《我的黑人问题——我们的黑人问题》(“My Negro Problem—and Ours”),追溯了他在布鲁克林的青少年时代。他说,在布鲁克林,犹太子弟都认为黑人比他们过得好,因为黑人是好的田径运动员,更强壮、更不守法律,

在性生活上更为放荡,几乎不受家庭的监管。由于黑人揍过他,他恨他们;到1963年时,他承认自己仍然不喜欢黑人,但他支持民权运动。虽然年少时与异族曾有的摩擦并非黑人和犹太人龌龊的主要方面,但它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多种族社会中与其他种族的实际生活,以及生活中摩擦的不可避免。比如,许多黑人抱怨说,犹太商人和房主剥削他们,而有些犹太人则倾向于把犯罪问题与黑人问题联系起来。在以往风平浪静时,双方大致还能和平共处。但在60年代末期的那种形势下,犹太人日益感觉到好斗的黑人运动对自己的威胁。随着黑人民族主义特别是黑豹党的兴起,城市骚乱中一些犹太人商店被黑人抢掠和焚毁,犹太人遭到攻击的感觉越发强烈。当然,一些犹太人夸大了黑人反犹的深度和广度。但是正像豪在《父辈的世界》中所说的那样,对于一个在十数个世纪中一直遭到迫害、在二战中又遭到大屠杀的民族来说,反犹主义已经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恐惧。它有时可能是神经过敏,但这种神经过敏并非单单来自个人或集体的记忆。“一种见解已深入犹太人的心灵,即,在西方世界,一直存在着反犹主义,不管这种反犹主义是剧烈的还是温和的。……大多数(犹太)人似乎都认为,只要基督教存在,反犹现象便不可避免。”更何况,在现实当中,没有人能把合理的惊恐与过度的“偏执”区别开来。所以在60年代末期动荡的形势之下,在大多数普通犹太人的头脑中,黑人的反抗总是和全球可能重新出现的反犹情绪和阿拉伯人明显对以色列产生敌意有关。^④

事实上,纽约文人对于新左派的反对也与这种无法摆脱的恐惧有关。贝尔在回忆他抛弃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政治时,头脑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图景,正是由此,他形成了反民粹主义的终生立场,因为一个社会的多数人被动员起来

后作恶的可能性与为善的可能性不相上下。他写道：“我由此产生了对集体行动的恐惧，对政治感情的恐惧，以及对关于激情和仇恨的政治学的恐惧，并且这种恐惧形成了贯穿于我一生的观点。”所以在他们眼中，年轻激进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新左派成员同样出身于犹太人家庭）砸烂现行一切、敌视权威的举动和语言绝非什么革命，只让他们想到了失控的大众、暴民、纳粹的大屠杀和斯大林主义、库格林神父。^③

两个事件促使犹太知识分子对黑人反犹情绪和新左派的恐惧在1967年和1968年交织在一起。一件是给美国犹太人带来强烈自豪感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天战争”）：1967年6月，以色列仅在6天时间内就击败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联合部队，获得了巨大的领土利益（开战仅三天，以军在西部进入了西奈半岛，占领了加沙走廊，完全控制了亚喀巴湾；在东部进入约旦，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并攻陷耶路撒冷；向北攻占了叙利亚的战略要地戈兰高地。所有这些土地加起来比以色列原有领土大三倍）。但让美国犹太人没想到的是，战争结束两个月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为了第三世界大团结，发表声明指责以色列为“不合法的国家”并在战争中屠杀和镇压阿拉伯人。委员会的一名领导人称，声明的目的不是攻击所有犹太人，而是“犹太压迫者”包括以色列人和黑人聚居区的犹太商人。同时，新左派对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态度——像斯通（I. F. Stone）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这样杰出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公开宣称以色列是侵略者——让纽约文人中的保守自由派更为不安，不仅因为斯通和乔姆斯基也是犹太人，因为以色列代表着一千多年来四处流亡的犹太人的一块家园（虽然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态度不尽一致，但几乎所有犹太人均认为，以色列应该得到帮助、发展并能永远生存），还因为以色列问题成了新左派攻

击冷战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激进派对冷战的抨击事实上帮助了苏联人,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和安全——最明显的体现。实际上,正是因为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辉煌胜利才让大多数纽约文人第一次真正关注这个犹太人国家,从此,他们对冷战自由主义的倡扬有了具体的政策目标和与以往不同的含义:在中东保证以色列的绝对安全和反击、新左派及第三世界的反美反以情绪。在他们看来,新左派关于以色列侵略的说法与新左派对世界政治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他们认为,新左派将世界分为邪恶的超级大国和无辜的、热爱自由的第三世界人民,其中,“以色列即便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也是腐朽的西方价值观念的滩头阵地。”^④

1968年4月下旬发生于纽约文人大本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骚乱,不仅让诸多纽约文人亲眼目睹了学生和黑人的激进行为,还直接导致了纽约文人和整个纽约知识界阵营——要知道,纽约一直都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政治的主要基地——的分裂。早在1968年3月27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哥伦比亚大学支部负责人马克·拉德就不顾校方禁令,为反对学校涉足国防研究活动,在该校防务分析研究所外举行了抗议示威。拉德等6名学生领袖被校方给予留校查看处分。4月22日,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再次举行示威抗议活动,他们不仅反对防务分析研究所为五角大楼从事研究活动,要求取消对6名学生领袖的处分,而且抗议校方为修建体育馆使哈莱姆区7000名黑人与波多黎各人迁居。次日,学生抗议发展为校园暴动,后来进占了校长办公室。哈莱姆区的青年黑人参加了这一行动。4月30日,校方要求警察驱逐造反的学生,700名学生被捕,148人受伤。一部分人如纽约文人中的麦克唐纳、梅勒和杜皮(F. W. Dupee)激动不已,以为自己亲眼目睹并将参与一场真正的

革命,梅勒和麦克唐纳四处活动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筹措资金(贝尔讽刺地称他以往朋友们的激动和狂热为“重获青春的老知识分子的那种充满激情的思古情怀”)。但对于另一些人如贝尔、霍夫施塔特、屈瑞林夫妇(这四人当时皆在哥大任教)、胡克、波霍雷茨及其夫人米奇·迪克特来说,学生造反中表现出来的只是带有很大随意性的破坏性——学生在校长办公室的地毯上小便,占领学校的一座建筑物并在教授办公室内任意破坏(多年以后,最让米奇·迪克特记忆犹新且心痛不已的一件事是学生们竟然将一位教授一生工作的心血撕毁)——和对权威的极端蔑视。对波霍雷茨来说,最让他气愤的倒不是学生在他母校的造反,而是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学生造反的态度。他发现自由派知识分子、他尊敬和信任的同僚没有去批评日益好斗的、激进的学生抗议者,无论学生做什么,自由派教授们都会赞扬学生们的“理想主义”,把他们的这些行为说成是年轻人的精力旺盛。波霍雷茨的师母戴安娜·屈瑞林认为,“哥伦比亚的骚乱是革命性的。……它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反自由主义的。说它是反自由主义的,是因为它目无法纪,它拒绝理性的程序。”从黑人的行为中,她发现了与白人激进学生不同的威胁:“他们不是玩暴力游戏的被宠坏了的中产阶级男孩。对他们来说,白人世界的权威是不合法的。”贝尔在《公共利益》杂志上以“哥伦比亚和新左派”为题,对新左派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挖掘和批判。他写道:“SDS(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引者)将被它自己的风格所摧毁。它依靠骚乱而生存,但是却无能为力把这些混乱的冲动力量转化为系统而负责的行为,那种行为对于促成广泛的社会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恰恰是它的风格否定了这些行为的合理性,因为像许多千禧年主义者一样,其意识形态的唯信仰论渗入了相似的心理氛围,或者相反

地,渗入了某些离经叛道的因素。它不是强制地导致创新,而是导致了毁灭。”⁴⁵

民主党1968年后的改革和随后的转变亦让他们不安。他们认为,麦戈文改革正使民主党走向错误的方向,《评论》成了他们抗议麦戈文改革的主要阵地。1970年10月,佩恩·凯摩尔(Penn Kemble,原美国社会主义党全国总书记,后来成为民主党活动家)在《评论》上撰文宣称,“新政治”对民主党已经构成了威胁,传统政治家以及他们老派的政治方式已被知识分子及他们的新政治运动所取代。但是,“新政治运动的战略只关注它自己宠爱的对象,从不考虑它对于大的政治图景的重要性,它运作的方式完全与其他主要的自由派集团无涉,有时与其他主要的自由派集团相冲突。”凯摩尔的警告代表了党内外保守的自由派的看法,他们担心,“过分的努力将形成引进青年和妇女的状况,而不能充分吸收工人阶级、劳工会员、年长者和其他人。他们宣称,强调吸引普通党员参与的党实际上是不民主的。那些乐意于参加公开的基层党员会议的人都是受过较多教育并比较富裕的,他们有时间、精力和兴趣进行通宵的辩论。劳动人民和穷人没有空闲、精力,也缺乏在会议上表达自己利益的自信心,甚至无法参加会议。”保守自由派尤其反对党务改革中推行以特定选民集团为基础的比例代表制,认为这种定额分配制度只是“人口统计得来的民主”,主观武断而且基本上没有代表性。1972年麦戈文在总统竞选中惨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所经历过最最惨重的失败)后,凯摩尔和乔舒亚·穆拉夫切克认为民主党已被左派挟持。麦戈文委员会已越出它的职责范围,改写了党的规则以致麦戈文本人在党的初选中所得选票不足25%却仍能获得提名,而保守自由派拥护的亨利·杰克逊参议员——在保守自由派眼中,杰克逊是一位反共的自由主义者、罗

斯福和杜鲁门传统的继承者、大多数民主党选民态度的代表——却被迫退出选举。他们两人相信,民主党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为,“对政治活动家需要的关心远远超过对普通公民需要关心的民主参与的观念已经在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内得到了如此之大的支持。”保守自由派还特别鄙视麦戈文本人,他们认为他对犯罪软弱,对共产主义软弱,对主流的价值观是一种威胁。对波霍雷茨来说,麦戈文的追随者都是敌视大多数美国人感情和信念的意识形态空头理论家(ideologues),珍妮·科琶翠克在1973年2月的《评论》上分析了麦戈文惨败的原因,她借用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对知识分子社会学的考察,认为麦戈文代表了资本主义文化的阶级敌人,因此,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不能认同于传统的美国文化价值观。李普塞特通过对民意调查数据和选举结果的分析得出了相近的结论:美国人民之所以拒绝麦戈文是因为认为他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⁶⁹

保守自由派和新政治派的冲突还在于对外政策问题。虽然保守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一直是冷战自由主义最忠心的支持者,但在60年代后期之前,他们很少关心具体的对外政策问题,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即使后来先后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莫伊尼汉和科琶翠克在70年代之前也都只关注国内问题)。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在越战引发的日趋激烈的对外政策大辩论中,他们突然发现,遏制苏联的冷战大战略已遭到处于上升势头的孤立主义情绪的挑战。60年代后期,以理查德·福克(Richard Falk)和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等为代表的“世界秩序论”强调由于世界的巨大变化,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应再以遏制苏联为中心,而应该更为关注南北问题、第三世界的发展和贫困、

环境问题等等；而要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美国需要苏联的合作。这种带有和平主义(pacifism)色彩的理论，恰好与大多数美国人因越战而对美国的海外参与和负担深感筋疲力尽的情绪一起导致了1968年后新闻媒体上连篇累牍的“孤立主义”报道，“美国责任和承诺的膨胀已经以一种远超出他们至关重要利益和他们真正力量能承受的方式将美国人民卷入其中。”1969年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一半以上的美国人支持大规模减少美国的海外义务和承诺。同年，民主党参议员曼斯菲尔德甚至提出一项要求美国从欧洲部分撤军的修正案，最后虽以几票之差未获参议院通过，但却反映了美国国内要求放弃对西欧联盟承担义务的孤立主义情绪。克里斯托领导了对这种思想的攻击，他在1967年说，知识分子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是提供“思想和道德指导”；但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这种责任，只是贬低美国和美国的政策。在他看来，美国无疑仍要继续占据世界上的头把交椅，“美国将不会不做帝国(an imperial power)”，“世界的确依赖于美国的力量。”尽管充当这种角色对于美国人来说不是那么舒服，因为美国时常被迫拿自己的价值观做妥协，但是，美国绝对不能推卸充当世界领袖的责任，否则国际秩序将会大乱。当然，作为社会科学家和杂文家的克里斯托不可能提出以深度研究和分析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理论。保守自由派知识分子从两位保守派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W·塔克(Robert W. Tucker)和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的著作中获得两点教益。第一，塔克和拉奎尔的著作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的具体框架。塔克和拉奎尔虽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美国的最主要威胁，但他们还强调其他威胁：西方的政治软弱、精英的混乱、第三世界对发达国家的“攻击”，这些和共产主义一起威胁着美国。第二，塔克和拉奎尔让他们认识到美国的

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存在着一种全新的联系。正像冷战自由主义认为国内和国外对自由主义的支持是不可分割的一样,保守的自由派认识到左派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攻击是它攻击美国国内民主的一部分。因此,对新左派的战斗要同时在两条战线进行:“国内政策就是外交政策,反之亦然。”这两点教益是保守的自由派在其后的七八十年代看待国际问题的基础。一直以来,麦戈文在越南问题上是最有名的反战派。从1965年起,他和富布赖特等民主党自由派国会议员就成为约翰逊政府越战政策公开的反对派。但除了反对越南战争以外,他在1972年参加总统竞选之前很少表露在对外事务上的看法。在他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他成立了一个由斯坦利·霍夫曼和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等人组成的外交顾问小组。在保守的自由派看来,这说明麦戈文偏爱世界秩序理论,背离了遏制苏联的冷战自由主义传统。当年10月,当麦戈文发布他竞选的主要对外政策声明时,他不愿继续遏制政策的态度表露无疑:“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将与塑造未来政治安排最有关系。”有鉴于此,美国需要和苏联进行合作来建设一个“并非建立在以军事冲突和权力政治这些过时的陈旧套路为基础的未来”,同时,美国应首先解决好自己问题,建立一个公正和繁荣的国内社会。很显然,麦戈文代表了基辛格所说的那种70年代新世代的美国人:“他们不再认为美国纯洁、孤高;他们认为,美国要在世界插手事务,需要先有一段时间专注做好本身的改善,正己方能正人。”在保守的自由派看来,麦戈文的对外政策纲领和他的竞选口号“回家来,美国”实在骇人,这意味着他要放弃美国遏制苏联的传统政策,意味着孤立主义在民主党内的胜利。^⑥

除了已对民主党失望透顶的克里斯托在70年代早期即公开支持尼克松并在1972年加入共和党以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决定必须让民主党回到罗斯福和杜鲁门的传统——即渐进改革和坚决反共的战后自由主义共识——上来。迪克特、波霍雷茨和瓦滕堡开始寻求推翻新政治派在党内的支配地位，让坚持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汉弗莱和杰克逊的支持者执掌民主党大权。11月选举结果揭晓后，他们联合汉弗莱和杰克逊的支持者建立了争取民主党多数联盟(the Coalition for a Democratic Majority)，参加者有科瑟翠克、坎佩尔曼、凯摩尔、贝尔、格莱泽、李普塞特、诺瓦克和理查德·派珀斯(Richard Pipes，当时系哈佛大学教授、苏联问题专家)等。这是新保守主义者参与实际政治活动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他们第一次展现其政治力量。但到1974年圣诞节时，他们的努力已告失败，成为党内的边缘派。^⑧

从一开始，他们就认为民主党的左转是激进浪潮和新左派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到1969年时，他们还认识到，美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格莱泽于1969年将新左派对美国制度和冷战政策的攻击、黑人的反犹情绪联系在一起，他宣称，激进的新左派知识分子正向他们的学生和好斗的黑人传授暴力思想，为使用暴力寻找托词，并将暴力合理化；“反犹情绪只是这整个症状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中产阶级的成员不再配拥有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地位、甚或他们的生命，那么，所有族群中中产阶级比例最高的犹太人肯定将被放在清算名单的头一位。”^⑨在自由派阵营已经分裂，在动荡的局势面前，在激进派攻击日趋猛烈的情况下，如果他们不站出来捍卫美国的体制和主流道德价值观念，他们自己也就很难保全了。虽然，自伟大社会项目实施及失败、新左派学生运动成为全国性的现象以来，他们一直就以《公共利益》为阵地质疑伟大社会的具体项目及其背后的精神，但是《公共利益》的基本调子是强调事实以及以事实为基础的分析，并不适于激烈的思想论争、攻击和批判。在新

左派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公共利益》似乎显得“学究气”太足而力度不够。

因此,大致与批评民主党改革同时,刚至不惑之龄的波霍雷茨向新左派全面“宣战”,以他主编的《评论》为阵地进行这场捍卫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思想“战争”。从1970年6月开始,波霍雷茨在《评论》上开设每月专栏,对每一期杂志上的文章或讨论的主题加上自己的评论,探讨的领域包括政治、教育、社会问题、艺术和美国外交,其目的是摧毁新左派的思想基础。波霍雷茨的攻击很快激起了激进左派的还击。1971年2月,尤金·古德哈特(Eugene Goodheart)在《国民》(*Nation*)上撰文进行反击,并称波霍雷茨对激进的反动为新的保守主义(new conservatism)。古德哈特说,波霍雷茨对激进浪潮的批判完全无视这样一项根本事实——“我们正饱受道德和政治危机之苦,……这些危机并非由激进所致”;而《评论》新的保守主义倾向只会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激进意识已经予以指出的真正的罪恶”移开。还有人认为,这种新的保守主义倾向是由获得成功的美国犹太人自我保护的本能所驱动。1971年8月,一位犹太激进派知识分子在新左派杂志《堡垒》(*Ramparts*)上称,“《评论》已经成为犹太权势集团思想的领袖”,它的新倾向反映了“那些已经在美国获得成功而不愿任何人晃动船只的美国犹太人”的利益。波霍雷茨对新左派的攻击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内部争论很快就引起了保守主义者的注意,而对《评论》新动向的注意则又进一步延及与《评论》关系密切的《公共利益》。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原本一直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无根的危险群体,都是宣扬“四海一家主义”(cosmopolitans)和批判美国的激进派;他们即使不是社会主义者,也大都倾向于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将扩大国家权力,从而也扩大他们自己的影响。正像李普塞特对美国知

识分子的实际考察所发现的那样,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倾向于左翼,在选举中,一般支持民主党。所以,当这个阵营中突然出现了一股批判激进之声,保守主义者自然很是开心。1970年11月10日,《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在编辑版上刊发文章讨论了《评论》的新动向。文章欣喜地宣称,“亲美国的知识分子正开始发言了”,并将波霍雷茨称为“不可能(improbable)的‘保守主义者’”。文章还把格莱泽、克里斯托和迪克特作为不再激进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国民评论》在12月15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大家庭的分裂?》(“Split in the Family?”)的文章,文章虽然也欢迎《评论》的变化,并将其视为反对左派的盟友,但尚有猜疑,担心知识分子阵营的内讧和《评论》对新左派的攻击只是暂时的。随着《评论》对新左派攻击的继续,《国民评论》大大减少了最初的猜疑。1971年3月,《国民评论》的一篇社论称,《评论》已经完成了从支持到贬斥激进派的大转变,赞扬《评论》的新倾向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希望《评论》能将“新的现实主义精神”用于“所有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主流媒体在1970年末也注意到知识分子阵营的变化,《纽约时报》在当年11月12日的报道中,主要把格莱泽作为例子,同时也提到了波霍雷茨和克里斯托。⁹⁹

这些人究竟处于当时美国政治光谱的哪个位置呢?应当给这些人加一个什么标签呢?是自由派、激进派、温和保守派还是保守的自由派?70年代前期,这个问题曾让许多人为之困扰不已。1976年,新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迈克尔·哈灵顿为他们从前的战友、现在的论敌想出了一个新的名号:“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显然,日益严重的意见分歧最终使得新左派觉得无法再与严肃批评他们的自由主义者共举自由主义这面旗帜。他说,那些与激进派唱反调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已

经成了新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实质上是保守的,而且已经与保守主义运动结成了联盟,甚至已经公开加入了保守主义阵营。哈灵顿认为,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本质特征是否定美国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假定。例如,新保守主义者不相信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不相信政府能够缓和乃至解决社会问题,反对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哈林顿造出这项“新保守主义”的高帽,套向先前“同一战壕”的战友、今日两军对垒的论敌。此中一是划清界线,反击稳重派的批评,另外也藏着搞坏对手名声的机心。毕竟,在知识界,保守主义始终是一个人皆恶之的贬义词(“neo”这个前缀暗指他们是背叛自由主义阵营的变节者)。刘连江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新保守主义》一书中,对此有颇为到位的评述:“给自己不喜欢的人取一个内含贬义的绰号是乡农野老也擅长的攻击手段。在政治领域和政治思想领域中更是古今中外屡试不爽的有力武器。西方人把这种做法叫做贴标签,中国人更为生动地称之为扣帽子。标签也好,帽子也好,功用相同,发挥功用的途径也一样。以世界之大,个人知识能力之小,无论何时何地,大抵是真正识货的少,随波逐流的多。”自此,或许是大多数人为称呼之便,或许是顺大流,“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界和政治思想界不胫而走,迅速流传开来。^⑤

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认为,他们的思想从未从根本上背离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相反,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被认为保守,并不是他们的信念发生了变化,而是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党变得左倾了。他们依然坚持战后的自由主义共识,他们仍然相信社会改革和遏制苏联及国际共产主义扩张的必要性,但在他们看来,不幸的是,6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的新发展及与其相伴而行的新一轮激进主义却要否定四五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正因如此,从“新保守主义者”之名加于其身直

至现在,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并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名称。

贝尔在1978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再版前言中,明确地拒绝“新保守主义”这个称号。他说,新保守主义“这类标签本身毫无道理。因为贴标签者把社会观点当成了能够平面排列的对象。……从较为宽大的历史角度看,‘新保守主义’的评语不当,因为我所致力文化批评……已经超越了眼下广为接受的自由派立场,而力图以一种不同层次上的构想来探究当代社会的众多难题。”贝尔进一步申明:“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詹姆斯·威尔逊在1980年也指出,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他们并没共同签署任何宣言,并不信奉同样的信条、信仰同样的宗教、高举同一面旗帜、唱着同样的“赞美诗”,他们也并非秘密的小集团。李普塞特对这个称号更感愤怒,他在1988年一篇名为《新保守主义:神话与现实》的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术语和一个政治团体的名称,新保守主义是政治词典上被误解最多的概念之一。我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这个词从来不曾指谓拥有一群倡导者的一套学说。相反,它是一个为毁谤政治敌手而制造出来的标签,而那些人的绝大多数是不喜欢人们这样称呼他们的。”他又说,新保守主义只是一种倾向,并未形成一种政治运动,新保守主义也从来不是一套严密的信条和学说,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把新保守主义等同于弗里德曼和里根的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是错误的。尽管不少新保守主义者在不同的时期参与过保守派的政治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放弃了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⑤

即便最早转向保守主义的克里斯托在1979年公开宣称自己为“新保守主义者”时,态度也是十分的矛盾。他说:“我自己已经接受了这个名称,可能因为正如我被命名为欧文一样,我本人

对洗礼时命名的反复无常相对不怎么在乎。”言下之意是，别人爱叫他“新保守主义者”，他又能怎么办呢？不过，他同时又指出，无论他个人对这个名称的态度如何，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那些人并没有共同的目标、意识形态和组织这一事实，也促使他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新保守主义这样的事物。”大多数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沉默的人实际上和克里斯托一样矛盾，但是他们之所以选择不再纠缠于自己是不是新保守主义者这样的争论，是因为他们和迪克特一样对这种争论感到疲惫。迪克特在1991年早期接受一位研究者的访问时，说她最终接受“新保守主义者”之名仅仅因为想避免在谁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问题上的争论。^③

那么，事实上真的并不存在新保守主义吗？对此，我们既不能听信哈林顿的说法，也不能陷入新保守主义者本身的矛盾之中。通过以上对新保守主义缘起的背景和过程的大致分析，可以肯定，作为一种思想现象的新保守主义的确是存在的，它最初主要表现为对60年代动荡和激进浪潮的反动。不过，仅仅断定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更深入地理解新保守主义，我们至少还需要考察以下三个问题：1. 既然存在着一种可称作新保守主义的思想现象，新保守主义者对他们共同关切的问题有何种共识？2. 此种共识之下，是否存在着重大的不同？3. 从思想上说，新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还是保守主义的？在以后的几章中，本书作者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① 转引自 Kenneth M. Dolbeare and Linda J. Medcalf, *American Ideologies Today: Shaping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1990s* (New York: McGraw-Hill, 1993), p. 64; 另参见 Mark J. Rozell and James F. Pontuso, *American Conser-*

native Opinion Leaders (Boulder: Westview, 1990), p. 101。

② 70年代初期,哥伦比亚大学查尔斯·卡杜辛的研究小组对全美的知识分子精英进行了大型普测。入选的前30名里,属于纽约文人系统的占去2/3;对人们影响最大的20本知识分子刊物中,先后由纽约文人控制或主编的刊物有7本。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卡特年代》(梅士、王殿宸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171页。这里尚有几点需要说明:1. 排名虽然是30名,但由于有并列情况,实际上上榜人数为69人;2. 纽约文人占去2/3,系采用赵一凡先生的说法,见赵一凡《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读书》1987年第8期。

③ 赵一凡《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

④ 大萧条之后的30年代是美国激进思想和共产党最有影响的时期,在新移民集中的纽约,更是遍布激进团体,以致纽约文人莱昂内尔·艾贝尔(Lionel Abel)说,30年代的纽约是“苏联最有趣的部分”。转引自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A Short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http://www.pbs.org/arguing/resources/essays.html>。另外,史家佩尔斯对萧条时代美国的激进思想做了全面而精彩的阐释。Richard H. Pells,《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思想》(卢允中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⑤ 由美国共产党资助的《党派评论》创刊于1934年,但美共教条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命令——特别是要求把小说与诗歌转变成为社会宣传媒介的做法——及其对现代主义的攻击让两位年轻的编辑拉夫和菲利普斯大为不满,1937年,拉夫和菲利普斯与美共决裂,《党派评论》成为独立刊物。

⑥ Daniel Bell, “First Love and Early Sorrows”, <http://www.pbs.org/arguing/nyintellectuals/bell2.html>。

⑦ 就每个人而言,反对斯大林的最初原因是不一样的。用贝尔回忆中的话来说,“据说,每一代激进派都有它的喀琅施塔得。对于有的人来说,是莫斯科审判,对另一些人来说,是苏德条约,是匈牙利(1956年审判拉吉)、捷克斯洛伐克、古拉格……我的喀琅施塔得就是喀琅施塔得。” Daniel Bell, “First Love and Early Sorrows”。

⑧ Irving Kristol, “Memoirs of a Trotskyis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23, 1977; Nathan Glazer, "From Socialism to Sociology", http://www.pbs.org/arguing/nyintellectuals_glazer_2.html; 赵一凡:《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

⑨ John Ehrma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3; Lionel Trilling,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5), pp. xii-xiii; 《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 第 397 页, 398—399 页。

⑩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第 410 页。《父辈的世界》是豪撰写的一部记录 1881—1924 年间东欧犹太人移居美国历史的上佳之作, 他以“清明上河图”般的历史写作手法, 向世人展现了东欧犹太人及其文化是如何在移民过程中和定居美国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⑪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拉塞尔·雅各比, 《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69 页。译文略有变更。

⑫ Ronald Lora and William Henry Longton, *The Conservative Press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Westport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9), p. 619; 刘绪贻主编, 《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143 页。

⑬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03—106 页。

⑭ John Ehrman, *op. cit.*, chap. 1.

⑮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477 页; John Ehrman, *op. cit.*, p. 12; Lora and Longton, *op. cit.*, p. 617; 赵一凡:《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 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 《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 年版, 第 178 页, 179 页。

⑯ Irving Kristol, "Memoirs of a Trotskyist"; Irving Kristol, "American Conservatism 1945—1995", *The Public Interest*,

<http://www.thepublicinterest.com/notable/article2.html>; John Ehrman, op. cit., p. 35.

⑰ Norman Podhoretz, “Neoconservatism: A Eulogy”, http://www.aei.org/news/news_ID.16009_filter./news_detail.asp; 梯姆, “CIA 渗透国际文化的一段历史”, 《读书》, 1990 年第 9 期。1967 年, 在 1950—1954 年间直接负责与争取文化自由大会联络事务的原中情局高级官员汤姆·布雷登 (Tom Braden) 在《星期六晚邮》杂志上撰文, 揭示了争取文化自由大会与中情局的关系, 同时指出, 《邂逅》杂志的一名工作人员系中情局的人。虽然, 布雷登并未指名道姓, 但很多人都猜测这个人是克里斯托。见 Godfrey Hodgson, *The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A History of the Conservative Ascendancy in America*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6), p. 329, 注 10。《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对文化自由大会的活动及其与中情局的关系、《邂逅》杂志的创办情况有更详尽的考察。

⑱ 《父辈的世界》, 第 544 页; Neil Jumonville, *Critical Crossings: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Postwar Ame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chap. 2;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⑲ David Steigerwald, *The sixties and the end of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John B. Judis,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Democra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chap. 3.

⑳ John B. Judis, op. cit.;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 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第 390 页;《战后美国史》, 第 233 页。

㉑ 西奥多·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年版, 第 6 页; John B. Judis, op. cit.;《美国自由的故事》, 第 401—402 页; 关于休伦港会议和《休伦港声明》, 更详尽的研究见理伯卡·E·卡拉奇:《分裂的一代》(覃文珍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0—19 页。

㉒ 李连江:《新保守主义》, 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3 年, 第 66—67 页。当然, 60 年代美国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肯定不能完全归咎于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政策。正像贝尔阐明的那样, 动乱的根源在于

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丧失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231—253 页。另请参见《战后美国史》，第 295—300 页。

⑳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 189 页。

㉑ 《美国自由的故事》，第 395 页、399—401 页、424 页；Alonzon L. Hamby, *Liberalism and Its Challengers: FDR to Reaga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59; Godfrey Hodgson, op. cit., pp. 115—116; 朱世达：《在肯定性行动中的两难处境》，朱世达主编，《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0—381 页；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20—525 页。

㉒ 这些暴力行为和 1966 年开始的“黑权”（Black Power）运动与南方非暴力民权运动有很大区别，它反映的是北方城市贫民区黑人下层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的声音和愤怒，而老民权运动反映的是种族隔离的南方黑人及其中产阶级的关切和风格；新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种族自尊，对白人美国的拒斥，它不仅仅是对诸如贫困和种族歧视之类实际问题的抗议，亦表达了远离美国社会的愿望。对于北方黑人的暴力行为，美国社会和民权运动内部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金就不赞成这种做法。尽管这些行动突出了把黑人问题列入全国议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是迫使联邦政府和国会重视黑人问题和制订相应政策和新民权立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它导致了原本局限于南方部分白人中的“白人反冲”（white backlash）扩散到北方地区，并使得普通的美国白人开始远离自由主义精神。见 Alonzon L. Hamby, op. cit., pp. 260—261、263。

㉓ 《美国自由的故事》，第 401—405 页、406—409 页；赵林：《新左派运动：异化和忧虑》，《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第 240—256 页；John B. Judis, op. cit., pp. 91—94；《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 243—245；《分裂的一代》，第 5 章；Paul Lyons, *New Left, New Right and the Legacy of the Sixti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 3；《战后美国史》，第 316 页。

㉔ 小阿瑟·M·施莱辛格主编，《美国民主党史》（复旦大学国际政治

系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4页。

⑲ 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365页; Godfrey Hodgson, op. cit., pp. 117—118;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3—574页;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14—617页; Hans J. Morgenthau, “To Intervene or Not to Intervene”, *Foreign Affairs*, 45/3 (April 1967); Alonzo L. Hamby, op. cit., pp. 271—272.

⑳ 《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第366—368页。

㉑ Alonzo L. Hamby, op. cit., p. 264; Paul Lyons, op. cit., p. 68; Leonard Williams, *American Liberalism and Ideological Change*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69—70。直至今日,激进派知识分子仍在倡议建立直接民主。道格拉斯·拉米斯在1996年出版的《激进民主》(*Radical Democracy*)中,以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社会运动——如美国的反战运动、菲律宾的反马科斯运动和墨西哥的恰帕斯自治运动——的总结性考察为基础,主张为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多种目的,形成面对面的小群体,以普遍价值相号召,争取在社区、工作场所和第三世界的本土尽可能实行直接民主和自治,壮大公民社会,建立自由空间,逐渐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消亡,从而既可以代替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安排,又可以代替传统左翼的权威主义的组织方式。见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刘元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㉒ Alonzo L. Hamby, op. cit., pp. 261—262, 264—265; 《新保守主义》,第70—72页。

㉓ Alonzo L. Hamby, op. cit., pp. 277—278; 《美国的自我探索》,第133—134、292页; 《美国民主党史》,第417—458页; 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尔塔森和托马斯·E·克罗宁:《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399页。

㉔ 《美国的自我探索》,第291—292页。

㉕ Daniel Bell & Irving Kristol, “What is the Public Interest?”, *Public Interest*, 1 (Fall 1965); 《意识形态的终结》,第514页。

⑳ Lora and Longton, op. cit., p. 647.

㉑ Irving Kristol, "American Conservatism 1945—1995"; Irving Kristol, "The Old Politics, The New Politics, The New, New Politic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24, 1968; Lora and Longton, op. cit., pp. 649, 652.

㉒ Irving Kristol, "Skepticism, Meliorism,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Public Interest*,
<http://www.thepublicinterest.com/notable/article3.html>.

㉓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 230—231 页、237—238 页、290—291 页; Irving Kristol, "American Conservatism 1945—1995"; 维达夫斯基的话转引自 John Ehrman, op. cit., p. 36。在新保守主义和保守主义合流后,有些保守主义思想家也认为 1965 年《公共利益》的创办是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转折点。见 George F. Will, "Looking Back to 1965", *Public Interest*,
<http://www.thepublicinterest.com/notable/article.html>。

㉔ Norman Podhoretz, "Neoconservatism: A Eulogy"; Joshua Muravchik, "The Neoconservatives Unmasked: Reading the Label",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6, 2003; John Ehrman, op. cit., p. 34.

㉕ Neil Jumonville, op. cit., pp. 186—193; Mark Gerson, "Norman's Conquest: A Commentary on the Podhoretz Legacy", *Policy Review*, No. 74 (Fall 1995)。贝尔在 1988 年回忆了海登拜访他的经过。1961 年,海登刚刚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贝尔当时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看贝尔。贝尔回忆说:"同海登的那些早期谈话引起了我的不安,那些谈话证明他是浪漫主义姿态和对组织策略采取随机应变的犬儒主义姿态的一种奇怪混合。"见《意识形态的终结》,第 475 页注 1。1963 年,海登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的其他几个领导人前往纽约《异见》杂志的编辑部,拜会豪。关于会面情况,详见 Neil Jumonville, op. cit., pp. 203—204。关于民粹主义,见 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New York, 1994)。关于"自由言论运动"的最新研究,见 Robert Cohen and Reginald E. Zelnik, ed., *The Free Speech Movement: Reflections on Berkeley in the 1960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④ Neil Jumonville, op. cit., p. 202; Charles B. Forcey, Jr., “From the Quest for Community to the Quest for Authority: Robert A. Nisbet and the Traditionalist Response to the Sixties”, the lecture at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Annual Meeting in a panel on “Conservatism in the Sixties”, 30 March 1996; Irving Kristol, “The Old Politics, The New Politics, The New, New Politics”。波霍雷茨和莫伊尼汉的话分别转引自《新保守主义》,第72—73页; John Ehrman, op. cit., p. 37。

④《父辈的世界》,第566—567、574—579;波霍雷茨的文章参见 Neil Jumonville, op. cit., p. 196。另参考 John Ehrman, op. cit., pp. 37—38。

④《意识形态的终结》,第477—478页; Neil Jumonville, op. cit., pp. 221—222。

④ John Ehrman, op. cit., pp. 38—39;《父辈的世界》,第571—574页。

④ John Ehrman, op. cit., pp. 40;《意识形态的终结》,第499页,注2。关于哥伦比亚大学骚乱情况,见《战后美国史》,第318—319页; Neil Jumonville, op. cit., p. 205。

④《民治政府》,第399页、268页; John Ehrman, op. cit., pp. 57—59。

④ John Ehrman, op. cit., pp. 48—57、59—60;《大外交》,第625页。

④ John Ehrman, op. cit., pp. 60—61。

④ Nathan Glazer, “Blacks, Jews, & Intellectuals”, *Commentary*, April 1969。

④ 本段论述主要参考 John Ehrman, op. cit., pp. 42—45。关于保守派对知识分子的传统态度,见 Paul Starr, “Liberalism, Conservat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 the lecture at the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New York University, February 8, 1995。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见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十章。

④《新保守主义》,第73—75页。

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0—21页;威尔逊和李普塞特的话分别转引自 John Ehrman, op. cit., p. 46;《新保守主义》,第76—78页。

④ John Ehrman, op. cit., p. 46; Jonah Goldberg, “The Neoconservative

Invention", *National Review* online,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goldberg/goldberg052003.asp>.

第三章 70年代：“危机”时期的新保守主义

70年代的事态发展让本已为60年代的动荡伤透了脑筋的新保守主义者更加揪心。在他们看来,70年代美国的图景大致如下:从国内方面来说,虽然伟大社会项目已经宣告失败,但其精神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的主流。由于自由主义在美国公共哲学中的主导地位,伟大社会的自由主义精神事实上一直支配着美国的公共政策,肯定性行动措施的发展即为明证;60年代的动荡虽已平息,随着越战的结束,新左派学生运动在政治上也已经无足轻重,但其流毒影响深远。一方面,新左派知识分子仍然在批判、攻击美国及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攻击资本主义,要求与苏联和平共处,宣扬第三世界革命国家的价值优越性,而软弱、糊涂和毫无主见的主流自由派即使不是公开支持新左派,也是默许和纵容。更为要命的是,很多受到激进思想影响的自由派在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关键机构中已经占据了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反主流文化以及对个人的极度张扬似乎已经深入大多数美国人的头脑之中,性生活的放纵,藐视权威,对家庭、社区和国家缺乏责任感的现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瘟疫”,由此,美国社会的凝聚力在下降、家庭在解体、犯罪、吸毒和未婚先孕等社会问题日趋突出。从国际方面来说,整个70年代,苏联在世界上咄咄逼人的态势恰与患上“越战综合征”的美国形成鲜明对照,被越战的灾难吓破了胆的美国政府和精英已经丧失了遏制苏联扩张的决心,在道德上事实上已经被解除了

武装,他们跟苏联搞缓和,不愿承担在海外的承诺和义务。此外,在联合国的舞台上,第三世界的反美反以倾向得到充分的宣泄。凡此种种,如任其发展下去,即便红旗不插满全球,民主阵营最终可能只剩下美国一个光杆司令,美国本身的安全显然得不到保障。

这种图景一方面促使新保守主义者更深入和系统地反思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倡扬更加强硬的对苏政策,批判自由派的软弱,对第三世界的反美反以言论发动反击。

一、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

1982年,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作了一次关于美国和德国新保守主义的演讲。在谈到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出现时,他说:“6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发现他们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并不切合西方工业社会在他们头脑中的肯定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源于应对失望的尝试。”^①哈贝马斯虽属左派阵营,对新保守主义和保守主义一直持批判态度,但上述论断还是基本正确的。

让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感到失望的第一项事实是自由主义的新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伟大社会版本的自由主义。就指导思想来说,他们认为其中的结果平等观念违背了美国自由主义的一贯的根本信念——机会平等,并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结果平等不仅意味着政府的迅速扩展(而政府的扩展于解决实际问题往往于事无补),也意味着官僚机构侵入个人生活的所有领域,结果必然导致个人自由不可容忍地被削弱。克里斯托指出,寻求结果平等的自由派和激进派对于结果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

并无清楚认识,结果平等只会带来摧毁自由的政策。他说:“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的收入分配是正当的,因为由人民的自由观点和自由偏好来塑造社会要好过由政府执行任何价值观念来塑造社会。”除此之外的任何替代办法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不能容忍的胁迫和对自由的牺牲。克氏进一步指出,任何偏爱平等的哲学都并非真正信奉自由,因为这种哲学对“社会正义”的强调导致它在必要时不惜胁迫人民来达到平等。“正是由于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是以前来界定‘社会正义’和‘公正’的,所以他们发现自己很难讨厌左派的(比如平均主义的)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政权。同样,正是因为他们作为平等之正义的真正信奉者,他们不喜欢自由社会,以及自由社会所有不可避免的不平等。”^②

事实上,新保守主义者不是反对平等,他们只是认为平等只能屈尊于自由之下,而且,在他们看来,真正可行的平等只能是机会平等。贝尔更雄辩也更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传统自由主义和伟大社会自由主义自由与平等观念的不同,以及伟大社会自由主义的弊端。他说:

传统的自由主义将平等定义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它以在法律的规章与人的惯例之间的区别为基础。法律的规章将一般说来应用于一切选手的比赛规则颁布下来;在这些规则之内,个人可以自由进行交易,作出自己的选择,决定自己的行为。按照人的惯例,管辖者或者法官可以宣布判决将某些人而非他人挑选出来让其承担义务或作出赔偿。这样做往往是出于正义和公正的原因,但仍有武断和强制的成分。自由主义对前者怀有偏爱——即使这可能产生后果上的一种不平等——因为自由主义的最主要价值就

在于减少政府的压制和维护自由交易的规则。……自由主义争论的核心,就在于人们因其能力、需要、禀赋、才能而有所不同。因而,就须区分平等待人与使人平等。使人们平等的努力必然导致行政机构把不同的程度和补偿的程度多少确定下来,因而也就意味着不平等地对待人们。

当然,并非所有导致不平等对待人们的使人平等的做法都不可接受(比如纳税,收入不同的人要交不同的税),关键的问题在于平等原则“在应用于社会的实质性问题”时会导致何种意义上的平等。要探讨这一问题,必须要区分不同层面的平等:

从逻辑上讲,平等有三个层次:条件的平等、手段的平等和后果的平等。大体说来,条件的平等指的是公共权力的平等、包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公共场合行动的平等、一人一张选票的原则,……这里的指导方针就是按照共同标准进行的平等对待。在这些情况中,如果个人由于公众歧视而不平等,我们就试图使他们平等,从而使他们得到平等的对待。……手段的平等意味着机会的平等——获得导致不平等后果的手段平等。……当人们看到,机会的平等已成为正式的事实,但某些群体在历史上一直社会地位低下,在“公正地”竞争职位时处境可怜,因而也就有充分根据采取补偿行动来为这些不平等作出纠正。然而原则依然存在:个人通过其“自然的”能力和各自的努力试图达到所可能达到的目标时,他们须得到平等的对待。

毫无疑问,在所有个人都得到平等对待的情况下,由于自然能力、努力程度或其他什么原因,个人之间竞争的后果仍可能是不

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是自由获得和通过努力赢得的”。不幸的是,伟大社会的自由主义及其所激起的期望却进一步要求后果的平等:

近年来有一种强烈的呼声,认为不可比拟的后果过于巨大和不平等,公共政策应该寻求后果的更大平等——简言之,即使人们在收入、地位和权威上更为平等。然而只有在限制其他人对职位的获得,或者剥夺他们已获得的成果……,这种努力才能获得成功。简言之,减少后果悬殊的努力就意味着,为了使另外一些人更与之平等,某些人的自由将会被限制或牺牲。^③

初看起来,新保守主义者对伟大社会自由主义的思想批评很容易让人想起海耶克,但是新保守主义者的思想根基并非自由企业理论或海耶克的政治哲学,而是对美国的信念(Americanism)。克里斯托本人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特别强调他们与受海耶克思想影响极大的《国民评论》保守主义的区别。他说:“作为‘大萧条的孩子’,我并不接受对‘自由企业’……的盲目信仰,我只是认为自由企业观念(与对新政的批评)是不相干的(irrelevant)。”克氏坦言,虽然他对海耶克后来的政治哲学和思想史著作甚是钦佩,但他从没读过《通往奴役之路》,因为他不相信“会有那样的时刻,美国人民允许自己被诱使或胁迫走向‘通往奴役之路’”。^④这正揭示了新保守主义者思想中最为根本的一点——对美国的信念。英国史家霍奇逊(Godfrey Hodgson)认为,在新保守主义者那里,对美国的信念并非仅仅是通常的爱国主义,而是一种哲学上的准宗教。对于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来说,这种说法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对美国的信念的确是所有

新保守主义者思想中最为根本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仅表现为对美国制度和文化的无比强烈的信心,也意味着信奉人们一般常说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所谓的美国信条由两条深深扎根于美国人头脑中的原则构成,这两条原则之所以能被称为美国信条,是因为它们根本上有助于界定作为一个民族的美国人,在个人的层面上,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两条原则构成了他们对公正和正义的看法。这两条原则分别是个人权利(即个人尽他们的才能、他们表现出来的能力、他们的阅历和经历发展自我且不会受到政府或压迫性多数强加给他们的不适当限制的权利)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指适用于每一个人的同一种法律,而非对不同的公民有不同的法律),或许也可称之为美国的个人主义。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的信念的核心,正是以个人权利和法律面前平等这两原则为基础的“个人事业”(individual enterprise)观念。贝尔曾说,“个人事业”观念就是“个人不受其阶级根源约束的成就观念,是个人地理和社会流动的观念”;它意味着机会均等和接受失败的风险:

机会均等的原则来自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个人(不是家庭、社会或国家)是社会的惟一单位,社会安排的目的就是要允许个人得到实现其目的的自由——通过劳动获得财产,通过交换满足需求,通过升迁达到与其才智相称的地位。认为个人是有所不同的——在天资方面,在精力和动力方面,在对于爱好的看法方面——因此社会体制应确立一套程序来公正地调节必要的竞争与交换以实现这些因人而异的愿望和能力。^⑤

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们支持早期的民权运动,因为种族隔离违

背了美国信条和自由主义精神；同样的信念亦促使他们反对后期民权运动黑人的经济及其他平等要求，反对伟大社会自由主义的许多实际项目。

在新保守主义者眼中，“肯定性行动”最能体现伟大社会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荒谬之处。伟大社会计划虽最初由民主党政府提出，但以后各届政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不继续贯彻执行。尼克松政府所起的作用特别突出，1968年，他赢得大选后，并没有推翻民主党的政治建树，而是继续执行民主党开创的对社会和经济政策的管理和干预。以致一位学者不无道理地说：“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伟大社会的计划达到了一个看上去似乎不可能的顶峰。”尼克松政府不仅大大增加联邦政府在老年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制度上的开支，还将肯定性行动计划扩展到大学并使之全面地体制化。至70年代中后期，肯定性行动已发展成为“以种族、民族血统和性别来享受和分配来自政府或非政府渠道的社会福利的政策。……这些社会福利包括就业、入学、获得政府合同、享受政府补贴、争取奖助学金等”。目的是“通过对过去受到全社会歧视的群体进行补偿性地辅助和支持，以帮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美国社会的竞争”。也就是说，黑人、印地安人、拉丁语裔人和妇女等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享受政府福利、就业和入学的权利。应该说，这么一项政策原本的用意极其良好——希望通过政府努力以纠正过去美国生活中不公正的现象，给历史上曾经受过歧视而受困于相对不利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歧视的美国少数族裔（不包括亚裔）更多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但从哲学意义上讲，它与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是相对立的：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肯定性行动注重的是群体权利，而强调人人机会平等的美国传统实践只看重个人权利；肯定性行动注重程序的结果（通过注意种族平等），而非无视种

族、性别和民族血统等因素,但这显然与“宪法的无肤色界限”原则(color-blind Constitution)相悖。配额现象的出现更直接促使许多普通白人将这项政策称为“反向歧视”,并促使他们采取越来越多的诉讼行动。^⑥美国高等学府和公司凭借这一原则在招生和雇用人的过程中对少数族裔和女性实行优待政策,一些地方甚至给予他们特别的配额,必须招满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和女性,原本希望达到更大程度平等的政策就变成了一种“种族优先”的“一刀切”政策。

对此弊端,自60年代以来一直对城市中族群关系特别是黑人和犹太人关系有着浓厚兴趣的格莱泽率先提出了批评。1975年,他出版《肯定性的歧视》(*Affirmative Discrimination: Ethnic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一书,悲叹美国正从机会平等的目标滑向“统计数据上的平等”(statistical parity)。他和其他新保守主义者一起反对这种趋势,因为他们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个人和个人权利的价值都是社会的中心原则,个人平等应当凌驾于团体平等之上。格莱泽抱怨说:“在自由主义者为了争取不再以种族、宗教或族裔出身为决定之基础而奋斗几十年之后,同一批自由主义者中的许多人正以肯定性行动的要求力图再作这样的区分。”在格莱泽看来,肯定性行动最大之弊是已经改变了美国族群之间的关系:

这个国家因为政府的行动正日益分裂为具有不同渊源的种族和族裔群体。奥威尔的噩梦——“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离我们)更近了……政府行动创造了新形式的冲突。^⑦

新保守主义者反对肯定性行动并不意味着他们歧视弱势群

体,恰恰相反,他们反对肯定性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肯定性行动违反了“平等待人”的精神。波霍雷茨曾说,“我支持招募合格黑人的具体行动,我也支持帮助不合格的黑人在平等的起点上参与竞争的特别努力”,但是如果像肯定性行动那样以族裔、性别或性趋向为基础而给予某些团体以特别优待的话,那么它显然违反了美国自由主义的一项关键原则,即不应以个人无法控制的特性为评判他的基础。^⑧

贝尔更为系统地批评了肯定性行动和配额现象。他指出,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的最初意图是消灭歧视。但由于歧视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工作要求的条件非常特殊时是难以证明的,因此实践中衡量是否存在歧视的标准就变成了测定各级工作中的少数族裔和女性成员数量是否等于他们在人口中所占比重,其结果是计划意在保护者规定“指标数字”和“定额”。但是这一政策为美国政治带来了一项重大变化:

一项全新的权利原则已经引进到政体中来。按照实践的性质,已经从歧视的原则转变为代表性的原则。作为一种权利,妇女、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要按他们的数量比例来雇佣,专业资格或个人成就的原则要从属于集团特性的原则。在同类技术的情况下,在一人可容易替代他人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合理地”坚持定额。

但这种做法却忽视了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特性和要求,许多职位的惟一要求只能是个人的才能:

教授、医生或者行政官员是按照适合于该职位的能力来检验的。在这儿“群体代表”的思想没有什么意义。如

果要维持公正感的话,那么标准就必然是能力而不是代表性;如果说(性别的或阶级的)歧视是武断的,那么对以性别或阶级为基础的地位平等的要求也是武断的;二者均需被摒弃。

真正的平等应当是“把每一个领域的特权限制在适合于其特征的规模之内”,力图在每一个领域中实现代表性的一刀切做法特别是定额之类的硬性规定不仅不能带来平等,反而意味着标准受到歪曲或破坏。更为重要的是,

对于要求以归属原则为基础的代表性,其历史性的讽刺是它完全倒转了激进的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对歧视进行自由主义和激进的抨击,根据的是歧视根据不公正的集团归属而否定人们公正地取得一席之地。评价一个人不是根据这个个人,而是根据他是某一特定集团的成员来加以评价或排斥。但是现在却在要求人们应有一席之地时,首先根据的是人们所具有的特定的集团归属。人的本身已经消失。只剩下归属性。……人们根据作用、集团归属而得到优惠,因此,人们又一次“被分解为”一个单一的主要归属性,以此作为他在社会上取得一席之地的前提。

最终人们看到的实际结果是西奥多·怀特所说的“巨大的幽灵”,“这个幽灵就是根据人种和民族血统把美国人分成各种集团,并让每一个集团享受其特殊的权利。”^⑨

在批判肯定性行动的同时,伟大社会计划的失败也是始终萦绕在他们头脑中的阴影,历经数年的反思让他们认为,通过政治行动促进人类的幸福和进步,其成效是有限的,甚至会适得其

反。具体来说,他们认为导致伟大社会计划和其他相关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以下四个方面。^⑩

第一,政治家及其智囊低估了社会的复杂性,夸大了理性的力量和政府的能力,以致政府制定的许多政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极为复杂,人与人之间和制度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都比以前高了许多,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政策的实施常常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如果政府未曾预料到这一点,它制定的政策很可能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从而使政策带来的益处大打折扣,甚至得不偿失。伟大社会计划的制定者们恰恰在这一点上栽了跟头。那么,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得周全些,是否就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副作用呢?新保守主义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认识到政策会有副作用只可以缓解矛盾,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原因是,无论社会科学怎样进步,人们关于社会的知识永远是有限的,而在有限的知识基础上不可能制定出完美的政策。李普塞特批评社会科学失去了应有的谦卑和审慎精神,对社会现象的极端复杂性和认识社会的难度缺乏应有的认识。克里斯托的批评更加尖刻:“社会科学家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60年代的社会改革之所以那么卤莽草率,原因就是受当时社会科学家思想的影响太深了。”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根本问题不在于社会科学家缺乏知识,也不在于政治家听从了社会科学家们一知半解的建议,而在于双方都没意识到或者不肯承认自己的能力或知识是有限的。无论什么时候,政策都只能在不充分的知识基础上制定,而且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圆满无缺地执行它的政策。要避免重大的失误,关键是要承认政府能力和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就政府能力的有限性,莫伊尼汉在1975年写道:“民主的稳定极为依赖于人

们要小心甄别政府能为之事和不能为之事……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特别是在饱含热情并毫无道理地相信能做到的情况下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是在为挫败和毁灭创造条件。”^⑩而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则极为矛盾地由人类知识的进步所证明,换言之,虽然社会科学在不断发展之中,但这种发展只会进一步揭示社会科学知识的有限性。莫伊尼汉这样写道:“社会科学越进步,越缺少指导社会政策的信心。社会科学家倾向自由主义,但社会科学的发现却无疑是倾向保守的,因为这些发现差不多都是在说明社会只能渐进性地发展,少有例外的情况。”

西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则将矛头直指源于启蒙的发展理想(dynamic ideals)、进步观念和现代化过程。西尔斯悲叹实质性传统(substantive tradition)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没落,他认为,很大程度上这是发展理想的破坏之故,而这种发展理想又已经变成了传统。发展理想“意味着应用抽象原则的理性,以及彻底地运用经验知识来实现这些社会中迄未达到的目标。在西方社会中,‘发展’理想要求人们与传统的观察方式和行事方式决裂。它是一种不满于人们所接受的东西的表示,这种不满具体地集中在个人所享受的物质福利的不充裕上。……近年来,政府成了克服这种不充裕的理想工具”。然而,

理想是理性化。现实则明显的不同;正是因为现实中太缺乏理想了,所以人们才如此迫切地企求它。现代社会远远不是由理性统治者全盘理性化的社会。这个理想之所以未能成为现实,有很多原因。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理想本身就其性质来说就是不能实现的。生活的目标并不是能由理性来建构、应用理性手段来实现的。^⑪

其次,那些制定政策或握有权力的人还存在着绝对的非理性因素,而且对自己所处的局面了解得太少,执政者所掌握的知识即便对于他们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来说,也实在是太少了。再次,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匮乏,各种社会集团利益之间的冲突,也都使现代化的规划受到极大的牵制。最后,尽管统治者身上充满了种种矛盾和缺陷,他们却依然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个人意志全面而深透地强加在人民身上。总之,尽管理性化规划导致了愈来愈集中的中央权力,但他仍然不能胜任统筹安排所有理性化活动的任务。

第二,人们对理性力量和政府能力的夸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人和社会的本质是可以被改变的,而这种观念是荒谬的。科瑟翠克在1978年说:“使制度遵从抽象原则的努力正是‘理性主义’政治观(approach to politics)的本质,这种政治观具有极大的潜在危险性,因为它假设制度和人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而实际上后者并不具有那么大的可塑性。”^⑩在这样一种乐观然而虚妄的信念支配下,人们把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当成政策的目标,注定要失败。哈佛大学教授班菲尔德对反贫困项目的剖析极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60年代,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相信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提出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观念,对于自由派来说,“贫困文化”意味着穷人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限制了穷人向上的社会流动;自由派特别是推动和支持伟大社会项目的自由派相信,通过政府的积极作为如公共学校的教育、对学龄前儿童的照顾和工作培训项目可以改变这种文化。1970年,班菲尔德出版了《世俗之城》(*The Unheavenly City: 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Our Urban Crisis*)一书(1972年出了修订版),同样关注了阶级的文化决定因素,但在以政府政策和项目

改变这种文化之可能性的问题上持更为悲观的态度。班氏认为,从某种重要的程度上,底层阶级(lower class)的文化可以解释贫困的持久存在,无论这贫困者是黑人还是白人;但是,文化和行为特征要比自由派假设的那样更难以改变。因为改变文化和行为特征也就是要改变人的本性和根本状况(human condition),前者肯定是不可能的,后者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至少比自由派假想的困难得多。就“向贫困开战”项目的具体效果来说,班氏认为,其所起的负作用远远大于积极价值。实际上,政府消灭城市贫困项目的主要受益者并非穷人,而是上层阶级的人道主义良心。^④

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人们对政府期望太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忽略了人性不可能完善这一事实。如果人们时刻记得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公民都不可能成为十全十美的圣人,相反地,他们都以自我利益为中心,那么人们就不会对政治和政府抱过高的期望了。在人性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全盘接受了欧洲传统保守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支配人们行动的是自私自利,因此,切不可过高地估计人们的理性对情绪的控制能力,也不可指望人们克服成见、一视同仁,更不能企求人们为公益而牺牲私利。在政治上,尤其不可把人性理想化,现实地对待人是成败的关键。政治制度的设定所必须考虑的,一是如何使人把私心用在同时对于社会有益的活动中,二是如何防止人的作恶能力。威尔逊在1977年十分简洁地用两句话概括了新保守主义的人性观:“人是执拗的,执拗得本性难移;但人也是理性的,理性得随机应变。”

第三,传统颓丧,个人失去了必要的社会依傍。新保守主义认为,有助于缓解社会问题的传统制度和结构遭到破坏,是美国政治失败的另一个原因。社会上本来有不少可以帮助人们消除

或缓解社会压抑的组织,比如家庭、教会等等。这些非官方的组织同时还能约束其成员的行动,从而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但是,政府对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破坏了这些传统的社团组织,使其丧失了应有的权威,由此开始了一个恶性循环。起初是政府急于解决诸如社会团体渐趋解体引发的街头犯罪之类的社会问题,但政府的直接介入导致传统组织的权威进一步被削弱,反而加剧了各种社会问题。

第四,尾大不掉,特权阶级横行。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国家职能的扩大造成了一个拥有特殊利益的新阶级,其中包括“科学家、教师、教育官员、新闻记者以及新闻界的其他人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在日益扩大的公共部门就职的律师和医生、城市规划者、大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等等”。新阶级的突出特点是培育了一种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道德观念相反的文化。他们打着为穷人谋福利的旗帜,搞出一个又一个社会项目,让政府不断投入资金,而真正从中得利的却是他们自己。新阶级的权力地位和财富都依赖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依靠着不断开设新的政府项目,维持已有的项目。这些人教育程度高,能直接接触到政府高层人士,又是直接为自己谋利益,所以在影响政策方面十分卖力,也十分成功。他们得了利,受害的却是社会,其中受害最大的正是他们声称要帮助的社会底层。^⑤

二、文化危机和解决办法

在反思自由主义的同时,新保守主义者还需要回答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60年代的美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原因何在?新保守主义者认为,60年

代的动荡表明美国面临着危机,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和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运转模式出了问题,而是由文化决定的合法性问题。所谓的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社会主要机构和制度特别是政治体系权威性的丧失,政治体系权威性的丧失是在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上发生的。

一是政府威信下降,人们不再相信政府。随着现代民主社会的发展,相互竞争的政党、大众媒体和各种利益集团助成并促进了人们对政府期望和要求的“膨胀”(inflation)。由于认为政府无所不能,人们要求政府消灭一切由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带来的不良影响。毫无节制的政治要求把政治变成了各社会集团努力利用政府力量满足自己要求的争夺战,从而使政府不堪重负。一旦以往分散在市场中的决策如今集中到了政治决策过程中,相应地,凡有失败或要求没得到满足,人们不复在利益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上找原因,而是把责任一股脑推在政府乃至政治制度身上,其后果必然是危害政治稳定。1975年,莫伊尼汉就此写道:“民主政治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认真区分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果要求政府提供它无法提供的东西,就会导致挫折和伤害。倘若人们由于被误导而热烈地相信政府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受到的挫折和伤害就会特别严重。”^⑩

二是政治体系受到挑战 and 攻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成了问题。由于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基本政治功能之一是,为公民提供一种评价政府(对其被统治者的)职责的适度标准^⑪,因此,当公民据以评价政府职责的标准不再适度,从而引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时,代议制民主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就是很自然的。就美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多元主义民主制就受到了来自新左派的挑战。从40年代末期以来,对美国多元主义民主制的信

念一直是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肯定评价的支柱之一。他们始终认为,美国的多元主义民主体制本质上是“精英统治的民主”,它虽不完美无缺,但宪政国家的代议性质和分权既保证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保证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又保证可以选出最佳的政治领导人。但是,新左派认为,人民的意志在现行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下被当权者封杀,不能畅行无阻,因而主张用直接民主取代现行的多元主义民主制。

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新左派的参与式民主本质上是民粹主义的乌托邦。说它是民粹主义的,是因为它带有强烈的反精英色彩,它强调的人民意志、民意只是乌合之众多数的冲动的、盲目的、随大流式的情感宣泄,并非真正的民意即多数人深思熟虑的意见。说它是乌托邦,自然是因为新左派在寻求建立现实当中不可能存在的“理想之国”,对于任何较大规模的政体来说,直接民主均不可行。参与制民主从广泛意义讲是对自制政府(self-government)的肯定,一定情况下的直接民主,目的在于把政治活动的旁观者转变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参与同自身生活有关的决策。这种民主接近托马斯·杰斐逊提倡的那种以“独立小农”为基础的古典民主。它只有在那鸡犬之声相闻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比如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或殖民时期新英格兰的小城镇——里才能找到适宜生存的土壤。针对新左派的这种民粹主义主张,新保守主义者指出,它除了会破坏美国现存的多元民主政治制度之外,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当然,它肯定会给某些人带来好处,比如参与性民主将给予“那些没有物质忧虑、具备必要的闲暇和技能的新阶级以权力,是让他们感到满足的活动,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有有限的吸引力”。尼斯贝说,参与性民主只会创造“根源于时髦或一时流行的狂热、屈从于反复无常的奇想”的乌合之众,“它很容易围绕某一个议题或人物形

成,缺乏时间、传统和惯例能提供的那种凝聚力。”这会导致《宪法》意在避免的稍纵即逝的多数和李普塞特批判的大众运动。^⑧

即便从实际考虑,在后工业社会中,参与的增多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的要求就能得到充分的满足,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贝尔就此写道:“政治舞台的扩大以及更大量的人参加进来,意味着达成决议和办成一件事要花费更多时间和更大代价。提出要求的人数更多,利益更繁复,小组会要召开,要求的内容要讨价还价,分歧要加以调停——因为每个人或每个利益都要自身的发言权,所以时间和代价大增。人们往往听到一些个人或集团感到对影响事态‘无力’的声明。但是,今天在各级政府的政治生活中可能比以前有更多的参与,参与的增加导致互相‘制约’的集团倍增,导致一条死胡同。因此,参与越多反而导致更多的挫折,情况往往是这样的。”^⑨新保守主义者还认为,和所有的民粹主义者一样,新左派也惯用危言耸听的伎俩,把本来不大的问题夸张为严重的危机,并据此要求美国政府作出坚决有利的反应。而当政府因卤莽从事遭到败绩时,民粹主义者不思己过,反而把矛头转向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基本的价值观念。比如,新左派认为,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出了不可救药的差错,种种社会政治问题,如种族歧视、社会不公正、帝国主义,都是整个制度造成的,而且现行制度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由此,他们和反主流文化论者、新阶级一起去反对、破坏、挑战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弃传统价值如敝屣。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新左派、反主流文化论者和新阶级在文化上具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他们都以“个人解放”为旗帜,抛弃艰苦奋斗和自我克制的传统,宣扬享乐主义和所谓的自我实现。这在贝尔眼中,就是现代主义的影响。二是他们的出现意味着新“敌对文化”的兴起。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贝尔和波霍雷

茨不约而同地借用了屈瑞林的“敌对文化”观念来说明反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现象。波霍雷茨指责这种“敌对文化”是毁灭性的、虚无主义的、根本上是危险的。贝尔则以非同寻常的敏锐注意到，高举反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敌对文化”和反对一切束缚的“反主流文化”的同时兴起，意味着砸破或意欲砸破一切条条框框和道德规程，意味着在信念和生活方式上，反资产阶级的意识已经获胜：“现在它必须承认对立‘意识形态’的胜利，维持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个新阶级的兴起以及老价值体系的瓦解，带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体系是被资本主义自身的结构变化所破坏的。”虽然思想和文化风格并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历史，但它们是“变革的必然序幕，因为意识上的变革——价值观和道德说理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危机，或叫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反对遵从道德法规的态度使人陷入根本的‘我向主义’，结果疏远了与社会的联系以及与他人的分享。这个社会文化矛盾就是缺乏一个扎下根子的道德信仰体系，这是对这个社会生存的最深刻的挑战。”^②

总之，新左派、反主流文化论者和新阶级所代表的“敌对文化”无异于从精神上瓦解美国的立国之本，他们的价值观念、方法和目的对于一个自由的多元主义社会是具有颠覆性的。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自由多元主义是以宽容、公民自由、自由和独立的批判性研究和对多样性的尊重为基础的；正是这些使得美国独一无二。当新左派、反主流文化论者和新阶级拒绝自由多元主义时，他们事实上已经从根本上拒绝了美国。因此，在权威合法性危机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更严重的问题即文化危机、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危机。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之所以失去了对政府和政治权威的信心和尊敬，原因是他们对政府失望；之所以

失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抱的期望太高;而之所以会对政府抱太高的不切实的希望,则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美国人本来是崇尚个人主义的,现在不少人放弃了个人奋斗,完全依赖社会和政府,期望国家把一切都给他们安排好。可是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问题就发生了。这就是我们上面为什么说合法性问题由文化决定的原因所在。

那么,如何解决或应对美国面临的这些危机呢?

新保守主义认为美国产生众多社会政治问题的症结,是自由与多元这两个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和破坏,要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必须采取三方面的主要措施。

第一,再造经济秩序、民主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一致性与和谐(coherence),这是新保守主义所有主张中最独特、最根本和最具有创见的一点。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最为系统地提出并近乎完美地证明了这个命题。贝尔首先假设,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离的:“它的不同领域各有不同的模式,按照不同节奏变化,并且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以此为前提,贝尔通过建立理想类型和历史考察,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三领域对立说”。资本主义历经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已形成了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三大领域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冲突,根本原因在于各领域的轴心原则相互矛盾:在技术-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起着决定性推动作用的关键部门——中,效益(efficiency)是支配原则,其中全部活动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其中的个人必然被当成“物”、而非人来看待,成为最大限度地谋求利润的工具。作为补偿,这个日益强大的技术与经济共同体又宽宏无度地许愿社会进步的奇迹,提供广泛选择就业和社会流动的自由,促进

社会享乐倾向。在调节冲突的政治领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平等(equality)原则,包括法律平等、公民权利平等、社会与经济权利平等。由于这些平等要求已经变成了“应享权利”,政治机构不得不日益加紧对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干涉,以便调配经济体系产生的社会位置和酬劳。在文化领域中,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self-realization or self-gratification)是轴心原则。“它是反体制的,独立无羁的,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贵贱。”由不同原则支配的不同领域所产生的机制断裂就形成了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紧张冲突。其中最为严重的断裂发生在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因为“自我”同经济领域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从历史上的发展来看,资本主义精神在萌生阶段就已蕴涵着病根。一方面,韦伯所发现的新教伦理的“禁欲苦行主义”(宗教冲动力)使资产者自我约束和勤奋工作;另一方面,桑巴特注意到的“贪婪攫取性”(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的“浮士德”精神,即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人的依赖,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浮士德式上天入地的想像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实现。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曾相互合作相互提携的资产阶级企业家和艺术家却变得相互仇视并害怕对方。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因素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平衡因素——“宗教冲动力”,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资本主义制度一旦失去了宗教苦行主义的束缚,它在经济与文化两方面的发展必然会畸形发展,相互抵触。一方面,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的惟一主宰后,世上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色彩:“毫无局限、无所神圣、变化

就是常规。”另一方面,作为意义之领域(realm of meanings)的文化本是“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像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悲剧与死亡。在这种同生存哲学反复遭遇的过程中,人开始意识到凌驾一切之上的根本性问题。”宗教正是人们据以破译此根本性问题的源泉,然而随着宗教冲动力的耗散,人们只有以文艺来重新解说人生意义,以文艺来取代宗教对社会的维系和聚敛功能,填补宗教冲动力耗散之后遗留下来的巨大精神空白。由此,就产生了“现代主义”。但现代主义并不能完成这一使命,因为它本质上是孱弱无力的。所以,贝尔说,“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②

应当说,贝尔的这种探讨已经远远超出了用“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这样的政治标签所能划定的范畴,更不用说中不类的“新保守主义”了。与其他所有的新保守主义者相比,贝尔的探讨要博大精深得多、系统得多、全面得多。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和框架,以认识新保守主义为美国价值观念危机开出的处方。归结起来,新保守主义者的建议可分为三个方面。^③

首先,坚决捍卫资本主义。新保守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人们迄今所知的种种社会制度中最合理的,它具有三大优越性。第一,资本主义最利于经济的发展。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要解决种种社会问题,根本的出路主要是大力发展经济,也就是先把蛋糕做大。而在这方面,资本主义比其他任何社会制度都更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的市场体制能最有效率地分配资源,并激励人们最大限度地把才智和体力投入商品生产活动。市场经济可以提供强大的动力,督促人们做他们应当做的事。市场可以把私利与公益结合

在一起,人们在市场体制下为自己的利益奔忙,但是由于他们是在创造财富,所以他们的行动对整个社会也是有利的。在促使人为社会作贡献方面,市场机制远比强迫命令有效。莫伊尼汉指出,“政府几乎总不灵,而市场几乎总灵。或者市场总是比政府更有效”,其原因就在于市场能激励人自动做事。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优越性,是它最能保护个人自由,最能防止极权主义国家的出现,是最坚强的民主基础。新保守主义者相信,尽管资本主义可能不是建设自由社会的充分条件,但看起来它确实是一个必要条件。在当今的世界上,只要一个社会实行多元主义的民主制,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其经济必是大多掌握在私人手中。市场经济把财富分散在个人手中,保证了公民的自由。财产公有的社会必然产生极权主义的国家,失去经济自主权的个人只能听任政府摆布,根本谈不上有政治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三大优越性,是市场经济可以分散决策的责任,减轻社会对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压力。在市场体制下,个人必须负起对自己的责任,不能指望靠政府满足他的需要。同时,在市场体制下,个人对社会资源的有限性有更加明白的认识,这样一来,就不会向政府提出过分的要求,也不会因政府无法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对政府乃至政治制度的信心。

不过,新保守主义者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拥护资本主义的。他们不赞成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和社会,但是承认自由放任主义也行不通,适当的政府调节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他们不赞成社会主义式的社会福利政策,但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社会福利。新保守主义之所以提倡建立“保守的福利国家”或“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弱点有清醒的认识。新保守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两个主要弱点。第一,资本主义缺少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因而不

能证明资本主义的财产分配方式是正义的。传统的资本主义分配理论声称财富是勤俭的结果,但是现在已经不大有人相信这种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弱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人们克勤克俭,但它的财富分配却刺激人们追求享乐。这就是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最明显表现: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需要清教的文化伦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文化享乐主义又是与清教伦理格格不入的。

其次,重建资本主义文化。如何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这种根本性矛盾呢?许多新保守主义者转向宗教,强调复兴资本主义秩序的宗教基础。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就曾期待某种利于建立“新意义系统”的宗教答案的出现。贝尔认为,宗教不是社会的“功能必需”,或者说没有宗教,社会就会崩溃;因为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接触到人的意识源泉的最深处,它有助于解决人类生存的难题,能为苦苦寻求人生意义和目的的大众提供可能的方向和解决。尽管贝尔强调宗教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明言他所说的宗教答案将会是什么,他只说了宗教答案不是什么,并以“限制”(limits)一词来表明寻求新宗教答案的大致方向:“限制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约束‘自大狂’”等等。^②在这方面,诺瓦克比贝尔更大胆,也更明确。一直以来,诺瓦克试图为资本主义提供一种新的合法性证明(justification),这种合法性证明能使社会生活三个主要领域中的支配性原则和谐一致。诺瓦克首先做了两条假设:民主资本主义虽缺乏神学上的合法性证明,却比其他任何政治经济体系更能提高生活质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两者合二为一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必然的关系,民主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存在。和贝尔等人一样,诺瓦克也认为资本主义存

在着根本缺陷。在他看来，“民主资本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是，经过两个世纪以来，它现在对人类的心灵、精神没有任何感召力。”“贪婪攫取性”并非使人向上的生活原则（uplifting principle of life）。当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除了贪婪攫取性以外什么也不剩时，鉴于贪婪攫取性又导致了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的毁灭性后果，大多数人并不喜欢这一原则。诺瓦克认为，事实上的确存在支撑资本主义的使人向上的道德价值观念，而民主资本主义的理想本身就是基督教精神的基础性理想。他说：“全能的主不会使创造（creation）具有胁迫性，而是把创造设定为自由的舞台（arena）。在这一舞台中，主要求个人和人们按照主的法则和愿望生活。民主资本主义就被这样设定以允许他们——所有的罪人——遵从这种自由模式。它创造了一个作为自由之舞台的非胁迫社会……”^④

最后，要再造经济秩序、民主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一致性与和谐，除了坚持资本主义、复兴资本主义秩序的宗教基础之外，还需要重建和坚持以联盟、协商和渐进主义为基础的多元的民主政治制度。新保守主义者们认为，美国开国之父们建立的权力制衡制度虽非尽善尽美，却远胜激进派的新构想。新保守主义者维护代议制的多元民主，不赞成以公民直接参政和平等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新保守主义者强调要严格区分深思熟虑的多数和乌合之众的多数，认为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前者的民主。需要说明的是，新保守主义不赞成直接民主，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的政治智慧和理性。克里斯托明确地写道：“我恰好相信，尽管美国人民在某些短暂的时刻表现得不理性，但从根本上说，他们是理性的。”他们反对直接民主的理由是，这种民主形成并不能加强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力，受益的将是有钱财、有技能、教育程度高并有意识形态的社会上层，而这些人一旦得势，必将全力

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第二,重新树立权威,保护政府的形象。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危机主要是丧失权威的危机。这一危机的主要表现是,政府开始失去合法性,人民渐渐失去对政治领袖和政府的信心,社会稳定因而受到威胁。新保守主义者特别关心社会稳定问题,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维达夫斯基借用经济学家马歇尔的一段话简明扼要地表述了新保守主义对政府的态度:“政府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为了使政府保持最好的运转状态,无论花多少心血都不算过分。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主要条件就是不要让政府做它并非特别擅长的事。”因此,他们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重新树立政府的权威,恢复它在美国民众中的合法地位。怎样才能重新树立政府的权威呢?新保守主义提出了三条建议。1. 他们认为,政府要取信于民,最重要的当然是要为民做事。所以,他们认为关键的问题还是政府要稳妥、有预见地实施社会计划,为人民排忧解难,从而切实地消除不利社会稳定的根源。2. 新保守主义者很看重舆论的作用,他们认为,美国政治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左派及其反文化思潮众口铄金的结果。因此,要重建政府的权威,必须大力反击新左派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诋毁。在批评新左派方面,新保守主义者擅长的手法就是把新左派的主张与某种极端的观点牵扯起来,从而引起人们的反感。例如,对于新左派对美国社会持激烈的批判态度,新保守主义者就给他们戴上“反美国主义”(anti-Americanism)的帽子。3. 新保守主义认为,权威危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危机、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危机。按照新保守主义的设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文化危机,除了要再造经济秩序、民主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一致性与和谐以外,还必须创立一种新的公众哲学,使人们在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上形成共识。他

们认为,任何政治社会都必须以社会成员公认的公益观为基础,如果在什么是公益这个问题上形不成共识,人们就会对社会秩序的正义性提出质疑,社会就不可能稳定。贝尔明确指出,当代美国的问题就是缺乏这样的共识,因而,面对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人们找不到一个公认的哲学判定哪些利益是正当的,也无法判定哪些社会效果是正当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本质上是个多元的社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运作于其中。若没有一种社会公认的社会政治哲学,社会必然会被相互冲突的利益分裂。

那么,这样的社会哲学应当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这种哲学内容就是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包括:克制自我、注重家庭、劳动光荣、发展经济、积极进取、崇尚贤能、民族自尊、宗教宽容、严守职业道德、奋斗在先、享乐在后、谨慎苦干、诚实可靠、节制情欲、维护社会秩序、尊重权威、强调责任感、不侈谈权利等。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这些价值代表的才是真正的美国,是美国人可引以为自豪的。他们认为,政府应当出力复兴和倡导上述价值观念。克里斯托和贝尔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一种社会哲学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崇尚贤能”(meritocracy)和机会均等,二是“最低社会福利”(social minimum)。崇尚贤能和机会均等原则相辅相成,按照崇尚贤能原则,分配社会地位和财富时,只应当依据教育程度和能力,不应看出身、财产和政治权力。在现实当中,要想确保崇尚贤能原则能得到贯彻,就必须坚持机会均等原则,反对人为地实现“状况平等”或“实质平等”。理由有三:1. 人为的均贫富必然会使人们失掉创造新财富的动力;2. “状况平等”原则会鼓励所有的社会团体都宣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要求政府改善他们的地位,从而危害社会秩序的稳定;3. 由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实现“状况平等”事

实上是不可能的。最低社会福利原则要求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在强调崇尚贤能和机会均等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忽视处于不利地位的其他社会阶层。在这一点上,新保守主义完全继承了欧洲传统保守主义的社会有机主义。一方面,社会必须让才能出众的人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乃至政治权力方面出人头地,从而保持社会的活力。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是个有机体,它的任何部分都不应该被忽视,所以尽管一些社会阶层贡献不大,处于不利的地位,社会还是要为他们提供适宜的住房、医疗保健等等。如贝尔所言:“这些事情事关安定和体面,是文明社会必须优先考虑的。”

第三,再造公民社会。

新保守主义为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提出的第三条建议是,复兴介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社团调节组织和制度。新保守主义者指出,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无论是谁,都免不了有必须求助于他人的时候。有些人认为政府可以帮助个人,而事实上,每个人的情况千奇百怪,要求的帮助也必然五花八门,政府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所以根本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帮助每一个人。因此,社会若要良性运转,就必须有中间性的社团组织,例如家庭、邻舍、教会、志愿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可以发挥五个重要功能。1. 它们可以通过培养人们对小团体的忠诚和信任,建立人们对整个社会的忠诚。社会看起来是个巨大组织,但对于个别的社会成员来说,社会二字的外延却可能是非常有限的。个人因家庭生活不幸而走向反社会,并不是罕见的事。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样的社会组织衰落了,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应有的关怀和同情,个人在国家面前感到软弱无助,国家也失去了个人的忠诚和信任。复兴社会中介组织将有助于重建人们对美国社会的信心。2. 这样的社会组织具有很大的弹性和

适应能力,不像政府的官僚机构那样呆板僵化,可以因时因地随机应变地解决社会问题。3. 这些组织存在于民众之中,容易赢得人们的信任。4. 人们都希望获得归属感,希望加入某种社会组织以超越个体的生活,这些中介性的社会组织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5. 这种社会组织可以使人们建立不同的价值观念,这正是一个真正的多元社会的基础。

三、对外事务中的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维护,不仅表现在对国内新左派的抨击上,而且表现在他们的对外政策观点上。他们认为,苏联已经对西方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到70年代,不少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苏联在军事力量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并因此忧心忡忡。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在苏联的鼓动和支持下,利用联大为讲坛宣泄他们的反美情绪,已经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使美国及其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原则在世界舆论舞台上被淹没的可能,二是让盟国和美国本国公民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丧失信心。长此以往,美国领导的西方民主阵营对苏冷战的道义合法性将会很成问题。因此,他们认为美国应对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进攻发起反击,把美国的价值观念纳入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利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宣传这些价值观念。他们认为,在国际场合对美国价值观之优越性的信心有助于巩固美国民众在价值观上的共识,有利于冷战反共大业。

新保守主义者对7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的看法和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批评、反对尼克松—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对苏缓和的政策;二是反击第三世界的反美反以言论;

三是宣扬美国应对苏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

对苏缓和的战略构想和政策始于尼克松。尼克松此举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深陷越战泥沼的美国在养精蓄锐后咄咄逼人的苏联面前,要想继续保持强硬的政策确有力不从心之感。60年代末,美苏两国战略力量已接近均衡。尼克松就任总统后虽提出要增强美国的军事力量,但越战的负担使得美国难以兼顾发展战略武器和加强常规力量。于是,试图用军控协议限制苏联扩充军备,力求同苏联保持大体的力量均衡,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同时用满足苏联某些要求的经济协议(比如给苏联贸易最惠国待遇和提供贷款),换取苏联克制扩张行动。在谈判的具体策略上,尼克松和基辛格采取所谓的“联系”(linkage)原则,即坚持达成全面谅解,做一揽子交易,不做零敲碎打的买卖;谈判必须有助于促使苏联在越南、中东和欧洲等问题上采取克制与合作态度,从而使美苏缓和在广泛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实际上是要把苏联其他方面的让步作为美国参加战略武器谈判的要价。^⑤

121

尼克松采取缓和政策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遏制”,他所进行的外交政策和全球战略的调整(包括缓和在内)只是使“遏制”更加灵活,采取了多样的形式。应该说,深受欧洲传统现实主义外交影响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实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中的“异数”。传统的美国外交理念往往带有极强的道德色彩,无论鸽派还是鹰派,或者说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在考虑美国国家利益的同时,总是赋予美国的外交政策以道德含义。这种道德色彩虽有程度之别,但其持久存在足以使我们毫不夸张地判定,大多数美国人看待美国与其余世界关系的基本视角是道德价值观。这种道德价值观往往促使美国在看待其余国家时,总是戴着摩尼教式的“黑白分明”眼镜:每个国家非友即敌,不合美国价值观

念的国家不仅是敌人，还是不可饶恕的、邪恶的敌人；美国与其——比如与共产党国家——的斗争是善与恶的较量，没有妥协的余地。而尼克松的外交却大异其趣，他和基辛格都“把世界视为充满混淆不明的挑战、许多国家各自因利益思考而非善意地互相对待，改变必须分段逐步而行，不是一劳永逸彻底变革——换言之，这个世界可以驾驭（be managed），却不能去支配（be dominated）或排斥。在此一世界中，不会有截然清楚的分界点，某个问题的解决很可能又会衍生出下一个新问题。”尼克松和基辛格也非否定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他们只是认为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固然重要，但不能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现实之举应当以国家利益、地缘政治考虑和维持均势为重。美国在基本的意识形态上当然是与共产主义相敌对，美国也必须阻止共产主义破坏全球均势；但另一方面，在控制意识形态冲突，不让核战争爆发问题上，美国和苏联又必须相互合作。一句话，在尼克松和基辛格那里，把苏联作为地缘政治对手的考虑居于把苏联看作意识形态敌人的看法之上。但这种看法，既为自由派所不齿，亦为保守派所反对。自由派不齿，是因为认为强调国家利益不道德；保守派反对，是因为他们重视与莫斯科的意识形态竞争，不能认同因地缘政治需要而要苏联修好。就包括新保守主义者在内的保守派而言，尼克松把苏联视为地缘政治上的对手之策略，实在太陌生，又不太适合。他们绝大多数人认为与共产主义的冲突，几乎绝对是意识形态上的势不两立。作为道德绝对论者，他们不信任与苏联的任何谈判，把妥协视为可耻的退却，与苏联谈判是对美国道德原则的背弃，是从道德上自我解除武装。因此，他们坚决反对与苏联缓和。^④

在最初反对缓和的斗争中，新保守主义者主要为杰克逊参议员的活动呐喊助威。当时，杰克逊在其主要助手帕尔和阿布

拉姆斯的帮助下,利用苏联的犹太移民问题来破坏缓和。犹太人移民迁出苏联问题,是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才首度被作为一个外交问题,1969年之前,历任两党政府都把它当作苏联内政问题。美苏关系改善之际,尼克松通过秘密渠道暗示苏联高层应当放宽对犹太人移民迁出苏联的限制。苏联为缓和考虑,在这一问题上对尼克松作出了让步。犹太人移民迁出苏联的步伐大大加快了,从1968年的400人稳步增加到1973年的3.5万人。1972年夏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苏联突然决定对移民出境者征收“出境税”(出境者必须退回国家为教育他们而花费的费用)。犹太人团体担心移民潮可能因此中止,就向尼克松政府以及长期支持他们的杰克逊求援。尼克松本来想继续以前的做法,通过秘密外交解决这个问题。但杰克逊突然发难,公开向苏联施压。1973年4月,杰克逊提出一项修正案,不准给予任何限制其公民移民出境的国家最惠国待遇。杰克逊此举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希望藉此终止美苏的缓和,使美国外交政策回到全面与苏对抗的老路上,像基辛格后来所说的:“就杰克逊及其支持者而言,犹太人移民问题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峙的幌子而已。”二是得到犹太选民广泛支持并打算在1976年大选中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杰克逊认为,利用犹太移民问题阻挠美苏贸易,尽可能用一种对抗的方式反对缓和政策可以获得政治上的好处。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继任的福特在会见杰克逊时,答应将同苏联谈判解决犹太人移民问题。当年夏秋之交,美苏政府和杰克逊开始幕后的三角谈判。但杰克逊参与谈判的主要目的是国内政治考虑,在移民数额上一再提高要价(连犹太人院外集团都认为杰克逊太过分),最终谈判事实上破裂。12月13日,参议院通过了杰克逊的修正案,苏联很快表示,1975年被批准离开苏联的犹太人移民将减少。^②

在利用苏联犹太移民问题破坏缓和的同时,杰克逊及其追随者也从整体上批判缓和政策。1974年6月,杰克逊向他所属的参议院武器管制小组委员会分发了一份批评缓和政策的文件。文件说,以苏联的术语来说,“缓和”或“和平共处”乃是公然与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对敌的一种策略性替代方案罢了。它并不意味苏联及其盟国会放弃与西方自由国家冲突。正面冲突换成了间接的作战方式,利用非军事或意识形态手段打击美国和西方。劳联-产联主席也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说,苏联是这样看待缓和的:缓和是因为美国虚弱,缓和代表着加强意识形态作战,缓和就是削弱北约,缓和乃是苏联终于在军力上凌驾于西方之上,缓和也使西方承认苏联控制东欧;缓和更代表着美军撤出欧洲。^⑧在反对缓和、主张对苏强硬这一点上,杰克逊派和共和党内以里根为首的保守派观点一致。他们都认为,苏联和华约集团在常规部队和战略核力量方面,既拥有数量优势,而且正在危及美国的质量优势;更为根本的是,他们认为缓和和外交在心理上麻痹了西方。事实表明,他们的判断大致正确。美苏缓和并没使苏联放慢发展军事力量的速度,在核武器方面,苏联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而且在质量上也逐渐赶上或接近美国的水平;在常规军力方面,苏联则更具优势。1973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却暂时极大地加强了苏联的经济实力(一方面,油价疯长使苏联借石油出口大发横财;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从油价上涨中获得的巨额财富流到国际金融市场上,使得国际借贷十分优惠,苏联和东欧都大举举债),美苏力量对比不断朝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而尼克松、福特和基辛格都没注意到这种变化。如果说尼克松时期的缓和政策还能把苏联拴住,苏联也的确想缓和的话,那么,福特上台后,苏联已在借缓和之名行扩张之实,

加紧在世界各地扩张,向美国步步进逼,最明显的就是1975—1976年苏联利用古巴军队在非洲插手安哥拉的内战。总之,70年代中期的事态已经表明,苏联在进逼,美国在后退。1975年底,刚任美国国防部长不久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也由原先的缓和立场转向对苏强硬政策。他说:“在进入国防部以后这个短短的时间里,……我已坚信美国落在苏联后面,我毫不怀疑,我们必须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以保持有效的防务体系。”^②

70年代中期的这种事态让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所面临的外部危机在加剧,他们一反之前只是为杰克逊敲敲边鼓的做法,开始大力批判缓和外交,鼓吹对苏强硬政策。他们认为,美国正在全面退却,已经丧失了捍卫它最基本利益的意志。1975年7月,迪克特在《评论》上发文,既批判美国向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讹诈”投降,又指责华盛顿的缓和政策。她悲叹:“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行为已经不像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次年2月,《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基辛格的对苏缓和就是“绥靖”,而对苏绥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绥靖不可能满足无法得到满足者”(appeasement cannot appease the unappeasable)。此时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与40年代时一样,正像格莱泽在1976年7月归纳的那样,“对民主制度和各国独立的最主要威胁就来自……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党中国以及他们争夺领导权的那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人不会满足于现状,因为共产主义尽管不是冒险主义的,“却是扩张主义的”。而此时的共产主义扩张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已经成为可怕的现实。安哥拉事件让他们相信,苏联的军事力量正稳步增强,莫斯科必定会利用这种力量在全球削弱美国的力量、影响,最终是美国的孤立。在这种情势下,缓和显然是带来贻害无穷的“一厢

情愿的想法”。在批判共和党政府缓和政策的同时，新保守主义者也抨击了自由派的外交政策观念。按照波霍雷茨的说法，自由派已经被越南战争“重创”，以致他们不再愿意保卫美国，反对苏联。他在1976年4月指出，在自由派中，新孤立主义情绪最为明显。不仅如此，自由派国际政治理论家的“世界秩序论”——两个超级大国施加其意志于其他国家的能力在下降等等论调——只是导致了“将美国虚弱合理化”。更可恨的是，自由派正从消极走向公开的背叛。社会学家伯格认为，一个新的“知识—工业综合体”（intellectual-industrial complex）正在形成：对苏联和美国都失望的知识分子正把古巴、朝鲜这些第三世界的专制国家看作人类的新希望，而企业家们则认为缓和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商机。^⑨

新保守主义者还认为，苏联的和平宣传攻势、美国当政者一厢情愿的缓和做法和西方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糊涂认识很可能导致这样的可怕后果：美国的盟友和支持者被亲苏力量中立化甚至被控制，美国作为惟一的民主国家将不可能生存。“一旦灯光在其余世界熄灭，自由和传统的美国价值观能够幸免于难吗？”波霍雷茨回答，不能，因为这样一个世界将为野蛮所掌握，将充满不幸；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美国不可能生存。格莱泽更为直截了当地说：“对我们来说，还存在其他民主社会的世界是更安全和惬意之地；没有其他民主社会的世界将更危险、令人沮丧。”因此，美国必须去“支持世界上正在缩小的民主之岛”。莫伊尼汉指出，美国必须继承威尔逊主义的原则，接受在世界上捍卫——若可能就促进——民主原则的责任，不仅因为“一国的民主是不够的”，一国的民主不会持久，美国本身的自由与其他国家的自由密切相关；还因为随着移民使得美国的族裔构成越来越像整个世界，“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争取个人自由（或国

家独立、或国家生存)的斗争……不影响到美国的政治。”^⑧

对于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来说,70年代中期的世界局势让他们想起了一战后的情况。对他们中的犹太人来说,30年代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犹太人被驱逐和毁灭的记忆是始终挥之不去的噩梦;他们害怕70年代西方的虚弱会让悲剧重演:以色列被毁灭和大屠杀。60年代的国内动荡曾让他们感受到这种威胁,70年代第三世界日益高涨且在联大讲坛上得到充分表达的反美反以情绪更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担心。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他们沉于内心的犹太人身份重新浮现的话,那么,以色列在1967年“六天战争”中的胜利则使他们认识到,“从今往后,以色列就是他们的核心事业(central cause)。”他们一方面相信,只有军事上强大的和永远采取干预主义政策的美国才能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另一方面,则不停地宣扬这样的观点:强大的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战略资产(strategic assets),可以帮助华盛顿遏制苏联在中东的扩张。他们的教条是对以色列好的就是对美国好的,反之亦然。^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亚非拉的不发达国家成为世界政治中一大自觉的、较长时间内有相当凝聚力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第三世界”的兴起。尽管第三世界只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但遭受殖民或半殖民统治共同的屈辱经历、独立后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大致相同的地位以及面临的共同任务——发展——使他们形成了一种颇为模糊的共同意识和态度:包括将本国的贫困和落后归咎于西方殖民者掠夺的倾向,归咎于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依附论”、不结盟运动等都是这种“第三世界意识”的反映和体现。60年代,随着新独立国家的迅速增多,联合国内形成了显著的第三世界多数。在安理会因美苏对立而往往不起作用的情

况下，联大一国一票的规则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联大以外的任何地方均无法比拟的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这必然导致联大的主要议题成为禁止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而西方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则被广泛抨击为这些邪恶的实行者、庇护者或纵容者。阿拉伯国家则因为与以色列时不时的冲突和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更以联大作为宣泄的途径。到70年代时，美国不仅已无法像50年代那样控制联大的辩论，在联合国的辩论中，美国和西方的声音显得越来越孤单、缄默并处于守势，这让他们十分沮丧；在美国看来，更糟糕的是，联大的许多决议已伤害到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的朋友。70年代初期，阿拉伯和非洲的一些代表团在苏联的鼓动下将以色列、南非和反殖民主义等问题归并在一起，比如，1973年12月4日联大通过了3151G号决议，谴责了“葡萄牙殖民主义、南非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帝国主义之间的罪恶的联盟”。³³

1971年，在联合国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莫伊尼汉即注意到这种状况。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随后石油输出国组织急剧提高原油价格（先是阿拉伯产油国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从而导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能源危机”。这两件事让时任驻印度大使的莫伊尼汉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精英都是反美的，他们正利用联大这个讲坛对美国、西方和以色列以及他们代表的民主进行疯狂的意识形态攻击；而美国的外交官们只是听之任之。（实际情况是，美国高层和外交界对第三世界把联大当作对现有世界秩序发表不满意的讲坛并不太在意，因为联大的决议是没有约束力的。）莫伊尼汉和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一样，十分重视意识形态斗争，他认为，决策者无视第三世界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攻击是错误的做法，是美国外交的重大失败。1974年12月，他

将若干想法写下来交给他的密友波霍雷茨。波霍雷茨将莫伊尼汉的想法以《处于反对派地位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in Opposition)为题,刊登在1975年3月号的《评论》上。在这篇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中,莫伊尼汉将联合国中的第三世界多数斥为“新的多数派暴政”,并剖析了第三世界反美意识形态的根源。他指出,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胜利不仅是因为他们相对一致的立场,也因为“美国外交的失败”。他说,美国决策者应该立即承认,“世界社会及世界组织已经演变到了一些明显的利益是由国际论坛来安排的前所未有的地步。”尽管共产党国家和第三世界集团已使得美国及其民主的盟友在联合国中成为少数派,但美国仍然必须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的事务,像国内某些极端派所建议的那样抽身而去只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考虑到其中牵涉到的巨大的利害关系,美国惟一的选择就是有意地“成为反对派”,竭力维护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观,反击第三世界和共产党国家反资本主义、反民主的意识形态攻击。^⑧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其他的新保守主义者非常赞赏莫伊尼汉的观点,波霍雷茨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门为这篇文章的面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1975年3月26日,国务卿基辛格邀请莫伊尼汉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欣然从命的莫伊尼汉为自己所定的目标就是在联合国打一场观念战争,重新恢复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者的信心。

1975年下半年联大内发生的两件事让犹太人既愤怒,又害怕。10月初,乌干达独裁者阿明在联大发表讲话时,猛烈抨击美国,并呼吁“消灭作为一个国家的以色列”。几周后,莫伊尼汉进行了反击,他说阿明是一个“种族主义谋杀者”,并将攻击的矛头含蓄地指向非洲统一组织。11月10日,联大在通过的3379号决议中宣称,“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此举令美国舆论一片哗然,美国参众两院于次日以

全票通过决议谴责联大的决议；联大的决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更是遭到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的反对，毕竟，犹太人移民是纽约最大的外来移民。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降至空前绝后的最低点，除了少数温和派之外，大多数国会议员的反应十分激烈，国会领导人甚至提出了更根本的问题：“美国是否认为联合国，或者至少是它的大会，是一个它想与之结交的机构。”莫伊尼汉在经过艰苦努力仍未能阻止该决议通过的情况下，对该决议进行了猛烈的驳斥。他说，这是个谎言，“对排犹太主义的憎恶，似乎是得到了国际上的支持”，美国“不承认、不遵守、永远不会默认这个声名狼藉的决议”。^⑥莫伊尼汉在驻联合国大使任内的表现既赢得了主流媒体的一致赞许，也为他在普通美国人心目中赢得了巨大声望。这令其他的新保守主义者十分高兴，因为看起来莫伊尼汉完全可以继汉弗莱、杰克逊之后成为坚持民主党老传统的另一位政治干将。因此，在1976年2月莫伊尼汉因与基辛格的分歧辞去大使之职后，波霍雷茨夫妇极力劝说他参加当年纽约参议员的竞选。莫伊尼汉最初虽不太情愿，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老朋友的劝告，于当年6月宣布参加竞选。

1976年的选举让新保守主义者喜忧参半，莫伊尼汉成功当选参议员固然可喜，但他们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杰克逊在初选中即被南方来的一个“圈外人”卡特击败。他们认为，这是“新政治”给民主党带来的变化的又一次证明。但事实并不全然如此，卡特击败杰克逊及当选总统主要是“水门事件”给美国两党政治带来的变化所致。尽管在参加总统竞选之前，除了他担任州长的佐治亚州之外，几乎没人知道卡特是何许人也，但这样一种劣势在“水门事件”之后，却成了优势。因为美国公众对当局信任下降，卡特这位局外人便给他们带来朦胧的希望。虽然卡

特在竞选中一再强调对罗斯福和其新政的钦佩,以致许多观察家和记者把他当成第二个罗斯福,但他事实上,“用以吸引美国选民大众的,并不是新政以来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改革纲领,而是他与华盛顿官场似乎素昧平生的平民主义‘新面孔’。”而且,他根本就不想仿效罗斯福,他与企业界关系的紧密是民主党总统中少有的,甚至超过他的共和党前任;不仅如此,后来的事实表明,卡特在他整个任期之内,对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福利国家、大劳工和国家管制、调节进行了限制,在国内政策上表现出战后历届民主党总统从未有过的保守性,迹近共和党人。无怪乎有人曾如此评价卡特:“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理查德·尼克松”。更有人说他是“违背新政精神和实质的第一个民主党总统”。^⑤

始终坚持新政精神的新保守主义者除了指责卡特对能源危机反应不力,继续批判肯定性行动以外,对卡特限制赤字财政、福利国家、大劳工和国家管制的国内政策并未过多批评。这至少说明了两件事。其一,对伟大社会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评事实上已经使得他们逐渐改变了在社会问题上的新政自由主义立场,他们的社会观念从表面上看越发倾向于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当然,这种倾向只是部分的,他们依然坚持国家要为其公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要为老年人提供福利。只不过他们认为,当时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福利不足或没有福利,而是福利过多。其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衰颓之势让他们更为关心卡特的外交政策。当时美国国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源问题 and 经济滞胀,但新保守主义者中没有经济学家,他们虽然关心,却不可能对政府此方面的政策提出有价值的意见,更不用说有什么好招了。另一方面,整个卡特时期,苏联更加明显的扩张势头让新保守主义者感到,如果不回到对苏强硬的遏制政策立场

上来,美国所受外部威胁之大使其及盟国的处境已十分危险。

然而,卡特的外交举措让他们十分失望。首先,他们不满卡特外交班子的任命。卡特没有任命一位新保守主义者或争取民主党多数联盟的成员担任重要的外交职务,有一项任命是委派争取民主党多数联盟的一位成员担任密克罗尼西亚——太平洋的一个小岛——独立谈判的美方谈判代表,这让争取民主党多数联盟的成员哭笑不得。这当然还是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卡特外交决策班子的组成。在卡特的外交顾问中,除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主张对苏强硬外,其他如国务卿赛勒斯·万斯、万斯的顾问马歇尔·舒尔曼、负责战略武器谈判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保罗·沃恩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得鲁·扬都程度不等地怀疑冷战假设。万斯是温和派,他和沃恩克一样都认为与苏联的战略武器谈判是对外政策重点,而沃恩克则是不折不扣的冷战修正派,反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给美国带来威胁这样的观念。舒尔曼是世界秩序论的支持者,他认为共产主义扩张和第三世界革命不再是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扬是所有人中最左的,虽然他对政府的决策影响有限,但他公开表达的立场在美国人看来却极具刺激性。他同情第三世界的革命政权,1977年在谈及安哥拉时,他甚至宣称,古巴的干预是有益的,因为古巴人维持了秩序。在新保守主义者眼中,扬和沃恩克这样的人在卡特政府中的存在进一步说明,左派已经控制了政府和民主党。和1972年他们认为左派导致民主党的失败不同,他们现在相信左派正将整个国家带入灾难之中。

其次,卡特政府具体的外交政策更让他们不满。1977年初卡特当政伊始,便宣布以“新的世界秩序”外交战略取代尼克松—基辛格的“大国均势”外交战略。卡特的新战略大大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次序,其核心是美日欧的三边联合,

其次是强调与第三世界的“南北关系”，再次才是与苏联的“东西方关系”。它认为只要能同西欧、日本及第三世界搞好关系，就比较容易解决苏联问题。1977年5月22日，卡特在圣母玛利亚大学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他的对外政策观念。他说，“同苏联发生冲突的威胁已不那么尖锐”，对苏问题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已“不再是中心问题了”；他同时要求美国人要摒除“对共产主义的过度恐惧”，认为“对待东西方关系的态度必须以人道观点和历史感为指导。我们的人道观点使我们谋求同共产党国家进行广泛的合作以造福于人类”。^⑤就其对苏政策的实质而言，卡特政府推行的仍然是有限的缓和政策。主要受万斯和沃恩克的影响，卡特认为，美苏关系中最危险的莫过于核军备竞赛，因此，他把同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视为美国对苏关系中压倒一切的任务。在他任内，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有了较大进展，并最终在1979年达成协议。

但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卡特对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没有正确理解苏联的本性和意图，因此，没有给予美苏关系的对抗性质以足够重视。罗伯特·塔克1977年早期在《评论》上发表题为“超越缓和”的文章，他在文中强调，苏联共产党政权的本性是扩张主义的，是对美国安全和整个世界的最大威胁，因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今天同苏联的关系构成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不仅如此，苏联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苏联介入安哥拉已经说明，扩张不仅是苏联共产主义的本性，也已经成为现实：苏联将会毫不犹豫地运用其大大增强了的力量进行扩张。1976年中情局的《B小组研究报告》（Team B Report）让新保守主义者进一步肯定了他们对苏联力量和意图的基本判断。1976年，福特总统授意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组织一个由民间人士组成的工作小组，评估苏联的

战略核能力和意图。该小组被称为“B小组”，以与中情局本身的工作小组——“A小组”——区别，成员包括保罗·尼采和哈佛大学教授、争取民主党多数联盟成员理查德·帕普斯。福特的本意是希望评估结果能为继续执行缓和政策辩护，但《B小组研究报告》却得出了与缓和政策针锋相对的结论，认为苏联始终在谋求对美的军事优势，并利用其现有军事实力谋取各种政治上的好处，还一直在为一旦与美国发生包括核战争在内的战争积极进行准备。同年12月，《纽约时报》披露了该报告的基本内容，在美国引起了极大震动，加剧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辩论。新保守主义者在《评论》、《公共利益》和《华尔街》上纷纷撰文，攻击执行缓和政策是“自我芬兰化”；主张对苏联谋求军事优势，重新实行遏制政策，以确保美国不再受人摆布。同年，尼采组建“当前危险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如波霍雷茨夫妇、科琶翠克和李普塞特等人均加入其中。^⑧此后苏联的扩张行动表明，新保守主义者的反对并非全无道理。正是在卡特时期，苏联的全球扩张达到高潮：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的影响不断扩大，企图扼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地带，使美国、日本和西欧的海上通道特别是石油运输线受其制约；在美国退出越南后，苏联把军事人员派到了越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拼凑“印度支那联邦”，进窥东南亚国家联盟，威胁马六甲海峡；以西欧为目标的SS-20新式导弹系统也在发展之中；1979年底，更是公然举兵突然大规模入侵阿富汗，从北面楔入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客观上有形成两面包围波斯湾地区的可能。难怪连力主缓和政策的国务卿万斯后来也承认，美国政府“对缓和所抱的期望膨胀到了不现实的程度，而对美苏关系中的竞争性质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⑨

在攻击卡特对苏缓和政策的同时，新保守主义者鼓吹美国

应采取更为严厉的对苏遏制政策。从他们在40年代后期接受冷战自由主义时起,他们一直认为苏联的最终目标就是消灭美国的力量。瓦滕堡将他们的这种观念称为“新时期的老观念”,并宣称,“共产党人还在那儿,他们的足迹仍是具有威胁性的。”帕普斯以与凯南当年相似的语言,提出了美国的反治措施:“西方反治战略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迫使苏联(将注意力)转向内部——从征服到改革。”帕普斯认为,当苏联的扩张冲动在西方的压力面前碰壁时,它就只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需要面对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其他方面的要求;此种情况下,共产党政权有两种选择,一是改革,二是拒不满足人民的要求从而导致国内的动荡甚至崩溃。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最终结果显然有利于西方民主阵营。⁴⁰

卡特的人权外交同样遭到了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他的宗教信仰,卡特可以说是自威尔逊以来在外交上理想主义色彩较浓的总统。他在竞选总统过程中就曾提出,美国应成为维护国际人权的“灯塔”。就职以后,为了一洗美国自越战以来在国际上的颓丧之气,改善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卡特提出了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权外交”。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由于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永远不能对其他地方自由的命运漠然处之。我们的道义感决定了我们明白无误地偏向于那些和我们一样坚持尊重个人人权的国家。”这种人权外交思想,应当是美国人比较喜欢的,新保守主义者也不例外。但是新保守主义者却不合常理地对卡特的人权外交发动了猛烈抨击,他们批评人权外交的实际执行不仅没有多大作用,反而贻害无穷。说它没多大作用,是基于卡特对苏联的人权攻势。他们和其他对苏强硬派一样,都认为对苏人权外交并不能阻止苏联的扩张势头,虚多实少。这种批评虽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多多少少带有点派别之见

的成分。新保守主义者说人权外交贻害无穷，主要是针对它在第三世界实施的结果所言。卡特的人权外交虽也有些华而不实之处，但其在第三世界贯彻人权外交理想的实际力度还是相当大的。卡特认识到，在第三世界竭力维持现状，特别是以抵抗共产主义、捍卫自由民主为名行支持亲美独裁政权之实，是美国在第三世界不得人心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越南战争的教训之一是，美国不应在反共名义下一味支持在国内极不得人心的反动政权。所以，卡特政府切实采取了一些有别于支持亲美独裁政权的传统政策的做法，包括削减对独裁政权的援助，要求他们进行民主改革等，试图改善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形象，增强其抗衡苏联的政治和道义力量。同时，以人权外交争取第三世界独裁国家内部的民心，促其政府进行民主改革，也会减少苏联插手第三世界国家的机会和可能性。卡特的人权外交在拉美表现得最为突出，卡特政府以“粗暴侵犯人权”为由，取消或削减了对拉美一些亲美军人政府的军事援助。卡特此举自然令受影响的政府不快，它们纷纷指责美国干涉其内政、侵犯主权，损害民族尊严。其实，卡特人权外交的实施仍是有双重标准的。这种双重标准体现为：对弱小的与美国无战略关系的国家，采取人权与经济援助相联系的原则，而对与美国有战略关系的国家，即使人权成绩欠佳，也不削弱经援。在拉美切实实行人权外交的同时，卡特在东亚则继续与独裁政权如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等保持同盟关系。^④

即便是卡特这种仍然名不完全符实的人权外交仍然遭到了包括新保守主义者在内的强硬派的反对。保守派思想库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迈克尔·克莱丁在1978年评论说：“实行人权政策的结果，同原来的意图完全相反：我们的敌人安然无恙，而我们的一些盟国却受到了惩罚。”^⑤就实际来看，这种批评

是有根据的,像拉美军人政府因人权外交而对美国不满,埃塞俄比亚则在人权外交影响下进一步倒向苏联,伊朗巴列维政权和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则因没得到美国的积极援助而倒台。但在他们自身宣扬的遏制苏联的道义上,是说过去的。不过,新保守主义者们利用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理论提出了一整套主张,来证明与第三世界独裁政权结盟的道义基础,证明与第三世界独裁政权结盟的做法从道义上并无悖于美国的价值观念。

阿伦特在考察极权主义起源时,曾极富见地也极为深刻地指出极权主义与其他专制、独裁的政权形式的根本区别。她写道:“极权主义根本上不同于我们已知的其他政治压迫形式,如专制(despotism)、暴政(tyranny)和独裁(dictatorship)。无论极权主义在哪里获得权力,它就会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机构,摧毁该国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新保守主义者正是以此为基础,早在卡特上台之前,即开始讨论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之间的实际差异。1976年7月,格莱泽宣称:“共产党政府的确具有一些独特之处,使他们与普通的威权主义和军事独裁政权不同。”他认为,共产主义的独一无二之处就在于共产党对社会控制的彻底和无孔不入。新保守主义者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看法既与威尔逊时期美国主流社会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十分相似(像威尔逊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就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人类头脑中从未有过的最骇人听闻的、最可怕的东西”),更几近是1946年凯南长电报中表达出来的认识的翻版:苏联领导人是冷酷无情的,是不道德的、邪恶的;他们的革命意识形态、斯拉夫人所具有的“东方人不坦率、搞阴谋”的传统使得他们不仅狂热,而且阴险狡诈;他们和历代沙皇一样,在国家关系中只懂得“武力的逻辑”。总之,在新保守主义者眼中,

苏联不是一个可用寻常手段与之打交道的正常国家；任何以将之作为寻常国家对待为基础的政策必将祸害无穷。这样一个社会没有一点自由可言，而威权主义政权尽管有压迫和侵害人权之举，但它还为自由留下了空间。而且，威权主义政权经由慢慢演进，可以实现民主化；而极权主义政权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社会学家伯格在批评卡特的人权外交时，就指出卡特的标准过于机械，没能看到威权主义政权和极权主义政权在违反人权方面的重大差异：威权主义政权侵犯人权是偶尔的，而极权主义政权则是“系统地攻击”人权；这就是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道义上的差别。^③

最系统地对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问题加以理论阐明的是政治学家科瑟翠克。1979年，她在11月号的《评论》上发表“独裁和双重标准”（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一文，猛烈抨击了卡特的外交政策并为美国支持面临内部革命威胁的威权主义政权进行了辩护。在这篇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中，科瑟翠克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其一，民主是政治演进过程的结果。她写道：“在以较为有限的参与形式扩展先前的实践之后，民主政府才会缓慢地出现。”试图在一夜之间建立民主的做法像其他的许多改革一样，只会产生相反效果：“匆忙地将复杂和陌生的政治实践力加于缺乏（该政治实践所）必要的政治文化的社会……不仅不会产生想要的结果；如果是在传统政权受到攻击时进行此种努力，事实上还将有利于造反者的事业。”科瑟翠克之所以强调民主实践的建立不可操之过急，正是针对卡特政府人权外交力压其独裁盟友进行民主改革的实际做法。其二，科瑟翠克进一步分析了卡特此种做法的思想和实践渊源。她认为，卡特政府人权外交背后的基本信念是想当然地以为，消灭威权主义政权是可取的，以民主政府取代它们是易行的。但这种

信念显然是错误的,而且犯的是与国内的政党改革者同样的错误。正是这种信念促使新政治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去积极扩大党内民主,同样的信念亦使卡特政府积极地推翻非共产党的专制政权,而在共产主义的扩张面前无所作为。这样,科瑟翠克就把她此前一些年中对美国国内政治的思考——特别是对新阶级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改革热情的批判——和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即区分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科瑟翠克毫不客气地称,卡特本人正是那种“将革命和理想主义、变化和进步、乐观主义和美德混为一谈的自由主义者”。因此,在伊朗巴列维政权和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面临国内的革命攻击时,卡特似乎忘掉了发动革命的左派正试图建立极权主义暴政,只是向受到攻击的独裁政权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进行民主改革,而非提供积极的援助,致使他们最终倒台。有鉴于此,科瑟翠克认为要想在面临武装挑战的威权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变革,美国的最佳选择就是支持他们的政府;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的和平时期,美国应鼓励这些国家实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的目标应当是逐渐的变革,而非在一夜之间建立起完美的民主。⁴⁸

除了反苏之外,新保守主义者最关心的就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在这方面,卡特的表现同样让他们很不满意。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在战争中遭到空前严重失败的阿拉伯国家在战后迅即与苏联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苏联成了埃及和叙利亚重建军队的靠山,苏联派出大批军事顾问驻在两国并同他们签定了带有军事同盟色彩的友好合作条约。中东形势的重大变化促使美国与以色列建立起真正的“特殊关系”:此前,获得犹太裔美国人选票这一国内政治需要和美以价值观的亲近,一般来说常与拉拢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和经济需要相抵触;但从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开始,主要由苏联在中东势力的巨大增长,美国的战

略向大力援助并保护以色列一边大大倾斜,或者说以色列成为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一大“战略资产”。^⑤虽然视以色列为美国在中东战略资产的观念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指导原则(直到冷战结束后才有过短暂的变化),但美国的具体政策也经常随情势的变化有所调整。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及由其引发的石油危机之后,美国为它极度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付出了很大代价。国内能源危机的发展使美国政府对影响这一地区的阿以冲突格外关注;美国也担心阿以敌对的加深会导致苏联的进一步卷入。卡特上台后,非常希望能以中间人的身份分阶段解决中东问题,但当时的中东形势很不利于卡特设想的实现,主要是因为1977年5月以色列新上台的总理贝京采取了比其前任更顽固的反阿拉伯立场。

1977年3月,卡特在马萨诸塞州发表演说,宣称解决中东问题的最终要求是巴勒斯坦难民必须有自己的家园。同年秋,美国邀请苏联加入将于当年12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中东和平会谈,苏美还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这激起了美国犹太人团体的强烈反响,美国犹太组织联合会(the Conference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主席公开宣称,这个联合声明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它对以色列安全和生存的传统义务。新保守主义者们也开始大力宣扬“战略资产论”,1977年4月,当代危险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尤金·罗斯托称,以色列是美国不可缺少的联盟,以色列的存在和强大能遏阻埃及、叙利亚或伊拉克的帝国冲动。此外,阿拉伯国家若成功侵犯以色列只会让莫斯科受益,因为阿拉伯人完全听命于苏联,是苏联的附庸。^⑥1978年秋天,由于贝京一直坚持其顽固立场,迫使卡特不得不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国会通过了向埃及、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供应军用飞机的一揽

子方案。此举打破了美国对埃及历时 30 年的武器禁运,不仅使贝京政府大感震惊,更让美国犹太人团体和新保守主义者愤怒到极点。

1979 年的扬辞职事件不仅引发了美国国内黑人和犹太人关系的再度紧张,也使犹太人对卡特更为失望。作为一位黑人,担任驻联合国大使一职的扬在美国黑人心目中是黑人在政治舞台上的象征。1979 年 7 月,他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面。但他并未告诉国务院会面的详细情况,盛怒之下的万斯要求他辞职。扬辞职后,许多黑人指责扬是因为犹太人的压力而被迫辞职的。全美大多数主要黑人团体的领导人发表了一份名为“黑人-犹太人关系”的声明,并称声明是“我们在中东问题上的独立宣言”。声明谴责以色列支持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的非法、压迫性种族主义政权,并宣称,许多美国犹太人已经变成了“种族主义现状的卫道士”。黑人领袖的指责固然让犹太人愤怒,卡特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沉默——在长达 6 周的时间内,卡特没有站出来说明,犹太人对扬的辞职没有责任——更让他们不安。犹太人认为毕竟是由于自己在 3 年前的大力支持,卡特才得以问鼎总统宝座的;现在在自己被他人攻击时,卡特竟然不闻不问,心中难免会有被背叛的感觉。犹太人对卡特的失望、愤怒在 1980 年达到顶点,当年 3 月 1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阿拉伯被占领土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做法。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反对以色列定居点问题上投了赞成票。在 3 周后纽约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初选中,犹太人把他们对卡特的愤怒转变为对卡特的竞争者的支持:80% 的犹太人选票投给了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④

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到 1979 年和 1980 年时,事情已经很明显:卡特在外交上的所有举措都给美国和反共反苏大业带来

了灾难，而卡特在中东问题上对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的“背叛”则进一步表明，民主党再非美国犹太人自然而然的政治家园。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是继续留在民主党内充当不被重视、时时与党的领袖和本党的总统唱反调的少数派，还是接过共和党不断抛出的“绣球”，站到与奉行反共亲以政策、其时已在共和党控制大局的里根阵营。

四、走向共和党和保守主义阵营的开始

在整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对于绝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即便他们对民主党再不满意，他们也不愿意像克里斯托父子那样转投共和党*。因此，他们一直不肯在政治活动上与共和党搅在一起，在思想上则刻意与战后新兴起的保守主义保持距离。不过，共和党的政治领袖们为争取他们却下了不少工夫。1972年的总统选举期间，共和党领导人一度希望借他们对民主党候选人麦戈文的不满吁请他们公开支持尼克松。但是，除了克里斯托以外，应者寥寥。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宁愿置身事外，贝尔和格莱泽则站出来支持麦戈文。1976年的总统选举中，新保守主义者支持的杰克逊在与卡特争取党内提名的竞争中早早失败，又让共和党领导人看到了希望。当时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比尔·布拉克认为可以趁机拉拢新保守主义者加入共和党，为此他单独邀请了不少著名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

* 克里斯托在1972年即加入了共和党，其子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早年为民主党工作，包括担任参议员汉弗莱和杰克逊的助手，但亦于1976年转投共和党。

与他共进午餐,进行游说,但收效甚微。布拉克还邀请科琶翠克在共和党杂志《常识》上撰文以明心志,科琶翠克则写了《为什么我们不是共和党人》一文。她在文章中说,新保守主义者不肯加入共和党,是因为共和党是代表美国上层白人利益的政党,共和党的领袖只关心富商巨贾、工业巨头,不同情穷人和黑人,反对社会福利政策。^⑧

以我们这些旁观者的事后眼光来看,新保守主义者之所以不愿与共和党和战后新的保守主义搀和在一起,主要出于思想和政治习惯,而他们的思想和政治习惯又与他们的犹太和(或)知识分子身份有关。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直到70年代,美国的东欧犹太人后裔和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一直都是自由主义的甚至是左翼激进的(在20世纪美国的左翼激进者中,犹太人的比例极大;无论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还是后来的新左派,其领导人大多是犹太人),在政治上则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就犹太人来说,他们一直极力支持自由主义政治,一方面投票赞成民主党的新政派,另一方面支持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强烈维护国内自由。即便美国犹太人在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后,他们仍不改变其政治和思想忠诚,这也是美国少数族裔中少见的现象。欧文·豪认为,美国犹太人支持自由主义至少基于两个因素:一度强有力的犹太世俗社会主义传统的残余影响;西方犹太人的这样一种信念,即一个提倡自由价值并容忍不同宗教组织的开放的世俗社会最有利于犹太人的利益甚至生存。^⑨对于犹太人来说,除了思想上对自由主义的忠诚使他们支持民主党以外,共和党在他们心目中的传统形象极差:共和党不仅不支持照顾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政策,还总是与老派的保守势力——如反犹主义者、反对外来移民的人——搅和在一起。总之,在美国,几乎没有犹太人认为自己是

保守主义者,更不用说是共和党人了。所以,在1970年底保守的《华尔街日报》因为波霍雷茨向新左派开战而称其为“不可能的保守主义者”时,波霍雷茨对这个称号十分烦恼。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知识分子的一般思想和政治倾向,李普塞特在1960年对美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作实证考察时,指出:“受教育越好的人,越可能支持各种形式的‘非经济自由主义’,包括给不受欢迎的政治少数派以公民权。”“反知识思潮之所以是保守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共和党——的有用的、甚至是当然的武器,原因很简单:在20世纪,直至最近,重要的知识分子极少是保守的。”^⑤

除了犹太和(或)知识分子身份让新保守主义者不愿加入共和党保守派阵营之外,新保守主义者在思想上无法认同或至少是无法完全认同于战后新的保守主义和共和党。

战后新的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观念和见解上无疑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其共同点是对新左派、对“官方”自由主义即麦戈文之流的自由主义的深恶痛绝;新的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从一开始都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和意图有着充分的认识(尽管有时未免言过其实),都强调要坚决反击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两者程度不等地反对伟大社会项目及其后新社会项目的发展和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由伟大社会自由主义精神所支配),注重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间机构,都坚持作为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特别是自由市场机制的有效性。^⑥虽然新的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点,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极大差异。从具体主张看,两派在三个最重要问题即新政、民权、共产党威胁的性质上有着很不相同的看法。新政。新保守主义者并不像传统保守主义者那样,想完全摧毁福利国家制度和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只是想防止它的无限扩张(就像伟大社会项

目那样)。民权。所有的新保守主义者都是小马丁·路德·金和1964年、1965年两个民权法案的热烈支持者,而《国民评论》的保守主义则怀疑金,反对禁止种族歧视的联邦立法。共产党威胁的性质。两派虽然都反共,但新保守主义者关注外部侵略的威胁,《国民评论》的保守派则更担心内部颠覆;《国民评论》保守派都是麦卡锡的热情捍卫者(小巴克利与麦卡锡关系极为密切),新保守主义者则视麦卡锡为政治凶手,并认为他的煽动行为严重损害了反共事业。^⑧

在思想风格、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上,两种牌号的“保守主义”亦全然不同。

政治色调(tonality)。新保守主义毕竟脱胎于自由主义,部分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乐观和对未来抱有希望的态度,因此,它的政治色调是向前看的、积极的。而《国民评论》的保守主义则是阴郁的、向后看的。克里斯托在80年代中期谈到以往的社会政策未能缓解城市贫民窟的“底层阶级”问题时,将新保守主义的这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指出,人们不能因为原先或现存的社会政策没能起到预想中的作用,就陷入绝望,因为总是会出现新的举措。又说:“不可避免地,总是会出现新的问题。但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世界是‘不完美的’,……它意味着世界仍是那个世界,……既然它是我们此生之中所居之惟一世界,令它变得更适于人居住就是一项令人愉快和令人满意的道德活动。”^⑨

新保守主义尽管批评伟大社会,批评自由主义和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但它并未放弃福利国家的目标,放弃把大政府作为实现这一目标及其他目标的工具。它对福利国家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以往和现行措施上,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以往和现行的福利国家措施特别是以“应享权利意识”为基础的措施“腐化

了”人们的心灵，削弱了人们去工作的激励因素，因此，应予以摒弃或改革，要寻找能更安全有效地实现福利国家目标的方法。就此而言，新保守主义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meliorism)。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的改良主义是与它继承自传统保守主义的人性观相互映照的。新保守主义者一方面要求人们正视人的劣根性和不可救药性，另一方面也要求人们不可因此就悲观厌世。相反，正是因为人本性恶，才更需要人们透过积极的努力创造合适的社会制度，渐进地、稳妥地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威尔逊在1977年写道：“我的主张是，对人和人创造的制度应当有冷静清醒的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合理的，放弃愚蠢的，忘掉空想的。”《国民评论》的保守主义则是要完全消除福利国家制度，其强烈的“反国家主义”倾向在克里斯托心目中，充满了“遗老遗少”的味道。在新保守主义与战后新的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结盟十多年之后的1995年，老克里斯托对后者的批判仍然十分不客气。他认为，真正的保守主义不应过分地咄咄逼人，保守主义的目的不是摧毁自由主义而是补足自由主义；而《国民评论》的保守主义显非如此，它并没能真正的遵循柏克和托克维尔的传统，并不具有真正的“反思性”，亦无助于“公共话语的精炼和提升”；其一味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国家主义”“只是一种政治歇斯底里”。

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来自知识分子的环境，尊重知识，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理智的、讲道理的。而《国民评论》的保守主义在反自由主义时，是无礼的、甚至是粗俗的，充满了反知识分子的气味。克里斯托因此说，《国民评论》的保守主义“在一般层面上的‘反国家主义’和具体对所有社会改革的蔑视，在我看来，是头脑简单的”。^⑤

新保守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自由市场的颂扬——

克里斯托曾写过一本书《为资本主义欢呼两次》(Two Cheers for Capitalism)(1978)——曾让许多人误以为,新保守主义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但实际上,自由至上主义对新保守主义者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自由至上主义对文化的漠视让新保守主义者极不舒服。或许是因为大多数自由至上主义者都是像海耶克和弗里得曼这样的经济学家或受其影响者,所以他们一般倾向于把经济和政治自由作为最高目标,但是在文化领域,自由放任主义将会导致“放纵的自由”(libertinism)。而“放纵的自由”恰恰是新保守主义着力反对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自由固然极为重要,但仅仅拥有自由对于人们来说是不够的,人们还需要自由以外的东西;那就是道德方向(moral direction),而自由放任主义则将私人伦理道德留给个人处理,这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将使资本主义极易受道德无政府状态之害。因此,新保守主义者始终对资本主义的弱点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在本章第二节中讨论过这一问题),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克里斯托都悲叹资本主义损害了曾给予美国社会以稳定基础的传统道德。而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丧失则进一步导致了美国的文化危机,自由至上主义完全忽视了这种文化危机,以致被左派利用了文化危机。其次,新保守主义者并不认为,应当让资本主义自由地起作用或对其进行管制。相反,贝尔和克里斯托都相信,资本主义必须远离“放纵自由思想”(甚或自由至上主义)的享乐主义和不负责任的自由的价值观,转向老的新教价值伦理:勤奋工作、节制和牺牲精神。总之,新保守主义认为自由至上主义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必然会导致文化危机,资本主义不能激发人们为了一种更高的文化理想去奋斗。所以,克里斯托因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自由、为大多数人提供更多的财富而为资本主义“欢呼两次”,因为资本主义缺乏能与

消费社会的虚无主义倾向作战的道德设想而不愿给它第三次欢呼。^⑤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上述思想和政治习惯,由于他们与保守主义主流的思想差异,即使他们在以后不得不加入共和党保守派阵营后,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和政治历程,发现自己已经远离当日的自由主义时,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在思想上都感到十分痛苦(克里斯托父子除外)。^⑥但是自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现民主党和自由主义主流离自己越来越远,而他们建立的争取民主党多数联盟又无力阻止民主党的进一步“左转”时,他们在政治认同上的迷茫之感越发强烈——他们自觉像被父母抛弃的孩子。到卡特上台后,卡特政府在外交上的所有举措越来越让他们认为,民主党已经无可救药。然而,直到1980年2月,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最终选择加入里根阵营之前,他们仍未放弃挽救民主党——使民主党和卡特能回到他们坚持的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老路上——的努力。

1979年之前,新保守主义者一度先试图规劝卡特改变他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1977年11月,李普塞特和另一位政治科学家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分析了关于中东问题的民意测验结果。他们指出,在受过良好教育、更为富裕、占据经理和职业岗位的人中间,对以色列的支持更为强烈;也就是说,精英阶层——即那些积极参与政治、因此一般也更有政治影响的人——是以色列在美国的坚强后盾。他们还发现,不那么支持以色列的人往往与反犹主义特别是黑人中的反犹主义有关,并据此暗示,如果卡特政府采取反以的立场将会使他失去更为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而只能赢得不那么有影响的、人数较少的群体的支持。很显然,李普塞特和波霍雷茨是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警告卡特疏远亲以选民的危险。为了确保卡特本人能获得他们

传递的信息,李普塞特和波霍雷茨都告诉《纽约时报》:“他们希望在卡特先生制定含有争议的中东政策倡议时,这项研究能影响政府的政策。”⁶⁵

在力劝未果后,新保守主义者一方面开始利用争取民主党多数联盟来拆卡特的台,另一方面利用犹太人与卡特政府日渐疏远的关系,在1980年大选即将来临之际,呼吁犹太人与自由派和民主党保持距离。前一方面的活动主要由新一代的新保守主义者如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斯默(Charles Krauthammer)等人来实际操作,目标是削弱公众对卡特的支持。比如,1979年初,另一位新保守主义者迈克尔·里丁(Michael Ledeen)——美国亲以组织“犹太国家安全事务学会”(the Jewis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JINSA)的组建者之一——在《新共和》上发表文章,揭露卡特的兄弟比利(Billy Carter)与利比亚政府官员的联系,以达到诋毁卡特本人的目的。在后一方面,1980年1月的《评论》出了一期讨论犹太人和自由主义关系的专刊。迪克特写道,犹太人正在失去他们在民主党内的政治家园,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已经变质。对于犹太人来说,这种自由主义是坏的,因为它不仅支持配额(肯定性行动),还因为它容忍反犹主义。“它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坏的,最主要因为它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坏的。”格莱泽指出,犹太人理想的选择是保守的民主党。阿布拉姆斯说,犹太人正漂浮不定,他们对民主党自由主义的依恋已被击碎了。即便此时,在他们号召犹太人重新考虑与自由主义和民主党关系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愿意成为共和党人,用阿布拉姆斯的话说,因为他们对民主党的依恋还“没有被对共和党的真正同情所取代”。⁶⁶

1980年1月底,卡特决定与争取民主党多数联盟的领导人会面,以争取民主党保守派的支持。他邀请联盟的领导人前往

白宫,被邀请的大多数人是新保守主义的重量级人物:波霍雷茨夫妇、阿布拉姆斯、科琶翠克、坎佩尔曼、瓦滕堡等。但会面让新保守主义者十分失望,因为他们认为卡特拒不听从他们的建议改变政策立场,留在民主党内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会谈结束后,科琶翠克走到记者面前,宣布她将支持罗纳德·里根。⁶⁹

五、共识、差异和影响

虽然新保守主义从来都不是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和学说,但就六七十年代的新保守主义而言,新保守主义者在他们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上还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共识。1976年,克里斯托对新保守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了概括。根据他的说法,新保守主义者有五条“模糊的共识”。1. 新保守主义坚持西方的价值观念,拥护资本主义,敌视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发展生产,并宣称美国的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适用于全人类,比任何其他价值观都优越。2. 绝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支持罗斯福新政的基本原则,认同福利政策意图达到的社会效果。但是他们在如何实行福利政策方面变得比较保守。从伟大社会项目实施开始,新保守主义者一直对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在实行社会福利政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们呼吁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促成新保守主义者思想转变的最主要原因是许多福利政策造成的严重的消极后果,例如助长了人们对社会和政府的依赖性,使很多人失去了靠个人艰苦奋斗实现自立的动力。因此,新保守主义者告诫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方面要谨慎小心,对事情的复杂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同时,新保守主义重申了个人主义原则,认为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

处境负完全的责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必须以不破坏个人主义为前提,否则就会在客观上奖懒罚勤。3. 基于对新左派蔑视权威和传统的反对,新保守主义者强烈主张维护传统的宗教和道德观念,力主维护传统的家庭观念,反对性解放运动和反文化思潮。4. 针对新左派要求在美国社会实现事实平等的激进主张,新保守主义者重申古典自由主义关于机会平等的思想,他们反对空想和乌托邦,认为激进派的均权主义势必造成社会灾难。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机会平等原则是惟一现实可行并对社会有益的原则,人为地实行结果平均只会使社会失去进步的动力。所以,他们反对优待少数族裔(主要是黑人)或其他社会阶层(例如妇女和退伍军人)的雇佣配额政策,认为这样做违背任贤尚能原则。5.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无法共存的。他们认为,如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敌视美国的价值观,那么美国的民主就很难长期生存。他们既反对越战后一度盛行的孤立主义,也怀疑缓和国际局势的做法能否奏效。所以,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方面,新保守主义者是主张强硬的鹰派。^⑧

除了具体主张上的上述共识之外,在思想上,新保守主义者也都秉持如下四条基本原则。1. 他们都认为生活和政治是无比复杂的,对乌托邦式的恢弘计划和大规模的“社会工程”饱含猜疑。2. 人性是复杂的,因此政治秩序不能建立在利他主义假设的基础之上。(在这方面,他们显然受尼布尔的影响,尼布尔曾说:“人追求正义的能力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但趋向于不正义的倾向又使得民主成为必要。”)3. 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就是说,共同体的要求凌驾于个人的自主之上,如果说自由是根本的善(good),那么自由还应服务于社会德行的目的(the larger end of societal virtue)。4. 观念统治世界,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捍卫自己

原则的自信,那么它将成为意在颠覆或改变其原则的那些力量的牺牲品。^④

另一方面,新保守主义者之间存在着远比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更为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各自思想活动的性质有关。大致来说,新保守主义者中除了政治活动家以外,主要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身处学院殿堂的学者,他们对自己研究领域内问题的分析都是“求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研究对象实际情况的详尽考辨而非任何先入为主的看法为基础的,正因如此,所以在情况变化时,他们乐于改变自己与现实不符的主张。像最先系统批评肯定性行动的格莱泽到90年代时,又重新思考了他过去的立场,认为作为一种防止在校园内再次出现全面种族隔离的手段,肯定性行动理应得到支持,这让他的许多保守派朋友很是沮丧。另一类人是像波霍雷茨这样的评论家,他们几乎什么问题都谈,但对于所探讨的大多数问题并无专门的研究,只是以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套几乎每一个现实问题;称他们为意识形态家(ideologues)或“知识工人”^⑤不算什么不敬之举。相对于学者来说,知识工人以实际为导向;他们当然是知识精英,他们所关心的、所倡导的更通俗化,也更容易让人明白。所以,他们的影响比学者更大。学者和知识工人最根本的差异在于他们看待现实的基本视角(the approach to the reality)或考虑现实问题的思维方式(modes of thinking):一种是思想式的,另一种是意识形态式的。

所谓思想式的思维方式是指以对事实的详尽考察和学术研究为基础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新保守主义者对伟大社会自由主义的批评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从事社会、政治和文化研究的新保守主义者来说,他们之趋于保守固是出于对60年代动荡的反动,同样也是他们对动荡

和自由主义反思的结果,换言之,他们是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得出了“保守主义”的结论。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还是作为一种公共哲学,任何一种思想体系一旦趋于极端往往会变得偏执,保守主义会如此,自由主义同样会如此。“肯定性行动”计划,本来是意在消除种族等方面歧视的一项德政。但是这个计划中规定的保障少数的名额制度却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极端化的一个表现,造成了消极的后果:以平等的名义否定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许多新保守主义者曾就读的纽约城市学院本来学术水平不低,有“穷人的哈佛大学”之称,但由于黑人学生不是以中学学业成绩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而凭名额制度的保证而入学,而致学术水平大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⑥所以新保守主义者对肯定性行动的批评完全是很有道理的,而且也颇合民意。李普塞特在1978年对民意测验的数据进行研究后指出:“支持分配名额和制定数量目标以达到取消种族隔离的政策……违反了具有机会均等含义的传统观念。美国人会接受这样的看法,种族和性别是值得补偿的不利条件……他们会赞同特殊的补偿直到大家认为资源已经大致得到平衡而且竞争的起点条件再一次变得公平。然而资料显示,一切想要引入任何形式的无条件优惠的企图……都会遇到绝大多数美国人强硬而坚决的反抗。”肯定性行动的确有着很大缺陷,这可以从多年来民意测验中人们对肯定性行动的态度上反映出来。一般来说,普通白人男性最为反对这项政策(一项民意测验显示,男性白人对肯定性行动的反对在9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1991年,44%的白人表示反对;1995年,反对的比例上升到67%),共和党和保守主义者也一直利用它来破坏民主党在妇女、少数族裔和男性白人工人阶级中的基础。在反对肯定性行动的人中,无疑有种族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也存在党派政治的因素,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白人男性来

说,他们反对肯定性行动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种族歧视(至少是法律和形式上的),他们也在寻求平等对待:如果一个黑人因其肤色或一个妇女因其性别而可比同资格的男性白人竞争者多一份机会的话,那不就等于这个男性白人因为自己的肤色和性别受到了实际上的歧视吗?1942—1972年间的民意测验显示,白人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越发宽容,比如这样的问题:“你认为(黑人)应该跟白人一样有充分的机会来获得任何工作吗?或者你认为白人应该在任何工作上机会优先?”1942年,只有42%的人认为应该平等对待;1968年,赞成平等对待的人上升到83%,1972年又增至96%。但是,对肯定性行动的支持却极为有限:85%的人反对“优先雇佣和提拔黑人”。还有的民意测验表明,80%的被调查者同意,政府应该与歧视行为作斗争,促进机会均等,公平对待一切人;但对于是否支持肯定性行动,通常支持者的比例在40%—50%之间;对于是否赞成给予黑人特殊照顾或优待,就仅有1/3的人赞成了;说到定额,支持的人进一步下降到20%。1995年,《洛杉矶时报》的调查显示,39%的人认为肯定性行动计划“走得太远”,32%的人感到“目前差强人意”,只有23%的人觉得“还走得不够远”。当问及国会应不应该禁止“雇佣中的优待措施”时,73%的人都认为应该。80年代中期以来,民意测验的数据显示,大多数人一直强烈反对雇佣中的优待举措和注重种族的大学招生措施。⁶⁹

自由主义也的确有着根本的弊端,而新保守主义者对它的批判不仅可以矫正自由主义思想之弊,更对具体的政策有着无可估量的涵义。比如班菲尔德对“向贫困开战”的批判性研究于人们认识贫困问题的根源有极大益处。他以社会阶级研究为基础,指出每一个阶级都表现出独特的态度模式、价值观模式和行为模式,这些模式的核心是“为自己将来打算的程度”(the

degree of orientation toward the future)。班氏特别注意比较所谓的“正常(normal)阶级”——包括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窟的底层阶级在这方面的差异。他发现,底层阶级的成员往往表现出极端的“短视”(present-orientation),没有为对未来的计划留下任何位置。他写道:“底层阶级的人……或不能或不愿考虑未来或控制自己的冲动。不考虑将来的直接结果是花钱大手大脚和不负责任……这些结果又产生了进一步的结果:因为花钱大手大脚和不负责任,他很可能也没什么技能,……很可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因而,底层阶级男性文化强调“孔武有力”(masculinity)和“行动”,倾向于不稳定和暴力;而且,这种文化是倾向于代代相传的。因此,有两种形式的城市问题和贫困现象:正常阶级的形式和底层阶级的形式,这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以就业问题为例,在前一种形式中,就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年轻人刚刚进入就业市场尚需一段时间磨练、适应和试错过程方能找到合适工作;而在后一种形式中,人们偏爱“街头行动”而非任何稳定的工作。再如贫困问题,正常阶级的贫困问题主要体现为老年人、残疾人和有需要照顾的孩子的母亲的贫困,钱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底层阶级的贫困仅仅用金钱是无法解决的。其他与底层阶级有关的问题——贫民窟、垃圾学校、犯罪和骚乱——同样无法用金钱解决,因为底层阶级的所有问题都可归结为一个根本问题:他们的观念(outlook)和生活方式是只考虑眼前的,因而没有赋予工作、自我改善或为家庭、朋友或服务以任何价值。而包括“向贫困开战”在内的现代社会政策的无效不仅在于将底层阶级和正常阶级的问题混为一谈,还在于其暗含的狂妄自大的假设——改变人的本性。^⑥

总之,新保守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内省,

这种内省正是屈瑞林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所呼吁的那种对自由主义有益的“保守主义”批判，也是克里斯托所说的去补足而非要摧毁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补足而非摧毁自由主义”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尽管美国的改革自由主义有着诸多缺陷甚至是根本性的弊端，但它的开创新局面和建设之功极大。从历史上看，“从杰弗逊的民主到杰克逊的民主，经过平民主义运动和进步主义运动，直到‘新政’，自由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功能，首先是增加了可以从巨大的美国财富中获益的人数，其次是使美国政治更加人性化并弥补了它的失误。没有这种持续的反对、抗议和改革，整个美国社会就只能像一片荒芜的丛林……就不能建立起今天可观的生产和分配的体制。”就此方面看，新保守主义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保守主义”或“英国式保守主义”，因为这种思想式的思维方式就是无偏见的保守主义思考方式，它强调均衡、适度和现实的复杂性。从另外一种角度视之，我们又可以像霍夫斯达特那样，将新保守主义看作是“经历过灾难的打击、时间的磨练和逐渐增长的现实感”而调整后的“老自由主义”。⁶⁰同时既是保守主义又是自由主义，初看起来明显矛盾，但这正说明了对于任何伟大和健康的思想来说，意识形态和思想标签都是无比苍白的。

不过，新保守主义也有不那么令人称道的一面。比如他们对新阶级的批判。毫无疑问，新保守主义对新阶级的“发现”和分析是一项重大的学术贡献，他们对新阶级的许多批判也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新保守主义者显然是过于简单化和吹毛求疵了，甚至是有刻意诋毁和不公正之嫌。在分析新阶级为何敌视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信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时，新保守主义者一般倾向于认为，新阶级之所以偏爱更多的国家干预，就是因为相对于通过市场分配资源，他们所具备的

技能使他们对资源的政治分配能发挥更大的影响。换言之,在新阶级寻求国家干预、支持社会福利政策和同情弱者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彼得·伯格说:“新阶级的阶级利益被诉诸同情和他们为被压制者福利作贡献的场面之辞(claims)所掩盖。但无论穷人可能从‘对贫困的战争’中获得何种好处,管理贫困项目的新阶级职业人员和官僚铁定无疑地会获益。”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新阶级最感兴趣的不是物质利益,而是地位、权力和影响。波霍雷茨就把新阶级对平等和“公共利益”的关切斥为“仅仅是掩盖追求私利的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遮羞布”。莫伊尼汉则认为,新阶级之所以想做善事,是因为在为其他人做事时,他们感觉到满足。“他们设想了一个他们自己作为创造者的新世界……他们是社会福利、家庭关系、儿童生活以及成千上万源自穷人生活的问题的专家……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都要依照使政府机器和雇用专家——‘知识分子’——成为必要的方针制定者,结果是在作为专家被雇用和对人类福利的热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密联系。”所以,福利专业人员在促进福利这一点上是有既得利益的。这种批评在一般的意义上部分可以成立,但是在具体的意义上,它对于几十万社会福利工作者是不公正的。更为不公正的是部分新保守主义者对环境保护运动的指责,在有些人眼中,环境保护主义是新阶级的另一项既得利益,它是以牺牲工人阶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需要为代价来促进中产阶级的环境价值观念。瓦滕堡毫不讳言地说:“环保心态是富人的心态,它是富人的环境。”李普塞特在1979年写道,那些寻求限制经济增长保护环境的人都是些“好心的热心肠。但是他们都是富有的;尽管当然并非有意,根本上(他们却是)想踢开他们身后的梯子”。环境保护主义认为经济增长是污染的罪魁祸首,但它减少了工人阶级的就业和经

济机会,它事实上是一场意在创造适合于新阶级的环境的运动。毫无疑问,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确有时显得过于好斗,但是,若无他们的努力和斗争,很多污染问题恐怕不能那么快得到解决。若认为环保主义者只是为自己考虑,显然不能成立。^⑥

再比如在反击新左派对美国的批评时,波霍雷茨和克里斯托等人惯用的手法是:不管新左派的批评是否有道理,是否有助于美国社会的改进,先扣上一顶“反美主义”的大帽子。

新保守主义还有更令人不满意的一面,这就是极为简单化的、带有道德绝对主义意味的意识形态式攻击和鼓吹。所谓意识形态式攻击和鼓吹源自意识形态的本质特点,即意识形态不仅指定了目标,而且对现存的社会现实一以贯之地提出了某些预见性的解释并固执地反对任何明智的改进意见。换言之,它的根本特点就是先入之见贯穿一切,有时甚至显得极端和偏执,在语言风格上则表现为危言耸听、夸大其辞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与攻击;它并不完全以事实以及对事实的详尽分析为基础(部分是事实、部分是主观臆测),在看待和考虑现实时,它总有一个事先搭好的框架,也就是说,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世界。其中的道德绝对主义意味着“时时沉醉于精神狂欢——即人们所说的道德讨伐”,道德讨伐论者认为他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而本质上又十分简单的斗争”,斗争中与己对立的一方是一种邪恶力量,“这种邪恶力量不仅应该被限制、防范或控制,而且应该被根除或尽可能早地消灭。”^⑦而已方具有绝对的道义优势,是人世皆一切至美、至善的代表和化身,这也是道德讨伐论者总是表现出非比寻常的热情的主要原因。由于道德绝对主义总是蕴涵着对永恒和绝对的追求,所以道德讨伐并不能确定现实和理想的界限。道德讨伐论者的世界观是摩尼教式的,换

言之,当他们以道德绝对主义的目光审视无比复杂的现实世界或其中的一部分时,他们脑海中的映象是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并不存在什么灰色地带;在黑白——良善与邪恶——之战中,也没有中立的位置,中立即便不是邪恶本身,也是邪恶的帮凶。这种道德绝对主义和道德讨伐就是史家霍夫斯塔特在其经典之作《美国政治中的偏执》(*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所刻画的那种偏执。霍夫斯塔特写道,患有偏执症的道德讨伐领袖,“认为社会冲突是无法调解或妥协的……因为它总是事关绝对的良善和绝对的邪恶之间的冲突,所以必要的不是妥协,而是战斗至终局。”^④

霍夫斯塔特所指的偏执主要在国内政治,而新保守主义的道德绝对主义一面主要表现在其对外政策看法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鉴于它在80年代以后才特别彰显,因此,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出这样一种说法,在以后几章中再对这种说法进行验证。

正是出于对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警觉,新保守主义者中最伟大的学者贝尔最先与新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他虽然与克里斯托等人关系密切,和后者一样坚持对自由主义的自我批评活动,但他作为素来审慎的“自由派社会科学家”,对政治意识形态化一直怀有戒备和疑惧。另外,同其他“坚定”的新保守主义者相比,贝尔既没有莫伊尼汉、科瑟翠克的参政热情,又不同意波霍雷茨和诺瓦克等人对资本主义“潜在精神力量”的肯定,从而遭到后者的指责,说贝尔的思想中“社会主义思想的比例过大”。^⑤1975年,贝尔离开了《公共利益》杂志,一方面是因为他要到哈佛任教,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与克里斯托的思想道路发生了分歧。在他看来,他之所以要和克里斯托在1965年共同创办《公共利益》,主要是想“通过对公共政策展开合理的公共辩论

和客观探索,试图超越意识形态”。之所以要超越意识形态,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点是不仅指定了目标,而且对现存的社会现实一以贯之地提出了某些预见性的解释——这些解释固执地反对任何明智的改进意见”。10年过去了,克里斯托和他的意见不再一致。按照贝尔的说法,克里斯托开始认为,一切现代政治学都不可避免地是意识形态的,因为这些观点都争着要去控制未来的情形;并且,克里斯托还认为,自由主义文化是同赞成乌托邦的或千禧年主义主张的驱力相抗衡的一根脆弱的芦苇,那些驱力推动西方文化去摧毁自由。而贝尔则反对这两个观点,贝尔说:“我认为,自由主义——关于以赛亚·伯林的自由主义——足以实在地抵制着那些幻想。意识形态是对抽象事物的具象化,是对现实的僵硬模拟,是对观念的虚假实在化。它赋予范畴以虚假的生命。并且它也是它的致命裂缝,它的致命弱点。它使它最终屈尊于其他的认识和信仰形式。”^①

总的来说,最初阶段的新保守主义虽有以上不能令人满意的一面,但是从当时美国国内的实际情况和在国际舞台上的颓势来看,新保守主义者对许多问题尤其是美国国内问题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正因如此,当新保守主义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初现端倪并在70年代中期前后成为美国政治思想舞台上的一支独特力量之时,它吸引了不少年轻知识分子。现在的新保守主义者之一詹姆斯·纽彻特莱(James Nuechterlein)就是在那时皈依新保守主义的。他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些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开始进入独立思考年龄的人”既不喜欢当时的自由主义,也不喜欢当时的保守主义;既不喜欢《新共和》,也不喜欢《国民评论》。“然后,克里斯托的《公共利益》来了,波霍雷茨重新改装过的《评论》来了,这两份杂志重新界定了美国政治的可能性,为我们这些曾在意识

形态上无家的人提供了思想的庇护所。”^②通过阅读《公共利益》和《评论》从而接受新保守主义或受新保守主义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政府官员和政治活动家,像里根政府的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和现在副总统切尼的夫人林恩·切尼(Lynne Cheney)。

更为重要的是,新保守主义做成了巴克利的《国民评论》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想做但并未能做到的事情,从内部瓦解、破坏了自由主义观念及其合法性(虽然这并非许多新保守主义者的本意,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1982年,波霍雷茨洋洋自得地在一家德国保守派知识分子刊物上撰文,向他的德国同道们炫耀他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取得的两项成就:第一,新保守主义者已经撼动了左派和自由派在“观念世界”中的地位,第二,藉此,他们为里根上台铺平了道路。^③第一点成就是确实的,第二点只能是部分成立。

① Jurgen Habermas, “Neoconservative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 Germany”, in idem., *The New Conservatism: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hierry Weber Nichol森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7), p. 23.

② 转引自 Kenneth M. Dolbeare and Linda J. Medcalf, *American Ideologies Today: Shaping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1990s* (New York: McGraw-Hill, 1993), p. 66.

③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21—325页。

④ Irving Kristol, “American Conservatism 1945—1995”, *Public Interest*,

<http://www.thepublicinterest.com/notable/article2.html>.

⑤ Godfrey Hodgson, *The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A History of the Conservative Ascendancy in America*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6), p. 135; M. Ali Raza, et. al., *The Ups and Downs of Affirmative Action Preferences* (Westport: Praeger, 1999), p. 1;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高钰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69页。1936年一位移民对当时美国社会状况的描述颇能代表美国的这种个人成就精神,他写道:“事业是美国人的灵魂:他对之锲而不舍,并不是作为为本人及家庭争取必要的舒适生活的手段,而是看作人间一切幸福之源泉。……整个美国仿佛就是一座庞大无比的车间,入口处镌刻着闪光的大字,‘非为事业者莫入’。”见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7页。

⑥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24页;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8—529、554—557页。80年代以前,最著名的反向歧视诉讼有两个条件,分别是德福尼斯案(Defunis Case)和巴克案(Bakke Case)。详细情况见《原则与妥协》,第560—562页;Godfrey Hodgson, op. cit., pp. 152—157。关于肯定性行动向配额的演变,见西奥多·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1—155页。

⑦ 遗憾的是,笔者并没能找到这本书,所引用书中文字分别转引自Neil Jumonville, *Critical Crossings: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Postwar Ame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00), pp. 88—89; Godfrey Hodgson, op. cit., p. 157。

⑧ Mark Gerson, “Norman’s Conquest: A Commentary on the Podhoretz Legacy”, *Policy Review*, Number 74 (Fall 1995)。

⑨ 《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第458—462页;《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326—330页;怀特语见《美国的自我探索》,第151页。所引《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译文略有变更。

⑩ 对这四个方面的论述,除另有注明外,主要参考李连江《新保守主义》,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88—95页。

⑪ 转引自Nigel Ashford, “Neo-Conservatism and the New Class: A

Critical Evaluation”, *Sociological Notes*, 3(1986), p. 6.

⑫ 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386页,388页。

⑬ 转引自 Nigel Ashford, *op. cit.*, p. 6。

⑭ Edward Banfield, “The Unheavenly City Revisited”, in Jerry Z. Muller, *Conservatism: An Antholog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另见编者的介绍,同书 pp. 335—338。

⑮ 对新保守主义新阶级观点的详细讨论,见 Nigel Ashford, *op. cit.*。

⑯ Jurgen Habermas, *op. cit.*, pp. 25—26;《新保守主义》,第96页、91—92页。

⑰ 约翰·邓恩编,《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⑱ Nigel Ashford, *op. cit.*, p. 5.

⑲ 《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第518页。

⑳ 《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第526—531页; Mark Gerson, *op. cit.*。

㉑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㉒ 本部分对新保守主义所开处方的介绍,许多参照《新保守主义》,第99—109页。

㉓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四章及第39—40页。

㉔ Michael Novak, *The Spirit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Lanham: Madison Books, 1991)。

㉕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p. 6.

㉖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85—687页。

㉗ 同上,第695—697页;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41—744页。

㉘ 《大外交》,第689页。

⑲ 转引自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1986》,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页。

⑳ John Ehrma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05—107.

㉑ John Ehrman, op. cit., pp. 107—108, 80.

㉒ 关于“六天战争”对包括美国犹太人在内的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影响,参见 Andrew Furman, “The Six-Day War and World Jewry”,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90/1 (March 2002), pp. 83—85; Leon T. Hadar, “The ‘Neocons’: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Global Intifada’”, *Washington Report*, April 1991.

㉓ 爱德华·C·勒克:《美国政治与国际组织》(裘因、邹用九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30页、135页。

㉔ 同上书,第131—132; John Ehrman, op. cit., pp. 80—83.

㉕ 《美国政治与国际组织》,第135—140页; John Ehrman, op. cit., pp. 85—86.

㉖ 《战后美国史》,第436—440页;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总统身后》(顾学稼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45页。

㉗ 《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第779—780页。

㉘ 《战后美国史》,第490页; John Ehrman, op. cit., pp. 100、111—114。

㉙ 赛勒斯·万斯:《困难的抉择:美国对外政策的危急年代》,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2页。

㉚ John Ehrman, op. cit., p. 114.

㉛ 《战后美国史》,第453页、461—463页;《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第787页、797—801页。

㉜ 转引自《战后美国史》,第462页。

㉝ John Ehrman, op. cit., pp. 115—116;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状与美国外交政策》(储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163—164页。

㉞ John Ehrman, op. cit., pp. 119—121.

④⑤ Yaacov Bar-Siman-Tov,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ince 1948: A 'Special Relationship'?", *Diplomatic History*, 22/2 (Spring 1998).

④⑥ John Ehrman, op. cit., pp. 124—125.

④⑦ Ibid., pp. 125—127.

④⑧ 《新保守主义》,第 121—122 页。

④⑨ 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566—567 页。

④⑩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98 页。

④⑪ 罗伯特·尼斯贝:《保守主义》(邱辛晔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版,第 123—124 页。

④⑫ James Neuchterlein, "The End of Neoconservatism", *First Things*, 63 (May 1996).

④⑬ Irving Kristol, "Skepticism, Meliorism,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Public Interest*,
<http://www.thepublicinterest.com/notable/article3.html>.

④⑭ 2、3 两点均参考 Irving Kristol, "American Conservatism 1945—1995". 威尔逊语,转引自《新保守主义》,第 93 页。

④⑮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Grant Havers and Mark Wexler, "Is U. S. Neoconservatism Dead?" *Quarterly Journal of Ideology*, Volume 24, Numbers 3 & 4 (2001).

④⑯ James Neuchterlein, "This Time: Neoconservatism Redux", *First Things*, 66 (October 1996).

④⑰ John Ehrman, op. cit., p. 128.

④⑱ Leon T. Hadar, op. cit.; John Ehrman, op. cit., p. 129、131.

④⑲ Ibid., pp. 135—136.

④⑳ 笔者并没有能找到这篇文章,文中所述系转引自《新保守主义》,第 81—83 页。

㉑ 参见 James Neuchterlein, "This Time: Neoconservatism Redux".

㉒ “知识工人”一词系借用美国学者亨特的说法,见 J. D. 亨特:《文

化战争：定义美国的一场奋斗》（安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5页。

⑥3 董乐山：《自由主义：宽容还是偏执？》，《读书》，1995年第5期。

⑥4 转引自加里·C·布赖勒：《扶持措施：少数民族的权利还是反向的歧视？》，雷蒙德·塔塔洛维奇、拜伦·W·戴恩斯编，《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吴念等译），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91—92页。

⑥5 Edward Banfield, op. cit. .

⑥6 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⑥7 Nigel Ashford, op. cit. , pp. 3—5.

⑥8 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第12—13页。

⑥9 转引自 Daniel W. Drezner, “Chicago School: Et Tu, Kristol?”, *The New Republic Online*, May 14, 2003.

⑦0 赵一凡：《贝尔学术思想评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第6页。

⑦1 《意识形态的终结》，第514—515页。

⑦2 James Neuchterlein, “The End of Neoconservatism”.

⑦3 转引自 Jurgen Habermas, op. cit. , p. 22.

第四章 保守主义思想基础设施 网络的建立和结构

1948年,当保守主义仍处于政治舞台的边缘时,理查德·韦弗出版了《观念有其后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一书。当时的韦弗绝对不会想到他这本书的书名会成为以后保守主义者在欢庆胜利时的口头禅。1986年,在里根政府管理和预算署(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担任高职的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得意洋洋地告诉记者说:“你知道我怎么到这里来的吗?是观念。观念的确很重要。观念驱动国家。”^①事实上,包括霍洛维茨在内的绝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和韦弗一样不相信观念本身就会自动地产生影响,他们和韦弗一样认为,只有建立在良好观念基础之上的积极和有技巧的行动才会带来好的结果。因此,从70年代早期起,来自不同方向的保守主义流派开始共同努力以建立一个对抗性运动(counter-movement),意欲取代自新政以来支配公众思想和社会政策的自由主义机构,消除自由主义观念。大致来说,这一对抗性运动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政治上“新右派”(The New Right)和宗教新右翼的兴起。新右派产生的直接原因是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继任的福特总统提名共和党东部权势集团领袖纳尔逊·洛克菲勒为副总统这一事件。在1964年戈德华特竞选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以维格里为首的一批共和党青年保守派(见本书第一章)对此不满。由于认识到政党常常会因为政治需要特别是

选票而牺牲其应该代表的“原则”，维格里等人开始建立一个由各种“奋斗目标单一”的集团组成的可分可合的跨党联盟。从意识形态上说，新右派基本上继承了《国民评论》的保守主义，但它的关注点并不在此，它主要进行草根（grassroot）政治动员。所以，新右派之“新”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它的“群众路线”即兜售意识形态的新方式和对可能支持保守主义事业的选民进行政治动员。由于它的最主要目的是影响选民，新右派只是针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一系列非常保守的政策主张，而且往往对不同的选民强调不同的具体问题。在国内政策上，新右派特别强调家庭和宗教的重要性，反对女权主义、自由堕胎、工会、轻率离婚、同性恋、吸毒和色情淫秽；新右派还关心教育和社会秩序，要求根本改变美国现行的自由派教育政策、加强宗教在学校中的地位，反对肯定性行动，反对枪支管制；在经济政策上，新右派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尽量减少福利开支、大幅度减税等。在对外政策上，新右派坚决反对美苏缓和，主张建立美国的军事优势。此外，新右派领导人在建立新宗教组织和招募与培训新宗教组织领导人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新宗教右翼的兴起。新宗教右翼的兴起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反弹，造成这种反弹的主要是沃伦时期法院的一系列决定（包括禁止在公立学校中进行宗教祈祷仪式，将淫秽作品作为一种言论自由加以保护，使堕胎合法化、性革命和女权主义）。^②

另一大部分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能与自由派知识精英的“权势集团”（Establishment）分庭抗礼的“敌对权势集团”（Counterestablishment），以便重塑政治和公共政策的议程与轻重缓急次序（priorities），建立有利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的思想框架。尽管保守主义者自己常常把这些活动说成是“观念战争”，“但是它所包含的远不止学术殿堂内的学者辩

论。……进行观念战争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和相互关联的机构基础设施。”因此，保守主义基金会和活动家们建立起一个由思想库和其他政策研究与倡议机构、媒体、出版物等组成的组织网络。随着来自保守主义基金会和大企业金钱的大量流入，这个组织网络的发展极为迅猛，在美国政策辩论和政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早在1984年，温和的共和党人约翰·萨洛马(John Saloma)即已注意到这个网络的存在，当时他警告说，这个“新的保守主义迷宫”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重要的新力量”，如果不受约束，它会把整个国家政治中心点急剧地拖向右翼。他的预测看来是应验了。今天，保守主义迷宫变得更大、更为复杂和精巧，影响公共政策议程的能力越来越大。^③在保守派攻击“20世纪自由主义所建立的统治秩序”三次大浪潮——里根及所谓的“保守主义革命”、金里奇和所谓的“共和党革命”、现在的小布什政府——的背后^④，无不有它的身影。本章将主要根据近年来一些自由派组织的调查报告*，重点考察这个保守主义迷宫。这不仅因为它一直且将继续影响美国的政治气候和政策，还因为80年代以来的新保守主义与这个网络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大公司保守主义的政治动员

自大萧条以来，美国的大公司就退至政治的旁观者之列，他们当然会为了具体利益去游说华盛顿，但他们一般并不参与更为广泛的政治辩论。不过，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的政治

* 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由于这些自由派组织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与保守派截然对立，所以，他们的调查报告可能会有刻意攻击和不实之处。

经济变化却促使大企业改变了政治上的无为态度。

经济增长的放缓,使得先前的劳资妥协和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政府管理商业周期并实行社会福利项目)的安排越来越难以发挥帮助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作用。二战后的美国尽管没有像许多实行社会民主制度的欧洲国家那样建立起制度化的劳资合作,但在由少数大企业主导的核心工业中也建立起有限的“劳资协调”安排:劳工接受企业获利是组织生产的最主要原则,接受管理层在一线生产车间的优势地位;企业则承认工会,同意给工人更好的报酬和工作条件。另一方面,美国虽然没有像欧洲大多数国家那样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没有像英国那样实行将企业国有化的尝试,但自新政以来,特别是二战之后,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也在扩展(主要体现为政府管理商业周期),同时也实行了一系列有限的社会福利项目。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美国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安排的扩展特别明显,在退休金、失业补偿金、公共住房、对儿童和残疾人的帮助等项目上的政府开支大大增加,实行了包括食品券、国民医疗补助(Medicaid)、老人医疗保险(Medicare)、工作培训和能源补助在内的新项目。有限的劳资协调和扩大社会福利项目在经济持续增长时期都有利于资本主义,但是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政府税收的下降,期望生活水平和保障永远提高或至少是维持同样水平的人们在私营部门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时,向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政府的开支和管制(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美国新建立了许多政府管制机构,如环境保护署、职业安全和健康署、消费者保护网络委员会、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等)增加了,私人投资率则趋于下降,企业界感到资本主义企业正受到威胁,当他们为政府所迫以有害于自己利益的方式行事时,他们有一种无力感。尽管所有问题都是

在经济陷入疲态时才出现的,但大企业认为经济问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原先的那一整套安排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不再能发挥作用。这表明,大企业的关切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大企业认为,在最强大和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庞大经济资源的资本家们却不再能控制政治体系,归根结底,问题的根源就出在政府和民主的政治体系。政府之所以要增加开支和对企业的管制,就是因为“一人一票”的民主体制,公民对政府越来越多的要求、政府向企业征收越来越高的税收和施加越来越多的管制以及企业收益和满足人们要求的能力的不断下降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⑤这对于大企业来说无异于一场危及自由企业体系生存的政治危机。

不过,问题远不止此。在政治危机的下面,大企业还发现了更为根本的意识形态危机:公众对于企业界的理解和支持处于最低点。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企业与其他社会集团相处得都很好。但是到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由于一系列事件——有两百多家工商企业进行非法的竞选捐款并同水门事件有牵连、许多因与水门事件有牵连而被调查的公司又被发现在国外有不当的支付款项——的直接影响,出现了对企业普遍的敌对情绪。同时,这一时期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和消费者保护运动让公众突然发现,他们身边的情况不太妙:越发明显的环境恶化、失业、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等。一些社会批评家开始公然抨击大企业、特别是企业越来越大的趋势,建议联邦政府应该更多地管制和控制公司,否则大公司力量的增长将使得它们能操纵美国的经济机器,既不利于消费者,对民主的政治体系也有害。而消费者保护运动的领导人拉尔夫·奈德(Ralph Nader)对企业界的攻击更为严厉,以致1971年5月《财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认为,奈德的真正目的不是保护消费者,而是要彻底粉

碎他所仇恨的公司力量。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到1975年战后时期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大企业和联邦政府一起成为了公众茫然不知所措、困惑不解和愤怒的宣泄对象，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企业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批评更加尖锐。1976年，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愤怒地辞去福特基金会董事会中的职务，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当时反资本主义、反企业情绪的蔓延之广了。福特二世在说明他为何辞职的信中，这样写道：

福特基金会的存在和兴旺依靠了我们经济制度的成果。竞争性企业的红利使基金会的存在与繁荣成为可能。美国企业所创造的相当大部分的财富，使福特基金会和类似机构有完成自己的工作的可能。实际上，福特基金会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创造。我相信，这个声明将使慈善事业领域里的许多专业工作人员感到震惊。从福特基金会所做的任何工作中，很难看出人们承认这个事实。在许多机构中，尤其是福特基金会捐赠计划的受益者的大学里，理解这个事实的就更少。……我并不想充当顽固的实业界巨头，认为所有的慈善事业家都是社会主义者，所有大学教授都是共产主义者。我仅仅向理事会的理事和工作人员提示，使福特基金会可能有今天的那个制度，非常值得维护。^⑥

大企业的经理人员相信，问题的根源在于“沟通的失败”：媒体、大学和企业界人士并没有让普通美国人认识到资本主义企业和私人获利对于他们生活和福利的重要性。结果是，人们所要求的政府项目和政策虽不能说是完全敌视资本主义的，至少也是无视企业界的利益的。在大企业的管理者们看来，这个意识形态问题是对自由企业体系最为基本和严重的威胁。^⑦他们感到

必须要采取行动以扭转他们面临的不利境遇,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体系真有不保的可能。通用食品公司董事长詹姆斯·弗格森说:

我自己的感觉是,那种认为企业向右转和企业正在竭力控制社会的倾向,实际上是企业有了发言权,并发现它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比过去想像的大,而且正在运用这种权力。我的看法是:同劳工、消费者以及其他集团比起来,企业界正在受到虐待,因而企业界内部不断发出呼声:“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使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⑧

70年代中期,大企业开始在政治上动员起来。他们希望通过增加开支、提高他们的政治组织水平和建立新的影响手段来影响政治进程。他们全力支持保守主义的经济议程,同意保守主义的有限政府立场。此次大企业的政治动员与以往企业界影响政治的方式根本不同,过去他们一般按照行业或部门以组织利益集团的方式,目的是十分具体的:如寻求有利于某个选民群体的某项具体立法或政府行动;相互之间在政治上常常是分裂的和冲突的:面向国内的公司和面向国际市场的公司、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较小的公司和大公司之间往往是各自为政,甚至是对立的。虽然,这种分裂、冲突和对立的情况在大企业的政治动员以后仍然存在,但是,它们现在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不仅试图影响具体的立法还想塑造政策讨论和政策形成的方式,塑造人们对自由企业体系的看法。^⑨

大致来说,企业界除了以一个整体——如1972年建立的企业圆桌会议(The Business Roundtable)——来直接游说国会,对

政治候选人的捐助越发意识形态化,也更为协调和对公众进行“政治教育”以营造有利于整个企业界的政治气氛外,还开始大力资助保守主义的思想库和其他研究组织,不仅帮助建立了大量新的保守主义政策机构,还使得原本一直默默无闻的老的思想库焕发了青春,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正是在大企业雄厚资金的支持下,经过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的迅速发展,保守主义思想库和倡议组织成为美国政策领域声音最为响亮的群体。像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旗舰”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70年时的预算仅为90万美元,到1983年即已增加了10倍,达1060万美元;而同一时期内,持中间立场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历史最悠久和最大的基金会之一——的年度预算只增加了一倍,从550万美元增至1190万美元。60年代早期一度接近破产边缘的斯坦福大学胡佛中心(Hoover Institute at Stanford University)1970年的预算为190万美元,1983年增至840万美元;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70年代中期的年度预算一般接近100万美元(1976年为97.5万美元),到80年代后期以前已增至年均800多万美元(1985年为860万美元)。同时,一些新建立的思想库也发展极快、表现抢眼,最“生猛”莫过于1973年才建立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了,到80年代,它的年度预算已与保守主义思想库的老大哥“美国企业研究所”持平,将近1100万美元。^⑩

保守主义的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和讨论组织网络的发展不仅为大企业提供了影响政府重要政策的主要方式,还创造了有利于企业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思想库”不仅仅是要塑造具体的政策,还为保守主义理念和自由企业体系提供合法性

的证明,向国会、行政部门和新闻界提供供讨论的公共政策问题,同时还是里根政府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保守主义思想库在大企业圈子和保守主义理论家的圈子之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接触界面,在这一过程中,它使得大企业越发意识形态化,保守主义越发有影响。此外,到80年代保守主义政策机构及其所鼓吹的保守主义观念已占据上风时,无论是出于财政压力、思想的转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持中间立场的主流政策研究组织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右转的倾向。

到里根第二届任期时,大公司保守主义虽仍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他们的联合已趋于解体。公司和行业之间越来越多的分歧伤害了企业圆桌会议,分裂了公司的游说团体,政策计划团体之间也互相争斗。此外,在选举方面,大企业在支持保守的共和党挑战者进入国会上也不再那么协调,企业支持在位者又成为趋势。大企业选举战略变化的一个因素是民主党为了获得企业的金钱也开始采取更为亲企业的立场,民主党向大企业强调,没有民主党的合作,共和党人对企业的利益没有什么帮助。当然,大企业并不是变得更为中立了,他们仍偏爱共和党,只是给了民主党挑战者少量的金钱。而且,企业的金钱仍旧支持着那个组织网络。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大公司保守主义从7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向保守主义运动提供资金,但它从来都不是保守主义运动的基本组成部分。事实上,大多数公司保守派一直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保守派,他们最为关注自己的企业。这有两层含义:其一,一般来说,他们害怕政府的计划或规章制度,反对政府的管制,欢迎市场和自由企业制度,但大多数人根本不关心意识形态问题,他们认为除非他们在需要政府的时候,政府最好不要管他们,在这方面,公司保守派是很灵活的;其二,他们并

不像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者那样想重塑美国,而他们之所以资助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者和保守派政治家,主要是因为后者在保护公司利益方面做得比自由派好。^①一言以蔽之,公司保守派更讲求实际,这和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者完全不同。

二、《鲍威尔备忘录》

在2002年之前,很少有人会想到保守主义迷宫的建立始于原美国最高法院法官(1972—1987)小路易斯·鲍威尔(Lewis F. Powell, Jr.)的一份私人备忘录。2002年,杰瑞·兰代(Jerry M. Landay)在对鲍威尔档案(现存放在弗吉尼亚州列克星顿华盛顿和李大学)的研究中发现了1971年鲍威尔撰写的一份备忘录。兰代注意到,7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运动特别是保守主义“敌对权势集团”的活动与这份备忘录中的内容有着惊人的一致。在经过进一步研究之后,他确信鲍威尔和《鲍威尔备忘录》是促使企业界政治动员的主要催化剂,《鲍威尔备忘录》中所概括的行动目标和方案也为保守主义“敌对权势集团”的活动提供了战略和战术。^②

曾担任美国律师协会主席的小路易斯·鲍威尔是一位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作为一名出色的公司律师,他与企业界关系密切,是11家公司董事会的成员。1971年10月,尼克松总统提名他为最高法院法官以填补休果·布莱克(Hugo Black)留下的空位。尼克松的原意是希望他能够加强最高法院内的保守派力量,因为当时最高法院内的其他8名最高法官,4人是保守派,4人是自由派。不过,鲍威尔在最高法院的所为肯定让尼克松很失望,因为他经常采取温和的立场;如果说他在政治上是个

保守派,那他在社会问题上则是自由派,在“罗伊诉韦德案”(Roe-v-Wade)中他就支持妇女的流产权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许多问题上的态度愈发倾向于自由派。80年代中期,他曾与保守派站在一起支持死刑;但是到1991年他已经不再担任最高法院法官时,他告诉他的传记作者说:“我开始认为应该废除死刑了,因为它使整个司法体系蒙羞。”1998年鲍威尔去世之后,曾为他工作过的理查德·法隆(Richard Fallon)教授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就说,他“太过自由以致不能取悦保守派,太过保守以致不能取悦自由派”。^⑬很显然,鲍威尔并非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派,那是什么因素促使他撰写那份极富攻击性的备忘录的呢?鲍威尔自己说,主要是因为他对“性放任的60年代”的过度深感不安。

鲍威尔所指的过度并非仅仅指性解放,还包括反主流文化、反对越战、黑人的骚乱等似乎让美国国内乱作一团的事态。不过,在他看来,最可恶又最令人担忧的是全国的反企业情绪。鲍威尔一直认为自由市场是自我矫正的,应该让企业自行其是。公司需要的不是更多而是更少的联邦控制,因此,他强烈反对任何损害公司自由运作力量的改革。在鲍威尔看来,那些鼓噪要求新政府管制措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评论家都是些吹毛求疵之徒,媒体特别是商业电视上又充斥着他们的言论,这似乎表明这是一场大规模反对自由企业体系的宣传运动,而运动的发动者就来自于大学、媒体本身甚至是教堂内的讲道坛。上一节提到的《财富》杂志那篇关于奈德的文章让鲍威尔更加不安,在与里士满的老朋友小尤根·希德诺(Eugene Sydnor, Jr.)的一次见面中,两人都认为企业界需要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以抵挡奈德和他所代表的“反企业叛乱”,目标是不能让自由派批判自由企业体系的观点独领风骚。希德诺不仅是里士满一家百货公司

的老板,还是华盛顿美国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美国最主要的企业和商贸协会——教育委员会的主席。鲍威尔建议,美国商会可以来领导这场运动。希德诺则邀请他筹划行动的计划,结果,《鲍威尔备忘录》出炉。商会的领导层在拿到备忘录后,一方面对于是否承担运动的领导角色犹豫不决,另一方面同意把备忘录散发给其成员。这样,备忘录就出现在商会的会刊《华盛顿报道》(Washington Report)上(注明日期是1971年8月31日),大标题是《对美国自由企业体系的攻击》,副标题是《鲍威尔备忘录》。

《鲍威尔备忘录》说,对美国经济体系的攻击已经影响了美国力量的中心地带:社会中塑造舆论和最受尊敬的人和机构——大学校园、讲道坛、媒体、思想界……政治家。美国企业界不能再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了,要发动反击。鲍威尔写道:企业界必须认识到“政治力量是必要的;且必须经过精心的培育;如有必要,必须使用它进行进攻……”,应该毫不犹豫地政治上惩罚像奈德及其同伙那样反对自由企业体系的人。尽管鲍威尔并未明确指出采取何种政治手段,但他强调企业应该利用它现有的经济优势即对大学、媒体、教会和其他力量中心资金来源的掌握,使用财政工具——“断奶”或“以断奶相胁”(threat of defunding)——迫使他们就范,毕竟企业才是他们的主要资助者。鲍威尔规划了四个主要的行动领域: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对公共政策、公众舆论和政治辩论有着直接影响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和教师;媒体;政治权势集团——那些塑造公众舆论、立法和政府政策与议程的中心;法院系统——编纂和阐释美国法律的地方。

1. 高等教育机构

鲍威尔认为,在大学校园中,“自由派”教授及其议程发挥

了“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正是他们使学生激进甚至到“成为革命者的地步”。因此，必须建立一个由学者、讲座者、公共演讲者等组成的对抗自由主义的文化群体(counter-culture)，学者们要“评估社会科学的教材”以确保“我们的体系受到公平和实事求是的对待”。要说服大学为宣讲足以代表美国企业界观点的“温和的或保守主义的观点”提供“同样的时间”；向大学的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施压，要求他们矫正“许多教职员的不均衡倾向”；而头等大事是建立一个由“杰出学者、作家和演讲者”组成的班子，他们能为整个运动而思考、分析、写作和演讲。

2. 电视和其他媒体

对抗自由主义的文化群体的另一项任务是在媒体上促进企业界的议程，保证电视网络受到监控，因此他们应该非常熟悉媒体，要能接近公众舆论，能与公众舆论有效地交流，也就是能够影响公众舆论；鲍威尔还呼吁要持之以恒地从电视节目、学术期刊、所有种类的书籍和小册子中选取“合适的样本”进行检查，同时向媒体和出版机构提供“激励因素”诱使他们传播、出版反自由主义文化学者群体的更多作品；企业界应拿出更多的钱“让美国人民了解自由企业体系，教导他们”，使他们“支持体系”。

3. 政治权势集团

鲍威尔注意到，立法者正在支持消费者保护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他说，这说明美国企业家已经丧失了政府在政府内的影响，因此，企业界必须采取行动“教育”政治家们，要他们理解并支持企业界；必要时，企业界甚至可以采取直接措施重获在政府内的决定性政治权力，包括扩大代表企业观点的院外游说集团的作用。

4. 法院系统

鲍威尔认为,法院和法官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最主要工具”。作为一名法律从业人员,鲍威尔知道如何通过法院来实现通过立法或行政手段不易实现的政策变化。他强烈要求商会建立一个企业界支持的法律中心,招募优秀的律师,这些律师应该代表企业在法庭上“充当发言人的角色”;专门的诉讼人员将领导对环境保护主义者、消费者活动家和其他像奈德那样“寻求摧毁体系的人”的反击。^④

三、“后台老板”及其意识形态

很明显,与其说《鲍威尔备忘录》是一份私人备忘录,不如说是政治行动的声明。尽管美国商会的领导层认为鲍威尔的想法过于野心勃勃,成本又高,因此最终决定不充当先锋。但备忘录已经在整个企业界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中西部和“阳光带”新兴起的企业家(特别是私人拥有的家族企业)和基金会开始按照鲍威尔的建议调整他们的捐助项目,目标是重塑公共政策议程,构筑一个保守主义机构与学者的网络。

密西西比州一家酿酒厂的老板约瑟夫·库尔斯(Joseph Coors)在读了《鲍威尔备忘录》后十分不安,《鲍威尔备忘录》使他相信美国企业界忽视了他们所面临的危机。他很快就行动起来,做了一件对保守主义运动贡献极大的事情:其家族控制的阿道夫·库尔斯基基金会(Adolph Coors Foundation)捐款25万美元帮助建立传统基金会。欧林基金会(The John M. Olin Foundation)过去主要将钱给予反劳工组织和不知名大学的自由企业教育项目,但从70年代早期开始,在新任总裁、尼克松政府前任

财政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的领导下,它的捐赠模式发生了变化,主要给予那些能影响全国政策辩论的保守主义者、评论家或机构。^⑤同时,库尔斯基金会、欧林基金会和其他几家保守主义基金会特别是布莱德利基金会(The Lynde &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科赫家族基金会(Koch Family Foundations)、斯基菲家族基金会(Scaife Family Foundations)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The 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等联合起来,支持同一批保守主义政治组织和政策研究机构。其中,欧林基金会、斯基菲家族基金会、布雷德利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因为在保守主义运动中一直十分活跃,被人们戏称为保守主义基金会中的“四姐妹”(The “Four Sisters”)。^⑥

斯基菲家族基金会的老板是理查德·梅隆·斯基菲(Richard Mellon Scaife),是从事石油和银行业的梅隆家族的成员。1995年,《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称他为“(保守主义)运动思想支柱的财神爷(the financial archangel)”。这话虽有些谄媚,倒也属实,根据1996年自由派组织“人民寻求美国方式”(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的调查,他在此前一些年中的总捐助额超过2亿美元;90年代中期,他控制的3家基金会——迦太基基金会(Carthage Foundation)、萨拉·斯基菲基金会(Sara Scaife Foundation)和安利盖尼基金会(Allegheny Foundation)——每周的捐助总数近40万美元,大多数流向了“新右派”组织和保守主义思想库。他还曾向巴里·戈德华特、尼克松、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和曾任里根政府教育部长的威廉·贝内特等政治家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持之以恒地资助保守主义思想库和政治组织,他不仅在里根政府时期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激增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按照麻萨诸塞大学政治学教授托马斯·弗古森(Thomas Ferguson)的说法,理查德·斯基菲为

“金里奇革命”所做的事与金里奇本人一样多。连金里奇也说是斯基菲是“真正创造现代保守主义”的人之一。^⑦

布雷德利基金会的老板哈里·布雷德利(Harry Bradley)是极右翼组织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的成员,而且在组织中十分活跃。总裁是曾任欧林基金会总裁的迈克尔·乔伊斯(Michael Joyce),他具有十分长远的战略眼光,认为对学术界的投资对于保守主义运动的长期成功来说至关重要;在他的领导下,布雷德利基金会向学术研究提供了数百万美元。根据他的说法,基金会在90年代中期的一些年中向近600位大学毕业生提供资助。在解释为什么把钱集中于知名大学时,他说:“在美国,精英舆论是在金字塔的最上层形成的。……精英机构在塑造公共政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⑧

欧林基金会是所有基金会当中最注重资助大学的。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詹姆斯·皮尔森(James Piereson)曾这样来描述欧林的使命:“我们对社会的最上层、对华盛顿的思想库和最好的大学进行投资,我们认为这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他们都是有影响的地方。”根据基金会1988年的年度报告,当年,基金会共提供了5500万美元的资助,其中大部分用于支持大学项目。^⑨“法律和经济”是欧林的一个长期项目,从60年代最初在芝加哥大学设立该项目以来,30多年来,基金会总共花费了数千万美元在全美的许多著名高校中设立该项目。以“欧林学者基金”(Olin Fellowship)的形式资助知名学者和前政治家是欧林基金会资助活动的另一大特色,在它的资助名单上有:《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的作者阿兰·布鲁姆,布鲁姆作为芝加哥大学“约翰·欧林民主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心”(John M. Olin Center for Inquiry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mocracy)主任,共接受360万美元的捐助;欧文·克里斯托,作为纽约大学商业管理

研究生院的欧林特聘教授,得到 37.6 万美元,随后作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欧林学者”在 1992—1994 年间得到的捐助超过 38 万美元;因“水门事件”而名扬全美的前代理司法部长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1994 年作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欧林法律研究主任”得到 162812 美元;前面刚刚提到的里根政府的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1993 年在哈得逊学会(Hudson Institute)时得到 10 万美元;年轻一代保守主义者中的明星迪奈什·德苏扎(Dinesh D'Souza),1993 年作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欧林研究学者”得到 10 万美元。^②

这些保守主义基金会的管理人员和后台老板、思想库和其他政策机构的管理者们几乎全是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非常坚决,尽管他们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像科赫家族基金会的老板戴维·科赫和查尔斯·科赫(David and Charles Koch),这兄弟俩的企业是美国第二大私人拥有的公司,两人都对自由至上主义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所控制的三家基金会一直大力支持宣扬自由至上主义的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寻求正确经济公民联盟(Citizens for a Sound Economy)。从 1986 年到 1990 年,科赫家族基金会给予这两个思想库的总捐助分别为 650 万和 480 万美元。和欧林基金会、斯基菲家族基金会、布雷德利基金会不同,科赫家族基金会只关心自由市场哲学。戴维·科赫说:“我的全部观念就是使政府作用最小化、使私营经济作用和个人自由最大化。”某些基金会的老板甚至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像库尔斯家族就以其极端敌视少数族裔、妇女和劳工而闻名全美。据报道,1984 年,库尔斯家族的一名成员威廉·库尔斯(William Coors)在科罗拉多丹佛市对少数族裔企业家群体——其中大多数人是黑人——说:“他们(奴隶贩子)为你们所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用锁

链把你们的祖先弄到这儿。”他还说,津巴布韦经济落后就是因为黑人缺乏思考能力。^④

这些较为意识形态化的保守主义者不仅仇视自由派,也不喜欢像尼克松、老布什这样的共和党温和派政治家;不过,对于大公司保守派的讲求实际的保守主义,他们或许颇有微词。但是,大公司保守主义毕竟控制着巨大的经济资源,而且与之合作互惠互利。

传统基金会的创办极为明显地体现了讲求实际的保守主义和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区别。70年代初期,国会山上的一些共和党强硬保守派及其助手——他们自认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以示与尼克松那样的“实用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不同——认为,通过众议院这一正式渠道或在共和党内的领导地位已不能促进真正的保守主义政治议程。同时,尼克松采取的政策特别是像家庭援助计划(Family Assistance Plan)和《儿童发展法案》(Child Development Act)这样的社会政策议程,在他们看来,这表明尼克松已经不再坚持保守主义原则了。因此,他们希望能找到一条影响政策的另类途径。当时,美国企业研究所虽颇受尼克松政府的青睐,但“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们”认为不能委以它宣扬“真正的保守主义”的重任。在他们看来,美国企业研究所过于追求学术,而它在追求“学术声誉”的过程中,已经越发趋于中间立场了。所以,他们委派保罗·韦里奇——此君是新右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是来自科罗拉多的共和党参议员格登·阿洛特(Gordon Allott)的助手——和其朋友爱德温·富尔纳(Edwin Feulner)——当时是来自伊利诺斯的共和党众议员菲利普·克兰(Phillip R. Crane)的助手——负责筹办一家新的政策研究机构,既能为他们在国会中的活动提供建议,又能影响政策辩论。最初(1971—1972),韦里奇和富尔纳策划建立了附

属于共和党的共和党研究会 (Republic Study Committee); 但很快, 通过观察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有影响的思想库, 他们认识到, 私立研究机构比与政党或政府有联系的组织具有更高的思想权威。因此, 他们决定建立一个类似的思想库, 既能产出自己的政策建议, 还能塑造公共舆论。在韦里奇和富尔纳的领导下, 共和党研究会的职员四出奔走, 寻求资金支持。随着库尔斯基基金会 25 万美元的捐助到位, 传统基金会开张。很快, 斯基菲家族基金会 (第一笔捐助是 90 万美元)、欧林基金会等加入了长期支持者的行列。^② 自成立至今, 传统基金会对自己的定位一直十分明确, 那就是“推销保守主义的政策”。它似乎不屑于像美国企业研究所那样去搞什么劳什子学术, 做思想创新的工作, 它自认为是“思想的商贩”, 用其总裁富尔纳自己的话说, 传统基金会是“观念的二道贩子”。^③

正因如此, 他们想要宣扬的意识形态信条既不复杂, 也不新鲜。托德·林德伯格 (Tod Lindberg) 1999 年在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喉舌之一《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 上的寥寥数语说得很清楚。林德伯格写道, 经过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十多年的努力, 现代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不仅已经成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还在思想的战斗中击败了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现在, “这个酝酿思想的时期结束了。” 今天, 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公认:

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大体上知道重要问题是什么, 也知道问题的答案。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弄清楚, 但轮廓是清楚的。保守主义的主张是推崇个人而非集体, 赞同清楚明白的评判标准而非相对主义, 强调个人责任而非巨大社会力量的互动, 偏爱市场而非政府的经济干预, 肯定国际实力和自我依赖而非空洞的安全许诺。总的来说, 联邦政府过大,

从富人那里征税太多,做了许多不必要的、常常是起反作用的事情,因而妨碍了经济增长,更不用说个人自由了。即使在沉溺于这些无聊的工作之时,联邦政府也因在冷战成功结束后匆忙裁军而忽视了美国人的安全。同时,走下坡路的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也没有复苏的迹象。^④

很明显,这些主张一点都不新鲜。不过,7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运动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倒颇有点老调新唱的味道,一反传统保守主义“回头看”的阴郁色彩和一味批评的消极姿态,为传统保守主义添加了“向前看”的一抹亮色。这方面,当为新保守主义者记上一功。1995年,欧文·克里斯托在《公共利益》上撰文回顾1945—1995年美国保守主义发展的3个阶段。他说,或许是因为新保守主义脱胎于自由主义之故,与传统保守主义相比,新保守主义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政治色调是“向前看的”,乐观、积极向上、对未来抱有希望。在克里斯托看来,新保守主义对保守主义运动的这方面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思想上,还影响到实际政治:新保守主义希望共和党终止在政治上的防御态势,要向前看而非一味回到过去,要积极地促进自己的意识形态议程;建议共和党应该更为“意识形态化”,旗帜鲜明地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大旗,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⑤

与“向前看”密切相关,当代保守主义再非仅仅建立在批评的基础之上,用迈克尔·霍洛维茨在80年代中期的话说,“为保守主义信念缔造道德和思想基础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意味着“保守主义要有它自己的设想(vision),不能仅仅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也就是说,保守主义要想占据思想市场,就不能听起来只是像富有的老白人那里一个劲地说“不”,而要像自由主义那样,勾画一个更好的未来。1980年,由保守主义思想库

网络资助出版的、乔治·基尔德(George Gilder)所著的《财富与贫困》(*Wealth and Poverty*),可算保守主义运动世界观的转折点。他在书中提倡的是保守主义的长期奋斗目标——减税,不过他并非采用传统的消极方式(“把你的手从我的口袋中拿开”)。他说,资本主义并非像斯密所说的那样,自私的个人在追求个人私利时,也将促进整个社会的福祉;资本主义是一个宽宏大量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每一个人都想让其他人最好,因为毕竟除非其他人有能力购买,某人才能靠出售他的产品而发达。而减税将激发这种利他主义的爆发。无论他的观点对错与否,他都发现了一整套适于兜售的全新语汇,能让人看到光明的前景而非一片阴沉。在获得了积极的设想后,保守主义变得温暖了。因此,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可以骄傲地宣称,只要击败激进主义,拒斥自由主义,在政策领域贯彻保守主义观念,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²⁸

为了在政策领域贯彻保守主义观念,保守主义基金会遵照鲍威尔“缔造一场运动”的长期计划,资助并建立了一个由思想库、倡议组织、出版物和其他政治团体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的触角还伸展到媒体、院外游说集团和其他领域。现在,经过30年的努力之后,它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包括500家组织在内的意识形态基础设施。

四、保守主义迷宫的结构

(一) 基金会及其资助战略

尽管从规模上来说,保守主义基金会远不及那些大的持中

间立场的或较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基金会,像其中最大者布莱德利基金会 90 年代的总资产仅为 4 亿多美元。1997 年 7 月,专门监督慈善事业活动的民间组织“有同情心的慈善事业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以下简称 NCRP)在发布的特别报告《推动公共政策议程:保守主义基金会的战略慈善活动》中,报道了该组织对 12 家保守主义基金会——布莱德利基金会、欧林基金会、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迦太基基金会和萨拉·斯基菲基金会(迦太基基金会和萨拉·斯基菲基金会皆为斯基菲家族所有)、厄尔哈特基金会(Earhart Foundation)、科赫和兰波慈善基金会(Charles G. Koch, David H. Koch and Claude R. Lambe charitable foundations,科赫家族基金会的一支)、菲利普·麦肯纳基金会(Phillip M. McKenna Foundation)、J. M. 基金会(J. M. Foundation)和亨利·萨拉维托利基金会(Henry Salvatori Foundation)——1992—1994 年活动的调查结果。报告发现,这 12 家保守主义基金会控制的总资产为 11 亿美元,捐款为 3 亿美元。^②而约翰·麦克阿瑟和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1992 年的资产为 29 亿美元,更不用说像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了。就数量而言,在保守主义运动中十分活跃的基金会屈指可数,资产在 1000 万美元以上的就更少了。

但是,保守主义基金会在美国政治辩论和公共政策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主流基金会。其根本原因有二。

其一,资助的数量和集中程度。在保守主义政策机构和政治组织所接受的捐赠中,超过 100 万美元的资助是很常见的,但在自由派政治团体中是很少见的。NCRP97 年的报告发现,1992—1994 年间,12 家保守主义基金会把他们全部捐款的 2/3

约为2.1亿美元捐赠给鼓吹如下政策议程的组织和项目：将政府服务私有化，反对联邦的反贫困开支、工业管制，将社会福利的责任转交给州和地方政府以及慈善部门；资助的重点放在主要关注全国政策和在全国有影响的思想库和倡议团体，资助的集中程度极高，75%的捐助给予了18%的受让人；1995年，得到资助最多的5家保守主义多议题公共政策机构的总收入为7700万美元，而8家左翼多议题公共政策机构的总收入仅为1860万美元。^⑧而在主流的持中间立场的基金会和支持与同情自由派的基金会的全部资助项目中，对思想库和政策倡议机构的资助只占极小的比重，它们的资助主要给予学术研究项目如治疗艾滋病的研究，美国本土的共同体发展项目和不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教育和科技事业等。

其二，保守主义基金会的资助带有十分突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目标就是要促进高度政治化的议程。1995年，科赫和兰波慈善基金会的总裁理查德·芬克(Richard Fink)在慈善圆桌会议年度会议的发言中，利用市场比喻来概括基金会如何对公共政策施加最大的影响：“像卖洗衣粉那样兜售政治意识形态。”他说，观念转化为行动需要发展思想原材料、把思想原材料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产品、向公民消费者兜售和散播这些产品。捐助者要参与整个生产流程，资助学者和大学的项目——因为他(它)们提出社会转变的思想框架，资助思想库——把学术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建议，资助执行团体(implementation groups)——他们把建议带到政治市场并最终带给消费者。用一个基金会理事的话说，他们知道政府的政策是以经过“一传送带输送来的思想家、学术界人士和活动家”的信息为基础的，并针对这一状况提供资助。他们支持传送带上每一站点的工作：包装和重新包装保守主义议题立场的全国性保守主义思想

库以及州和地方一级的思想库,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和塑造全国媒体报道情况的全国性政治团体,在各州做同样工作的州一级团体,在地方活动的草根组织,报道、阐释和放大这些活动的全国性和州媒体,记录这些活动历史和推动议题思想疆界的学者,组成新一代学者和未来运动领导层的大学毕业生,大学校园内的报纸——塑造了美国下一代政治领导人政治意识形成的环境。结果是右翼在许多议题上观点的放大,尽管资助的接受者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完全与基金会步伐一致,但是接受者们把同样的议题传送到他们各自的受众那里,从而使多年以前即已被主流贬斥或抛弃的许多政策观念在公共辩论中依然活跃。反过来,这对于右派正在进行的重塑美国社会的努力具有极大的价值。⁹⁹

保守主义基金会的钱并不是白给的,接受其捐助的机构与组织必须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支持与这些意识形态相符的政策主张,否则就难免会受到惩罚。80年代初期,传统基金会委托一位前陆军上校乔治·库恩(George W. S. Kuhn)进行军事改革方面的研究。库恩写了一份名为“结束防御停滞”(Ending Defense Stagnation)的研究报告,作为传统基金会的年度出版物《议程83》的一章出版。库恩的报告指明了那些不能使用的武器的名称和完全多余的军事指挥位置,得出的结论是“增加开支并不能买来军事力量的加强”。传统基金会的管理层最初对库恩的研究十分热情,以极快的速度出版,并将副本送往白宫,安排了无数次媒体报道。但没想到,国防部长加斯帕·温伯格(Casper Weinberger)看到之后十分愤怒,海军部长莱赫曼奉命向传统基金会施压。莱赫曼写信给传统基金会的长期支持者库尔斯基金会的老板库尔斯,库尔斯然后打电话给传统基金会总裁富尔纳。很快,公开宣传库恩研究的活动突然全部停止,库恩

被冷落一段时间后被解雇,关于他研究的所有材料从传统基金会的文献中消失了。80年代另一个因为“不识抬举”而被思想库解雇的分析专家是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乔纳森·斯坦(Jonathan Stein),他在出版了一本严厉批评星球大战计划的书几个月后,被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解雇,因为对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不仅会为该机构带来几百万美元,星球大战计划还是保守主义运动所雇用的专家们提出的。^⑨因为研究不合保守主义基金会管理层口味而受到惩罚的不仅限于个人,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旗舰美国企业研究所亦曾因此受难。平心而论,90年代以前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尽管也宣扬保守主义的政策和思想,但是,它仍追求学术声誉,希望能够像布鲁金斯学会那样受人尊重。80年代中期,有些保守主义基金会认为,美国企业研究所在追求学术上已经走得太远,它的研究方向已经趋于中间,因此决定给它“断奶”。1986年,欧林和史密斯·理查森两家基金会取消对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所有资助,致使美国企业研究所陷入财政危机当中,总裁小威廉·巴鲁迪(William Baroody, Jr.)被迫辞职。^⑩主流基金会在这方面与保守主义基金会也不一样,它们即使在资助思想库和倡议组织时,仍倾向于纯学术研究,且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要求。

保守主义基金会资金的主要流向是:1. 保守主义学术项目、培训下一代保守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改变大学的课程设置;2. 建立并加强全国性的思想库和倡议组织的基础设施,主要资助关注国内政策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外交政策和全球事务的机构;3. 资助媒体;4. 资助保守主义的亲市场的律师行和其他与法律有关的计划和组织,支持地方和州一级的思想库和倡议团体网络;5. 改变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资助宗教和慈善事业领导人的活动。^⑪

(二) 占领制高点和争取美国的未来:大学和教育机构^①

为了在争取美国未来的战斗中获得持久胜利,右翼基金会深知,他们不仅必须控制现在的公共辩论,还必须促进下一代保守主义学者、记者、政府雇员、立法者和活动家的成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四姐妹”等基金会向保守主义的大学项目、大学教授职位、巡回讲座、右翼学生出版物投入了巨额金钱;建立并支持保守主义教授的网络。1992—1994年,NCRP调查的那12家基金会向大学提供了8890万美元,而它们的资助想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建立并加强支持保守主义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观点的思想体系。他们向学者、学术研究项目、研究机构和公共政策中心捐助了上千万美元,当然,这些学者、学术研究项目、研究机构和公共政策中心的工作必须能够支持和扩展自由市场经济学和有限政府的哲学和理论基础。第二,建立大学教职员、学生、校友和校董事的组织网络以反对和倾覆大学校园内的进步主义课程和进步主义政策趋向。保守主义运动所采取的具体战术是攻击所谓的“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步骤有二:第一步是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在大学校园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左派和自由派已经使学术标准腐化并压制了自由学术研究的空间,然后大力宣扬鼓噪使之成为公众所知;第二步是利用这种批评向大学施压要求大学进行改变,特别是改变大学现行的招生政策、课程设置、教职员的聘用和资金支持政策。1992—1994年间,基金会向145家学术机构、学术项目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捐助分布如下:2300万美元用于开设或扩展具体的学术项目和课程;主要通过法律、经济学、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分析等学科的奖学金将1680万美元用于资助大学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780万美元用于学术改变组织的活动;760万美元建立大学的教授职位和支持

优秀学者;610 万美元支持国内政策研究;570 万美元支持某些研究中心的日常运转;460 万美元支持外交政策研究;330 万美元支持各类会议;310 万美元资助法官培训项目,内容是将经济原则适用于司法决定;210 万美元支持书籍写作和出版。在 8890 万美元中,5130 万美元给了 16 家机构,其中被称为保守主义思想家大本营的芝加哥大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最先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推销给罗斯福及其高级幕僚的)获得的捐助最多,为 1035 万美元;哈佛大学,967 万美元;乔治·梅森大学,855 万美元;耶鲁大学,595 万美元。

“法律和经济学项目。”法律经济学派的建立者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经济学家阿隆·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④他认为,法律只是证明自由放任经济学逻辑的另一种方式。正是在他的鼎力帮助下,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进入芝加哥大学。科斯认为法律规则应当考虑社会成本,而依靠市场可以使社会成本最小化。该学派的另一位学者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则更为激进地宣称:“我憎恨‘正义’,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波斯纳不仅把法律简化为经济学,还简化为一种特定的经济教条,并把这种经济教条奉为普遍真理。按照他们的推理,市场蕴涵着可解答任何法律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只需去辨认看不见的手的意图即可。总的来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经济学派强调“经济效用”和“财富最大化”是司法观念的理论基石。毫无疑问,作为一门学问的“法律经济学”是很有价值的,正像该学派的其他学者如罗斯-艾克曼(Susan Rose-Ackerman)指出的那样,从内在的本质来说,法律经济学既非自由也非保守,它只是提供了一个考察各种法律问题的有用的、重要的分析工具(经济分析)。^⑤虽然以往也存在着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进入法学的情况,但那只是

为了解决具体实践中的问题,而法律经济学学派的理论则会改变法律的整个框架和理论基础。如果说,法律经济学学派的理论极富学术价值的话,那么当他被保守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们用于实践当中时,理论的逻辑立刻在现实的逻辑面前变得无比苍白。

60年代,欧林基金会首先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一个教授席位,目的是教授“自由市场经济学”并将之适用于法律。随后,欧林基金会在其他主要大学建立了同样的项目。80年代以来,斯基菲家族基金会也加入了资助该项目的行列。事实上,在保守主义基金会对学术项目的资助中,该项目的地位十分突出。在1992—1994年用于具体学术项目的2300万美元中,1650万美元用于各大学的“法律和经济学”项目,其中在该项目上获得资助最多的著名大学,有芝加哥大学(330万美元)、哈佛大学(320万美元)、弗吉尼亚大学(230万美元)、耶鲁大学(200万美元)、乔治·梅森大学(140万美元)、康乃尔大学(120万美元)、斯坦福大学(71万美元)。自由派法律组织“正义联盟”(the Alliance of Justice)1993年发布报告认为,保守主义基金会在该项目上的活动正在以更有利于企业和公司利益的方式重塑司法理论和实践。报告称,保守主义基金会帮助了芝加哥大学法律经济学学派理论的制度化,他们的金钱创造了一场“法律和经济学”运动。报告指出,在保守主义捐助者看来,芝加哥学派的反管制倾向有助于创造一种更有利于企业的司法环境。因为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家们“断言法律的根本目标应是通过促进稀缺资源的最有效使用使社会的财富最大化”,政府管制只会干扰资源的自然流向从而不利于“资源在市场上最有价值的利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相信法律应该模仿市场,只寻求最‘有效’的法律结果,即经济收益超过经济成本的法律结果”;因

此,法律并非说明和促进宪法或伦理信条的载体,“法律只是市场的补充:一个使市场解决完美无缺的必要但渺小的工具。”^④如果人们对自由派——毕竟自由派与保守派是对立双方——的批评和指责有所怀疑的话,那么更进一步地考察该项目或许有助于我们对保守主义基金会真实目的的认识。

从表面看,保守主义基金会对该项目的支持主要体现为资助“法律和经济”课程的开设,但是,资助往往是有附带条件的。比如,对乔治·梅森大学该项目的资助中,有一部分是要求该校必须培训联邦法官,承担这一任务的“法律和经济中心”(the Law and Economics Program and Center,1992—1994年间得到140万美元的资助)意在教育法官如何将经济分析原则用于法律,到1991年,该中心已经培训了40%的联邦法官。为了调动联邦法官参加的积极性,中心一般采取在度假胜地举办研究会的形式并提供参加者的所有食宿旅费。^⑤对于基金会的附带条件,并非所有的大学都能接受。1985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接受欧林基金会“法律和经济”项目一年后,拒绝再接受该项目。该项目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具体程序是,向学生提供约翰·欧林奖学金(John M. Olin Fellowships),由同样从该基金会接受捐助的教师加以指导;该项目要求被资助的学生必须参加基金会安排的常设座谈会,座谈会的演讲者通常是由基金会邀请的如罗伯特·博克和安东尼·斯盖利亚(Antonin Scalia)这样的保守派活动家。这使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认为,欧林基金会“在利用学生的经济需要向他们灌输特定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基金会不仅资助这些将发挥长期影响的学术项目,还在1992—1994年间拿出1050万美元支持亲市场的公共利益律师行,对联邦法官的培训研讨会、法学院内、司法界和决策界致力于宣扬保守主义哲学和法律原则的学生和校友

组织。1992—1994年间,保守主义基金会用于法律机构和培训项目的总资助为2700万美元,这其中还不包括资助全国性思想库司法改革项目的部分,如对全国法律辩论影响极大的曼哈顿协会(Manhattan Institute)的“司法研究项目”(Judicial Studies Program)。

很明显,就其实际结果来说,保守主义基金会此类活动是改变美国法律体系特别是取消对公司各种的法律限制和残留的政府管制的一部分,营造一个更有利于企业利益的法律环境。照顾企业利益并没有错,但是当它损害到社会其他大多数群体的利益时,人们必须要警惕从一个极端——过多的管制伤害个人和企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走到另一个极端——自由市场至上即公司利益至上。不过,保守主义的此类活动仍在继续,而且已经有了实际效果。一家民间组织200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保守主义基金会以“教育”为名拉拢法官的活动已经奏效,特别在环境保护领域。^⑧

招募和培养学校中的年轻人。资助学生在公共政策分析、经济学和政府学方面的培训,1992—1994年间以奖学金形式在这方面的开支近1700万美元。对乔治·梅森大学的资助可算保守主义基金会此类活动的典范,该校位于华盛顿特区,便于接近决策者。正因如此,该校能在1992—1994年间获得855万美元的资助,在所有接受捐助的高校中名列第三,超过了像耶鲁、麻省理工和斯坦福这样的名校。该校的人文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1992—1994年间获得300万美元的捐助)和市场过程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Market Processes,1992—1994年间获得210万美元的捐助),主要负责向年轻的保守主义者提供培训以便他们今后参与公共政策工作,前者为学生举办关于自由市场经济学和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暑期免费研讨班,向

愿意继续进行研究的学生提供最高达 17500 美元的奖学金；后者同样提供有奖学金的夏季培训项目，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参加为期两周的市场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思想”培训和为期八周的实习生安置计划（主要安置在保守主义政策机构内，因为大多数著名的思想库也在华盛顿）。此外，市场过程研究中心还有一个专门培训国会资深职员的项目。

教员组织。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拉道夫·理查森(R. Randolph Richardson)在 1984 年散发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讨论了如何改变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界的“自由主义倾向”，他指出有两大可行的战略：“威胁性的活力主义”(deterrence activism)和“高端鼓噪”(high ground articulation)。他认为，“威胁性的活力主义”是一种老套的做法，也是保守主义者正在使用的战略，就是对左翼议程作出反应，至多也不过是大吵大闹以引起媒体注意的一种形式。因此，他倡议采用“高端鼓噪”，通过新闻网络、学生刊物等提出系统且全面批判左翼趋势的观念、呼吁需要学术和思想的严格标准。大方针既定，接下来就是遵照执行。1992—1994 年间，保守主义基金会投入近 800 万美元用于支持教职员的组织网络、保守主义的学术评估机构和保守主义学生出版物和其他组织，目标是“逆转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向非传统学者和学生开放的趋势”，努力活动以赶走和取消他们所认为的过于敌视自由市场或过于批评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和历史的学者和学术项目。执行这一使命的主要组织包括号称拥有 6 万成员的校际研究协会(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全国学者联谊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麦迪逊教育事务中心(the Madison Center for Educational Affairs)，其中全国学者联谊会还建立了右翼学生出版物的“学院网络”(Collegiate Network)，旗下有 66 家校园学生报纸和刊物。(由于在保守主义运

动的此类活动中,新保守主义者堪称马前卒,所以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将在下一章中介绍。)

正是凭借以上活动,保守主义基金会“通过战略性地使用其资源,……富有技巧地策划了必将在全国政策辩论中发挥巨大影响的右翼知识分子的壮大”。^⑨

(三) 全国性思想库和倡议团体

最近 30 多年来,保守主义思想库的迅猛发展颇为引人注目,更惹人注意的是它们在美国政治和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之大。里根上台后,一位白宫官员说:“没有美国企业研究所,里根不可能当选。(因为)美国企业研究所使保守主义在思想上为人尊重。”^⑩同样,在 1994 年共和党中期选举胜利的背后,保守主义思想库提供了大多数思想“火力”,像传统基金会就为《与美国订约》的写作作出了极大贡献。2003 年 2 月 26 日,小布什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对外政策演讲,强调必须推翻萨达姆政权时说,美国企业研究所是“我们国家一些最好思想家”的家园,他们“做的工作如此之棒以致本政府也从这里借用了 20 个人”。^⑪如果说,美国企业研究所是小布什政府“人力资源部”的话,传统基金会可以称为小布什政府的“宣传部”。在现在几十家最大的保守主义思想库当中,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凯托研究所等一些机构仍能保留一些学术研究的色彩,而传统基金会则很讨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究气”,自始至终就以“宣传鼓动”为己任,完全服从于保守主义运动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1985 年以来,传统基金会从那些大的保守主义基金会获得的捐助总额在保守主义思想库群体中一支独秀,高达 4200 万美元,而“老大哥”美国企业研究所得到的捐助总额为 3000 万美元。在传统基金会的历史上,颇有一些让它极为得意

也大力倡扬的事情。像 1980 年的《领导人的职责》，这部长达 1093 页的政策建议书，在里根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发给每个内阁员一份。根据基金会自己的说法，在里根执政的第一年，建议书提出的 2000 条建议中的 60% 成为具体政策，包括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计划。另一桩让传统基金会颇为得意的事情是 1995 年，在新国会开会的前 100 天中，传统基金会的分析专家参加了 100 次的国会听证会；新国会开会的第一天，制订了 15 项新规则，其中 13 条是传统基金会的建议。^④

尽管保守主义思想库在诸多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它们的大方向特别是国内政策上的大方向是一样的：使公共领域私有化，将市场提升为社会仲裁和资源配置的最主要机制，使它们所认为的“美国信念”成为主导。它们推动社会保障 (Social Security) 和老人医疗保险的私有化，放宽对工作间安全的法律限制，削弱工人组织权利的法律规定，取消环境安全和消费者安全的管制，削弱非赢利组织参与公共政策辩论和倡议的能力，使公共教育体系私有化，在其他无数领域削减政府的职责范围、规模和开支 (除军事以外)，提倡减少税收，攻击肯定性行动和“多元文化主义”。传统基金会去年年度报告对自己使命的描述或可作为代表：

(我们的)使命是构划并促进以自由企业、有限政府、个人自由、传统美国价值观念和强大国防诸原则为基础的保守主义的公共政策。基金会职员通过对关键政策问题适时且准确的研究并将发现有效地推销给我们的主要受众：国会议院、国会的关键工作人员、行政部门的决策者、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学术和政策圈子来履行这一使命。^⑤

对于保守主义运动的推动而言,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的突出作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所有大的保守主义思想库都接受同一批保守主义基金会的支持。雄厚的资金、保守主义迷宫中其他单位的支持、极为老练的推销技术和与共和党的联盟关系都使得保守派思想库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自由派思想库。

资金。NCRP1997年的调查发现,12家保守主义基金会在支持全国性思想库方面的开支近8000万美元,其中6400万美元给了那些主要关心塑造国内政策的多议题政策机构,1520万美元给了关心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研究与倡议组织,获赠最多的5家机构——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自由研究和教育基金、凯托研究所和争取正确经济公民联盟各得到2870万美元。NCRP1999年对20家最大的保守主义思想库的研究发现,这20家机构1996年的开支是1.581亿美元,而当年共和党为竞选筹集到的“软钱”为1.38亿美元,比这些机构的开支少了2000万美元。与1992年相比,保守主义思想库的开支增长极快,在四年内,许多组织的年度预算都翻了一倍。5家最大的、最有名的政策机构(传统基金会、胡佛中心、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和自由国会研究和教育基金会)的开支占总开支的一半。90年代,保守主义思想库的资金来源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在90年代后期以前,许多思想库的生存和维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保守主义基金会的支持,像致力于“加强国内和外交政策问题上公共辩论中犹太-基督教道德传统”的道德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60%以上的收入来自“四姐妹”。即使一些大的思想库也是如此,像凯托研究所1990年预算320万美元中的175万美元(超过50%)来自科赫家族基金会。不过,到90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NCRP1999年的调

调查发现,大多数机构资金的2/3来自于个人和公司捐助者。这既与这些机构已经建立起有效的资金筹集部门有关(事实上,90年代保守主义思想库的组织形态越来越像政党,建立了资金筹集部门、院外游说部门、政策分析和发展部门、公共关系部门、草根动员或发展选民部门),也可能与保守主义基金会在慈善事业领域的活动有关。从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开始,保守主义基金会在慈善事业领域活动的专门组织有两个:资本研究中心(the Capital Research Center)和慈善圆桌会议(Philanthropy Roundtable)。慈善圆桌会议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保守主义基金会的资助活动;资本研究中心的目标是吸引和召集公司捐助者捐助保守主义事业,“揭露”和攻击自由主义和中间派的非营利慈善机构。当然,问题可能还在于保守主义思想库倡议的政策总是对富人有利,像传统基金会这样的右翼思想库总能比自由派思想库筹到更多的钱与共和党候选人总能比民主党候选人筹到更多的钱是同样的原因:因为公司和富有的个人首先关心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资金来源的多样化都说明了保守主义基金会的更加强大。与财力雄厚的保守主义基金会相比,自由派基金会的开支和收入都少得可怜。一家自由派思想库90年代初进行的调查显示,华盛顿4家最大的进步主义思想库(政策选择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协会、预算和政策优先次序研究中心、经济政策学会)的年度预算加起来为1020万美元,而4家保守主义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立法机构交流委员会、凯托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的年度预算加起来是4590万美元,是前者的4倍多。1996年,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的年收入分别为1650万美元和2870万美元,而政策研究协会当年的收入仅为65.4万美元(传统基金会的2.3%)。^④

观念推销。要想让公众接受你的看法,首先必须让他们知

道你的看法是什么,而要做到这一点,主要的渠道是媒体。保守主义基金会十分理解媒体时代兜售的重要性。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前总裁老巴鲁迪(William Baroody)说过:“我对兜售并无顾忌。……我们就像注意产品的内容那样注意产品的分发。”1989年《政策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说了相同的意思:“让你的信息正确很容易,(但)真正的考验是散播你的信息。……每天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包含六个方面的兜售。兜售你的政策建议,兜售政策建议背后的原则和价值观念,兜售你机构发行的出版物和发生的事情。兜售思想库观念本身,然后兜售你自己的机构,永远不要停止兜售你自己和其他能象征机构的关键个人。”^⑧在观念的兜售方面,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无疑做得最出色,也最有名。如果说,美国企业研究所在兜售时尚能注意内容的话,传统基金会更为注重形式和手段。80年代之前,在传统基金会尚被主流媒体视为疯人聚集之地时,它聪明地采用了“迂回”战术。前资深副总裁伯顿·帕恩斯(Burton Yale Pines)在80年代中期告诉记者说:“在主要媒体忽视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全国有1600份日报和周报。从统计学的角度说,大多数人并不从大媒体获知新闻,而是从小报纸。”因此,基金会开始向那些小报寄送他们研究的副本,而且刻意以很容易为记者和编辑阅读的行文方式和格式制造副本。基金会发现,他们寄出的每项研究会带来200到500篇新闻报道,基金会然后为每一篇报道制作一个简本送给该报所在区域的国会议员。时移事易,现在的传统基金会显已今非昔比,在2002年的年度报告中,传统基金会自己列举了2001年媒体对它的报道:在电视网上出境180次,868次广播访谈,C_SPAN上26次电视讲座,在报刊上发表了1217篇表达观点的文章,其出版物和旗下学者的观点主张在143家报业辛迪加的专栏和520篇社论中被引

用。^④几乎所有的保守主义思想库都积极与媒体建立并保持良好关系,像胡佛中心的公共事务办公室十分活跃,与全美 900 家媒体中心和 450 家国外媒体建立了联系。从 70 年代保守主义的组织网络开始建立时起,保守主义者就一直在谴责媒体的左倾倾向,说左派和自由派把持了媒体,但是 90 年代以来主流媒体对右翼思想库的关注程度远超过对自由派思想库的关注。迈克尔·多勒尼(Michael Dolny)以 1995 年对主要报纸、广播电视节目抄本的研究为基础,发现,保守主义机构被主流媒体引用或提及的次数近 8000 次,而自由派思想库被引用的次数仅为 1152 次。^⑤除了通过主流媒体来推销自己和政策观念以外,保守主义思想库还可以利用由保守主义基金会支持建立起来的右翼媒体网络。

思想库进行观念推销的渠道并不局限于媒体,影响立法机构的成员也是重要一环。传统基金会的办公地点在国会山上,这使它能方便地与国会议员的助手和国会的职员建立日常联系,而这些人在未来必将占据重要位置。传统基金会每天都举办提供免费食品的活动,每两周举办一次名为“第三代讲座”(the Third Generation Lectures)的会议,这些活动每次都吸引数百名国会职员。在向立法机构成员推销观念方面,位于伊利诺斯的一家州思想库哈特兰学会(The Heartland Institute)做得更是出色。该机构出版一份名为《思想弹药》(*Intellectual Ammunition*),内容主要是全国大多数保守主义思想库和倡议组织的政策声明和立场报告的浓缩,免费提供给伊利诺斯、密歇根、俄亥俄、威斯康星的所有州立法机构成员和 1200 家媒体中心。该机构 1996 年大胆创新,采用传真的方式(他们自己称之为 Policy-Fax)免费向提出请求的州立法机构成员和媒体发送任何他们能提供的材料,所包含的内容极广,从犯罪到经济到福利;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提供服务。伊利诺斯的一位州参议员对此大加赞赏：“PolicyFax 是一项革命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服务，它能使你通过传真收到来自全国 100 家以上最主要思想库、出版物和贸易协会的成千上万份材料的全文。”^⑧

尽管上述推销并不一定会让接受者接受他们的观念，但是正像传统基金会前公共关系主管赫伯·伯克维茨 (Herb Berkowitz) 所说的那样：“(被人们)感觉到有影响就是影响 (perceptions of influence are influence)。”^⑨

“人就是政策。”“People Are Policy”不仅是传统基金会最钟爱的一句话，也被所有思想库奉为至理名言。对于保守主义思想库来说，这句话包含 3 个含义：第一，招揽贤才名人。新保守主义者在与民主党彻底决裂后，保守主义思想库立马行动起来，“收编”这些前自由派。珍妮·柯派翠克 (Jeane Kirkpatrick) 可能要算 80 年代保守主义思想库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了。1979 年，她在《评论》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独裁和双重标准”不仅为她赢得了里根的注意 (从而获得驻联合国大使的任命)，还立马成为众多大保守主义思想库的“宠儿” (当时她已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人)。一时之间，各大保守派思想库如传统基金会、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道德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胡佛中心等都把她的名字和照片放在显眼位置。第二，为保守主义运动培养新一代“职业专家学者”。在这方面，传统基金会同样是最出色的。在负责“研究”的前副总裁帕恩斯眼中，他手下的人必须是专家，但不是布鲁金斯学会或城市研究所中工作的“学究”；帕恩斯的要求是传统基金会的“专家”要熟悉他所从事领域的一般学术文献和政策辩论，然后，“专家”要运用他的“专业知识”发动和参与“辩论”。帕恩斯说：“他们是鼓吹者。……我们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参加的不是一个学术组织，而是一个致力于某

种信念的组织。”帕恩斯形象地把传统基金会的专家称为“保守主义决策的突击部队或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的先头部队”，而胡佛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更像是“从远距离打击敌人的重炮兵”。^⑨80年代，传统基金会还大胆起用像迪奈什·德苏扎这样的20多岁的年轻人，让他们去为参议员做情况简介或代表传统基金会的立场去国会作证。

当然，“人就是政策”最重要的体现或许就在本机构的成员能够获得政府职位尤其是高层职位上，因为政府职位是影响政策制定最直接的途径。对于在思想库中工作的大多数“专家学者”来说，如果一辈子没能在某届政府中弄个官做做，这一生恐怕不算完美。里根和小布什政府显然是最能让他们中的某些人满意的了，里根的第一届任期内，许多高层官员都来自保守主义基金会，50人来自胡佛，36人来自传统基金会，34人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18人来自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现在的小布什政府亦不逊色。^⑩

（四）州和地方的思想库、媒体

80年代以来，由于里根政府将更多的权力和职责从联邦政府转交给州政府，州和地方的保守主义思想库发展迅猛。NCRP199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那时州和地方的保守主义思想库已在100家以上。这些思想库几乎全是仿照传统基金会建立起来的，他们的活动和目标也是传统基金会的翻版。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哈里斯堡的Commonwealth Foundation for Public Policy Alternatives的总裁说：“除非我们能在州立法机构内宣战，我们不会在全国拥有力量。”^⑪作战的对象自然是他们所认为的“自由主义”及其造成的一切“邪恶”：肯定性行动、社会福利、“社会道德沦丧”、“高等教育的腐败堕落”等；同时竭力以保守

主义的安排取而代之:将一切能私有化的都私有化,削减税收,“重新肯定被自由派抛弃的以机会均等和爱国为核心的美国信念”等。各机构并非单兵作战,而是通过广泛的支持和传播网络互相之间以及全国性思想库和保守主义迷宫的其他单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9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新动向就是全国性思想库向州和地方的发展,这方面的先行者是保罗·韦里奇在1973年建立的美国立法机构交流委员会(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简称ALEC)。该机构的主要活动是在州一级进行的,主要任务是为州立法机构中的保守派提供政策服务。它1992年的《财政报告》说,它的使命“就是在每个州的首府和全国的公共政策辩论中获胜”。《财政报告》称它的成员自1988年以来翻了一倍,1991是2500人,其中州立法机构成员为2400人,接近美国州立法机构成员总数(美国州立法机构成员总数为7500人)的1/3;其余为“私营部门成员”,而每一个加入的“私营部门成员”需付出为数不少的费用。该组织自称,它每月收到700项研究请求,建立了15个涉及所有政策议题的由立法机构成员和私营部门人员组成的专门小组。ALEC每年提出150件“原型议案”(model legislation):以这些模型为基础的672个议案被拿到全国各州的立法机构中讨论,其中92个成为法律。正是由于它在州立法机构内拥有的巨大影响,ALEC的资金主要来自个人和公司捐助,但保守主义基金会同样给予该组织以慷慨的支持,1994年主要的基金会捐助者包括:布雷德利基金会、欧林基金会、JM基金会和安利盖尼基金会。^⑤其他全国性思想库影响州和地方政策走的是结网的路子,1994年,传统基金会建立了一个由60个州级公共政策机构组成的群体,另一个组织网络“麦迪逊集团”(Madison Group networks)拥有相近数目的公共政策及其他组织。尽管到目前

为止,我们并不清楚保守主义基金会对州和地方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捐款总数(NCRP1997 所调查的 12 家保守主义基金会在 1992—1994 年间,向部分州和地方保守主义思想库捐款 900 万美元)和具体情况,但是从一些记者和州草根组织发布的零星调查来看,几乎所有的州和地方保守主义思想库与保守主义基金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像在威斯康星州推动社会福利和公共教育改革、鼓吹实行“教育代用券”的主力威斯康星政策研究中心(The Wisconsi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仅在 1992—1994 年间就从布雷德利基金会获得的捐助为 290 万美元。^⑧

为了帮助政治保守派塑造公众和精英舆论,保守主义战略活动家还完全依照《鲍威尔备忘录》中的指示进行“媒体”活动。根据 NCRP1997 年的调查,保守主义基金会在 1992—1994 年间在这方面花费 1860 万美元。活动的主要方式有二:一是资助保守派控制的媒体,二是培养右翼媒体批评家向主流媒体施压以传达右派的政治、政策议程。在前一方面,接受捐助的媒体和刊物主要有由韦里奇的自由国会基金(Free Congress Foundation)创办的有线电视网络——National Empowerment Television(1993 年,斯基菲家族基金会捐助 30 万美元),专门攻击保守派敌人的《美国旁观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 1992—1994 年间得到保守主义基金会的捐助为 170 万美元),1981 年在欧林、斯基菲家族等基金会的帮助下创办的新保守主义艺术评论刊物《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 1992—1993 年从欧林、斯基菲家族和布雷德利基金会获得的捐助为 100 万美元),欧文·克里斯托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杂志(1992—1994 年间,从 12 家保守主义基金会获得捐助 190 万美元),《评论》(1992—1994 年间,从 12 家保守主义基金会获得捐助 100 万美元)。在刊物所得捐助上,自由派刊物和保守派刊物的差距极大。正是雄厚的

资金支持使得保守主义刊物可以一心进行他们的重要使命：加强对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的影响。比如，足够的资金使得他们可以向国会的关键职员赠送每一期杂志，向公众和大学的图书馆免费或折价提供杂志，杂志的工作人员有充分的时间与主流媒体的编辑、脱口秀的主持人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人建立关系。而自由派刊物的工作人员尽管也想影响公共辩论，但他们必须在杂志的生存问题上投入更多的精力。除了资助保守主义杂志、电视节目和向学生报纸提供资金之外，保守主义基金会还支持攻击公共电视 PBS，1992—1994 年间用于此一方面的费用为 520 万美元。在攻击 PBS 的战斗中，大众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1992 年超过 50% 的预算来自四姐妹）身先士卒。按照它自己的说法，它的使命是：“改变在娱乐业中主导的左倾、反美的精英主义文化，使大学、媒体、主流教会和能发现现代瘟疫的每一个地方中的激进左翼的白痴行为和邪恶暴光。”1988 年，萨拉·斯基菲基金会向其提供 12.5 万美元设立“争取媒体诚实报道委员会”（Committee for Media Integrity）计划，由戴维·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主持，计划的惟一任务就是攻击公共电视。他们对 PBS 的攻击与共和党努力削减国家资助公共广播公司的活动遥相呼应；保守派认为 PBS 的节目过于自由化，有的右翼媒体批评家甚至指责 PBS 的节目是亲共宣传，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将 PBS 私有化。所有这些活动都促成了有助于使右翼议题和观点日益受到尊重的气氛的出现，还使主要媒体受到不断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针对右派的攻击做出调整，如对 PBS 的有组织攻击迫使 PBS 不得不增加保守主义的公共事务节目及其播出时间：像巴克利主持的“火线”（Firing Line）和瓦滕堡主持的“思想库”（Think Tank）节目。⁵⁵

除了支持保守主义的大学项目、相关高等教育机构和组织、全国性思想库、州和地方的思想库和媒体的活动以外,保守主义基金会还支持保守主义的宗教团体和法律组织。NCRP1997年的调查显示,12家保守主义基金会于1992—1994年间花费了1050万美元用于资助一些亲市场的律师行和其他与法律有关的机构的诉讼和公共教育活动,目标是推翻肯定性行动、环境管制、房租控制法律和其他被认为与经济自由、契约或结社自由和私有财产原则不相容的政府项目或法令。1991年成立的正义协会(The Institute for Justice)是一家诉讼团体,该机构在重构公众对肯定性行动的理解和公共辩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80年代早期建立的联邦党人学会(The Federalist Society)是一家力图改变整个法律职业界的组织,依照它1995年的年度报告,它在全国140家法学院中拥有学生成员4900人;有1.5万名律师和法律职业人士成员,有50家分支机构。该机构的律师对现在小布什政府的司法政策和法官人选的挑选影响极大。^⑥

(五) 活动的协调机制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保守主义运动活动协调机制的构成、层次划分、具体情况、建立过程和形式。除了通过热线电话、电子邮件、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参加者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保守主义草根活动家)的年度会议、思想库每年固定的筹款集会、联邦党人学会每月一次在唐人街的午餐聚会、每周三晚上传统基金会举办的“第三代聚会”、泰雷尔周六晚俱乐部(主要保守主义作家和专家在一家法国餐馆每月一次的聚会)^⑦以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会面以外,目前,原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的顾问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主持的周三讨论会在保守主义运动每周议

程的安排上发挥着关键作用。诺奎斯特曾说美国政府是“暴虐和傲慢的”，一个“从人民那里偷了无数钱财”的政权，他说他——他是草根组织全国纳税人联盟的头头——的目标就是“在25年里将政府缩减一半……缩减到能在浴缸里将之淹没的规模”。周三讨论会的参加者有：包括全国枪支协会(NRA)、基督教联盟(the Christian Coalition)等组织代表在内的保守派活动家、传统基金会、公司的院外游说集团、共和党和国会共和党领导层的头面人物、白宫的主要助手、保守主义运动的宣传家。可以信任的右翼记者和编辑有时应邀也参加，但会议的内容是没有记录的。会议使诺奎斯特成为保守主义运动中权势颇大的人物，据说，当小布什政府的一名官员向《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说，他担心政府废除房地产税的计划会伤害慈善事业时，诺奎斯特当众警告他说“这是布什的第一个背叛之举”；当一位名叫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的保守派学者批评众议院一位保守派同道对保守主义事业似乎过于“热心”时，诺奎斯特立刻通知她决定“是和我们站在一起还是反对我们”，此后，再没邀请她参加过周三谈论会。“9.11”之后，诺奎斯特及其组织全国纳税人联盟到处宣扬为企业减税对于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来说是必要的。他们说：“通过削减资本收益税，布什总统和国会将帮助重新振兴放缓了的经济，为华盛顿带来新的收入，而这将对我们的反恐战争有决定性的帮助。”^⑧如果说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和周三讨论会更多地涉及草根和实际行动的话，那么，一年一度的传统基金会资源库(the Resource Bank)年会(始于1978年)则是保守主义运动智囊们的聚会。在1998年4月举行的年会上，代表200多个政策组织的315名保守派领导人与会。这个资源库既是一个信息交流中心，也是战略论坛。^⑨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协调机制，保守主义的各个群体、保

守主义迷宫的各个单位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就正在进行的政治辩论协调了攻防策略,大致地弄清楚了本群体、机构应扮演的角色。

五、案例:打造“明星”和培养下一代

今天在保守主义阵营中和全美都名声远扬的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在1984年之前还是无名之辈,那时的他先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干过一段时间,后到传统基金会做些写写小册子之类的事。在传统基金会期间,或许是帕恩斯教导有方吧,他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安全网和真实的贫困》(*Safety Nets and the Truly Needy*)使他初获声誉,颇为迈克尔·霍洛维茨所赏识。穆雷在那本小册子中,宣称福利加剧了贫困。在霍洛维茨的提携下,他被邀请去参加曼哈顿学会的午宴。在穆雷更详细地介绍了他的观点之后,曼哈顿学会的总裁威廉·汉密特(William Hammett)如获至宝,力邀穆雷加入曼哈顿学会,并决定尽快为穆雷筹集12.5万美元让他写一本书。欧文·克里斯托利用与欧林基金会的关系,请欧林基金会提供了其中的2.5万美元。实际上,穆雷对福利国家的看法与新保守主义者不同,新保守主义者当时的观点还只是要改革福利国家,而穆雷则提倡废除。但是,从克里斯托如此积极地为穆雷筹款来看,保守主义运动的政治需要已经凌驾于他所表达的信仰之上了。1984年,穆雷的手稿《失去的基础》(*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完成后,曼哈顿学会专门筹集了一大笔钱用于宣扬和促销。最初,书出版后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一些主流刊物和媒体甚至不愿对此书发表评论。不过,穆雷和汉密特另有

“绝招”。曼哈顿学会在书出版的3个月内,做了大量让学术界和新闻界更为了解穆雷其人及其书的工作。其中一项活动特别关键,曼哈顿学会花费了10万美元请来美国该领域的20位顶尖学者(既包括保守主义者,也有来自自由派阵营的),专门进行了两天的讨论。然后,又为穆雷安排了多次在电视和广播访谈中露面的活动。接下来几个月中,曼哈顿学会把它手头所有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都用于资助穆雷的“露脸”活动。结果,书是越卖越火,成为80年代的畅销书之一;精装本大概售出3万本左右,对一本大量引用统计数据、主题又如此严肃的书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④

正像乔治·基尔德的《财富与贫困》在里根第一届任期内所发挥的作用一样,穆雷的《失去的基础》为里根第二届任期的政策提供了合法性证明。穆雷的主要攻击对象是“伟大社会”的社会福利项目,他以为“向贫困宣战”是自由派精英从上面强加的,并没有得到“蓝领和白领选民”的同意。更为重要的是反贫困项目导致了贫困,他引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以证明贫困率在1968—1980年间并没有下降。在他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与预想完全相反的结果”,是因为联邦资助的福利项目不可避免地有利于那些“最不守法”、“最没有能力”和“最不负责任”的穷人。为了得到福利,四处乱晃的年轻人不愿对他们的非婚生子女承担责任,拒绝去工作,十几岁的女孩子未婚先孕;黑人青少年中非婚生子女普遍的罪魁祸首就是AFDC项目。美国摇摇欲坠,获得拯救的惟一希望就在于取消“对工作年龄段人们的所有联邦福利和收入支持安排,包括AFDC、医疗援助、食品券、失业保险、津贴住房、残疾保险等等”。穆雷承认,一些心肠较软的美国人包括那些认为自己是保守派的美国人可能认为这种做法过于冷酷;但是,穆雷指出,取消上述福利安排只可

能让大多数穷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因为它将创造一种奖励勤奋工作、惩罚懒惰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福利国家事实上一直妨碍了穷人在自由市场上致富。⁶尽管穆雷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比如他对贫困率的测算并没把商业周期和失业率的因素考虑在内,他的大多数案例研究是以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对虚构的福利夫妇的例子为基础的(但是,在宾州,高福利受益是不常见的),他的数据全是1970年以前的,但这并不妨碍穆雷在一夜之间成为保守派的明星。《失去的基础》在保守主义者中被奉为真理,而所有对该书的批评则被认为是自由派权势集团的必然反应。该书的成功不仅是穆雷本人的成就,也是曼哈顿学会的成就。1984年12月26日,汉密特在一份私人备忘录中向其“老板们”表功般地写道:“过去6个月的事态证明,曼哈顿学会的确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观念舞台上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为我们支持者的评判之故,我们特提供如下摘要。”在简要介绍了穆雷的观点后,汉密特还列举了摘录、分析或评论该书的杂志和报纸。⁷穆雷的成就也引起了保守主义基金会的注意,布雷德利基金会开始向他提供固定的资助:1986—1989年,该基金会给穆雷的年度资助为9万美元,1991年调整为11.3万美元。

如果说《失去的基础》还能让曼哈顿学会为之感到骄傲的话,那么十年后穆雷出版的另一部引起更大轰动的书则让曼哈顿学会鸡犬不宁。1994年,穆雷与哈佛心理学家理查德·赫尔斯坦合作出版了《正态曲线》(*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一书。他们认为贫困并非社会条件或政策的结果,而是某些种族基因低劣的结果。要消除贫困和日渐增加的“下层阶级”的“威胁”,只有取消所有的社会福利项目,代之以胁迫和行为更正的工作项目。目标不是通过让穷

人获得工作和独立使他们真正自强,而是对他们的全面管制,因为根据“科学”理论,他们基本上是不能管理自己生活的劣等人。此书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反对,曼哈顿学会要穆雷离开。但布雷德利基金会支持他,基金会总裁乔伊斯公开赞扬穆雷“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之一”。穆雷离开曼哈顿学会后,到了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雷德利基金会很快就将对他的年度资助提高到16.3万美元。^⑤

迪奈什·德苏扎是保守主义基金会领导人“培养下一代”计划——支持在校期间的学习、让他们进入保守主义的网络和实习生计划、放到思想库并引导他们进入政府高层——的最成功之作。德苏扎是印度人,1978年赴美,进入达特茅斯学院。在学院期间,他创办并主编极端保守的《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 Review*)——第一份隶属麦迪逊教育事务中心“学院网络”的学生报纸。在麦迪逊中心实习生、培训和安置(*placement*)项目的帮助下,他随后进入《前景》(*Prospect*)——一家由保守的普林斯顿校友资助的杂志——的编辑。在他任内,《前景》攻击妇女研究,并在未得到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把一位女大学生的性生活曝光。在出版极右翼宗教组织“道德多数派”领导人杰瑞·法维尔(*Jerry Falwell*)的传记之后,德苏扎成为里根政府的资深国内政策分析家,随后进入美国企业研究所。1991年,他出版《不自由的教育:大学校园内的种族和性政治》(*Illibe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该书成为当年《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他也成为知名人物。欧林基金会向该书的写作和出版提供了部分资助,《国民评论》在书出版后则不遗余力地吹捧。^⑥德苏扎在书中攻击了肯定性行动和“政治正确”的高等教育,他将之称为对“政治正确言辞过度 and 胁迫战术”的批判。1995年,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总结了

他对于肯定性行动的观点。他引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没有肯定性行动,黑人入学率从6%降至不足2%——说:“除非黑人能提高他们自己的水平,能在最高层次上(与他人)竞争,……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才会结束。”解雇合格黑人这样的种族歧视“没有任何经济意义”,因而自由市场将会消灭种族歧视。⁶⁵同年,他出版《种族主义的终结:多种族社会的原则》(*The End of Racism: Principles for a Multiracial Society*)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他说,低收入的黑人基本上是“病态的”(pathological),白人的种族主义根本就不是种族主义,只是对这种病态的合理反应;对于许多白人来说,犯罪的和不负责的黑人下层阶级代表着西方文明中野蛮的复兴。“如果黑人作为一个群体在学校和工作间里能够表现出很好的竞争能力时,……种族主义将失去其实践基础。如果黑人能够缩小文明差距的话,这个国家的种族问题很可能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种族主义才会结束。书中对于美国黑人史的分析,更具“刺激性”。在他看来,蓄奴制根本就不是种族主义制度,只是经济制度,因为有些黑人也有奴隶。而随后的种族隔离只是要保护黑人,“就像保护残疾人那样”,确保他们能获得与他们能力相匹配的发展。该书出版后,两位主要的黑人保守派罗伯特·伍德森(Robert Woodson)和格莱恩·罗利(Glenn Loury)断绝了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联系,因为美国企业研究所支持该书。美国企业研究所在企业界大力推广该书,据说国会山上的共和党议员和职员急切地盼望该书能把肯定性行动的辩论推向“右翼的方向”。⁶⁶德苏扎似乎喜欢在所有“刺激性”的问题上向自由派发起挑战,在批判了“政治正确”、肯定性行动之后,2000年他又出版了《繁荣的美德:在技术丰裕时代发现价值观》(*The Virtue of Prosperity: Finding Values in an Age of Techno-*

Affluence)一书,主要观点是除了避免贫困以外,富人对贫困没有责任。一位左翼批评家在左翼自由派刊物《国民》上指责他说:“就像他过去为种族主义辩解一样,他现在为吝啬哲学代言。”^⑥

① Gregg Easterbrook, “Ideas Move Nations: How conservative think tanks have helped to transform the terms of political debate”, *The Atlantic Monthly*, 257/1 (January, 1986).

② 关于新右派和新宗教右派,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作更详细的介绍,可参考刘绪贻、胡金平:《美国新右派初探》,《美国研究》,1988年第4期; Jerome L. Himmelstein, *To the Ri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79—94; Robert C. Liebman and Robert Wuthnow, ed., *The New Christian Right: Mobiliza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Alding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③ Sally Covington, *Moving a Public Policy Agenda: the Strategic Philanthropy of Conservative Foundations*,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 July 1997 (以下简称 NCRP97).

④ William Grieder, “Rolling Back the 20th Century”, *The Nation*, May 12, 2003.

⑤ Jerome L. Himmelstein, op. cit., p. 135—137.

⑥ 伦纳德·西马克、马克·西马克,《美国的权势集团》(金君晖、潘同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8页。

⑦ 同上书,第251页; Jerome L. Himmelstein, op. cit., p. 137.

⑧ 《美国的权势集团》,第255页。

⑨ Jerome L. Himmelstein, op. cit., pp. 138—139.

⑩ Ibid., pp. 139—151; Gregg Easterbrook, op. cit..

⑪ Eric Alterman, “The right sort”, *Guardian*, December 15, 2001.

⑫ 本部分除另有注明外,皆参考 Jerry M. Landay, “The Powell Mani-

festos: How A Prominent Lawyer's Attack Memo Changed America", August 20, 2002,

<http://www.mediatransparency.org/stories/powell.htm>.

⑬ Richard Fallon, "Remembering Justice Powell", *Harvard Law Bulletin*, Fall 1998.

⑭ "Attack of American Free Enterprise System: The Powell Memorandum", from Lewis F. Powell, Jr. to Eugene B. Sydnor, Jr., August 23, 1971,

<http://www.mediatransparency.org/stories/powellmanifesto.htm>.

⑮ James A. Smith, *The Idea Brokers: Thinks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pp. 181—182.

⑯ Dave Johnson, "Who's Behind the Attack on Liberal Professors?", 2003. 2. 10,

<http://hnn.us/articles/1244.html>.

⑰ Phil Kuntz, "Citizen Scaif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2, 1995; *Buying a Movement: Right-Wing Foundations and American Politics*, A report by the 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Foundation (Washington, D. C.: 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1996), pp. 20—21.

⑱ *Buying a Movement*, p. 16.

⑲ John Wiener, "Olin Money Tree: Dollars for Neocon Scholars", *The Nation*, January 1, 1990.

⑳ *Buying a Movement*, pp. 18—20.

㉑ 转引自 *Buying a Movement*, pp. 17, 21, 23.

㉒ James A. Smith, *op. cit.*, pp. 198—200; 关于美国企业研究所追求学术声誉的倾向和传统, 参见同书, pp. 174—180.

㉓ James A. Smith, *op. cit.*, p. 201.

㉔ Tod Lindberg, "Conservatism at Century's End: A Prospectus", *Policy Review*, No. 94, April & May 1999. 《政策评论》原系保守主义思想传统基金会的刊物, 1999年转由另一家保守主义思想库胡佛中心主办, 托德·林德伯格被任命为主编。

②⑤ Irving Kristol, “American Conservatism 1945—1995”, *Public Interest*,

<http://www.thepublicinterest.com/notable/article2.html>.

②⑥ Gregg Easterbrook, op. cit. ; Tod Lindberg, op. cit. .

②⑦ NCRP97.

②⑧ NCRP97.

②⑨ NCRP97; *Buying a Movement*, pp. 3—5.

③⑩ Gregg Easterbrook, op. cit. ;保守主义运动与星球大战计划的关系, 详见 Sidney Blumenthal, *The Rise of the Counter-Establishm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pp. 305—310。

③⑪ 美国企业研究所陷入财政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总裁巴鲁迪雄心勃勃, 过度扩展机构和研究计划所致。见 James A. Smith, op. cit. , p. 204.

③⑫ NCRP97.

③⑬ 本部分除另有注明外, 主要参考 NCRP97; “Buying a Movement”, pp. 12—15。

③⑭ 他是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的姐夫或妹夫, 现在十分活跃的保守派罗伯特·博克(被里根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是他的学生。

③⑮ Sidney Blumenthal, op. cit. , pp. 303—304.

③⑯ *Alliance for Justice, Justice for Sale: Shortchanging the public Interest for Private Gain* (Washington, D. C. : Alliance for Justice, 1993), p. 24.

③⑰ Justice for Sale, p. 70.

③⑱ *Community Rights Counsel, Nothing For Free: How Private Judicial Seminars Are Undermin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and Breaking the Public's Trust*, July 2000.

③⑲ David Callahan, “Liberal Policy's Weak Foundations”, *The Nation*, November 13, 1995.

④⑰ Gregg Easterbrook, op. cit. .

④⑱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Speaks at AEI's Annual Dinner”, http://www.aei.org/news/newsID.16197/news_detail.asp.

⑫ Heritage Foundation, "Heritage history", <http://www.heritage.org/Support/about.cfm>. 在思想库扩大影响的各种途径中,本机构的专家参加国会听政会是所有思想库都十分看重的。因为国会议员一般没有功夫去看那些冗长的、充满各种专业术语的政策报告,而思想库专家参加听政会能使议员们了解本机构在某问题上的看法和主张。

⑬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02 Annual Report* (Washington, D. C. :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03).

⑭ David Callahan, "\$ 1 Billion for Ideas: Conservative Think in the 1990s",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 March 1999, 以下简称 NCRP99; NCRP97; "Foundations in the New Era", A NCRP Special Report, September 1995, 以下简称 NCRP95; "Buying a Movement", p. 6; Lawrence Soley, "Heritage Clones in the Heartland: Local think thanks' 'research' comes pre-digested", *EXTRA! (Think Tank Monitor)*, September/October 1998. 关于“软钱”,请参见赵可金、朱锦屏,《论美国竞选财政中的“软钱革命”》,《美国研究》,2003年第1期; Ellen S. Miller and Micah L. Sifry, "Democracy That Works: Clean Money Campaign Reform", 2/28/2001,

http://www.ourfuture.org/projects/next_agenda/ch13_1.cfm. 对主流基金会的攻击在1996年达到高潮。当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彼得·古尔德马克(Peter Goldmark)公开宣称,“迫切需要……一个关于种族的全国性讨论……以直率地探讨个人和机构种族主义的涵义。”正是这番讲话成为保守派攻击的导火索。曼哈顿学会的希瑟·麦克唐纳(Heather MacDonald)在本机构的《城市》(*City Journal*)上发文批评像麦克阿瑟、福特和洛克菲勒这些主流基金会正在资助“多样性意识形态的传播活动”,她写道,这些基金会过去做过一些好事,但“今天已变成攻击美国社会的胡冲乱撞的公羊”(该文发表不久为《华尔街日报》节选转载)。传统基金负责教育事务的副总裁在同年11/12月号的《基金会新闻和评论》(*Foundation News & Commentary*)上,宣称“美国主流慈善机构正是这个国家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办法的一部分。”参见 NCRP97。

④5 John K. Andrews Jr. , “So You Want to Start a Think Tank” , *Policy Review* (Summer 1989).

④6 Gregg Easterbrook , op. cit. ;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 2002 *Annual Report* .

④7 NCRP97 .

④8 NCRP97 ; *Buying a Movement* , p. 10 .

④9 转引自 James A. Smith , op. cit. , p. 202 .

⑤0 James A. Smith , op. cit. , pp. 205—206 .

⑤1 Sidney Blumenthal , op. cit. , pp. 35—37 ; 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 *Right-Wing Affiliations of Bush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Washington , D. C. : 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 2003) .

⑤2 NCRP95 .

⑤3 NCRP95 ; *Buying a Movement* , p. 10 .

⑤4 *Buying a Movement* , p. 9 ; Lawrence Soley , op. cit. .

⑤5 *Buying a Movement* , pp. 8、11—12 ; NCRP97 ; Beth Schulman , “Foundations for a Movement ; How the right wing subsidizes its press” , *Extra!* , March/April 1995 .

⑤6 NCRP97 ; 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 *The Federalist Society From Obscurity to Power ; The Right-Wing Lawyers Who Are Shap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s On Legal Policies And Judicial Nominations* (Washington , DC : 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 2001) ; Jerry M. Landay , “The Conservative Cabal That's Transforming American Law” , *The Washington Monthly* , March , 2000 .

⑤7 Robert Borosage , “The Mighty Wurlitzer” , *The American Prospect* , 13/8 (May 6 , 2002) .

⑤8 Eric Alterman , “The right sort” .

⑤9 任晓 : 《试论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 : 传统基金会之研究》 , “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外交政策” 讨论会 , 2002 年 8 月 24—25 日 , 上海 .

⑥0 Sidney Blumenthal , op. cit. , pp. 293—295 ; James A. Smith , op. cit. , p. 192 .

① Charles Murray,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p. 42, 227—229, 236.

② Sidney Blumenthal, op. cit., pp. 294—296.

③ Buying a Movement, pp. 16—17; *The Feeding Trough: Wisconsin's National Model for Welfare Reform*, An Investigative Report by A Job is a Right Campaign (Milwaukee: June 1997); 还见 Charles Murray, “IQ and Economic Success”, *Public Interest*, [http://www.thepublicinterest.com/notable/article 10.html](http://www.thepublicinterest.com/notable/article10.html).

④ “Review of Illibe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 *National Review*, Vol. 43, April 15, 1991.

⑤ Dinesh D'Souza, “Separation of Race and Stat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2, 1995.

⑥ Buying a Movement, pp. 32—34.

⑦ Eric Alterman, “Which Way W.?”, *The Nation*, February 12, 2001.

第五章 从冷战到文化战争：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臂膀

1996年1月16日，波霍雷茨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布雷德利讲座”上宣称：“新保守主义已经不再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存在了，不再需要自己的名称”，新保守主义死亡了。无独有偶，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位领军人物克里斯托在1995年同样宣布了新保守主义的死亡。他说，现在新保守主义这个词已经只能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了，因为新保守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区别已经很模糊了。不过，这两者为新保守主义撰写的“墓志铭”一点挽歌的意思也没有。对他们来说，新保守主义之淡出舞台不是因为失败，而是因为成功；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新保守主义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它开始时的目标。波霍雷茨说，新保守主义的死亡值得庆祝而非悲伤，“因为杀死新保守主义的不是失败而是胜利。”新保守主义之出现，是为了“与60年代的激进谎言作战”，“是为了重建对美国社会所依存的价值观念和制度的思想信心与道德信心”，是为了抵抗并反击苏联共产主义所代表的“极权主义邪恶”和扩张主义。现在，“邪恶帝国”已经崩溃，新保守主义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捍卫和与反主流文化的战斗同样以胜利告终。另一方面，新保守主义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上的独特性：“到现在为止，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已不再支持福利国家，尽管他们在如何以最人道的方式逐步废除福利国家的问题上与其他保守派有分歧。至于肯定性行动，老保守派则接受了新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即每一个人都应该被作为个人而非群体的

成员来对待。在对外事务上,与其说新保守主义丧失了它在更大的保守主义群体中的独特性,不如说丧失了它的内部认同。”新保守主义者虽不赞同冷战结束后某些老保守派的孤立主义,同时尽管有一小部分新保守主义者仍旧支持源于冷战高潮时反共热情的扩张性国际主义,但他们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并没有一致的立场。在冷战后文化战争中最为显著的议题——堕胎——上,新保守主义者同样没有一致的立场。“虽然在移民问题上,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不同于其他保守派,但这一议题并没有重要到能让新保守主义独树一帜的地步。”同时,如克里斯托注意到的那样,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自己只是“不加任何形容词修饰的保守主义者”,或用1996年9月《经济学家》杂志上一篇文章的话说,“新保守主义是过渡一代的哲学。”^①现在,过渡已经完成了。

实际上,在这两位新保守主义的“教父”异口同声地宣布新保守主义死亡之前,早已有人注意到新保守主义和主流保守主义的趋同。著名政评家、《华盛顿邮报》记者迪奥恩(E. J. Dionne, Jr.)在1990年充满疑惑地问道:“谁现在还是新保守主义者呢?”迪奥恩之所以有此问,因为他认为,新保守主义最好的东西、新保守主义或《公共利益》最初的那种精神——即拒绝派别之见和怀疑意识形态——已经不存在了。新保守主义已经变得和传统的保守主义没有什么区别,新保守主义者身上能称得上“新”的东西几乎没有了,原因即在于他们已经屈从于他们过去曾十分怀疑的“对社会现实的先入之见的阐释”(prefabricated interpretations of social realities)。1995年,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美国前景》(The American Prospect)主编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评论克里斯托当年的新作《新保守主义:观念历程》

(*Neoconservatism: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时,同样断言新保守主义不再新了,因为在新保守主义和克里斯托身上,政治考虑和意识形态偏见取代了独立的思想性批评。历史学家约翰·厄哈曼(John Ehrman)也注意到,冷战结束时,新保守主义“已经完成了从自由主义向主流保守主义的转变”。厄哈曼更加具体地指出,导致新老保守主义趋同的因素有如下几个:其一,新保守主义者加入里根阵营已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保守主义者,像在里根政府中占据高位的阿布拉姆斯和科瑟翠克一直在制定、捍卫和执行保守主义的政策。其二,他们与民主党人的斗争扩大了他们与温和自由派原本就存在的裂缝,除了呆在保守主义运动内,他们已没有其他可安身的“政治家园”。新保守主义者詹姆斯·纽彻特林(James Nuechterlein)则以局内人的身份证实了以上几位局外人的看法,他说,如果说在1980年之前,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并不相信里根的话,那么在里根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当选后,几乎所有的新保守主义者都开始支持他。正是在里根任内、在里根与左派不断的斗争中,不同流派的保守主义慢慢合成为一或多或少统一的意识形态联盟。^②

一、冷战和观念战争:新保守主义的黄金时代

(一) 克里斯托和保守主义的思想“敌对权势集团”

《外交》(*Foreign Affairs*)的编辑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2000年对新保守主义者曾有如下评价:“就他们的思想活力与连贯性和与权力的接近而言,我所能想到的惟一类似于新保守主义者的群体就是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者了,……

两个群体都相信观念是起作用的,认为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是重要的,社会科学和历史能够指引公共政策。”这两个群体还都在发行量较小的严肃杂志上阐明自己的观念,而这些杂志也成为“通向权力和名声的道路——《新共和》之于进步主义者、《评论》和《公共利益》之于新保守主义者”。但扎卡利亚没有提到的一项事实是,新保守主义者获得权力和名声的另一个途径:他们和7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运动所建立的思想“敌对权势集团”之间的紧密关系,换用另一种表述,甚至可称为观念与金钱的关系。斯塔尔1995年在纽约大学做“知识分子”专题演讲时,有感于此,用稍带有调侃意味而又颇有些无奈的话说:“钱不仅会说话,还会思考。金钱和观念之间的关系从未如此地直接和有效。”^③

说到新保守主义与思想“敌对权势集团”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克里斯托。从思想历程和政治转变来说,克里斯托属于“早慧”,这在新保守主义者中当属例外。和很多出身于纽约文人系统的老一代新保守主义者一样,克里斯托最初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是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1940年,他从纽约城市学院毕业后,加入了美国社会主义党。其后,在尼布尔、屈瑞林和斯特劳斯思想的影响下,他开始慢慢右转。冷战开始后,克里斯托和纽约文人中的其他“肯定者”们一起,积极参与反苏意识形态斗争,并在1954年成为《邂逅》杂志的两主编之一。克里斯托在1995年回忆时说,他在那时虽然是一名自由派,但已受到保守主义一些想法的影响。所以,当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因为60年代的“过度”侵害了他们作为自由派一直珍视的观念而右转时,克里斯托早已完成了转变并开始与企业界和保守主义阵营建立联系。1972年,他在大选中公开支持尼克松,并应邀参加了白宫的正式晚宴,其后即公开加入共

和党。还是在1972年，他加入《华尔街日报》的“作者委员会”（Board of Contributors）。《华尔街日报》在企业界影响极大，克里斯托的观念藉此影响了很多有权势的人物，他本人也结识了很多有权势的人物。其后不久，他进入美国企业研究所。

通过《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克里斯托做了两件事对新保守主义运动和整个保守主义运动贡献极大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克里斯托及其保守派朋友威廉·西蒙——威廉·西蒙曾任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又长期担任欧林基金会总裁，无论与政界还是与企业界都有密切联系——在保守主义思想“敌对权势集团”的建立过程中，特别是在说服企业界出资建立这样一支思想力量方面居功至伟。

70年代中期以后，克里斯托反复劝说企业界捐助保守主义思想库。他称，如果企业界想要市场逻辑重新获得主动权，扭转他们所面临的不利境遇的话，就必须创造一个它自己的新阶级。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家想获得思想力量的话，他们就必须打开自己的钱包。克里斯托借用屈瑞林的“敌对文化”观念，认为大学和基金会一直敌视美国的价值观念，特别是那些支撑资本主义体系的价值观念。在他看来，美国的慈善机构、学者和思想库中的研究者都是一丘之貉，这些人合“乌托邦理性主义”、“乌托邦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和现代主义美学于一体，弄得社会科学名誉扫地。他们的社会科学吸收了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传统，“研究社会”就意味着由一个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趋势的精英群体来管理社会变迁。克里斯托认为，这样一个精英群体既是颠覆性的，又是异端，损害了根本的美国理想和制度。1977年3月，克里斯托有感于亨利·福特二世辞去福特基金会理事一事，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在大多数大基金会和主要大学的舆论氛围中，“反企业倾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一个敌视私

营部门而同情公共部门的“新阶级”控制了这些基金会和大学，他们主要是依赖公共部门为生的白领职业阶层，包括科学家、法律从业人员、教育工作者、犯罪学家、公共医疗系统的医生，他们不公开的议程是使美国走向“受到事无巨细严格管制以实现左派传统反资本主义愿望的经济体系”。他问道，继续支持那些敌视公司的机构是否符合公司的长期利益，他呼吁公司的基金组织应当去发现并只支持那些相信私营部门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克里斯托认为，要想使资本主义精神和美国信念重新获得主导地位，必须进行一场“观念战争”，在观念领域、在新阶级的思想自留地——大学、基金会和思想库——中进行“战斗”，因为大学、基金会和思想库不仅是观念产生的地方，还是使观念合法化的机构。因此，资本主义精神的捍卫者要进行“观念战争”，一方面，要建立自己的基金会和思想库即能与自由派新阶级控制的“权势集团”相抗衡的“敌对权势集团”，另一方面，还要把战火引向大学和官僚机构。^④

威廉·西蒙作了更为有力的呼吁。在1978年出版的《说出真相的时刻》(A Time for Truth)一书中，他指出，政府的开支、税收和管制已经威胁到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企业界必须进行反击。他大量引用新保守主义者特别是克里斯托的著述，宣称问题的根源在于由政府官员、知识分子、记者和基金会的领导人组成的敌视资本主义的“新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治和文化权力，并且正在利用这种权力来损害企业界。企业界之所以坐视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他们已经退出了政治，因为他们更为关心自己的短期利益而非长期生存。不仅如此，企业界还十分荒唐地资助这个新阶级，帮助新阶级毁灭自己。为了拯救自己，拯救资本主义体系，企业界最需要采取的行动不是为了某项具体立法而投入更多精力去进行游说，或是在某位合意的政治领导人身上花

费更多的金钱,而要在大学、媒体、基金会和思想库中帮助建立并扩展一个与自由主义“新阶级”对抗的“对立知识分子群体”(counterintelligentsia)以便为企业界重新赢得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相应地,企业界必须把他们的资源转投到那些愿意支持保守主义学者和研究的基金会中,必须停止对那些敌视资本主义的大学的资助,停止对充当反资本主义传声筒的媒体的支持,转为资助那些“亲自由的媒体或……至少从职业上说能公正和准确对待亲资本主义观念、价值观和论断的媒体”。^⑤克里斯托和西蒙这一对堪称“黄金搭档”的组合——前者有思想观念、在文化界有影响,后者在政界和企业界有关系,可拉来赞助——不仅大力倡导大企业资助保守主义思想库,还亲自参与实际的筹款活动,并从1978年开始建立侧重于影响文化教育界的机构(详见下文)。

正是由于克里斯托在新保守主义运动中的突出贡献,所以被人称为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教父”。1996年2月《评论》上一篇名为“教父”的文章大赞特赞他的贡献,作者写道:“当排列他最后的成就时,结果很可能表明,他对运动的实际领导地位,特别是他在建立机构方面不知疲倦和成功的努力,是他最持久的遗产。”^⑥

克里斯托对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另一大贡献是通过美国企业研究所,将自己的许多门生安排到美国知识界、新闻界和企业界的重要岗位,同时,无论是出于示范作用还是克里斯托本人的引介,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先后进入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库,纽豪斯、伯格、瓦滕堡、诺瓦克、柯瑟翠克等人进入美国企业研究所(使美国企业研究所到80年代已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大本营),波霍雷茨则进入哈德逊学会。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在80年代之前虽仍与共和党保持距离,但他们并不排斥加入保守主义思想库。

思想库一来待遇丰厚,二来也为他们提供了影响政策的另一种途径。

(二) 里根的外交政策

1980年11月4日,共和党保守派代表人物罗纳德·里根战胜在职总统卡特成为美国第40任总统;1984年大选,他再次获胜连任总统至1989年1月。里根年轻时曾是拥护罗斯福新政的民主党人,后政治思想逐渐改变,1962年正式转入共和党。自那时起,他的基本信条就是小政府、低税收、削减福利、加强国防,对苏强硬,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这些主张与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颇为相近,而里根最为新保守主义者欣赏之处就是他的对外政策主张。在70年代的美国政坛,里根以对苏联强硬著称,曾尖锐批评作为美苏关系基础的缓和政策。1980年在共和党政纲中提出“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专注于保持对苏联全面的军事、技术优势,在与美国利益有关的地区与苏联进行直接对抗,以求重振因经济滞胀、苏联的咄咄逼人和伊朗人质事件而大为受损的美国国威,并且使资本主义制度在与共产主义制度的斗争中“重放光彩”。他的言辞往往刻薄激烈,当选后不久即发动对苏联的猛烈抨击,称苏联为“煽动内战、助长恐怖主义、谋求扩张的邪恶帝国”,指责苏联领导人认为为实现自己目的而“享有犯罪、撒谎和欺诈的权利”。里根的一位助手曾这样评价里根:“他属于1952年(麦卡锡时期)那个世界的人。他看世界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在里根看来,美国是从“人类历史上惟一真正的革命”中诞生的(所有其他的革命都“只是简单地由一帮统治者换成另一帮统治者”)。美国是“自由之岛”,“上天”指派它担当起全世界和平和自由捍卫者的角色。同道德高尚、慈悲为怀的美国相对立的是苏联这个“现代世界最具侵略性的帝

国”。苏联是恶魔，是“一种罪恶的力量，这种力量将熄灭我们已经呵护了6000年的光明”；里根断言，克里姆林宫像任何“独裁的”“中央集权的”或“极权的”政府一样，必然是好战的，不可避免地敌视自由。因此，美苏对峙是正义和邪恶的较量，正是这种摩尼教式的世界观使得里根及其政府主要成员——首任国务卿黑格和国防部长温伯格——决定了里根政府初期与苏联全面对抗的政策思想：1. 苏联是世界上一切不安宁的根源；2. 对付苏联必须从实力地位出发，“苏联在哪里干涉，就在哪里同它对抗”；3. 在“重整军备”和“振兴经济”这两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之前，不同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或者其他高级会晤，只能显示强硬姿态，以求稳定西方阵脚，然后逐步扭转美在全球同苏争夺中的不利态势。^⑦

为此，里根政府在最初几年中将重整军备置于优先地位。他一上台就提出开支总额达1.5万亿美元的1982—1986年的五年防务计划，和一个耗资1800亿美元的增强战略核力量的六年计划；其后即便在财政赤字不断上涨情况下，里根也坚持大力增加军费，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政策有重大转变，这一势头才有所减缓。随着美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和美国经济在1982年底走出危机低谷，而苏联经济则日益困难、国内政治上出现诸多问题（保守僵化、贪污腐败盛行和最高领导人的频繁更换）和国际上处境危难（中国问题、阿富汗问题和波兰问题），美苏力量对比越发有利于美国。里根政府发动了咄咄逼人的对苏攻势：发动反共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民主攻势”和在第三世界采取“进攻性推回战略”。1982年6月8日，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著名的“威斯敏斯特演说”，直接攻击马列主义，公开邀请苏联同美国进行思想和价值观的竞争，还公开提出要在全世界公开推广西方的民主，制定一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扔

到历史的垃圾堆去”的向自由和民主进军的长远规划。次年，美国国会拨款建立由两党参与的国家民主基金，采取具体的实际措施贯彻里根的推广民主倡议。另一方面，里根政府积极倡导主动进取地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主导权，其标志是“里根主义”的出笼。首先，里根政府调整了对地区冲突的战略认识，认为应当把发生在非洲、中东和中美洲地区的冲突置于美苏全球竞争对抗的范畴中来理解。里根及其外交智囊认为：“美国必须同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控制权，‘以阻止正在操纵各个地区性联盟的苏联扩张主义者’。……其次，‘进攻性推回战略’强调以反苏反共划分敌友，反对卡特政府过度强调人权，过度依赖联合国等多边组织而牺牲美国传统地区盟友的政策，并恢复且大力增加向第三世界亲苏政权中的反政府力量提供各种形式的军事援助”，公开支持世界各地的所谓“自由战士”。这种战略在中美洲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或是军事协助萨尔瓦多政府打击‘左翼叛乱分子’，或是武装颠覆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或是将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拉入美国控制的军事网络，或者直接军事占领格林纳达。……最后，‘进攻性推回战略’把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所谓‘承诺’和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信誉’置于对外军事干预政策的重要位置。”^⑧

不过，正如尼克松评价的那样，里根是个负责的右派，而不是疯狂的右派。他的语言虽往往激烈，但行动却颇为谨慎。所以在自感经济和军事实力已显著加强，认为苏联进攻的危险已经下降的情况下，里根政府从1984年起，无论语言还是行动上都比之前大为温和。此外，里根本人与反共一样强烈的反核主义(anti-nuclearism)立场也是促使他改变调门和政策的主要因素。里根对核武器的个人信念和他政府中的大多数人是不一样的，后者认为核武器是有用的工具，公开抨击武器控制界和和平

运动——比如1982年美国国内出现的规模空前的要求“冻结核武器”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舆论浪潮——对核武器的道德批判，坚决推行最强硬的核政策。但是，里根本人却十分讨厌、害怕核武器，认为废除核武器是现实和可取的目标。在1983年3月著名的“星球大战”演说中，里根提出要让核武器变得无用和过时。尽管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里根在说反话，但它事实上表达了里根的真实想法。里根在当年11月又说：“我知道当我说，我们的梦想是看见有一天核武器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时，我是在替每一个地方的人代言。”里根的反核主义决定性地影响了苏联对美国政策的认识。对于里根政府扩充军备和强硬言辞，苏联的最初反应是加快战略和常规进攻性武器的生产。但当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台时，他对核武器的看法事实上和里根极为一致，认为核武器会给双方都带来毁灭性的伤害，应当解除核武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处境艰难的苏联为避免同美进一步对抗，逐渐接过里根伸出的橄榄枝，乘机下台阶。美苏关系在1985年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 新的军控谈判的开始；2. 围绕地区问题的对话和双边往来增加；3. 11月，里根时期的第一次美苏首脑会晤在日内瓦举行，正是通过这次会晤，里根对戈尔巴乔夫产生好感，认为他是近五年来最终遇到的“可以与之交谈的苏联领导人”，而里根的反核主义则让戈氏相信和西方共同努力结束核军备竞赛是可能的。由此，才有了双方互信的基础，有了自有核武器以来第一次真正裁减核军备的1987年中导条约和戈氏越发大胆的国内改革特别是1987年的“民主化”和“公开化”改革，也有了1987年底西方舆论对美苏关系变化的代表性结论：苏联已经不那么具有威胁性了；美国已经赢得了冷战，“我们已经在冷战中取胜了，但却不知道。”^⑨

(三) 新保守主义者的观念战争

在绝大多数外交政策问题上,里根及其最亲密幕僚——如白宫总统顾问埃德温·米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的基本立场和新保守主义者是一致的。除去上述各方面以外,在新保守主义者最关心的中东问题上,里根政府最初的做法极得新保守主义者的赞许。作为里根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艾伦一开始就强调“美以特殊关系”,说以色列是“美国的一张战略王牌”。1981年9月,美以达成建立战略合作的谅解,11月30日,双方正式签订有关协议,提高了以色列在美国中东地区战略中的地位。此外,在大量削减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的同时,1981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比上一年增加了8亿美元。^①更令新保守主义者高兴的是,作为里根竞选阵营的后来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得到在政坛上一展身手的机会。

从1980年2月开始,在新保守主义者与卡特在1月底的会谈失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逐渐加入里根的竞选班子。里根当选后,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先后得到重用,柯瑟翠克成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帕普斯为里根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诺瓦克当了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代表,波霍雷茨和瓦滕堡被聘为政府国际通讯/传播问题顾问,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更是一直由新保守主义者所控制。在约翰逊政府时期曾任副国务卿的尤金·罗斯托、汉弗莱参议员的原助手麦克思·坎佩尔曼和柯瑟翠克的原副手肯尼斯·艾德尔曼先后担任署长。年富力强的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他们大致都出生于二战结束前后,成长于动荡的60年代)在仕途上似乎风头更劲:威廉·贝内特——贝内特在60年代上半期就读于威廉姆斯学院和德克萨斯大学,整个60年代一直是一位坚定的支持民权

运动的自由派，一度受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的吸引；1970年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后因不满学生抗议者和黑人激进活动家的“反美主义”，态度发生改变，受克里斯托思想的吸引转为新保守主义者——先后担任国家人文基金主席、教育部长和毒品管理署长；艾里奥特·阿布拉姆斯——之前先后为参议员杰克逊和莫伊尼汉的助手，他最初想要求助理国务卿帮办的职务，但莫伊尼汉要他将目标定在更高的职位上，1980年3月，他与波霍雷茨和迪克特的女儿结婚——先后担任负责国际组织的助理国务卿、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颇为克里斯托赏识的理查德·柏尔——他受保守的核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影响很大，1969年参议院就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争论正酣时，柏尔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沃尔斯泰特打电话给柏尔，要柏尔和自己的得意门生保罗·沃尔福维茨（Paul Wolfowitz）到华盛顿特区就辩论采访一些人并撰写一份报告。华盛顿之行不仅让柏尔与沃尔福维茨成为挚友，柏尔还第一次见到了杰克逊参议员，杰克逊很快就将柏尔招至麾下充任自己的助手，正是在此期间，柏尔与许多新保守主义者结识——任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维茨——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和博士期间，沃尔福维茨受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的大弟子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和沃尔斯泰特影响很大；1972年从芝大毕业后曾在耶鲁大学短期执教，后去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工作，先后任署长特别助理、助理署长帮办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特别助理等要职；1977年进入国防部工作，任国防部长帮办——先后任国务院政策计划署（State Department's Policy Planning Staff）长、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美国驻印尼大使；克里斯托的儿子威廉·克里斯托

(William Kristol)成为贝内特的首席顾问。^①

在里根政府任职的新保守主义者对里根时期的军控和中美洲政策影响最大、最直接。在军控问题上,尽管由于美国当时的国务院外交档案和五角大楼的相关文件尚未解密,但从新保守主义者一直控制裁军署和美苏武器控制谈判的直接参与者大都是新保守主义者或与其观点相近者——比如负责欧洲中程导弹谈判的美方首席代表保罗·尼采——来看,即便不能说新保守主义者一直决定美苏武器控制谈判的基本方针(考虑到里根的反核立场和里根第二届任期内的美苏缓和),说他们的影响极大应当不算夸张。此外,作为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柏尔事实上是里根政府武器控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坚决反对任何武器控制的新条约,因此被武器控制的提倡者称为“黑暗王子”(Prince of Darkness)。他在里根政府内部的影响很大远超过一个一般的助理国防部长,1986年里根在雷克雅未克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他是随里根前行的国防部惟一代表,当时国务院内与他不和的许多人认为五角大楼内最有权势的人是他而不是国防部长温伯格。在中美洲政策方面,阿布拉姆斯在里根政府后期作为负责美洲事务的最高官员自然有相当程度的决策权,特别在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问题上,他一直十分坚决。与当时已较多处于聚光灯下的柏尔和阿布拉姆斯相比,今日声名显赫的沃尔福维茨当时似乎不太起眼。但是根据曾被里根任命为美国民权委员会副主席(1986—1989)的穆雷·弗里德曼(Murray Friedman)的说法,沃尔福维茨的作用亦不可小视。弗里德曼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阿布拉姆斯作为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反击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活动的主要人物,柏尔则是在西欧部署潘兴导弹的强烈倡议者之一,而制订这些政策的总头头就是沃尔福维茨。”^②

除了军控和中美洲这些具体政策外,新保守主义对里根外交政策最大和最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们一直强调的反击共产主义和第三世界革命与反美思想言论的意识形态或观念战争,而这种观念战争又很自然地形成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思想的另一个主题:“推进民主。”为叙述之便,我们可将新保守主义对意识形态战争的认识及其实际做法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1. 新保守主义者倾向于认为,意识形态战争是冷战的第二条战线,它极为关键,因为苏联就其核心本质而言,是意识形态构造(ideological creation),而非一个能以正常外交政策——如现实政治战略——对之的正常大国。克里斯托在1985年12月再次提醒美国人民:“苏联政权是一个马列主义政权,也就是说,一个建立在列宁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宗教基础之上的政权。……而列宁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它要求一个集权的革命政党……”不同意见是不被容忍的,“如果你不同意列宁阐述的任何主要观点,你就将作为一个‘反革命分子’而终结……”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政权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所有的威权主义政权都有宗教宽容——他们对其臣民的心灵放任不管,只关心他们的外在(通常是政治)行为;而没有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容许宗教宽容,极权主义既控制心灵,也控制身体。”正是在以上意义上,“苏联的列宁主义政权是一个‘邪恶帝国’”,西方无法与其共存,因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信念认为“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其的永久性威胁”。所以,从根本上说,冷战是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民主之间的斗争,是为了争取人民“思想和心灵”(for mind and heart)的意识形态战争。而过去西方的领导人和公众因为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信心不足,忽视了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的重要性,没有认

识到意识形态攻击可以给苏联造成极大伤害。因此,新保守主义者大声疾呼,西方应毫不妥协地宣扬其价值观念的优越性,完全拒斥苏联体系的道义合法性,并认为,西方的军事实力只能阻止西方的失败,只有意识形态上的突破才能带来胜利。柯瑟翠克利用联合国讲坛在观念战斗的前线冲锋陷阵,她认为宣扬民主观念是里根外交政策的核心,所以从她正式履行驻联合国大使职责的第一天起,她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像过去的莫伊尼汉那样在联合国打一场观念战争,除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外,还要反击第三世界的反美言论。1981年9月,93个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指责美国对世界上的许多问题——包括核军备竞赛、巴勒斯坦问题、尼加拉瓜、古巴和格林纳达的不稳定——负有责任。一周后,柯瑟翠克给其中40个国家的驻联合国大使写信,抨击该声明是恶毒的谎言,并要求他们对此作出解释。在给柯瑟翠克的回复中,大多数人说,他们根本没想到会有美国官员认真对待那份联合声明。^⑬

2. 第三世界的所有反共斗争都是在争取民主和自由,是世界范围内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美国应责无旁贷地支持他们。就当时中美洲出现的动荡,柯瑟翠克认为,民主国家有权捍卫其他受到极权主义挑战的民主国家,并以此为里根政府在中美洲的干预政策辩护。比如,在面对国内反对派和国际社会质疑美国1983年武装入侵格林纳达时,她公开反驳道:“联合国宪章从来没有绝对地反对一国干预别国事务。……它(联合国宪章)为追求自由、民主与和平等价值对向外动用武力提供了充足的合法性。”“而格林纳达的国内事务早就受到某一邻国(指古巴)以及另一个相距更远的独裁者的介入和控制,它的人民正生活在绝望的恐怖之中。”“美国军队的使命是恢复格林纳达的法律和民主体制,防止它落入由古巴和

苏联掌控的一小撮暴徒手中。”1984年，在说到萨尔瓦多局势时，她说：“我们并不认为听任小国及其无助的人民任由一小撮暴徒宰割是道德的。”^④

3. 推进民主。所有的新保守主义者都认为，美国应当积极地推进民主，而不是坐等民主的扩散，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威尔逊主义”的冲动一直都是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思想的一部分。莫伊尼汉早在1974年就写道，“捍卫民主和在可行的地方推进民主原则”是美国的职责。当与他们思想观念接近的里根上台后，推进民主的观念在里根的“威斯敏斯特演说”中表现无遗，而且在1983年随着两党参与的“民主计划”（Project Democracy）和国家民主基金的建立，推进民主的政策制度化了，成为政府对外政策机构的一部分。新保守主义者卡尔·戈歇曼（Carl Gershman）——柯瑟翠克的原顾问——被任命为国家民主基金主席，在他的领导下，国家民主基金在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展开了积极的活动，向新民主国家的个人、团体和政府提供培训、金钱和技术援助。^⑤

在政府任职的新保守主义者鼓吹、推动、制定和执行更积极的遏制苏联和进行反共意识形态战争的同时，政府之外的新保守主义者也用语言和行动予以支持和配合。1981年2月，在斯基菲家族基金会、欧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提供的12.5万美元启动资金的帮助下，米奇·迪克特建立了“自由世界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Free World）。其成立声明宣称，委员会的目标是“改变极大削弱西方民主国家的不知所措和自得意满、冷漠和自我贬低的氛围”。迪克特很清楚，党派政治是她的弱项，而“舞文弄墨”才是她及其同道的强项，因此，委员会的成员——作家、艺术家、编辑、科学家、工会成员、教师——将在书籍、报纸和广播电视上，在教室和所有的公共机构

中反对“极权主义野蛮”、“捍卫自由世界”；“我们让自己仅限于从事……出版、写作，做些像我们这些人知道如何去做的事情。”400名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在声明上签名，包括威廉·贝内特、罗伯特·塔克(Robert W. Tucker)、格楚德·希默尔法伯、西德尼·胡克、艾里奥特·阿布拉姆斯等人。在威廉·西蒙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帮助下，委员会又从富有的捐赠者和一些大公司那里获得了大量捐助。1983年2月，委员会举办了“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会议(借用了《党派评论》1952年研讨会的名称)，包括克里斯托、艺术批评家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和历史学家迈克尔·里丁(Michael Ledeen)在内的主要的新保守主义者参加了会议，他们悲叹美国文化的现状、知识分子中的反美和新左派的影响。此外，委员会还成为新保守主义活动家的信息交流中心，让他们互相之间保持联系，为他们寻求帮助。委员会与里根政府高层保持密切关系，迪克特本人则是白宫的座上客，包括与总统及其助手共进午餐，与白宫的助手们通信。柯瑟翠克的副手艾德尔曼曾寄给迪克特一封手写便笺，告诉她：“请让我知道我如何以及在哪些地方能帮助你”；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署署长特别助理杰德·施奈德(Jed Snyder)则写信告诉迪克特，自由世界委员会“在思想上非常有吸引力”，自己很愿意参与委员会的项目。^⑥

眼见自己长期鼓吹的主张变成了政策，自己的好友、子侄和同道身居高位，新保守主义者自是十分高兴。迪克特在2001年出版的回忆录《老妇传奇：我七十年的爱和战争》(*An Old Wife's Tale: My Seven Decades in Love and War*)中说，里根当总统时，她沉醉在愉悦之中，因为她和她喜欢的东西第一次在华盛顿受到了欢迎，她第一次“真正地接近政治行动”。波霍雷茨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会议上，宣称“我们许多人一直在做的工

作没有白费”：

毫无疑问，今天与我们观点相同的人比十年前多了。……有些在五年或十年前还被嗤之以鼻、被斥为谬论和胡话的（新保守主义）观念，（现在）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已饱含敬意地倾听，在另一些情况下，……事实上已变成常识。

美国在 80 年代初期经济和军事状况的极大改善以及 1984 年里根的再次当选，则让克里斯托在 1985 年 4 月断言，里根之所以能成功和连任就在于他采取了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在他看来，里根政府的政策主要融合了两种保守主义思想，一种是强调审慎管理经济事务和外交政策的传统保守主义，大多数白宫官员、行政部门的最高级官员和国会的共和党领导人都是这种传统的代表。经济上，他们最关心预算均衡；外交上，以相对狭隘的方式界定“国家利益”，从而对超出防御行动的任何事情都饱含戒心。总之，他们不相信新观念和大胆的创新的政策。至少在一半时间内，里根总统的言行说明他是一个传统保守派，但是在关键时刻，他又是一个新保守派。里根政府政策所包含的新保守主义是面向未来的保守主义，看重经济增长胜过经济稳定，强调希望而非保持。正是这种新型的保守主义使里根政府不同于以往的共和党政府，正是这种新保守主义带来了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和或可称为“供应学派”的外交政策：即由入侵格林纳达、星球大战计划和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为代表的积极主动的政策而非被动反应（reaction）的政策。克里斯托颇为得意地说，如果没有这些大胆的政策，“很可能就不会有第二届里根政府。……里根先生现在能被广泛认为是一位‘成功’的总统，

应主要归功于他的新保守主义,而非他的保守主义。正是他政策中的新保守主义维度使美国人民感到,‘我们再次挺直了腰板’,乐观地憧憬个人和国家的未来。”^⑧

正当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处于顶峰之时,运动的元老莫伊尼汉却与新保守主义运动决裂了。里根执政的最初两年中,莫伊尼汉和其他新保守主义者在外交上的观点基本一致。但从1983年起,他改变了原先对第三世界激进主义危险的看法。1983年6月,有记者问他萨尔瓦多左派游击队的胜利是否会影响到美国的安全时,他回答说:“这些事情基本上仍是(他们)国内的事情,除非苏联决定那样做,否则不会影响其他国家。”次年1月,他又公开宣称,他并不相信苏联和古巴在中美洲的政策是对美国的威胁。莫伊尼汉态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越来越怀疑里根政府对世界看法的某些基本假设,他认为由于苏联观念合法性的迅速销蚀,美国对苏联享有的越来越大的经济优势和苏联国内问题特别是民族问题的牵制,苏联极权主义的危险性正变得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他对美国秘密帮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方式特别不满,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那是不合法的。同时,1983年特别是当年10月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入侵后,他开始怀疑美国自己正变成法律和国际规范的违反者,在评论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时,他强调,即便是保卫民主也不能证明侵略的合法性;他认为,只有在将武力作为法律的工具时,才可以使用武力。莫伊尼汉态度的转变让其他的新保守主义者极为沮丧,迪克特在1991年回忆说:“他打碎了我们的心。”波霍雷茨对他作出了最猛烈的抨击,指责他为“新孤立主义者”。^⑨

对于莫伊尼汉的转变,只有波霍雷茨的反应最强烈并非偶然,那是因为他并不能理解人的观点应顺时而变。莫伊尼汉仍然反对世界上的左翼激进主义,但到80年代早期,他断定苏联

已成明日黄花，靠山即将倒台，左翼激进主义的危险就不像过去那样大了。而波霍雷茨则拒绝接受环境正在变化，更不用说改善了。一位学者在研究纽约文人的专著中，曾特地对比了贝尔和波霍雷茨的思想变化轨迹。他发现，在许多方面，贝尔是波霍雷茨的对立面，后者的思想从50年代到80年代不断地简单化，一直在寻找一个更简单的、更可以确认的邪恶；而贝尔则从一个40年代部分意识形态化的作家变为50年代以后的更有学者气质、更为复杂的思想家。^⑨

的确，在老一代的新保守主义者中，波霍雷茨是最为意识形态化的。他1930年出生于纽约一个贫困的犹太移民家庭，比克里斯托、贝尔等人小10岁左右。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年少时即有文学抱负，一心要离开贫民窟；中学时潜心学业，获得奖学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投入屈瑞林夫妇门下。后入剑桥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美国陆军服役两年。屈氏夫妇对这个颇有天赋且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关怀备至，屈瑞林在他尚在军中服役时，已为他联系好退役后去《评论》做编辑。1960年，而立之年的他已成为《评论》主编。他对成功的追求凌驾于一切，1967年，不顾恩师屈瑞林的劝阻，执意要出版庆贺自己升至执掌文化力量位置的自传《成功》(Making It)，书中对自己和自己成功之路毫不掩饰地宣扬使他在自传出版后饱受讥讽。无论在新保守主义者中，还是在纽约文人中，他对反主流文化的敌视态度之激烈程度首屈一指，而且他并不像贝尔和克里斯托等人那样去剖析反主流文化的渊源、批评反主流文化的虚无主义性质，他认为反主流文化首先是自私的。那时的《党派评论》主编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和波霍雷茨有一次就反主流文化发生争执。根据前者的回忆，波霍雷茨坚持认为新一代的年轻作家是懒惰的、被宠坏了，而菲利普斯并不同意他的说法，说

年轻人精力充沛,是新世界的新一代,“将把我们这些属于旧世界的老家伙一扫而空”。没想到,波氏听到后一句话猛然爆发了,激烈地反驳菲利普斯,说他永不允许自己被年轻的激进派推到一边。波霍雷茨的文风很奇怪,有点四不像,论文不是论文,文学批评不是文学批评(他总是以政治来衡量文学作品),或许可称为论战文章,抨击为主、叙事说理为辅。其人心胸似有些狭隘,1999年出版另一本自传《绝了交的朋友》(*Ex-Friends*),因副标题指名道姓要与屈瑞林夫妇、汉娜·阿伦特闹翻,而引起文坛一片骚动。屈瑞林若泉下有知,心里不知会是什么滋味。对其思想转变或许更重要的是,作为屈瑞林的得意门生,他似乎并没学到其师最重要的均衡思想,而是如董鼎山先生所说的钻入牛角尖。^②

里根时期,波霍雷茨显赫一时,《评论》40周年大庆时,里根本人更是亲自写信恭贺褒奖。不过,再大的成功似乎也不能把他从牛角尖中拉出来。即便他一直承认里根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总统,但极度简单化的思维促使他时常批评里根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过于软弱。这种批评一方面固出于他狂热的反共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与他另一种一贯的考虑(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有关,即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需要。1980年初,他警告说,如果美国的冷战政策不以“为了自由反对共产主义、为了民主反对极权主义”为道义基础和根据,美国人民对冷战政策的支持不可能持久。为此,他认为,仅仅遏制是不够的,而是要发动反共十字军远征(*crusade*)。像曾宣称“中立是可耻的堕落”的杜勒斯一样,他认为,与莫斯科的斗争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这样的斗争不可能有中立可言。所以,他在80年代初期就像50年代的杜勒斯那样开始强调以“解放”(liberation)代替遏制,主张重新打造遏制战略,目标是摧毁苏联(当然要以不

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为前提)。1982年,他出版了《为什么我们在越南》(*Why We Were in Vietnam*),一反过去对越战的反对(他是最早公开反对越南战争的人之一,因为他认为美国不可能打赢越南战争),跟着里根说越南战争是“一场高贵的事业”,美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为战争提供能令人民信服的道德根据,以此表明采取更强硬反共政策必须要有道德合法性。他在书中还将攻击的矛头指向自由派知识分子,比如反战知识分子活动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正是他们的反战活动损害了人们对战争的支持。他还断言,这些人还将反对里根重整军备和对苏的强硬政策。但是,他的这些说法是很奇怪的,因为桑塔格和乔姆斯基这些人在80年代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影响。这只能说明波霍雷茨相信,不仅必须在道义基础上攻击和摧毁共产主义,即便是对反共最轻微的反或是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也将会危害反共大业,从而是不能被容忍的。因此,当波兰政府在1981年12月镇压团结工会时,他指责里根的对苏政策在倒退,因为里根政府没有切断与波兰或苏联的经济往来和贸易。他甚至还认为,里根已经显露出退回到尼克松—基辛格缓和战略的迹象。波霍雷茨在1984年暗示,里根的强硬言辞只不过是惺惺作态,当不得真的。当苏联内部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出现变化时,波霍雷茨和《评论》的撰稿人们仍认为苏联是扩张主义的,在苏联的体系之下,不可能出现政治改革。尤金·罗斯托在1987年于《评论》上撰文指出,“苏联以侵略性地使用武力进行的无限扩张计划”仍是“世界政治和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问题”,在里根第二届任期内指望西方和苏联关系特别是美苏关系能有任何改善纯属幻想。而里根80年代初期的政策已经帮助苏联稳定了他们的帝国,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改革正是共产主义体系得到加强的

证据。^②

与以波霍雷茨为代表的极端意识形态一派不同的是,以克里斯托和柯瑟翠克为代表的相对现实主义的一派甚至到1987年时已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对于苏联和西方关系的涵义。1987年12月,老克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人们必须认真看待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性改革”(glasnost)。他说:“在我们这个世俗世界上,没有东西是永恒的,极权主义政权也不能免于变革的规则。”“开放性改革”并非意味着新“缓和”时期的到来,而是表明苏联本身在变化:停止外交上的全球冒险主义、全球干预的冲动在减弱;尽管苏联仍敌视西方,但这种敌视已不那么有刺激性。那么,为什么要认真对待它呢?克里斯托不无道理地指出,因为“开放性改革”既包含外交政策的改变,也包括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如果只是外交政策的变化,可能并不能认真对之;但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事实表明,外交政策的改变和国内的改革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这说明苏联领导层正小心翼翼地走向“修正主义”阶段。尽管克里斯托依然和过去一样认为,苏联是一个有全球野心的大国,但如果“开放性改革”真地意味着经济和社会变革,必定会影响外交,使苏联外交政策出现让西方欢迎的变化。它会缓解美苏的紧张关系,但这是它影响最小的方面,最重要的影响在它苏联内部的影响。这种影响由苏联社会内部的政治动力所塑造,美国不可能理解或影响苏联社会内部的政治动力。因此,美国外交的明智之举是莫对“开放性改革”提供的机会作出反应,最不明智的莫过于认为美国外交政策能够在界定“开放性改革”的命运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了。换言之,“美国治国术的根本任务是限制苏联的选择,而非改变苏联的体系。”后一任务只能由苏联人自己承担。^③

波霍雷茨的僵化不仅使自己无法面对苏联的变化,还牵累

到《评论》杂志。80年代后,许多原先为《评论》撰写对外事务文章的作者从杂志上消失了,莫伊尼汉因其态度的转变不再受欢迎。柯琶翠克在1985年离开联合国大使职位后只在《评论》上发表过一篇不重要的文章,而按常理推算,本不该如此。因为1986年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新任总裁解雇了原先的所有外交政策研究人员,聘请柯琶翠克为他组建一个全新的外交政策研究班子(几乎全为新保守主义者,柏尔1987年从国防部去职后也加入其中),若在70年代,《评论》岂非发表观点的最理想阵地?罗伯特·塔克、格莱泽、贝尔和李普塞特也不再为《评论》撰稿,弄得《评论》上满是歇斯底里的文章。不知是否出于对波霍雷茨和《评论》的不满意,接替威廉·西蒙任欧林基金会总裁的迈克尔·乔伊斯在80年代初就不断要求克里斯托出马办一个类似于《公共利益》风格(即严肃讨论、兼容并包)的、专门探讨外交问题的杂志。根据《华尔街日报》1985年专就此事的报道,乔伊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感到在里根政府时期,重要的外交政策辩论已经转到了有利于保守主义的一方,但是却没有一个可供辩论的地方。就这样,1985年,年近七旬的克里斯托再度出马,凭借欧林基金会提供的第一笔57万美元的资助,创办了今日在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界大名鼎鼎的《国家利益》,并挑选前澳大利亚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欧文·哈里斯(Owen Harries)和罗伯特·塔克共同主编。在首期的编者寄语上,哈里斯和塔克强调,杂志的目标是为“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声音”提供一个论坛。《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报道在最后强调,在《评论》即将迎来40周年大庆的时候,《国家利益》“将创造一个不同于,比如说,《评论》的论坛”。^④

直到1989年东欧巨变之前,波霍雷茨等极端意识形态派仍然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西方和美国仍

需像过去那样警惕一个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极权主义帝国。在当年春天“自由世界委员会”的会议——会议的主题仍和过去一样触目惊心,名曰“西方仍能生存下去吗?”——上,他和柯瑟翠克就此问题发生激烈争吵。与波霍雷茨观点一致的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原为国防部高级官员、柏尔的助手,离开国防部后一直担任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思想库安全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主任——在会议上列举了美国仍需害怕苏联力量的理由。克里斯托尖酸地说:“我必须说,听弗兰克·加夫尼这样一位非常、非常明智和杰出的分析家分析,我感到自己好像在扭曲的时间里听某人说话。”²⁴⁶

新保守主义在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上述分歧说明,在外交政策思想上,新保守主义者存在两派。一派是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极端意识形态化的理想主义一脉,另一派是在80年代后期才相对较为明显的现实主义一脉(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派并未居于主导)。在冷战结束后的最初阶段(至少到1995年之前),两派在美国的世界角色问题特别是“输出民主”问题上争议很大。尽管两派都同意他们的前辈希德尼·胡克在1939年的说法,“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也同样坚信,除了民主之外,“一个允许和鼓励多元(plural)价值观和多元结社的社会”不可能采取其他方式;他们也或多或少地胸怀扩展民主的“威尔逊主义”的冲动,希望民主特别是美国式的民主能为其他非民主的社会所采用,但是对于美国冷战后的外交战略是否以“输出民主”为核心,理想主义派和现实主义派的观念并不一致。在苏联解体之前,瓦滕堡就在1989年冬季号的《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新天赋使命》(Neo-Manifest Destinarianism)的文章,把冷战后美国向全世界的扩张同19世纪以“天赋使命”(Manifest Destiny)——此论调宣称美利坚民族

是“上帝的选民”，其人口增殖和领土扩张都是顺天意、行天道的正当之举——为旗号向南部、西部的移民和领土扩张相提并论，藉此表明美国主宰世界是“神授天命”。他主张“美国应当推行民主……尤其是美国式民主，”宣称今天“只有美国人才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胆量去进行……全球文化宣传”，甚至毫不讳言地承认：“我们的确犯有那些反美分子指控我们的部分罪名——我们确是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文化帝国主义。”在1990年的两篇文章中，瓦滕堡对他的“新天赋使命”战略提出了更详细和具体的建议。他指出，在共产主义垮台后，美国的目标应当是锻造和扩展民主，但是“要记住，民主大厦有很多个房间”，比如，美国式的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个政治体系都不同于瑞典式的民主。“如果世界朝欧洲风格的社会民主或一些混合式民主……的方向发展，随它好了。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已经赢得了一个自由世界，但这一结果只能是接受的，作为最后的超级大国。我们应尽力塑造世界的发展。”也就是说，要大力推广美国式民主。有感于美国通俗文化在全世界的巨大影响，他建议美国应通过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利用美国的娱乐节目和英语的优势影响其他国家的人民，促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吸引更多的移民等措施来实现既定目标。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中的乔舒亚·穆拉夫切克1991年出版了《输出民主：完成美国的天赋使命》，与瓦滕堡相唱和，他指出，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输出民主”和传统的国家利益关切之间并不矛盾，“促进民主事业可以成为最有成效的美国外交政策，不仅在道义上如此，而且对本国利益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世界上民主国家愈多，美国所处的环境就愈好”，“世界上民主国家愈多，世界就愈倾向于和平。”在此前提下，穆拉夫切克归纳了美国输出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和手段，包括文化交流、对外广播、

对外援助、秘密颠覆、经济制裁、外交压力甚至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等等，为美国总结过去的经验，设计未来的蓝图。^⑤

在柯琶翠克、克里斯托、查尔斯·克劳瑟默（Charles Krauthammer，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和欧文·哈里斯等相对更为现实的新保守主义者看来，这种观念未免不太审慎甚至有点异想天开。他们不是反对民主的扩展，像柯琶翠克早在1984年就说过，“我惟一赞同并希望所有人都能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但正如她1979年那篇著名文章“独裁和双重标准”中所指出的，她坚持认为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缓慢和演进的过程。当年春她在解释里根政府的萨尔瓦多政策——在督促并支持萨尔瓦多逐步民主化的同时，帮助它镇压左翼叛乱武装——时承认，萨尔瓦多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美国政府认识到中美洲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和经济问题，在于人们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希望没有得到实现，在这样一个地区，民主根基是不稳的。但柯琶翠克同时强调，由于民主体系不可能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由外力强加建立起来或在一夜之间臻于完美，问题和困难绝对不能成为不支持民主化的借口。但民主的扩展只有通过一点一滴地艰苦努力，才能取得逐步的进展。阿布拉姆斯在担任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时，也一直强调民主的扩展只能是逐步的、缓慢的过程，他曾说道：“民主信徒的任务不是要在一个强烈反对民主的世界中将民主强加于他人，而是要帮助那些承认民主价值的人实现他们的期望。”很显然，柯琶翠克和阿布拉姆斯都谨记尼布尔的教诲：“所有历史成就的破碎性质”，即进步往往是一点一滴的。克里斯托在1990年直接批评了“输出民主”派，他写道：“这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很有吸引力的观念，但只要花一小会工夫想一想就会认识到其实质（及其全部假设）是何等的空洞。在美国的全部历史中，

我们只成功地向两个国家——德国和日本——‘输出’了我们的民主制度，那还是在战争和占领之后。在菲律宾、或巴拿马、或中美洲的任何地方，我们都没能建立起可以生存下去的民主制度。为什么有人会认为我们能在东欧或东南亚做到这一点呢？”那么，美国该如何界定其外交政策呢？老克指出，要复兴“国家利益”观念并赋予其实质，也就是说，要寻找美国的国家利益。此外，他完全不像瓦滕堡那样相信美国通俗文化的影响，在1992年《国家利益》上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如果一个世界强国想维护其地位的话，就需要他人对其文化的尊敬；流行文化能提供娱乐，却不能提升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⑥

应当说，在更为现实的新保守主义者身上，尼布尔的影响似乎更大。尼布尔的思想曾让他们放弃对乌托邦的信念，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之前，在他们认为美国在冷战中处于不利境地时，他们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背弃了尼布尔的教诲即绝对不能视外交政策为“征伐”（*crusade*）（无论是为了共产主义还是为了自由民主）；不过在时事变得越来越利于美国时，特别在冷战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时，或许他们又记起了尼布尔。和更为现实的新保守主义者不同，更为理想主义和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新保守主义者则始终将观念置于现实之上。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如所有的纽约文人和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中的穆拉夫切克和戈歇曼——一度曾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徒，无论是否出于这种激进过去的影响，新保守主义在许多最基本的假设方面确与马列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像列宁一样认为“观念比枪更致命”。他们对政治和历史抱有一种意识形态式的看法，换言之，他们认为政治就是观念战争。由此，和许多学者和政治家不同的是，新保守主义者从不严格区分思想理论和实践；相反，他们认为思想理论是政治斗争的

另一种形式,政治是应由思想理论贯穿其中的活动。相应地,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宏大事业中的“干部”而非严格独立的知识分子,愿意运用思想理论作为武器。^⑧冷战结束的现实似乎让前者更大程度地摆脱了过去的影晌,尽管他们同样重视观念和意识形态,但他们也更愿意兼顾现实。不过,我们不能夸大这种分歧,因为当他们先后确认冷战后美国一枝独秀的现实时,这种分歧已经湮没在更为广泛的共识——维持并扩展美国的霸权或“帝国”——之中了。

在这共识出现之前,他们之间的分歧不妨碍他们共同庆祝美国和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并将胜利归于里根的强硬政策,实际上也为自己记上了一功。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东欧共产主义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他们大力鼓吹并由里根政府实际执行的对苏强硬政策经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里根大力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建设和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攻击,既使得苏联采取了“温顺”的对外政策,也最终导致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换言之,里根的政策给苏联造成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压力,让苏联别无选择,只能抛弃在国外的扩张主义和国内的镇压。更具体地说,里根政府的扩张军备之举尤其是“星球大战”计划使得经济上已经困难重重的苏联没有能力再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只能与西方和平共处,回到谈判桌上。意识形态战线上的“观念战争”——包括宣扬苏联为“邪恶帝国”、大力宣扬西方和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和完全拒斥苏联体系的道义合法性——则发挥了更为重大的作用(因为西方和美国的军事实力只能阻止西方的失败,只有意识形态上的突破才能带来胜利;更关键地还在于苏联就其核心和本质来说是意识形态构造),正是意识形态战争促使苏联和共产主义体系本已逐渐销蚀的合法性在数年内荡然无存,从而给了摇摇欲坠的共产党政权以最后的致命一击。从

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甚至如福山所说是“历史的终结”。

新保守主义者对冷战结束及里根政策在其中作用的上述阐释,正是他们在冷战后大力鼓吹“新里根外交”的论据之一。但是,正如杜德尼(Daniel Deudney)和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在90年代初期指出的那样,包括新保守主义者在内的“里根胜利学派”(Reagan victory school)对80年代事态发展的诸多阐释是不正确和不完整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没能理解导致冷战结束的深层力量。抛开其他不说,单就意识形态的作用来说,意识形态的确促使了苏联的改变,但其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苏联体系在其公民眼中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丧失不是因为里根政府的“观念战争”,而是因为西方富裕和放任(permissiveness)的吸引力。对于苏联和东欧的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颠覆苏联的主要力量与其说是抽象的自由民主原则,不如说是西方的生活方式:物质上的富足和个人生活上的极大自由。西方流行文化——以摇滚乐、电视节目、电影、流行服饰为象征——要比新保守主义者强调的反共意识形态宣传更为有效地诱导着共产主义世界的人民,“列宁最有力的意识形态对手是约翰·列农(John Lennon)和保罗·麦卡尼(Paul McCartney),而非亚当·斯密和托马斯·杰弗逊。”^②这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实在是个巨大的讽刺,因为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文化和放任的生活方式正是他们在国内极力反对的。他们在与国外的共产主义斗争的同时,在国内还进行着另一场战争——“文化战争”;在冷战结束后,这场“文化战争”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更凸显了。2001年10月15日,老克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布雷德利讲座”上说:“我们在美国进行了一场文化战争,我们(保守主义者)输掉了,但不是完全失败。”^③

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在这场“文化战争”中,很难说哪一方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因为“文化战争”远还没有结束。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保守派早就在文化战争中获得全胜的话,西方又如何赢得冷战呢?

二、文化战争:寻找德性与捍卫美国的中心

任何一社会之常存都必须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我们是谁”和“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前一个问题涉及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自我认定(self-identification),对它的回答往往表现为人们常说的认同或自性(identity)。大致来说,认同既包括由政治和法律框架所规定的公民认同(civic identity),也包括由共同的文化传统、血缘纽带或其他非政治法律因素等维系的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后一个问题则涉及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必须和自愿遵守的规范,这些规范既包括制度化的法律,也包括不成文的风俗习惯和道德准则。显然,认同和规范除了具有公民内涵(civic dimension)外,还具有文化内涵(cultural dimension)。公民内涵和文化内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而构成社会的基干,两者就如同人的两条腿对人的支撑一样,倘若其中一方面出了问题,不仅将影响另一环节,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也大成问题。恰恰在文化内涵这一环节上,当今的美国出现了问题。

(一)“礼崩乐坏”和“中心的失落”

自动荡的60年代以来,种族矛盾、贫富差距、暴力犯罪、毒品泛滥、未婚生育等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会。许多原有

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进一步恶化,且不断产生新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诸多社会问题又掺杂在一起,形成一个难以解开的结,比如犯罪、毒品、非婚生育和福利依赖这几个问题就形成了人们常说的美国的社会病态(social pathology)。在相当一部分普通美国人眼中,美国社会乱象纷呈、道德沦丧。“1/3的儿童出生在单亲家庭;1/2的婚姻以离异而告终;1/3孕妇的结局是堕胎;1/4的高中学生毕业前辍学。我们有9000万功能性文盲。谋杀是18—34岁美国黑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我们国家首都被杀的人比死于越南的士兵还要多。”暴力犯罪极为猖獗,“在美国,每22分钟有一起谋杀,每5分钟有一起强奸,每47秒发生一起抢劫,每22秒有一起其他类型的犯罪。每年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达500万,联邦调查局估计,83%的美国人将会在他们的一生中的某个时刻成为犯罪受害者。”^⑩近几十年来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社会环境的恶化是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衰落所致,社会问题就是道德问题或价值观问题;美国正经历一场道德危机,或至少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道德问题。他们认为,这体现在礼貌(civility)、尊重、责任感和家庭稳定的衰落。1998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49%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是道德危机,另外41%的人说美国人的道德出现了严重问题。^⑪由此形成了朱世达先生所说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社会政治现象:美国致力于在全世界……推行美国价值观——推行民主、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市场观念,同样,在当今世界上,最醒目的则是在美国本土,美国价值观本身却在销蚀。”^⑫

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和道德危机感使得美国人重新认真思考“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这一基本问题,同时还使得美国学术界和政界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争论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整个80年代之前,争论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分配领域。但是在“80年

代中期以后,经济和分配领域的讨论基本淡出,几乎所有辩论都完全集中在所谓道德文化问题上”,即便在讨论分配和社会福利问题时,学术界和政界对美国社会面临的家庭、婚姻、宗教、教育和种族关系等领域的新变化(有人称之为“危机”)所引发的争论大抵是以文化的面目出现的。在这场论争中,过去一贯忽视价值观问题的学院派自由主义开始大谈特谈道德问题,诸如“自由主义与道德生活”、“自由主义与善”、“自由主义的德性(virtue)”之类的讨论充斥于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著作。^④自由派如此,一直以传统价值观念的捍卫者和道德卫士自居的保守派就更不用说了。而70年代即已从社会政策领域进至价值观领域且一直注重文化问题(自三四十年代就如此)的新保守主义者,在与其他保守派站在一起对抗他们的自由主义大敌的过程中,着重点也从社会科学转向公共德性(public virtue),旨趣也从世俗转为越发倾向于宗教。^⑤笔者通过 ProQuest 数据库的大致检索发现,《公共利益》(1988 年至今)所刊载文章的一半以上在探讨德性和道德问题;《评论》(1986 年至今)上关于美国国内问题(《评论》一直以来关注三大领域,即犹太人和以色列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国内问题)的讨论也大多涉及到这些主题;由理查德·约翰·纽豪斯主编的另一家主要新保守主义刊物《首要事务》(First Things)宗教色彩本就浓厚,不仅纽豪斯本人即为宗教界人士,刊物的办刊方针也明言要“发展出一种具有宗教实质的公共哲学”(a religiously informed public philosophy)。来自两党的政治家以几乎同样的热忱在探讨道德和德性问题,就连普遍被保守派认为是60年代之“余孽”的克林顿总统夫妇也多次在公共场合鼓吹德性。^⑥

尽管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强调德性和道德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对于何谓德性和好的品行(good character),能否对个人生活

做道德评判,道德原则及规范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可应用于公共生活或其哪些领域等一系列问题,两派看法并不一致。这种分歧还表现在对诸多社会文化问题——堕胎、犯罪、学校纪律、吸毒、家庭价值观、女权主义、同性恋、色情、乱交、非婚生育、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学校祈祷、种族问题、性教育、福利问题——的不同态度上。同时,普通美国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政治与思想精英们的辩论一样,大众在以上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也“远远超过了问题本身的范围,而带有一种文化价值的和哲理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宗教的内涵),涉及到对权利法案和对美国开国元勋的理解,甚至涉及到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问题。这是一系列有关美国民族归属性和民族终极目的的争论,有关美国的真正含义(the meaning of America)——或者说到底什么是一个美国人的争论。”^⑤朱世达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为“美国社会中的文化断裂”,实质上就是文化冲突,或近十几年来人们常说的“文化战争”。用美国学者亨特的话说:“文化冲突就是因道德标准不同而产生的政治、社会对立,这种对立常有的结果是某种文化或道德体系凌驾于其他道德精神风貌之上,说得清楚一点,这些道德认识的思想体系争先恐后,其原则、理想绝非细枝末节,……它们决不是可以随意更改的态度,而是基本的理想与信念,是依附者的认同感、目的感、团结感的根源。”^⑥文化战争的核心就是相互竞争的道德观,所以今日美国引起争论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最后都可以追溯到道德权威——指人们判定好坏、对错、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等等的根据——的问题。

“文化战争”(Kulturkampf)本来是指普鲁士统一德国后由俾斯麦和自由派所组成的联盟力图控制天主教而与天主教会及

教众发生的冲突,该词为当时的自由派领袖之一拉道夫·沃彻(Rudolf Virchow)所创,意指将公共生活从宗派主义的强迫中解放出来,阻止教会作为独立的等级制机构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任何影响,美国人为描述目前美国在社会文化和道德问题上的争论而借用。^⑧因此,文化战争的准确历史含义是,自由主义国家使有组织的宗教反对派失去能力的努力;更宽泛地说,文化战争也意味着自觉的宗教群体之间的斗争或宗教团体和反宗教或世俗主义群体之间的斗争。在历史上,无论是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反教会的共和派与教会为争夺对教育的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早期),还是20世纪之前美国常常发生的宗教冲突,文化战争总是涉及政治、道德特别是宗教,在宗教多元主义的美国,尤其如此。^⑨目前美国的文化战争同样涉及宗教,但冲突的路线与美国以往的类似冲突大不相同。以往的大部分文化冲突发生于圣经文化的领域内,在各教派(新教各团体、天主教和犹太人)之间,而现在的冲突则是由不同的世界观造成的。换言之,“分裂不再围绕着某个特定教义问题、宗教执礼的方式或组织,而是以我们最基本的、最注重的假定为中心——在这个社会中,如何安排我们的生命,如何与他人共处。”在冲突的最基本层面,是这样一个大问题:人们能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目标构建一个合理的(rational)社会秩序,还是应该接受上帝、自然或历史给他们的律令(order)?人们是将上帝视作超越俗世的(transcendent)、以神启方式向人们透露其意志的权威,还是认为上帝只是人类需要和经历的象征性表达(symbolic expression),随着人们理解和目标的变化而可有意识地重塑这种表达呢?由此,当代美国文化战争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两极化趋势:即走向正统的冲动与走向进步主义的冲动。正统派相信并决心奉持(commitment)外在的、可以界定的、超越俗世的

权威。“这种客观的、超越的权威则为个人与团体定出一套前后一致的、千古不变的标准,用以衡量价值、目的、良善与认同的物质。……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真实的,我们如何生活,我们是谁。”进步主义者则信奉现代主义、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modernism, rationalism, and subjectivism),“真理常被视为过程,是展开的现实世界。”尽管有些进步主义者仍可能认同某种宗教传统,但他们往往根据时代精神来重新界定他们所信奉的宗教甚至转换门庭,因此,“所有进步主义者共同的世界观是倾向于根据当代生活盛行的假定,重新构筑历史上信仰的象征”即“人们应该为自己诠释圣经”。换言之,不论道德权威的传统根源是什么,它对人的生活都不再有完全的或主导的约束力。相反,“道德权威的约束力常在于个人经验或科学理性,或是这两者之一与某个宗教、文化传统的对话。”^④更明确地说,双方的真正差异在于是接受一个绝对的、永恒的、普遍的道德权威的存在并将之作为自己个人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指导,还是认为这权威应“与时俱进”。换言之,人们是否称自己为基督徒远不如他们将自己的信仰置于何种现实之上更重要。

文化战争不可避免地会追问到“我们是谁”这个大问题,鉴于美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文化战争还表现为“主流和多元之争”,即什么是美国的中心。这一问题之起首先是因为美国人口种族构成的变化。二战后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由于来自非欧洲地区的移民(包括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增多和白人生育率的下降,许多人口统计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直预测美国白人的多数地位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将是少数族裔的多数。1996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白人少数》(*The Coming White Minority: California's Eruptions and America's Future*)一书预测,到2000年,加州的白人将不足其总人口的一半;到2050年,整个美国将出

现相似的局面。该书的作者写道,加州的白人担心,“这种变化看起来正把他们的州变成和美国其余地方不同的地方。他们不仅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也害怕失去自己的文化。有些人以为,加州将变成另一个南非,当少数族裔成为多数时,白人将失去权力。”对白人多数的丧失和文化中心地位下降的担忧——常被表述为“中心的失落”、“西方文明的没落甚至死亡”等等——由于原来的同化机制受到“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更进一步加剧。许多人认为,如果来自非欧洲国家的移民能被同化的话,种族构成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没落或死亡。但是“大熔炉”(melting pot)已经不存在了,被指责为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大熔炉”已被多元文化主义的“色拉盘”(salad bowl)所取代。^④

“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这两个词都是90年代在美国公共辩论中使用极广的词,大致来说,前者旨在反对歧视、特别是语言上的歧视;后者则否认任何一种价值体系和文化在本质上会比其他价值体系和文化更优越,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据说,“政治正确”这个提法是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的主席卡琳·迪克劳最早在1975年提出的(她认为,法定的妇女平等地位,并没有完全改变对妇女的不公正待遇,妇女在语言上受到的歧视和侵犯是普遍的),但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一提法整整15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根据“全国妇女研究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Women)的一份研究报告,媒体的此类报道开始于1988—1990年间关于大学校园内“政治正确”的少量文章:1988年101篇文章,1990年656篇文章;随后,相关文章数量急剧攀升,1991年关于“政治正确”的报道已达3989篇,剧增500%。“多元文化主义”不知为谁所创,但该词的广泛流行也是在90年代,格莱泽曾对“多元文化主义”一词

的使用情况作过统计,他发现,美国主要报刊是在 80 年代末才开始使用该词的。该词在 1989 年出现过 33 次,两年后增加至 600 次,到 1994 年就增至 1500 次。^⑧“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都是美国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的结果,也都对美国的主流文化即所谓的“WASP”现象——其主要内涵是,以英语为主要交际工具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政治、文化、宗教理想和体制以及价值观——构成了挑战。由于篇幅之故,也由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更为丰富和复杂、对主流文化的挑战更大,因此,我们将探讨的重点放在“多元文化主义”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元文化主义是对一个老问题的新回答。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其人口、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从一开始就极为多样化,由此产生了一个十分根本的问题:即如何“合众为一”(a pluribus unum)以及如何处理一元和多元的关系?尽管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白人基督徒)确立了美国社会的大多数规则,但美国社会并不存在欧洲意义上的比较深厚的“民众/民族”(Volk)——即共享同一祖先、文化的群体——意识。不过一直以来,主流的观点始终认为美国的“一”(unum)或者说美利坚民族性(Americaness)的内核由两根紧密相连且相互加强的支柱来支撑,在此我们可引用王希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他写道:“独立和立宪使美国人有了个历史机会来建立一种与欧洲传统不同的政治社会,这个过程被认为是美国民族性的重要基础,而在其间建立的政治原则和价值也被奉为美国政治传统的精髓,成为不同背景的美国人相互认同的基础。”^⑨换言之,这两根支柱一是政治—法律框架,一是观念因素。前者确立了一个以地域(地域的范围并非不变的,而是扩展的)和公民作为个人应享权利及应担义务为基础的公民权/公民身份(citizenship)体系,后者则体现

为以早期欧洲移民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所谓“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它除了包含“个人事业”观念,还包括尊崇或在形式上尊崇所有人作为一个个体的尊严和平等的理想、个人不可剥夺的追求自由、公正与机会的权利。对于这两者尤其是后者的坚持与信奉就构成了意识形态化的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美国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观念”,换言之,“在美国,观念是产生一致性(oneness)和同质(homogeneity)的东西”;或如李普塞特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言:“美国之独一无二在于它开始于一场革命,并从意识形态上界定其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而其他国家的自我认识源于共同的历史,而非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一个美国人……是一种意识形态承诺(i-deological commitment)。它不是出生地的问题。那些拒绝美国价值观的人就不是美国人。”⁴⁸美利坚主义所主张的“合众为一”或同化机制就是“熔炉说”,即最早由法国移民让·克雷夫科尔于1782年提出的观点:美利坚特殊的气候、政治制度、宗教多样性和工作环境会将来自欧洲(克雷夫科尔一直说的是欧洲)不同国家的移民变成同样的美国人。⁴⁹

但是,现实总是和理想存在着极大差距。从独立之日起,黑人(还有印地安人)就不是“美国信条”的适用对象,⁵⁰被法律所认可的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促使20世纪早期的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W. E. B. DuBois)反思美国黑人的地位和意识;20世纪初发生的针对东南欧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犹太人)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运动也遭到犹太籍学者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的强烈批评,指责对新移民的强制性同化会导致某一民族对其他民族绝对统治的“文化帝国主义”。1924年,卡伦首次使用“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一词来表达他的所有民族间民主的理想;同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实用主义哲学从哲学层面拒绝了“一元论”和惟一真理,使多元主义接受了文化相对主义,而约翰·杜威(John Dewey)则以更注重实践的方式(强调人们对民主机构的参与)宣扬多元主义意味着“现实存在乃各异事物之和”。上述20世纪初期的“多元主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认为是今日多元文化主义的先驱,两者有许多共同点(如都强调美国社会的多元性,强调对不同文化和传统的包容,强调多元性是美国精神的基础等等),但也有很大不同,其中一点即在于前一种多元主义要求的仅仅是白人社会或欧洲/西方文明内部各种文化的平等。而东南欧移民以很快的速度融入主流社会则事实上证明了近年来“白人同化理论”(Whiteness Theory)的正确,至少在解释60年代以前的现实是正确的。这一理论认为,同化只限于白人;白人的融合依赖于排斥其他种族,肤色是关键性的;非白人少数族裔由于美国的种族主义特性变成美国社会完全和平等参与者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确是被实践中的多元主义排除在外的。民权运动在几个关键方面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准备了条件:首先,民权运动采用的是以种族为基础的“群体斗争”方式来争取“群体权利”,这种斗争方式是对强调个人权利的美国传统的反叛,且成为一种极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群体诉求”、“群体权利”也因此成为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的核心思想和策略。其次,民权运动的结果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奠定了政治基础,黑人获得了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从而可以参与政治生活。再次,“肯定性行动”的实施则更为有力地促进了美国社会诸领域特别是大学的多元化。最后,民权运动的另一项成果——1965年的《移民法》一改之前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性移民政策,使大量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得以进入美国,改变且将继续改变美国人口的种族构成。^⑦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美国是多种族和族裔的国家，美国文化是多元文化；“不同种族、族裔、性别和文化传统的美国人的美国经历是不同的，美国的传统不能以某一个民族或群体的历史经验为准绳”；“群体认同和群体权利是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美国社会必须面临的现实。”

根据王希先生的分析，当代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所指甚广，牵涉不同的层面和领域。在学术领域，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用法：1. 首先是一种教育思想和方法，增加对美国不同民族和族裔的文化传统的理解，减少甚至消除种族主义偏见。

2. 历史观，重新阐释美国史。6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美国史学”注重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历史的研究，强调美国历史的“多元性”。

3. 文化批评理论，常被人们与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归为一类，“被看成是向传统西方文明知识霸权进行挑战的一种话语。”其核心主张是文明没有优劣之分。

4. 冷战后的新世界秩序理论，各种文化和社会应建立起相互认可、尊重和交流的关系。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并不仅仅是学术殿堂内的“象牙塔”，还表现为实际的政治和利益要求。对于以“多元文化主义”为改革旗号的人来说，多元文化主义的最终目的不是追求“文化平等”，而是“社会平等”，“是争取不同群体（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长期受到歧视和压迫的群体）在分享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方面的平等。”由此，多元文化主义又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其功能在于动员和集合广泛的力量，推动现实的社会改革”。以改革为关切的“多元文化主义”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支持“不同群体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繁荣”和“在自由和人类尊严原则范围内的群体认同”，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来保证受压迫群体的进步，其核心内容是将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转换为政策。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主义的理

想是一个“不带偏见和歧视的更为美好的美国”，希望将美国文化看成是所有种族和族裔文化交融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实际“争取的不仅仅是对美国社会不同种族和族裔的文化和传统的尊重，而是要对传统的美国主流文化提出全面检讨和重新界定，它要求的不止是在文化和民族传统上对有色种族的尊重，而是改变美国政治的基础，要求将种族平等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去”。实践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主要表现在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政府对教育和经济资源的分配和对各级学校中人文教育课程的改革。其中，多元文化主义进行得最深入、影响最大的是在美国的教育和学术界。一方面，70年代以来肯定性行动计划在校园内实施使得学生和教师队伍的构成远比过去更为多样化，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比例大为提升。另一方面，大学的人文和社会学科课程内容也进行了改革：少数族裔和妇女研究的兴起、非西方文化的课程也被列为大学生的必修课。⁴⁹

在纠正以往的过失时，人们一直都想做到矫枉不要过正，用我们传统儒家思想的话说，要“中庸”，用英国保守主义衷爱的词叫“适度”（modest）。但矫枉难免过正，多元文化主义本意要纠正以往各类歧视，但其实际执行过程中的一些硬性做法却不太妥当，比如很多大学将“肯定性行动”简化为在招生和招聘教师时优先照顾某些少数族裔和女性的“配额制度”，这种做法不仅对于那些其他的入学申请者和应征者不公，即便对于受到照顾而合格的（qualified）人来说，也如吃了苍蝇般，因为一般的认识（尽管不明说）是受了照顾就说明你不合格。保守派将之称为“种族偏好”（racial preference）也不为过。不仅如此，一些以“多元文化主义”及种种“新学术”——如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和非洲中心主义（Afrocentrism）等——为大旗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对主流文化和价值观提出了更为根本的挑战甚至

颠覆。这些人认为西方传统的文学、哲学、历史及法学的所谓学术客观性是虚伪的,过去任何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典之作,本身并无实质上的固定内容,因此可对其作任何解释。美国传统的一些根本也遭到他们的非难,比如“熔炉说”。他们指出,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被炼焦的、甚至化为乌有的是众多的非 WASP 种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色人种变成了白人的添加剂。如果说以上两例倒也全非胡说八道、还有一定学术性的话,那么,有些非洲中心主义者的观点就让人不知所云了。有位老兄提出过一个入种学的高见,他说,整个人类可以分为冰人(Ice People)和太阳人(Sun People)两大类,地球北部的冰人生性贪婪好战,太阳人则天然乐善好施;冰人就是白人,太阳人就是黑人,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白人要比黑人低劣,白人价值体系发展的高峰就是德国的纳粹主义。在形形色色激进新思潮的影响下,大学生们也再次行动起来。1988 年春,斯坦福大学学生自发组织集会,抗议该校人文学科传统的以西方文明典籍为基本的课程设置,高呼:“西方文化快滚蛋!”在学生的压力之下,校方被迫让步,取消了讲授从古希腊罗马到 19 世纪欧洲主要经典作家的“西方文化”这门必修课,代之以“文化—观念—价值”这门新的必修课,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第三世界学者、少数民族人士及女性作者关于民族和两性差别问题的作品上。斯坦福大学学生抗议并取得胜利后,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教材内容也受到类似质疑;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亦需选修种族研究的科目,但可放弃西方文化(包括美国历史)的科目;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不修一门非西方文化课程就无法毕业;克利夫兰大学则要求学生至少要选修两门美籍非洲人文化以及一门欧洲以外地区文化的课程。⁴⁹

凡此种种,让保罗·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在

1991年春季号的《哈得逊评论》(Hudson Review)上写道：“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足堪与中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中国人已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他们的文化大革命，而我所见到的种种迹象却表明，美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正在日趋恶化下去，并且不会在可预见的将来被扭转。”感到担心的并不仅仅是保守派，一些自由派中坚也颇为忧虑，史家小施莱辛格在1992年就问道：“美国不再把自己视为一个具有自己独特认同感的有改革能力的民族，而是将自己视为不同的外国身份的大杂烩。美国不再把自己视为由毫无阻拦地作出自己选择的个人组成的民族，而是将自己视为由无法抹去的种族特性的社团组成的。……凝聚中心还会存在吗？或者说，熔炉会让位于巴比伦塔吗？”⁶⁹

(二) 新保守主义者宣战

新保守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文化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其最主要和持久的关切就是传统文化在自由主义和左派挑战之下的生存问题；把所有新保守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对美国（及西方）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能否生存的极大忧虑，其他所有问题——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都从属于文化问题。正如詹姆斯·威尔逊自己所说，与自由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和其他保守派不同的是，新保守主义者始终是以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对于品行和德性问题的涵义(implication)来阐释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的。早在70年代，他们就不仅在学术和思想上以文化来透视美国当时面临的内外危机；到70年代中期时，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虽仍对共和党抱有疑虑，但已开始政治上给共和党“支招”。他们建议，如果共和党想在美国政治中取得长期成功的话，它就必须

改变战术,除了重新界定政府的社会作用——如建立保守主义的或最小的(minimal)福利国家,减少人们对大政府的依赖,减少大政府对大企业的干预等——以外,共和党还必须设法应对美国面临的文化危机——高犯罪率、非婚生育、享乐主义和放荡、日益上升的离婚率等都是文化危机的症状。新保守主义者特别是克里斯托警告共和党,如果他们想阻止这场危机的话,就必须提出一种明确的回归传统价值观念的设想(vision)、一种能对深为美国社会乱象和文化危机而烦恼的普通百姓特别是南方的福音派教徒产生吸引力的美国文化观(a vision for American culture)。^⑤(70年代后期,共和党与基督教右派结盟应为克里斯托的建议记上一功。)

如果说因为尼布尔的思想在四五十年代让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当然,那时他们还不是新保守主义者,此处这样说纯为叙述简便)找到了生活的基础,找到了使他们个人一生有意义的承诺和认识(commitment and understanding),尼布尔让他们许多人得以避免滑入乌托邦之泥沼——尼布尔让他们认识到,“预言式的”激进主义暗含着对所有政治方案、制度和运动的激进相对化,因此,也就是彻底拒绝每一种形式的政治理性主义——从而可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之父”(迈克尔·诺瓦克1992年语)^⑥的话,那么,当他们在探寻美国文化危机之原因和解决办法时,斯特劳斯的思想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斯特劳斯对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又由于以下两项事实得到加强:1. 最初的新保守主义者中,相当一部分人或是斯特劳斯的弟子,如沃尔特·伯恩斯坦(Walter Berns)和马丁·戴蒙德(戴蒙德于1977年去世);或在某些方面受斯特劳斯影响很大,如贝尔和克里斯托对宗教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斯特劳斯。2. 在新保守主义者进入共和党保守派阵营后,他们与斯特劳斯派迅速接近。到80年代

时,在很大程度上,新保守主义者和斯特劳斯派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发出的声音已没有太大区别。

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他们在里根年代的得势并不能消除他们对美国文化危机的忧虑,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在道德—文化领域与自由主义及其左派同盟的战斗。1984年,纽豪斯出版了《无遮无拦的公共广场:美国的宗教和民主》(*The Naked Public Square: Relig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猛烈抨击了从不考虑宗教和宗教价值观的“世俗主义”政治信念,“无遮无拦的公共广场”就是他对世俗主义空洞(empty)的比喻。詹姆斯·威尔逊在1985年庆祝《公共利益》创办20周年时,在《公共利益》上发表《重新发现品行:私人德性和公共政策》一文,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文化危机感。他在文中开篇即说:“过去20年中,我曾亲眼目睹且参与了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界定公共利益所发生的最重大变化是对公民品行发展的越来越深的担忧。”^⑤正是对文化自始至终的关注和有增无减的文化危机感,使新保守主义者在80年代后半期就率先发起了文化冷战,而“文化战争”、“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等词语到90年代才为大多数人所知。

1986年7月8日,已从教育部长任上去职、时任里根政府毒品管理署长(National Drug Policy Director)的贝内特在传统基金会演讲时,吹响了保守派在道德—文化战线推进“里根革命”的号角。他指出,里根总统已经在经济和外交政策领域实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里根革命尚未成功,保守派同志尚需努力”,努力的方向就是道德—文化战线。他说:

财富和军事力量是实现国家伟大的必要手段,但仅仅有财富和军事力量是不够的。如总统(指里根—引者)所

说,“一个国家的伟大不是由其国民生产总值或军事力量来衡量的,而是由其致力于将其人民联结在一起和界定其特性的原则和价值观念的程度来衡量的。”归根结底,国家的伟大依赖于——也体现在——我们人民的特性。反过来,这又依赖于:1. 我们对我们作为一民族是什么和我们相信什么的认识;2. 我们建立以表达这些信念的制度的健康状况;3. 我们据以塑造下一代美国人的价值观念。

此战线上的战斗任务十分艰巨,战斗

仅仅是刚刚开始,胜利尚遥不可及。有那么多美国人事实上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文化机构面前仍处于道德上的防御地位。美国人能确信我们的孩子可能继承我们的父母珍视的习惯和价值观念吗?我们确信他们对于我们的历史和遗产将有足够的了解吗?我们确信他们将在一种能适当地培养出他们的道德和思想品质的环境中成长吗?我们能信任我们的孩子从我们的教育机构、媒体、艺术世界甚至教会那里获知的文化信息吗?我们相信我们的社会传递给我们的年轻一代正确的信息、教给他们正确的教训吗?这些信息和教训关涉家庭、使用毒品、尊敬宗教信仰、我们作为一民族的意义和作为个人的责任。公共气氛是有益于道德和思想健康?亦或当我们思索我们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公民同胞的未来福祉时,我们有理由感到担心吗?……曾几何时,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失去了对公开肯定我们中大多数人在私下相信之事优越性的权利和责任的信心。我们必须重新得回这种信心。用理查德·约翰·纽豪斯的话说,我们曾容许公共广场变得“无遮无拦”;容许我们的社会和文

化机构随波逐流；我们不再清楚我们曾坚持的标准和我们藉以评判的原则，或者即便我们明了自己所想，却不知何故将公共讨论的领地丢给了道德和思想相对主义。⁶⁹

次年，斯特劳斯派的掌门人（斯特劳斯本人在1973年去世）、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出版《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一书，将其师对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历史主义——的批判引入对60年代以来美国道德沦丧、社会和高等教育危机的分析，并指出美国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病根就出在以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相对主义价值论在美国的兴盛。他认为，强调真理的相对性，主张价值、文化的多元化，是尼采、海德格尔、韦伯、弗洛伊德学说的共同特点。价值相对主义理论解脱了以往使人们囿于统一的善恶标准去判别人类行为的桎梏。像战争、性压抑、自杀这类事物用善恶的准则去衡量是难于处理的，而引入了灵活易变的价值观之后，这样的局面就消除了。“开放——相对主义使它成为面对多种真理、多种生活方式和多种人物所表现出的惟一合理态度。”相反，那些传统的拥有真正信仰（或许可以称之为理性绝对主义）的人倒成了危险分子。在传统理性主义看来，一切事物包括传统宗教都必须拿到理性的殿堂予以审视，理性是至上的。价值相对主义则怀疑理性、科学的有效性，其阐发的重心则落在了那个“神秘莫测至高无上”的“自我”。尼采称之为“深渊”；弗洛伊德把它描述为“茫茫大海上的冰山之尖”；海德格尔、萨特把它定义为无所不包的“存在”。总之，人类在杀死了上帝、发现了理性的缺憾之后，又在塑造新的上帝——自我。但是，循着新思潮拒斥理性、崇拜自我的路径“开放”下去，启蒙理性的基本原则势必发生根本性的动

摇。所以,布鲁姆大声问道:“当人们对于公共利益已没有共同的目标或看法时,社会契约还可能存在吗?”正是受这些思潮的影响,美国各种牌号的“多元论者”——实质上就是价值相对论者——把“向所有人所有生活方式开放”放在了第一位,他们主张不应藐视任何人的情感和行为方式。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文化之间的差异似乎消除了,反对歧视获得了更为充分的根据。然而在另一方面,推动人类追寻高尚、优秀品质的动力也消失了,即便这些品质找到了,也无须加以推崇。在此种思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学生“拒绝向高雅的文化表现出虚伪的恭敬”,结果是学生追求榜样和高尚情操的渴望消失了,理想教育失去了目标和动力。在开放、多元化的浪潮中,人与人之间共同的追求和规范所剩无几。人们期待的就是不断地分离:人的分离、信仰的分离、家庭的分离,“我们都是些社会性的孤立主义者。”开放的婚姻指的是没有责任的婚姻(在原本的含义上,婚姻本身就意味着责任);开放的性欲带来的是性解放和女权运动。彻底的多元化和分离,其终点只能是个人。既如此,滑向虚无主义的极端倾向就很好理解了。既然每个自我、每个文化都是合理的,那么推而极之,群体和社会的共同规范就瓦解了,正义与邪恶、崇高与卑劣、真理与谬误的界限就殊难判定,从而导出这样的结论:个人只要有所信奉,有他自己的价值择定,不管其信奉或价值的内容如何,就是好人。既然“自我”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也就意味着一切都是不合理的,自我成了纯粹的虚无,从而导致人的心灵的空虚、焦虑、紧张和迷茫。“人类进步达到了颠峰阶段,竟然到了承认人的生活价值毫无意义的地步。”显然,如果听任相对主义价值论的负面效应随意发展,势必导致人类社会规范的荒废、创造精神的衰颓、人类进步和合理目标的虚幻。循着这样的道路“开放”下去,恰恰与开放的初衷背道而驰,其结果只能是

人类思想和创造力的封闭。为此布鲁姆大声疾呼，要对相对主义的极端倾向在未来的专横保持警醒。⁶⁵布鲁姆对价值相对主义和多元化的反对建基于斯特劳斯派共同的两条原则之上：1. 与历史主义的假设恰恰相反，存在着永恒不变、永远适用的道德准则；2. 历史与社会的不平等是永恒且必然的，用戴蒙德在1970年的话说，不平等是人类生存（existence）的最深层原则。⁶⁶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出版后，引起了极大轰动。该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栏上停留长达30周，卖出80万册，并带动了一批类似著作的出版。“封闭”（closing）一词也成为保守派和新保守派抨击“多元化”的标准用词。斯坦福事件发生时，贝内特就表示：“斯坦福废除西方文化课程的决定，并不是辩论启蒙的产物，而是在政治压迫和恐吓下导致的投降协定。在‘开放胸襟’和‘鼓励多元化’的名义下，我们看到的是斯坦福心灵的关闭。此一事件让我们了解到，恐吓可以取代真理的地位。大声则赢，缄默则输，这一切不是通过辩论的力量，而是来自恫吓、要挟和谩骂，这些不是一所大学应该做的事。”⁶⁷

1988年10月，纽豪斯在一篇文章中较早地使用了“文化战争”一词。他说，里根年代虽即将结束，但是将里根送上台的那股推动力将继续影响美国的政治和文化。这股推动力就是宗教社会力量的文化反叛（cultural insurgency），宗教右派——坚持文化保守主义、坚持宗教可以帮助人们组织（ordering）其公共生活——的兴起正是其表现。里根下台后，反叛将继续下去。纽豪斯在文章的最后明言，这场文化反叛就是“文化战争（Kulturkampf），一场界定美国文化的战争，一场关于我们应以何种观念（ideas）组织（order）我们生活的战争”。⁶⁸

(三) 美国文化危机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新保守主义的观点

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文化战争是他们过去与新左派、反主流文化论者和反美主义者之间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苏东共产主义的步履维艰以及随后的垮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系和民主政治体制在全球的扩展,意味着左翼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最终终结和任何版本的国家统制主义(statism)的名声扫地(苏东共产主义垮台对美国国内政治有一项甚是重大的影响,使左翼激进派和自由派之间本已模糊的界限几乎无存),^⑧从而表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和社会政策在思想上的破产。然而左派和自由派并不甘心于在社会经济领域内的失败,又扛起“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大旗继续干着诋毁美国及西方价值观、追求乌托邦式平等的勾当,战火既然烧进了文化领域,他们就只有起而迎战了。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在文化战争中,他们自然代表着美国大多数人的立场,自由派是少数。所以,威廉·贝内特在1994年的一本书中说,文化战争发生于自由派精英和社会其余成员之间,这些精英藏身于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间,在文学界、政治刊物、好莱坞、艺术界、主流教会和一些媒体那里。他们人数不多,影响却极大,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引导潮流者和舆论制造者”。和美国历史上传统的精英群体不同,他们拒绝资产阶级对工作、节俭、性行为的克制和自我控制的强调。他们投自由派候选人的票,在如堕胎、同性恋权利和环境等议题上支持自由派的立场。这些精英的最显著之处在于,他们完全拒斥美国的理想,质疑美国梦;他们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并不在乎现实的实际情况。^⑨希默尔法伯也指出,在价值观念上,那些长期以来无视社会生活现实的“新阶级”即便不是与那些感到受社会无序状态威胁的普通美

国人特别是工人阶级相对立的，也是根本不同的。新阶级牢牢地扎根于媒体、学术界、职业阶层和政府之中，他们贬斥“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清教伦理”，使底层阶级的价值观合法化，使仍然坚信资产阶级价值观、清教伦理的工人阶级的价值观不合法化。^⑥

很显然，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自由派和包括他们在内的保守派构成了文化战争中的对立双方。尽管这种看法远不如上面提到的亨特的划分精细和客观，但鉴于我们要介绍新保守主义者的主张，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沿用新保守主义者的划分。

从表面上看，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歧主要在于对美国社会-文化现实的不同看法。在相当一部分自由派（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者）看来，美国社会-文化的一系列新现实，如族裔构成的多元化和少数族裔因坚持自己的文化而对主流文化与价值观形成的挑战、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特别是单身母亲家庭的增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稳定以及这种不稳定对儿童的影响等，都是美国社会变化中的健康迹象，他们最不喜欢一个单一的共同文化、一个单一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从单一向多元的变化可能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但这种混乱是获取自由选择的代价。保守派则认为，自由派对多元化、社会进步和自由选择的痴迷是极端错误的，那些社会-文化新现象绝非健康的表现，而是“礼崩乐坏”的标志。

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他们的美国文化危机感并非杞人忧天，两方面的现实——社会问题的严重和“熔炉”让位于族群的“马赛克拼板”——正是美国文化危机的表现，前者意味着社会的去道德化，后者则表明中心的失落。

希默尔法伯对前一方面的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作为一位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和思想颇有研究的历史学家，希默尔法伯

对美国现实问题的透视是从重新解读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开始的。长期以来,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主要受拉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1918年出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出类拔萃者》(*Eminent Victorians*)一书的影响,认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是社会压迫和道德伪善,“维多利亚”一词也经常意味着性别压迫、资产阶级的沉闷乏味和倒退的世界观。希默尔法伯修正了这一阐释,她并没把维多利亚时代理想化,但坚持认为维多利亚时代也有好的一面,维多利亚时代文化有些值得现在美国人学习的重要方面。许多左派历史学家一直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文化存在着巨大的裂缝,希默尔法伯认为恰恰相反,维多利亚时代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共同的道德信念;女性也非受压迫,妇女在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中十分活跃;富人也并非对穷人漠不关心,中产阶级政治家和由新教道德信念激发的政治运动进行了不断的改革。

1994年,希默尔法伯在《公共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对比维多利亚时代至今英美社会和道德问题的长文。^⑨在大量引用所谓“道德统计数据”或“社会统计数据”——即关于犯罪、未婚生育、离婚率的统计数据——后,她发现,与之前相比,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犯罪率和未婚生育率一直持续下降,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英国的犯罪率和未婚生育率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同一时期,美国的情况大致与英国的情况相似。但是之后,英美两国都出现了犯罪率和未婚生育率急剧上升的情况。希默尔法伯认为,这说明了英美两国之前长期相对良好的社会和道德状况的急剧恶化。与此相关的是,美国社会判定何谓“不正常”(deviancy)的标准同时出现了“下降”和“提高”的趋势。就前一方面,希默尔法伯引用莫伊尼汉的分析指出,现在人们判定不正常的标准降低了,不正常的门槛高了,现在不再认为过去被认

为不正常的行为是不正常的,人们容忍甚至支持过去的不正常行为。比如,离婚和私生子过去被认为是家庭破裂的标志,现在被认为是好的。在后一方面,希默尔法伯则借用克劳瑟默的分析强调,随着不正常正常化了,正常的反变成不正常的了。过去一直被认为是自然和道德的家庭现在被认为是病态的,犯罪已经很少被报道,因为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这两种对何谓不正常看法的变化使过去被认为不正常和非法的正常化和合法化了,使过去正常和受尊敬的名声扫地。这一过程的发生速度令人吃惊的快,以60年代“性革命”对人们的影响为例:1965年,在30岁以下的人中,69%的美国女性和65%的美国男性认为婚前性行为是错的,1972年,急剧下降至24%、21%;30岁以上的女性,从91%降到62%,男性,62%到47%。希默尔法伯认为,主流社会思潮无法帮助人们理解这些现实,因为美国的主流社会思潮怀疑道德观念本身。道德原则(道德评判)被认为至好是思想阻碍,从坏的方面说则是不自由和压迫的表现。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对个人生活做道德评判,更不用说让道德评判进入公共事务了。“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没有权利做出此种评判并将之强加于他人,还因为我们对道德评判本身没有信心,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原则对我们是真实和正确的,更不用说对其他人了。”在今天的美国,道德事实上变成了品位问题(a matter of taste)。公共官员特别回避使用“不道德”这个词,以免被控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精英主义。不仅是政治和文化领袖患上了“道德恐惧症”,其他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感染。

希默尔法伯认为,正是不愿谈论道德使现在的美国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截然不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道德原则和道德评判既是社会话语的一部分,也是私人话语(private

discourse)的一部分;既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也是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深深扎根于传统之中,也深嵌入当时的两派思想之中: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福音主义和卫理公会的信念(Evangelicalism and Methodism)。这两派思想在哲学上可能并不相容,但在实践中却相互补充和相互加强,“对快乐和痛苦、回报和惩罚的边沁式估算正是福音主义和卫理公会的信念来源于宗教的美德和堕落的世俗对等之物。”正是这种世俗精神(ethos)和宗教精神的联盟决定了社会政策,每一种减贫或慈善措施必须以其能既促进穷人的道德又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为其正当之依据。整个社会舆论瞧不起那些“身强力壮的接受救济者”,社会政策对受救济者和穷人作出了严格区分。这是有意识的道德决定的结果,目的在于避免福利依赖,维护不依赖福利的穷人的尊严,同时为其提供生存所需的最低保障。而美国最近几十年的做法是完全拒绝任何种类道德估算,有意将福利与道德惩罚或激励分开。希默尔法伯认为,这部分反映了这样一种认识,即社会对于所有的社会问题负有责任,应该承担起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部分反映了流行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精神,这种相对主义精神使得很难将任何道德评判和道德条件加于接受福利者。这种政策力图是道德中立的,试图客观地看待贫困问题,认为贫困是非人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的产物,然而事实上,贫困问题的经济和社会方面与道德和个人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虽然决策者有意制定价值中立的社会政策,但事实上这些政策伤害了他们帮助对象的道德和物质福祉。这是一种去道德化(de-moralizing)的社会政策,它不仅使福利接受者也使整个社会去道德化了。美国的福利体系起了反作用,因为它不仅使福利问题变得严重了(激励人们去接受福利而非避免),更严重的是,它还使得其他社会问题更严重了,以致长期福利依赖已变

成“社会病态”现象的一部分。

那么,完全放弃失败的福利政策和依靠自由市场能否解决美国目前面临的社会问题呢?和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一样,希默尔法伯的回答是否定的。她指出,经济增长和激励并不能打破福利依赖的循环,产生稳定的家庭。因为这样的做法低估了社会问题的道德和文化维度。一方面,应当承认自由市场经济具有物质优势,但另一方面,还要看到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动产生道德和社会的善(moral and social goods),甚至会颠覆这些善。针对通常的“进步代价说”(这种说法认为,现代化一方面意味着人类在物质、政治自由、社会流动性、种族和性别平等等方面的收益,另一方面,作为这些收益的必然代价,道德上却丧失颇多。从较为根本的层面上说,民主、资本主义、富裕和现代性本身就带有使民主、资本主义、富裕和现代性统统无用的“矛盾”。鼓励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那些特质——个性、大胆、企业家和创新精神——也是损害传统、习俗和权威的因素),希默尔法伯以英国的实例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她看来,英国是第一个经历工业化—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但是,革命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摧毁所有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因为自由市场从来都不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自由或普遍;另一方面,传统价值观念和制度仍旧会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说现代主义的物质层面——工业化和都市化(Industrialism and urbanism)——在某些情况下的确助成了穷人的非道德化,但也会有相反的效果。19世纪末期的英格兰与初期相比,是一个更文明、更和平、更人道的社会。中产阶级的风俗习惯渗入大部分工人阶级,传统的家庭仍如以往一般牢固,妇女的地位有了改善,宗教也很繁荣。为何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没有出现道德和文化的无政府状况(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经济个人主义不可避免的

后果),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一种强有力的时代精神(ethos)在约束个人主义。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个人或自我是社会的盟友而非敌人。人们是在共同体和家庭的语境内谈论自助的,在工人阶级中,这表现为“邻里互助”(neighbourliness),在中产阶级中,则表现为慈善。自私并非普遍利益的对立面,而是如斯密所言,是普遍利益的手段。自律和自我控制被认为是自我尊重(self-respect)和自我改善的源泉,自我尊重是获得他人尊敬和认可的先决条件。简言之,个人既有责任也有权利,既有职责也有特权。在希默尔法伯看来,这种自我观不同于美国现在的自我观念。和以往的自助不同,现在的“自尊”(self-esteem)并不依赖于个人的行为和成就,而是抽象的个人,是一种脱离了他人的自我。因此,希默尔法伯最后指出,目前美国可以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获取的最重要教益是: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道德实体,一个社会的“精神”(ethos)、道德和精神特性不能被化约为经济、物质、政治或其他因素,价值观或德性本身就是重要因素;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切实注重“价值观”或“德性”有益于社会的健康。

在1995年出版的《社会的去道德化: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德性到现代的价值观》(*The De-Moralization Of Society: From Victorian Virtues To Modern Values*)一书中,希默尔法伯深化了对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批判,将矛头直指道德相对主义。她说,对维多利亚社会超阶级的道德,当时也有持异见者。他们是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代表是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他们是现在道德相对主义的先驱。但那时这些人只是少数,属于去道德化的先锋派(avant-garde),而现在他们则充斥于整个文化之中。换言之,“去道德化的先锋派现在已经变成了不讲道德的(amoral)^⑥权势集团。”不讲道德的结果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德性变成

了现在的价值观念。“‘德性’是人们深信的道德规范，是事物本身的秩序(the very order of things)。”而价值观念和观点(opinion)没什么两样，观点是或多或少武断的偏好(preference)；一般来说，人们对自己的观念既不太肯定，也不知道如何捍卫，且肯定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其他人。偏好是一个借用自消费行为的术语，是可以很快改变的。和布鲁姆一样，希默尔法伯也认为，从德性向价值观念即道德相对主义的转变，根子在尼采和韦伯。更具体地说，今天美国的社会病态——犯罪、毒品、非婚生育和福利依赖——并非如左派所说应归因于经济衰退或更大的不平等。事实上，这是由道德相对主义引发的道德革命的结果，这场革命如此的成功以致没人敢以道德方式来说这些病态，否则会被人扣上“谴责牺牲品”(blaming the victim)的大帽子。在这里，希默尔法伯借用了米隆·麦格内特(Myron Magnet)——现总统小布什的顾问——在《梦想与噩梦》(*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 The Sixties' Legacy to the Underclass*)中的观点，指出，这场革命是双重的，既发生在中产阶级文化之中，也发生于所谓的“贫困文化”中，但是在两种环境下革命的后果却大不相同。比如，中产阶级的职业单身母亲肯定面临着一些困难，孩子的成长也会有不利，但是她还有可以减轻严重后果的手段。相比之下，同样处境下的贫穷妇女就没有资源(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来减轻严重后果，对她及其孩子来说，后果就是灾难性的。今天的底层阶级就是这种灾难的集体结果，这种灾难就根植于道德败坏(deformation)。而在所有的西方社会，这场道德革命都是在60年代突然爆发的，1965—1975的10年事实上成为西方社会的分水岭。这让彼得·伯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维多利亚时代事实上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中期。^⑥那么，为什么会在这短短几年时间内发生这样巨大的道德转变？

在希默尔法伯的丈夫克里斯托看来,这样的提问是错误的。1994年,他在《评论》上撰文探询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根源,拓展了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考辩。在贝尔那里,60年代的文化反叛源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敌对文化;克里斯托则将源头推到了更早的世俗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他认为,理解反主流文化远比批判它重要得多,但理解的困难在于人们无法找到导致这场文化反叛的具体因素。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都没有可见的危机,甚至危机感;即便人们通常认为的原因——越南战争——也不是,因为反主流文化在那之前就出现了;而且,这也忽视了这场运动的国际性质。事实上,“反主流文化不是被导致的,而是诞生出来的”(the counterculture was not “caused”, it was born)。那么,该如何理解反主流文化呢?克里斯托指出,理解的起点即在于反叛者对反叛的自称——counterculture。它既不是“持异见的运动”(dissenting movement),也不是新一代年轻先锋派的风格革命,它反对的是文化本身,更确切地说,反对的对象是现代文化。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出现于18世纪后半期,指人类活动的新的自主的活动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和思想家提供了传统宗教无法再提供的那种精神活动。宗教骚动的时代已经结束,精神骚动现在已成为“文化”事件,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全欧引发的青少年自杀现象。同时诞生的是现代的艺术观念。现代文化艺术观念之存在,其目的在于指明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新的使命感。在这里,克里斯托有一个并未明说的对于人本性的假设:如荣格在自家门上所刻的那句拉丁文神谕——“不论是否祈求,上帝总会在场”——所指的,人总是要寻找某种超过自己的东西以解答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悲剧与死亡;在

这种同生存哲学反复遭遇的过程中，人开始意识到凌驾一切之上的根本性问题——意义何在。⁶⁹宗教本是人类此种精神追求的古老努力，为人们解答意义问题。但现在，现代文化艺术取代了宗教，因此，现代文化艺术的新使命是世俗主义的、人文主义的和救赎的 (redemptory)，而与宗教的传统纽带被实质性切断。人们开始在文化和艺术中发现神圣，“创造性的天才”将给予我们生活以意义，给我们的精神渴望 (spiritual aspirations) 以实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代文化艺术的确成功地执行了此功能。但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时，事实表明现代文化艺术已经不能承担此使命了。反主流文化已经远离创造他们的现代传统，是“后现代主义的”。因此，反主流文化及其孪生兄弟后现代主义是对作为自主的、世俗的人类活动的文化艺术的反叛。文化艺术现在已经空无一物，所有的精神实质都不见了。

由于大学在一个世纪 (1865—1965) 中一直是世俗人文主义正统的核心机构，因此，反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现代大学。一个世纪以来现代文学和艺术的趋势——发源于大学之外、反对大学——孕育了反主流文化的前身，即作为“敌对文化”的现代主义。敌对文化敌视资产阶级社会，在深层意义上，则敌视世俗人文主义，即使敌对文化本身也包含极多的世俗人文主义因素。现在回过头去看，最优秀的现代派小说家、诗人和画家如艾略特、叶慈、卡夫卡、普鲁斯特和毕加索都不是世俗人文主义者。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对他来说，资产阶级西方的敌对艺术和文学是即将到来的文化危机的清楚信号，随文化危机而来的将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但是当 60 年代反主流文化兴起时，作为人文主义信念信徒的大学教授们并没有理解运动的性质，徒劳地去寻求学生不满的近因，一直试图对学生的要求作出让步以满足不满者。他们不知道，由于世俗人文主

义,大学已经变成了没有灵魂和精神的(soulless)机构,没有任何超越性(transcendent)意义的机构。失去了灵魂和精神,失去了超越性意义,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的“存在的精神危机”(an existential-spiritual crisis),出现于学生中间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如性乱、吸毒、寻求新“生活方式”的绝望努力、流行音乐等——正是“存在的精神危机”的表现。^⑥由于世俗人文主义从一开始就斩断了人类存在的精神根本,所以它也为道德相对主义的兴起和泛滥提供了空间。

总的来说,新保守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美国目前社会一道德—文化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道德相对主义,所谓的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只是道德相对主义的最新表现。道德相对主义不仅酿致了社会的“去道德化”和“不讲道德”的主流社会思潮与政策,从而造成道德失范和社会问题的难以解决,还导致了“美国中心的失落”。

1998年,格莱泽以颇为感伤的笔调缅怀了已失落的中心。在他看来,美国从开国至现在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两段美国史诗(American Epic):第一个阶段的史诗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主流,但近几十年来,另一个美国史诗的出现已使其黯然失色。前一个史诗强调的是美国的“新”、“浩瀚无垠”、“开放”以及赋予美国人的自由;与这个史诗相关的词语是“美国观念”(the American idea)、“美国信条”、“美国梦”或“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第二段史诗在格莱泽看来,与第一段是对立的,说它是史诗是有疑问的:它强调的是种族和族裔多样性,而作为史诗的美国首先让人想起的是“由英雄们上演的一个故事”。与第一段史诗有关的是没有边界的边陲,它意味着自由土地、自由制度和自由的人;而第二段史诗则以城市为中心,意味着一个有明确地理界限的社会。

第一段史诗是大森林、大草原、大平原的史诗，是发现者、探索者、先驱的……史诗。第二段史诗歌颂的是完全不同的历程：……移民船、地铁和从贫民窟到郊区的迁居路线。第一段史诗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苏格兰—爱尔兰人的史诗，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德意志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史诗。第二段史诗是美洲印地安人、非洲人、来自东南欧的“新移民”和过去三十年来新新移民的史诗，这些人通常被说成是第一段史诗主角的牺牲品。

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可作第一段史诗的标志，“他欢呼美国力量的扩展和向西的拓殖、美国力量的投射越出我们的大陆边界之外”；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出现了美国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他认为移民加强了美国的力量，为美国的工厂和矿山提供了劳动力，充实了美国的军队；但他并不赞扬多样性，他坚持要求移民必须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美国化。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可算第二段史诗的代表，他赞扬移民对美国的贡献。老罗斯福在说到移民的时候，他想到的是需要人力的增长和更强大的美国；而肯尼迪想到的是“吸引一个新选民群体的支持或表示对混乱世界中牺牲者的同情”，他从不使用“美国化”一词，今天这个词更是在政治上受到禁止。自肯尼迪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赞扬移民，而自由女神像象征的也不再是她本来的意义：从“慧启世界的自由女神”(Liberty Enlightening the World)变成了“欢迎移民的自由女神”(Liberty welcoming the immigrant)。^⑥

之所以会出现这第二段史诗，多元文化主义的两大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和自我贬低——是直接的推动力，而这两

股力量都首先且一直主要是从世俗人文主义的基地——大学——挑战/颠覆美国的中心的。大学是文化传播和延续之地，在动荡的60年代之前，主宰美国大学的文化传播观念主要由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一位伟大批评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所奠定。阿诺德是一位极典型的人文主义者，对他来说，“文化”仍保留了其拉丁意义，即“cultivation”；文化的传播内容既包括情感，也包括理性，文化传承的榜样是希腊和希伯来——西方传统的两大源泉。文化就是这两支的综合，希腊在思想和品位上卓越不群，希伯来则胜在诚挚和坚韧(earnestness)。阿诺德认为，文化是教条主义的对立面，也是教条主义有效的解毒剂。只有文化才能提升作为个人和群体的我们，使我们超越“我们微不足道的情感”(petty passions)。就文化于个人的作用而言，文化，“把人对完美的追求放在把自己变成什么上，而不是拥有什么上，放在思想和精神的内在状况上，而不是外在的环境上……放在有别于自己兽性的我们人性本身的发展和优势上……放在扩大那些使得人性成为特殊的尊严、财富和幸福的思想和感情才能上。”像歌德一样，阿诺德把这个理想等同于希腊人和来自希腊而已在人文主义传统中得到发挥的 humanitas 观念。humanitas 观念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它奠定了西方文明的两大根本性假设或观念：教育可以塑造人的个性的发展，是发扬那些纯粹属于人和人性的品质的途径；颂扬根源于人性的人的优越性。而古希腊人认为，在公共事务中扮演活跃的角色是一个人之人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能言善辩和领袖群伦又是在公共事务中扮演活跃角色的必备品质。由此，它就规定了教育的内容：学习传统的七门学科(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以获得“全面教育”，并以掌握语言、精确思想和熟练论辩为具体目标。罗马人继承了希腊人的这一传

统,并由西塞罗在拉丁文中找到了一个对等的词 *humanitas*。就文化之于群体乃至国家的必要性来说,阿诺德曾告诫美国人:“国家的兴衰是受道德原因支配的。在一个像这个社会一样的民主社会里,由于它的新,它的幅员,它的力量,它的商业生活,它的纯粹自由和平等”,其危险就在于缺乏纪律,就在于感情冷漠和物质至上,尤其是“大众的当权,而又没有恰当的理想来提高或指导大众”,而文化恰可以承担此使命。因此,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政治体”来说,文化都是好的,它界定适于自由人的教育。阿诺德的这种观念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的美国大学中十分普遍深入:以最好的东西来教育所有的公民,无论其种族、宗教或阶级,在源于《圣经》和古典作品的西方传统的名著中可以发现这些最好的东西。^⑧

很显然,阿诺德的这种文化传播和教育观念与斯特劳斯和布鲁姆师徒分别提倡的“人文教育”和“通才教育”是一致的。但是,阿诺德与斯特劳斯派的根本不同在于环境和具体所指(*specific reference*)。阿诺德针对的是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及大众民主的骚动,即他所谓的“机械和物质文明”;而布鲁姆的“具体所指”或语境是作为事实的美国社会的多元化,针对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因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布鲁姆提倡“通才教育”的实质是强化美国文化的西方传统,对 WASP 价值的认同,强化年轻的美国人——未来美国的领导人——对西方价值的认同,以对抗“非我族类”文化对美国主流的侵袭。^⑨

但对于新保守主义者及其同路人来说,这种差别于维护美国文化之正统并无关系。在多伦多大学教授古典政治哲学的克利福德·威尔逊(Clifford Wilson)于 1996 年在《公共利益》上撰文,悲叹阿诺德传统在北美大学校园中的失落。在他看来,阿诺德的那种高等教育观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就已受到挑战,从

纳粹德国逃到美国的难民所带来的与阿诺德观念不相容的新的“文化”观念就是挑战者之一。这种新文化观强化了此前即已进入美国学术界特别是人类学界的德国哲学的影响,其中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文化相对主义”流毒极广。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每一个人类群体都有“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是指社会实践的总体),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因为并不存在衡量文化演进的中立原则,所有的原则无不与特定文化相关。从一开始,文化相对主义就为进步主义者所欢迎,因为他们认为文化相对主义支持了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支持对多样性的容忍。到1950年,它已成为美国自由主义和学术界的主导信念。克利福德·威尔逊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不仅包括文化相对主义的信条,还包括民权和其他解放运动、非西方学生大量涌入美国大学、庆祝“差异”的“后现代主义”等的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把60年代的反美主义和反西方主义也包含在多元文化主义之中,从而将抨击的范围扩大到所谓的“自我贬低”。克利福德·威尔逊自认,他不是反对宽容、多样化,他反对的是多元文化主义的这项要求——对所有文化的平等“承认”(recognition)。从根本上说,没有人知道对所有文化的平等“承认”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真正相信所有文化是平等的,所有文化都得上无条件承认,对不同文化予以不同对待是合理的。当然,在实践中,“承认”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包括增加每一种文化在课程中的“代表”,让每一种文化的拥护者在校园内拥有自己的领地:课程、项目甚至居所。它还促进了这样一种倾向:依其归属对待学生,而非将他们作为个体。他说他并不反对开设其他文化和族裔的研究课程,但是以多元文化主义为旗号的课程扩展并非如此,所开设新课是对现存实践的批判、改变核心课程或其他课程教授的方式。克利福德·威尔逊进一步指

出,多元文化主义的实际表现说明,它不是一种思想,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是“对目前西方、北美文化的表达。多元文化主义的燃料是‘后现代主义’,从理论上欢庆‘差异’”。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西方哲学的后裔,那些形形色色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后现代主义者仍处于这个西方的思想框架之中,使用的正是这个西方的话语。因此,在他看来,与其说多元文化主义要让西方学生严肃研究非西方文化,不如说是想让西方学生相信对西方文化的某种阐释。相应地,多元文化主义者对非西方文化的表述倾向于服务于他们对西方的批判。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的理解是政治的,而非人类学的。对于严肃的非西方文化研究,如具有伟大文明的古代印度、中国或中世纪的伊斯兰,多元文化主义者并无兴趣。对于他们来说,文化是一个标签,表明了某群体受忽视或压迫的程度,以此来批评西方的压迫性,所以女性、非裔美国人和同性恋都被算做“文化”。对多元文化主义者来说,非西方文化只是他们引入目前西方情节剧的演员;伟大的文明开始于非洲,希腊人从非洲窃取了文明;美洲印地安人是环境的保护者。这些半真半假的观点不仅让学生们获得对其他文化的错误认识,也使学生们得到对自身文化的错误理解。多元文化主义造成的最大伤害是对西方“文化”的教授。最主要的就是夸大西方的罪孽,人类的所有罪恶如种族主义、帝国主义都是西方的。研究自己的文化有批判精神是必要的,批判精神是浅薄的派别之见的解毒剂。然而多元文化主义却支持派别之见,一味地反西方,为此,必须贬斥西方文化的所有产物。^⑥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马克·法尔科夫(Mark Falcoff)则更进一步,认为冷战后,整个西方世界的左派就只剩下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了。1992年,他在《评论》上评论社会学家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所著《反美主义:来自国内外的批

判,1965—1990》(*Anti-Americanism: Critiques at Home and Abroad, 1965—1990*)一书时,写道:“自越南战争结束以来,这可能是西方左派惟一真正的意识形态了;但只有现在,随着共产主义的消失,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法尔科夫认为,正像霍兰德正确指出的那样,反美主义是敌对文化兴起的结果;敌对文化首先兴起于美国然后才在其他国家出现,敌对文化在美国最为繁盛,其他国家的敌对文化几乎都是美国的分支。因此,反美主义首先是美国国内的现象。自越南战争以来,由于左派已经有效地控制了美国的文化,反美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国内的正常现象,在美国社会的一些小团体、某些环境中特别是大学、教会和媒体当中,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按照法尔科夫(霍兰德)的说法,反美主义者一贯宣扬的观点是:“没有哪个社会比这个社会(指美国)更低劣,不曾有社会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畸形未在美国繁盛过的。”这种不说美国一个好字的做法已经使得“正常的社会异议”(normal social dissidence)被抬高到某种类似于“国家自我仇恨”(national self-hatred)一样的东西。美国左派虽然没有成功地将其政治议程强加于国家,却经常能将他们的某些观念引入主流的文化辩论之中,结果是人们在主流媒体的世界事务报道、主流新教教会的声明、出版社和期刊的严肃出版物中,都能看到法尔科夫所谓的“温和左派观点”(soft-Left perspective)——几乎总是在谴责美国政策的过失。霍兰德认为,左派的反美主义是乌托邦冲动受挫所致,也是感觉孤立的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决意在生活中寻找意义的结果;因此,社会抗议成为寻求位置(status-seeking)的一种形式。而在法尔科夫眼中,霍兰德的这种解释并不完全,因此,他补充了一个标准的新保守主义解释即新阶级式的阐释:霍兰德没有注意到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主流基金会的激进化,在民主党在国会占优

或控制白宫时,还要加上政府提供资助机构的激进化;因此,对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说,参加左翼活动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可进入中产阶级上层的职业。^①

新保守主义者对“反美主义”的警觉和批评有时甚至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1994年9月28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递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关于美国国内人权状况的报告。这份由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司制定的报告在基本肯定美国国内人权状况的同时,也指出,少数族裔争取权利的斗争和某些法律对人权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这份大致客观的报告特别是后一方面的内容,让新保守主义者大发雷霆,迪克特在当年11月的《评论》上猛烈抨击了报告,认为报告是由美国政府机构和官员对美国发起的攻击,是十足的自我贬低的行为;她文章的标题《国务院反对美国》(The State Department vs. America)暗示国务院不再代表美国的利益,国务院是反对美国的。^②

更为疯狂的举动发生在“9.11”之后,所有批评布什政府及其政策的人都被被认为是不爱国的。2001年11月10日,新保守主义政治活动家林恩·切尼(目前副总统切尼的夫人,1986年5月至1993年1月担任国家人文基金主席,卸任后进入新保守主义者的大本营——美国企业研究所)控制的美国校董和校友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发表一份报告,称“9.11”之后,几乎所有的美国人对恐怖主义袭击的反应都是愤怒、激昂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支持军事干预(报告没说对哪里进行军事干预),但是在学术界并非如此。报告写道:“当两党的官员和所有政治倾向的媒体评论员谴责袭击并追随总统将袭击称为邪恶时,许多大学教职员提出异议。一些人拒绝作此判断,许多人提出容忍和多样性是邪恶的解毒剂,一些人甚至指责美国自身而非恐怖主义者。”报告列举了那些“9.11”之后

发表“不爱国声明”的大学教职员的名字和单位,以及作为代表的115条“不爱国声明和举动”。^③2002年11月18日,在伊拉克战争的战鼓声越敲越响、反战派和主战派的争论也越发激烈之际,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中的中东问题专家、理查德·帕普斯之子丹尼尔·帕普斯(Daniel Pipes)在网上发表文章(文章先后出现在History News Network网站、《纽约邮报》和《耶路撒冷邮报》上)指名道姓地攻击一些反战学者,其中包括诺曼·乔姆斯基(Noa Chomsky,麻省理工的语言学教授)、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哥伦比亚大学19世纪美国史教授)和格琳达·吉尔摩尔(Glenda Gilmore,耶鲁大学美国南方史助理教授)。小帕普斯在这篇名为《为什么那么多教授恨美国》的文章中指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既残忍又危险,“可是如果你去一所美国大学的话,你常常会发现你走进了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在那里,教授们认为美国而非伊拉克才是问题,石油而非核武器才是问题的关键。”按照他的文章,方纳说,对伊拉克先发制人的战争“会使我们回到丛林法则观念”。方纳还深信先发制人打击正是日本用来为进攻珍珠港辩护的那种论断。吉尔摩尔告诉她学校的报纸说,与伊拉克的冲突是扩展美国权力的阴谋,她断言,这只是“布什把我们国家转变为一个不能容忍反对的侵略者国家计划的第一步”。在小帕普斯看来,这种仇恨美国的情绪在美国学术界已经司空见惯,“几十年来,美国学术界一直是与这个国家其他部分最为疏远的美国主要机构。”小帕普斯认为,批评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反对拟议中的伊拉克战争就是和萨达姆政权站在一起,他提议,现在已经到了监督美国大学的教职员和管理当局的时候了。^④方纳和吉尔摩尔进行了反驳,他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危险的和压迫性的政权提供任何辩护,相信一个政权是压迫人的是一回事,认为美国

有权充当全球警察的单边主义角色是另一回事”；而小帕普斯“把反对政府的政策等同于恨我们的国家，这显示他是敌视民主政体的本质：异议的权利”。^⑤

对反战派最持久、最疯狂、最不可理喻和最富“想像力”的攻击来自戴维·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霍洛维茨本是60年代新左派的建立者之一，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第一次政治示威的组织者之一；曾长期担任新左派刊物《堡垒》(Ramparts)的编辑。但在70年代后期或80年代前期改变立场，1986年6月《评论》刊载他的一篇讲话——1986年4月4日，他在伯克利的一次会议上发言，力劝他原先的左派同志改变或重新思考他们反对美国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立场^⑥——应是新保守主义阵营接纳他的标志。笔者检索了2002年9月10日到2003年9月11日他所写的12篇相关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将那些组织反战示威的人称为“仇恨美国者”(American Haters)，说他们和恐怖分子一样认为美国是魔鬼——“这是这个国家中令人恶心的第五纵队的信条，这个第五纵队的基地在信奉政治正确的大学，其思想领袖是诺曼·乔姆斯基和霍华德·齐恩(Howard Zinn)”。在2002年10月28日的文章中，他将此前华盛顿的10万人反战示威说成是“10万共产党员进军华盛顿帮助并安慰萨达姆·侯赛因”，反战示威者“既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反战分子。他们是反美的激进派，其梦想是美国的共产党革命，但其近期议程是在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中挫败美国”。2003年2月17日，针对2月15日在全球发生的反战大游行，霍洛维茨称为“拯救萨达姆的游行”；“游行的组织者都是共产党和其他极权主义的支持者，是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第五纵队。”3月10日，他在名为《恐怖分子的人民前线》的文章中开篇即说：“要想在反恐战争中获胜，有必要认清敌人及

其战略,知道敌人如何建立联盟,了解敌人为了实现其目标如何制定战术。……现在威胁的宗教根源是激进的伊斯兰,但其政治却是冷战时期共产党左派的惯用战略。”即所谓的人民阵线。现在在美国国内,共产党和激进的穆斯林已经结成联盟;“美国是世界侵略者——魔鬼撒旦——的信念是一种准宗教式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锻造了无神论的共产党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联盟。”3月17日,即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开始当天,他说,第五纵队正准备在美国国内发动他们自己的战争。计划是在全国各城市制造混乱,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吸引国内安全力量的注意力,为国内的恐怖分子制造机会。其余的第五纵队成员还计划入侵军事基地。他建议对这些人加大处罚力度,国会还应该考虑重新起用反煽动暴乱的法律。霍洛维茨还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民主党,在7月21日的文章中,他说,民主党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一直扮演着经典的绥靖者的角色,而现在民主党已经由绥靖党变成了暗中破坏的党(the party of sabotage);在同年1月20日的另一篇文章中,他暗示,由于“这种反美的支持美国敌人的运动在民主党内扎根甚深”,美国人民有必要重新思考两党体系,不能将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任交给一个反美的、支持美国敌人的政党。^⑦

在批评国内左派时,新保守主义者始终极富“想像力”地将来自“外部邪恶的威胁”和国内的“颠覆”危险联系在一起,从而在部分人那里表现出麦卡锡式的“歇斯底里”。即便不像上述小帕普斯和霍洛维茨那样“疯狂”的人,其主张也同样是极为意识形态化的。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克劳瑟默就指出,美国现在的文化主张——与多元文化主义、扩散认同、教育课程变化、“政治正确”等等问题有关——正在分割社会的一致和“美国的观念”,以致于作为结果的“巴尔干化”引起了“后苏联世界

的外部行为体无法匹敌的威胁”。和70年代晚期波霍雷茨所大声疾呼的一样，克劳瑟默警告美国人，这些所谓的内部颠覆分子可能会降低国家对未来邪恶势力的警惕。同样地，另一位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林德在90年代中期因不满新保守主义过分的党派倾向而转入自由派阵营——也断言“文化”必定成为新的、保守的外交政策议程的基础，因为自从“1683年土耳其人最后一次围攻维也纳以来”，西方文化就处于最“直接的攻击”之下。这种威胁的发动者被认为是国内“‘政治上正确’的激进分子和国外‘其他的文化’”。^⑧

抛开这些过分意识形态化和没有道理的攻击不说，且让我们看看那些仍在一定程度上能坚守事实且真心想解决问题的新保守主义者(绝非偶然，他们大多数是学者)为美国文化危机开出的处方。对于不同的具体问题，不同的新保守主义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他们在所有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只能综合他们针对文化危机的两方面——社会的去道德化和中心的失落——分别提出的一般性建议和主要的执行手段。

就前一方面来说，新保守主义者呼唤德性和宗教的回归。希默尔法伯指出，既然维多利亚时代的经验已经告诉现在的美国人德性的重要性，那么德性的回归显能帮助美国人解决他们面临的社会—价值问题，造就一个健康的美国社会。她写道，“如果在一个经济和社会迅速变化的时期，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展现了他们”道德水平的“实质性改进”，那就意味着“经济和社会变化并不必然导致个人和公共的(道德)混乱。如果他们能够保持甚至加强根源于宗教和传统的时代精神，我们可能并不像我们原先想像的那样受我们时代的物质状况的约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后工业化的经济并不必然包含一个后

现代的社会或文化,更不用说一个去道德化的社会或文化了。”^⑧詹姆斯·威尔逊早在1985年就建议回归传统的政治观。他认为,“对政治的传统理解是,政治的目标是改善其公民的品质(character)。”要恢复这种传统,“基本的第一步是要承认,在根源上,在公众关心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领域内,我们要寻求诱导人们有德性地行动,……”何谓德性或美德呢?德性“意指适度行动的习惯;更具体地说,行动时,个人冲动要受应有的限制,应该考虑到他人的权利,以及对行动长远后果的合理关切”。^⑨

沃尔特·伯恩斯以他对美国开国之父们思想的理解为威尔逊和希默尔法伯对德性的呼唤提供了合法性,在1997年发表于《公共利益》名为《认真对待德性》的文章中,他说,美国开国之父们一致认为,自由政体不能无视其公民的道德特性,为此,必须采取措施塑造公民的道德特性。尽管《独立宣言》和《宪法》并未提到和促进德性或约束堕落有关的任何事情,但是《宪法》却为制定促进公共道德的法律留下了空间。这些法律不仅约束不道德或下流的言行,还应涉及父母对子女的保护、界定家庭的标准、公共(和私立)学校教师的资格、学校中行为的规则和权威等等。针对那些将个人自由和权利推至极端的人——伯恩斯称他们为“穆勒自由派”——坚决反对审查色情产品的做法,伯恩斯认为这不仅在实践当中造成了对他人和社会的长远损害,从而是不合乎德性的,而且在道理上也是荒谬的,甚至误读了穆勒本人的观念。伯恩斯指出,目前美国的“穆勒自由派”有两种论断。一种是“自由至上主义”的论断,持此种论断的人将个人的自由选择权置于最高地位,或用穆勒在《论自由》中所说的,一个家长制国家通过对可读或可欣赏之物加以限制,就禁止了“人领悟、判断、鉴别、感觉、精神活动甚至道德偏好的能力”。伯恩斯认为,至少从绝对的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培养一

人更高能力时所包含的因素多且复杂,许多因素都依赖于对人本身的品性的选择。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选择完全追求最大物质享受和情感满足(sensual gratifications)的生活方式的人,不可能发展出这些更高能力。穆勒显然知道这一点,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中,他将这些称为“低等愉悦”,自由原则必须由其他对于好生活和好社会来说至为基本的其他原则来支撑,如正义、德性、共同体、传统、审慎和适度。令伯恩斯感到沮丧的是,美国的一些法官并没像穆勒那样看到这一点。“他们只是使选择自由最大化,因为选择自由会使我们更愉快,但拒绝相信某些愉快是较低等的;或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第一修正案要求他们平等地对待所有的言论或表达。”由此,就进入了第二种论断即“平等主义论断”,此论断可通俗地表达为“对于一人来说,俗不可耐之物恰是另一人的田园诗”。伯恩斯认为,当代美国自由派哲学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鼓吹的平等生活方式和平等权利理论是“平等主义论断”的代表。德沃金的基本主张是,“人们(包括色情小说作家、吸毒者、性施虐受虐狂等)有权不受社会物品和机会分配时的不平等对待(disadvantages),……他们的官员或同胞不能仅因为认为他们对何谓自己生活的正确方式的观点是不高雅的或错误的,就不平等地对待他们。”在伯恩斯看来,宪法的制定者从未承认过这种权利,德沃金的主张是荒谬的。^⑧

如何回归德性呢?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至少有三种可行的途径。

1. 立法。伯恩斯在上面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即制定法律来促进公共道德,约束或禁止那些不适当的言行。希默尔法伯更为明确地提出了进行道德(morality)立法。她说,面对美国目前的社会问题,许多保守派转向了中间机构或市民社会:家庭、教

会、社区和其他志愿组织。但是，国家支持的主导文化是个障碍，官方的言行正是这一文化——过去的反主流文化——的反映：“另类的生活方式”（alternative lifestyle）、性教育、在学校分发避孕套、禁止学校的祈祷、不牵涉道德评判的社会政策等等。仅仅依靠私人团体和志愿活动来反对这种受国家支持的价值观是不够的。价值观念需要合法性，至少“需要不被非合法化（illegitimated）。”在一个世俗社会中，主导文化、国家和法院，掌握着合法化或非合法化的权力。针对通常认为道德无法立法的观点，她认为事实上是可以对道德立法的，民权立法——禁止种族歧视的民权立法，不仅从法律上也从道德上禁止种族主义行为——就是先例。^⑧

2. 教育。1993年《公共利益》上的一篇文章对大中小学的道德规范教育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首先，学校应制定强调礼貌（civility）、亲善、自律和诚实的行为准则；其次，当教师教导孩子们要基本能做到庄重（decency）、诚实和正直时，不得指责教师是对孩子洗脑；最后，应当经常给小孩子们讲述能加强善良的故事，大中学的学生应经常阅读、研究和讨论道德经典著作。总之，教师必须帮助学生熟悉文献、宗教和哲学中的道德遗产。德性是能够被教授的，最好的道德教育首先能够让学生们深切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品质是至关重要的。^⑨

3. 恢复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功能。新保守主义者强调这一点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们和大多数社会学家一样一直认为，美国社会一价值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社会结构深层的本质性威胁——家庭价值观的衰落与家庭的解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莫伊尼汉就指出，黑人贫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家庭的破裂。出生在破裂家庭中的儿童，由于缺乏正常儿童成长所需要的精神和道德关怀，极易在高中毕业之前就走上未婚

先孕、甚至吸毒和其他形式的犯罪道路，并因此而辍学。他们成年之后，因为缺乏教育和技能又往往难以找到工作，而不得不依赖政府救济，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由于他们从没有过正常意义上的家庭，其子女出生后，往往又走上了与他们相同的道路：从小依靠政府救济——吸毒、犯罪——辍学——长期滞留社会底层。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有问题的家庭孕育有问题的孩子，有问题的孩子导致有问题的社会”这一恶性循环模式，让美国政府和社会头疼不已的底层阶级问题始终难以解决。⁶⁸而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家庭价值观的衰落与家庭的解体又与自由派精英的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詹姆斯·威尔逊在1993年说，当代美国有两种不同的家庭观念。一种是公众相信的家庭观：家庭是向下一代灌输大多数基本价值观念的地方，这些价值观在近几十年来的削弱，原因之一就在于家庭被削弱了；由于家庭是如此地重要，政府、政治家和社会应当更加重视家庭，双亲之一应当留在家照顾孩子，这样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另一种是政策精英的家庭观：正常的双亲家庭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重要。威尔逊本人显然是赞成第一种观点的，在1998年的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家庭是公共生活的基础，孩子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们的早期经历所决定，稳固的家庭可以减少底层阶级的数量。威尔逊不仅强调家庭的实际重要性，还从理论层面将家庭和道德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新保守主义者强调家庭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威尔逊认为，人天生地有某种道德情感，人们也总是倾向于做道德评判。换言之，我们道德生活某些方面是普世的（universal），文化多样性不是故事的全部，还存在着普遍的道德。普遍的道德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universal rules），而是“普世的意向”（universal dispositions）。由于规则“反映了道德情感针对经济环境、社会结构和

家庭体系诸现实情况而做出的调整”，这些现实情况各地差别很大，所以规则不可能相同（即便如此，仍能发现一些相同的规则如反对乱伦或杀人）。要想寻找人性中的普遍一面，就要深入规则和环境的背后去探询哪些根本的意向（disposition），这些意向就是普世的。这些意向中最根本的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而孩子也正是从父母那里、在家庭中获得了道德感——包括公正、自我控制、良心、对他人的责任等等。⁶⁸无论出于哪一方面的原因，新保守主义者都认为恢复传统的家庭既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更可促进道德规范的复兴。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强调德性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性也就意味着回归宗教。纽豪斯作为新保守主义者中为数不多的宗教界人士在这方面无疑最有发言权。他认为，很大程度上，政治是文化的功能（function），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更具体地说，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中的观念（ideas）（文化）所控制，而最强有力的观念就是实质上的宗教（尽管不是名义上的）。因此，美国民主的道德（democratic morality）实质上是宗教性的。从实际情况看，“关于美国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美国人自己的理解中，他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他们和那些非基督徒都认为，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道德。”当然，对于纽豪斯这位曾与马丁·路德·金一起为黑人平等权利斗争的路德派牧师来说，他并非偏狭的宗教极端分子。他所希望的是宗教在规范道德和社会行为方面的应有作用，希望美国人能够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尊重宗教的角色。所以，他在评论80年代社会科学家们对米德尔敦的调查时，说：“米德尔敦人认为：任何人特别是国家干预别人的心灵是错误的，是道德上的错误。换句话说，容忍那些在上帝意志问题上与我们观点不一的人，正是上帝的意志。尊重那些有不同信仰或者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

人,不是出于对宗教的冷淡,而是出于对宗教的信奉。……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它对美国宗教自由的未来则是个极好的消息。”^⑥

如果说强调宗教对于纽豪斯(还有诺瓦克)来说始终是十分自然的,那么从强调德性进而到强调宗教,对于很多新保守主义者特别是他们中的犹太人来说,却是一个十分困难、勉强但又必然的转变。阻碍这种转变的因素有两方面:其一,犹太裔新保守主义者根深蒂固的世俗性。克里斯托在剖析60年代反主流文化时曾说,世俗人文主义和敌对文化孕育了反主流文化。同样的论断也适用于作为一种思想现象的新保守主义,说到美国的知识分子对现代主义的了解,大概没有哪个群体能比得上出身于纽约文人的新保守主义者了;也正是因为他们受现代主义影响之大、对现代主义了解之深,才使得他们对二战以后各种左翼激进思潮的批判远远比其他保守主义者更能触及其实质。实际上,从心理上说,即便他们转向新保守主义后,仍可从他们对反主流文化的批判中察觉出他们对现代主义的微妙感情。克里斯托在1977年谈到自己年轻时的激进经历时说:“年轻时加入激进运动就像年轻时坠入爱河一般。结果可能证明你爱的姑娘是个堕落的人,但恋爱的经历是极有价值的,不能因为最终的觉醒而被完全否定。”而过去几十年中校园中的学生激进主义更多的是心理现象而非真正的政治现象,换言之,并非真正的激进,用句中国话说,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作愁”或“吃饱了撑的”。贝尔的看法大致与克里斯托类似,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说:“在现代史上,艺术和政治的结合在60年代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紧密。……(但是)60年代的重点不放在思想内容上,而偏重气质和情绪。游击戏剧和示威艺术,除了愤怒,没有什么内容可言。”^⑦说到世俗人文主义,尽管新保守主义

者早已跳出了敌对文化,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是世俗人文主义者。说他们是人文主义的或许比较容易理解,毕竟通过尼布尔、屈瑞林甚至斯特劳斯,他们始终与人文主义传统一线相通;更何况,他们也一直没有放弃人文主义的信念,即只有增加了知识,特别是认识自己的知识(自知),才能使人得到自由。当然,他们也知道人不可能完全自知,知道理性的局限性,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理性,他们相信,人类只有认识到理性手段难免的局限性,那脆弱然而不可缺少的理性手段才能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倒颇近似于弗洛伊德,后者曾说过:“经验教导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极限,超过这一极限,他们的天性就无法适应文化的要求。任何人如果要想做到比他们的天性所能允许的更加高尚,就会患上神经官能症。”^⑧说他们是世俗的,乍看起来似乎与他们自70年代起就强调宗教相矛盾,但事实上并不矛盾。在他们对宗教的强调上,我们既能发现涂尔干的影响,也约略能看见容格的影子。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种道德秩序,它的核心是一整套价值观,一种“集体意识”,宗教不过是其象征性的表现,它的作用是保持神圣与亵渎之间的界限;而对于容格来说,宗教心理功能的重要性不下于涂尔干心目中它的社会功能。容格坚信,人类一旦达到成熟以后的主要特点和需要,就是寻找某种超过自己的东西的精神追求。尽管贝尔曾经否认过他强调宗教是因为其社会功能,但他不能代表其他人。或许对于世俗的犹太裔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宗教除了其社会功能和心理功能之外,也是对人之局限性的警醒,以免“自我”无限膨胀终致滑入虚无主义的深渊。另一方面,他们依然是世俗的。从较为具体的层面来说,这体现在他们对社会科学解释模式及将之用于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衷爱。格莱泽曾说,正是对社会学的研究使他改变了最初对社会主义的信

仰。^⑧从更根本的层面看，他们的确希望世俗信条能帮助人们理解道德，同时亦能赋予人们以德性，给人们以生活的目标。

对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担心和疑虑。在犹太人近两千年的流亡史中，反犹太主义一直是西方犹太人挥之不去的噩梦，而基督教就是反犹太主义的主力。在二战之前的美国同样如此。即便在今天，大多数普通犹太人仍然对基督教特别是 70 年代末期以来兴起的基督教右派心怀疑惧。1998 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许多美国人认为如果大多数美国人深信宗教的话，美国社会会更好：85% 的人认为更相信宗教的父母在抚养孩子方面会做得更好，79% 的人认为犯罪会下降；而且，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担心宗教影响增强会带来负面影响。只有 31% 的人认为对少数宗教的偏见会增加，31% 的人认为政治体系会受到威胁。^⑨但是犹太人是明显的例外，相对来说不那么相信宗教的益处，而更担心其害处。54% 的犹太人认为宗教影响的增强会导致更多的偏见，49% 的犹太人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会受到威胁。新保守主义者或许不像普通犹太人那样担心基督教保守派会导致反犹太主义，然而时不时从基督教右派阵营发出的刺耳之声——特别是与他们十分敌对且在南方福音派教徒中有着巨大影响的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和声势日盛的“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领导人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的言论——却使他们无法完全放松警惕。

但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他们也比以往更加地倾向于宗教了。原因或许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毕竟如波霍雷茨在 1996 年指出的那样，19 世纪尼采的断言“上帝死了”已为 20 世纪的事实证明并未发生，上帝依然活着。“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上帝，除了上帝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人类对意义和安慰的根深蒂固的需要。”^⑩美国社

会一价值问题的日益严重使他们认识到,能导致道德复兴的世俗信条或没有足够的力量,或在美国没有号召力。“上帝没有死亡,但世俗的神们看起来已经死了。”在美国的环境中,看起来惟一能复兴道德和德性的就只有宗教了。

2. “犹太—基督教精神”的一些方面对新保守主义者是有吸引力的,比如人的谦卑(humility)、原罪和理解力的有限(limited understanding)。尽管新保守主义者对海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的警告不以为然,但他们是非常欣赏海耶克提出的这样一种观念:“由于人比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所假设的都更为复杂和神秘,因此,人类对尘世之事只能有有限的理解。”伟大社会项目的失败及其后社会一价值问题的日益严重,也让新保守主义者更加深刻地领会了尼布尔和斯特劳斯的教诲。尼布尔曾从人的骄傲中找到了有罪论的根据,从反面说明人应当谦卑:“人的自我通过权力的骄傲实现自给自足和自我主宰,这种骄傲并不承认人的生命的附带和依附性质,以为自己是自己存在的设计者,自己价值的判断者,自己命运的主人。”从新保守主义者特别是老一代新保守派学者的作品中,尼布尔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而斯特劳斯对他们的影响则远非那么明朗,我们得知这一点主要通过新保守主义者自己的嘴巴,而非他们的著作。2001年,克里斯托坦言,说自己尽管没有跟随斯特劳斯做研究,但在思想上受到斯特劳斯的极大影响。他称,列奥·斯特劳斯成为文化战争中的重要因素,是新保守主义者把斯特劳斯带进了这场战争,斯特劳斯的贡献在于帮助新保守主义者认识到宗教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又说,尽管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和斯特劳斯主义者本人并不相信宗教,但斯特劳斯却让他们认识到宗教的道德维度:“你是否相信(某种宗教)并不重要,那是你与上帝之间的事情;重要的是,你是否是一个相信神圣不可侵犯之

真理的共同体的一员。”^②

3. 新保守主义者对宗教的兴趣绝对不是抽象的政治信念的问题,许多新保守主义者注意到他们过去希望政府做的事情现在正由宗教组织在做,而且效果更好,比如福利。早在70年代,纽豪斯和伯格在他们的合作研究中,就已指出介于“宏观结构”(megastructure)(不仅指国家,还包括现代社会中所有那些大机构)和个人之间的“协调机构”(mediating institutions)的重要性,这些机构不仅可以供应福利,还为共同体提供了道德框架。对这些机构的强调是把新保守主义者带向宗教的另一条道路,因为正如纽豪斯和伯格所说:“迄今为止,宗教机构构成了美国社会中最大的志愿组织网络。”“在美国,以教堂为纽带的团体是公民社会的支柱,有半数的美国人卷入其中(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这一数字平均仅为13%)。宗教社团给人们捐款、受援、举行会议、为其他协会招收会员、获悉公共事务的信息,提供了渠道……这些社团对于那些收入甚微、教育程度较低、也不打算加入其他团体的人特别有价值。”宗教团体在美国的志愿组织中占有相当的比重。199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志愿者组织中,教徒占55%。只有34%的不是与宗教相关联的人参加这类活动。如果考虑到以下的事实,这种情况则更加明显:近60%参加志愿者工作的人在年轻时曾活跃于各类宗教组织中,仅有约37%选择提供其志愿服务的人不曾积极参与过宗教活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前白宫 Office of Faith-Based and Community Initiatives——小布什上台后新设的机构——主任小约翰·吉鲁迪奥(John J. Jiludio, Jr)2002年在《公共利益》上宣称,宗教能改善个人的福祉(well-being)、缓解具体的社会问题。至少三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信仰因素最有益于个人和社会:

(1) 组织(organic religion),信仰上帝、定期参加宗教会所的宗

教活动；(2) 项目 (programmatically religion), 个人参与附属于宗教的组织主持的社会项目；(3) 生态/社会生态 (ecological religion), 无论是否信仰上帝、是否参加宗教活动、参加社会服务项目, 都可能受生态宗教的影响。对于许多都市的年轻人来说, 惟一比酒吧更常见的机构是教会, 他们所见到的惟一没被打破的窗户是宗教场所的窗户, 经常供应他们或他们邻人基本所需和服务的许多社会服务项目就是由社区的宗教领袖主持的。即便他们生活中并无正式的宗教, 他们仍可能受宗教的影响。⁹⁹

4. 文化战争中与部分基督教右派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对“基督教联盟”总干事拉尔夫·里德 (Ralph Reed) 的赏识, 让新保守主义者基督教保守主义在复兴道德规范和德性方面抱有极高期望。1995年, 老克在回顾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历史时曾指出, 宗教保守主义的前途不可限量。他还说, 基督教保守主义尽管早就与传统保守主义建立了联盟关系, 但更易于与新保守主义相处; 正是新保守主义者对福利的批评——福利腐化了受益者的心灵和精神 (传统保守主义往往强调福利浪费了纳税人的金钱)——使得福利改革成为基督教右派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 两派心气相通的另一表现是, 在家庭问题成为所有保守派的流行话题之前, 基督教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都早已关心这一问题。当然, 新保守主义者并不喜欢所有的基督教右派, 他们寄予厚望的是里德。1996年, 《公共利益》的执行主编亚当·沃尔夫森 (Adam Wolfson) 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里德自传的文章。沃尔夫森在这篇文章中对里德赞赏有加。按照他的说法, “基督教联盟”能在美国政治中起到如此之大的影响, 完全在于里德的领导有方和里德的新战略战术。1988年, 基督教保守派牧师、电视福音传道家帕特·罗伯逊加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 最后未能入选。次年, 罗伯逊和里德邂逅。罗伯逊邀

请里德就如何组织草根组织撰写备忘录，里德的备忘录极得罗伯逊赞许。当年在里德的具体操作下，罗伯逊以他竞选中的支持者为基础，成立了宗教右翼最大的政治团体——基督教联盟。里德早年就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从高中时代起就是共和党的积极支持者，在他和罗伯逊相遇时，他的许多观念和基督教右派相近，特别是希望宗教能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更重大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多种方式。里德采取的方式是领导基督教联盟远离过度 and 偏狭，趋向于泛基督教主义（ecumenism）。他认识到，宗教右派卷入 20 世纪美国政治的历史并不太令人愉快，如果宗教要想在美国公共生活中获得应得地位，必须采用新的战术，不能只靠大喊大叫或采取过激行动。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将宗教右派从极度热心的神学政治变成了民主政体内负责任的选手。基督教联盟采用的就是他所说的“联合主义战略”（fusionist strategy），基督教保守派已开始认识到，整个社会的健康不仅依赖于他们的胜利（比如他们最紧迫的目标——结束合法化的堕胎），还依赖于良好的经济、好的学校和起作用的社会福利体系。新战术还强调道德说服的力量和逐步的改革。也正因此，里德一直受到基督教右派阵营内部对手的指责，说他在堕胎问题上过于软弱。新战术还具有开放性，这是里德和过去的宗教十字军战士区别最明显的地方，他勇于承认己方应承担的责任和对方的长处，他写道：“在总体上鄙弃现代自由主义时，宗教保守派必须面临的痛苦真相是，纵观历史，自由派在社会正义问题上一直是正确的。”对于美国黑人，他说，“白人福音派教会有种族主义这项不体面的遗产，背负漠不关心本世纪争取社会正义最核心斗争的历史包袱，这项遗产现在只能由悔改和种族和解来洗刷干净。”他特别提到 80 年代曾红极一时的“道德多数派”领导人杰里·法韦尔，在 60 年代曾和种族隔离

主义者站在一边反对民权运动。说到同性恋,他再次提到法韦尔,说法韦尔对同性恋的态度是“充满仇恨的偏狭”。至于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他充满悔悟之情地承认,过去的新教右派滋养了反犹太主义和反天主教的顽固分子。里德友善和说服的新战术并非仅是技巧,他认为这些是服务于新的目的:不是像过去那样拯救心灵,而是要做“好公民”(good citizenship)。因此,基督教联盟政治议程的核心(这是不可谈判的)关涉生命的圣洁、以婚姻为基础的健全家庭的重要性、扭转道德衰败、停止充满性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对孩子的文化污染、所有美国人的宗教自由包括自愿祈祷的权利。因此,在沃尔夫森看来,里德战略战术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它的无宗派性、开放性和负责任的精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俗性。⁹

5. 维持美国犹太人身份之必要。1994年,克里斯托问道:“如果一个宗教群体出生率很低,与外人的通婚率又极高——50%,它会有何种未来?很明显,它没有未来。”美国犹太人就面临着这样的状况。他指出,今天的美国犹太人即想和基督徒通婚,又想保持犹太人的本色,但这在犹太人仍坚持原先的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将很快成为美国基督徒的多数,自由主义的主流教会虽为犹太人所喜,却必将成为少数派。因此,“现在是美国犹太人该考虑自己的状况及其犹太人在一个更为基督教化的美国之前景的时候了。”“过去两个世纪的自由主义将犹太人从犹太人区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西方社会的平等公民。犹太人必须面对的新挑战是,如何在美国社会中作为平等一员生活”,而又不放弃犹太人身份。他强调,这个挑战是个机遇,让犹太人群体有机会重新确立一个犹太核心、一个宗教核心作为其认同的关键,即便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立刻放弃他们的自由主义。1996年,《评论》在

8月号上邀请方方面面的美国犹太人来探讨美国犹太人身份的保持及其与犹太教的关系。对犹太教的强调由于美国犹太人出现的另一新动向而加强,那就是和以色列关系的淡化。二战后,美国犹太人形成了一种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此公民宗教为美国犹太人认同的构筑提供了框架。这种新的世俗公民宗教的支柱之一就是美国犹太人无条件地忠于和认同于以色列(另一个支柱是大屠杀的记忆)。到60年代末时,批评以色列是极为严重的罪过;换言之,认同并无条件忠于以色列是犹太人认同的新核心,取代了原先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在此公民宗教中,对于许多人来说,参与本地以以色列为中心的组织或活动成为犹太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随后以色列支持的黎巴嫩武装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大屠杀导致了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关系的恶化;其后1987年巴勒斯坦起义的爆发和《奥斯陆协议》都助长了恶化。同时,美国犹太人的代际变化不仅影响了以色列的形象,还影响了犹太人捐助模式的变化。新一代美国犹太人的成长过程并未如他们的先辈那样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很大影响,以色列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并非理所当然。以色列社会的内部变化也加深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疏离感。美国犹太人认同的世俗人文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已日薄西山,本·古里安的自由主义政治已受到宗教民族主义和领土扩张主义——以右翼的利库德集团为代表——的威胁。宗教民族主义和领土扩张主义并不能吸引大多数自由主义的美国犹太人,只能激发极端正统派。由于缺乏共同目标,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事务兴趣的下降,对亲以游说活动的支持在下降,为以色列募集资金变得更困难,许多美国犹太人因为怀疑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而不像过去那样慷慨解囊。总之,美国犹太人开始更关注自己的内部问题。^⑤

如果说新保守主义者对解决社会——价值问题的看法有着较丰富的内容,他们对文化危机另一方面——中心的失落——的答案相对来说简单明了:坚持美国的中心。美国的中心是什么,于他们而言是非常明确的。首先,美国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和新顶峰,无论美国族裔构成、美国社会和文化怎样多元化,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是不能放弃的。其次,美国文化的核心原则是“美国信条”、是开国之父们确立的那些原则、是“多元文化主义之前的个人主义”。至于如何坚持和捍卫美国的中心,新保守主义者并无较为系统的想法。大致来说,有如下几点比较重要:(1) 坚持原先那种成功地融合了欧洲移民的“熔炉”同化机制。对他们来说,一方面,为多元文化主义论者所鄙弃的“同化”观念对于之前来自欧洲的移民来说是个现实;而且同化并不意味着抹去所有的族裔特征,族裔共同体的继续存在也并非意味着同化是个神话。另一方面,人口构成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信条正被或将被其他东西如多元文化主义所取代。“为了实现和谐,我们并不需要剥夺自己的多样性(plurality)。……在美国,观念是产生一统(oneness)和同质(homogeneity)的东西;只要对这些观念的信仰依然强烈,美国就有能力同化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美国信条始终为多样的亚文化、为依然坚持其母国一些传统和价值观的人们留下了空间。但美国的多元主义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由共享的道德和政治框架所划定。否则,美国将受某种族群部落化之苦,整个国家四分五裂。”(2) 爱国主义和公民教育。伯恩斯坦在1997年大声疾呼,美国必须进行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他说,“爱国主义意味着热爱自己的国家,愿意为国家牺牲、战斗。但没有人生来就是爱他们的祖国的。爱国主义是需要教授的或劝导的,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2002年《公共利益》上的一篇文章更打出了“复兴公民战士”(citizen-

solider)的口号。(3) 必须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一方面反击多元文化主义,另一方面坚持西方文化的核心课程。^⑥

(四) 组织活动

70年代末期以来,新保守主义者不仅与过去一样“坐而言”,以文字为武器进行鼓与呼,还开始利用保守主义基金会提供的资源“起而行”,在文化教育界建立各种组织,进行“文化战争”。

1. 资助保守派学生出版物的组织

1978年,利用欧林、斯基菲、史密斯·理查森等保守主义基金会提供的10万美元启动资金,曾任尼克松政府财政部长的威廉·西蒙和克里斯托联合建立了“教育事务协会”(the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Affairs)。协会的使命是:“寻找有潜力的博士生和研究生,通过赠与和奖学金帮助他们使他们被学生接受为领袖,然后帮助他们在行动组织(activist organizations)、研究计划、学生出版物、联邦机构或最主要的期刊杂志找到工作。”教育事务协会对保守主义运动的最大贡献是,从80年代上半期开始资助建立了大量的保守派学生刊物,其中最著名的有达特茅斯学院的《达特茅斯评论》(*The Dartmouth Review*) (最早由德苏扎主编,是教育事务协会第一个资助的保守派学生刊物)、密歇根大学的《密歇根评论》(*The Michigan Review*)、哈佛大学的《哈佛佼佼者》(*The Harvard Salient*)、普林斯顿大学的《普林斯顿托利党人》(*The Princeton Tory*)、弗吉尼亚大学的《弗吉尼亚鼓吹者》(*The Virginia Advocate*)等。莱斯利·莱考斯基(Leslie Lenkowsky)1983年前一直担任教育事务协会财务主管(secretary-treasurer),根据他的回忆,协会最初并没打算资助大学校园内的保守派学生刊物,只是想资助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年轻学者,

但芝加哥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主动找到他们,要求他们资助保守派的学生刊物以与自由派和左派的学生刊物对抗。教育事务协会的领导层认识到,这样做更有利于争取下一代和培养保守主义运动接班人。在去里根政府短暂任职后,莱考斯基1985年回来担任协会主席,并开始着手建立由所有接受协会资助的学生刊物组成的“学院网络”(Collegiate Network),目的是在保守派学生刊物及其编辑人员之间建立制度化和经常的联系。不仅如此,网络还就报纸的内容提供实质性的指导,由该网络资助的《斯坦福评论》(*Stanford Review*)的主编直截了当地承认说,网络的职员“帮助我们形成我们的观点”。2003年1月,《哈佛佼佼者》的一位编辑在《国民评论》网络版上同样指出:“80年代以后的保守主义学生刊物更富有学术性,关心的问题并不只限于校园内的问题,而是国家的政策。许多文章讨论的问题是武器控制、税收政策和教育代用券等。这无疑部分归功于新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比老一代保守主义者更注重学术,特别是在国内问题上。”^⑤

1990年,教育事务协会和“麦迪逊中心”(Madison Center)——该中心由威廉·贝内特、阿兰·布鲁姆和斯特劳斯的另一位弟子哈佛大学教授、一直担任《哈佛佼佼者》顾问的哈佛·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在1988年建立——合并,组成“麦迪逊教育事务中心”(the Madison Center for Educational Affairs)。麦迪逊教育事务中心除了继续通过“学院网络”资助保守派学生刊物外(1990年在该项目上花费超过30万美元),还在合并当年设立了招募少数族裔学生加入保守主义事业的计划。1995年,麦迪逊教育事务中心将“学院网络”工作全盘移交“校际研究协会”(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校际研究协会刚一接管“学院网络”工作,就制造了一起轰动全美的事件

(见下文案例 2, p. 318), 并成功扩大了保守派学生刊物的数量, 从 1995 年接管时的 38 家增加至 2002 年 12 月的 80 家。⁹⁸

除了先后主管资助保守派学生刊物工作的教育事务协会、麦迪逊教育事务中心和校际研究协会之外, 迪克特 1981 年创办的“自由世界委员会”也特别热心于帮助大学校园内的团体, 向保守主义的学生团体提供支持、特别支持那些想创办校园报纸的保守主义学生团体。

2. 教员组织

1985 年, 在教育事务协会和自由世界委员会的帮助下, “全国学者联谊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成立。根据该组织网站上的自我介绍, 联谊会是一个由“大学教授、毕业生、大学的管理人员和董事组成的组织, 致力于推进理性对话使理性对话成为自由民主社会中学术生活的根基”。联谊会认为, “只有通过完全理解西方的思想遗产和当代世界的现实, 公民和学者才能保护我们文明的成就。就这些目标而言, 本组织对学术界内贬低我们社会价值观和制度的看法深以为忧。”具体来说, 让该组织感到忧虑的问题是“学术标准的衰落, 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政治化以及以社会改革取代对知识的追求, 使用性别、种族或其他和贤能(merit)无关的标准来雇用教师、招收学生, 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不恰当地使用性别、种族或其他非学术标准, 对西方文明的教条式敌视并将非西方文化研究变为诋毁美国社会的工具, 缺乏保证通才教育的核心课程或其他要求, 不公正地对待那些被怀疑为持有‘政治不正确’观点的同事, 大学校园内对多样性容忍程度(civility)的下降, 压制学生的言论和结社自由, 大学校园内的种族极化现象以及鼓励种族极化的政策……”等等。因此, 联谊会做了大量工作, 意在: “提高课程的质量和含量, 使高等教育回归其古典功能即为学生打下了解他

们自己文明丰富遗产的基础,维持研究、教学和学术界自我管理的严格标准,鼓励校园内关于当代问题辩论的思想均衡和现实主义,提供对高等教育问题和趋势的有识之见,维护学术自由和校园内外观念交流的自由,创造以负责和成熟方式讨论课程问题的职业论坛,建立一个致力于理性学术研究理想的学术领导层。”换言之,全国学者联谊会就是要反对“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教育和在招生与聘用教职员时考虑种族或性别因素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在联谊会顾问委员会的32名成员中,新保守主义者和斯特劳斯派及其同路人(fellow traveler)有沃尔特·伯恩斯、克里斯托夫妇、哈里·贾法(Harry V. Jaffa)、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科芭翠克·莱考斯基、李普塞特、哈维·曼斯菲尔德、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和詹姆斯·威尔逊;其中,除贾法和曼斯菲尔德为斯特劳斯弟子、伯恩斯既是新保守主义者的主要成员又是斯特劳斯弟子外,其余均为新保守主义者。^④

至21世纪初,该组织的成员已超过4000人,在46个州有分支机构,在美国社会学学会、美国历史学会和现代语言协会中均有代表。除定期出版会刊《学术问题》(Academic Questions)外,联谊会还经常进行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各种调查并发布报告。自成立至今,全国学者联谊会一直受到欧林、布莱德利、萨拉·斯基菲、库尔斯和史密斯·理查森等保守主义基金会的大力支持,1990—1991年,共获得上述基金会的捐助34.8万美元。联谊会的名声大噪是在1990年,当年,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联谊会成员成功地阻止在一门英语课程中包含民权运动阅读材料,还鼓励保守派学生团体成功地发起了断绝墨西哥裔学生报纸的资金来源的活动。联谊会1994年发布报告,强烈要求麻萨诸塞大学系统放弃把少数族裔学生增加到新生的20%的目

标,终止鼓励招聘妇女和少数族裔教职员的项目。报告说,少数族裔学生的 SAT(即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美国高中毕业生的“学术能力测试”,大学主要依此分数来录取新生)分数要低于平均成绩,因此,对于合格的白人学生是不公平的。1996 年联谊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教师中自由派的比例是一般公众的两倍,而保守派的比例仅为一般公众的一半(自认为是保守派的大学教师为 17%,自由派为 37%;而这两项比例在一般公众中分别为 35% 和 17%。大学教师和一般公众中的温和派或中间派的比例相近,分别为 43% 和 42%)。2002 年 6 月初,联谊会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不仅批评“如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这样的学术‘时尚’像奴隶问题那样深深地分裂了美国人,对于美国的未来是极为危险的”,还呼唤“真正爱国主义”的回归。2002 年,联谊会接连发布的两项报告分别暗示,由于自由派教师的影响和自由主义思想及政策在美国公共生活和高等教育中的主导地位,美国 3/4 的大学高年级学生所受的道德规范教育是含糊的即强调个人价值观念的差异和文化多样性,今天美国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尚不及 50 年前的高中生。^⑧

3. 其他组织活动^⑨

新保守主义者除了积极参与保守主义运动争取下一代和改变大学校园内的教学及学术研究等活动外,在断绝“自由主义高等教育”的资金来源方面也十分活跃,这一活动的目标就是将公共部门的资金和私人的捐助从自由化的高等教育目标引到保守主义的目标上来。林恩·切尼在这一活动中起了极大作用,长期担任国家人文基金主席的她,一方面在国家人文基金高层安插新保守主义者,另一方面继续对“政治正确”教育的攻击,反对国家人文基金资助非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在克

林顿当选、切尼去职后,1993年,在欧林、布莱德利、斯基菲等基金会的资助下,包括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在内的保守主义者在纽约大学举办了一次座谈会,目标是攻击已不为他们所控制的国家人文基金和国家艺术基金。从会后出版的会议记录看,他们指责这两家基金正支持思想、艺术或道德价值观念上可疑的计划,资助活动效率极差;基金的活动是对纳税人金钱的极端滥用,应该由市场或消费者需要而非政府项目来决定支持哪些计划、不支持哪些计划。当时的全国学者联谊会主席赫伯特·伦敦(Herbert London)指责克林顿政府在这方面不负责任地使用纳税人的钱,他说,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期设立的这两个基金(1965)一直“假设花钱就必然能带来好的艺术和著名学者”,但事实证明这一假设是错误的。1995年,保守派的批评最终导致了对国家人文基金和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活动的立法攻击,他们建议将两家基金的拨款削减30%到60%,最终废除两家机构。同时,保守主义者还进行了劝说私人捐助者将捐助转投给更为传统的教育机构或学术活动的活动。在保守主义基金会的资助下(欧林和布莱德利提供了启动和运转资金),1994年,校际研究协会建立了“全国校友论坛”(the National Alumni Forum),其使命是“组织校友支持学术自由、挑战威胁思想自由和损害学术标准的政策和实践”,严惩那些没能教授如下“真理”——西方尤其是美国是文明的最佳范例——的教授们,“论坛将帮助校友,引导他们把捐助给予那些会提高他们母校教育水平的项目。”1997年,在切尼的领导下,全国校友论坛——1998年该组织更名为美国校董和校友委员会——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广告宣传活动,告诉世人高等教育出现的问题;让人们熟悉论坛新建立的分支机构“重振学术基金”(the Fund for Academic Renewal)。广告宣传活动将1/3的书面广告放到常春藤联盟的

校友杂志上,广告鼓励校友与论坛联系,利用重振学术基金帮助他们选择资助的对象。根据 mediatransparency 组织的调查,从1997年到2002年,美国校董和校友委员会从欧林、斯基菲和布莱德利等保守主义基金会那里得到24笔捐助,总额为119万美元。^⑩

(五) 文化战争的两个案例

1. 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引发的辩论^⑪

1994年10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全国中小学历史教学中心,公布了《全国(中小学)历史教学标准》(National History Standards)。《标准》一共三部,《5—12年级美国史教学标准》、《5—12年级世界史教学标准》和《K—4年级少儿历史教学标准》(5—12年级大约相当于我国小学5年级到高三年级,K—4年级相当于我们的幼儿园到小学4年级。)《标准》是美国政府中小学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初衷是为全国中小学历史教师提供一份统一的教学指南,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由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全国中小学历史教学中心以前曾制作过历史教学的标准,如《历史的教训》(Lessons From History)等,因此,1992年,负责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教育部和国家人文基金就委托该中心来主持这项工作。为了保证《标准》的学术质量和吸收广泛的意见,中心建立了一个多层次的《标准》制定和审阅机制。一个由30人组成的历史教学标准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History Standards)负责把关,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长于美国殖民地史的格雷·纳什(Gray Nash)为委员会的两负责人之一;来自美国历史学会(AHA)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的一批专家对《标准》的内容、大纲和写作格式进行具体指导,一个由50名专业历史学家和中小学历史教师组成的班子

负责写作；初稿交由相关历史学专业组织和委员会审定，然后再送交“全国历史教学论坛”（该论坛由24个公共团体组成，代表不同的群体，被称为“美国本身的缩影”）征求意见，最后再进行修改并由委员会定稿。经过两年时间，《标准》五易其稿，于1994年10月完成。《标准》特别提出美国史教学应强调美国历史的两个基本特点：第一，美国社会历来存在一个以不同的“种族、民族、社会和经济地位、性别、地域、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而划分的多元化社会；第二，所有美国人又都同时为“美国民族的共同特征”（nation's commonalities）联结在一起。《标准》的制作者希望学生通过在《标准》指导下的学习，能了解美国历史上重大决定和决策的背景和内容，了解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上的不同经历，建立相互的尊重和理解，深刻理解“共享的公民价值”的历史涵义，建立共同的公民认同。最终定稿的《标准》，“注重强调美国民族多元化的历史起源，注重以新的角度去学习传统的历史题目并对传统的历史解释提出挑战，注重强调少数民族和妇女在历史上的作用，注重讨论美国国内与国际历史事件的相互关联。”

不料，《标准》一公布就在美国国内引起了长达数年的争论，其中争议最大的是《美国史教学标准》。反对一派称，《标准》歪曲了美国历史的本来面目，过分强调美国历史上的阴暗面，诋毁美国历史的光辉传统。支持一派则说，《标准》如实地反映了美国历史的成败，尤其反映了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上的经历。数年之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仅限于学术界、教育界和媒体，还惊动了政界。参议院于1995年1月通过决议，谴责《标准》，并威胁停止对《标准》制作单位的拨款；即便在全国中小学历史教学中心迫于压力，重新修改《标准》之后，争论仍没有停息。

在这场争论中，新保守主义者一马当先。刚刚卸任的国家人文基金主席林恩·切尼首先发难，在《标准》正式公布前两周，事先得到《标准》的切尼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对《标准》进行猛烈抨击。在文章的一开头，她就愤怒地写道：“请想像这样一份美国史教学大纲，乔治·华盛顿只露了一下面，且从没被说成是我们的第一任总统；或者……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的建立被认为是重要事件，而美国国会的第一次会议却不是。”这就是《标准》描述的美国历史，“《标准》的执笔者们将省下的钦佩给予了那些没有资格的人、地点和事件，这样的做法是政治上正确的。”在她看来，《标准》的写作班子为了迎合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潮，不惜牺牲美国历史的精华，无视美国历史的优秀传统，仅因为政治上正确的考虑就有意引导学生去学习那些没有什么重要影响的族群和地区的历史。不仅如此，《标准》还大曝美国历史的阴暗面，不讲积极和成就一面；对于非洲和北美原住民社会则只说成就，不谈缺点。为了说明这一点，切尼特意在文章结尾附上了《标准》所提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的次数，比如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19次，三K党17次，帮助营救奴隶的女黑人废奴主义者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提到6次；而与塔布曼同时代的两位白人男性，格兰特总统被提及一次，罗伯特·李将军压根就没提到。许多传统上受美国人尊敬的历史人物受到了与罗伯特·李将军一样的“待遇”，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爱迪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切尼还指责美国历史学会“劫持了标准的制定”，按照她文中引用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历史教学标准委员会成员的话说，在委员会讨论世界史标准时，美国历史学会特别激烈地反对侧重西方。切尼警告说，如果《标准》一旦被批准并实施，美国历史上“大量真

正有意义且重要的内容将开始从我们的学校中消失”。因此，她呼吁国会和有关机构应采取行动，阻止《标准》成为教育美国法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比《标准》所描述的更优秀的人民，我们的孩子们有权利知道这一事实。”^⑤

切尼打响第一炮，其他的新保守主义者和保守派立马响应。克劳瑟默在两周后指出，《标准》“已被教育界的权势集团所劫持，变成了政治正确的经典”。《标准》“绞尽脑汁地褒奖这个国家受到偏爱的少数族裔的成就，突出他们的牺牲；也同样绞尽脑汁地贬低已管理这个国家两个世纪的白人男性的成就，突出他们的缺陷”。克劳瑟默指名道姓地抨击了标准制定的负责人纳什，说纳什代表的新美国史学具有一种恶意倾向：“痴迷于以种族和性别来计算，因为害怕歧视（之恶名）而拒绝运用任何辨别之能力。”在此种倾向下制定的《标准》并不想告诉学生们事实，而是要向学生灌输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即希默尔法伯所说的“种族、性别和阶级决定论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倾向。^⑥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教授、保守派外交事务刊物《奥比斯》（*Orbis*）编辑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A. McDougall）于1995和1996年两次在《评论》上撰文对《标准》作总评，他指出，《标准》根本无助于学生了解美国和世界历史，因为《标准》的期望（expectation）是乌托邦的，方法是非历史的，精神则是“政治上正确的”。^⑦

2. 耶鲁大学退捐事件

1990年，德克萨斯亿万富翁李·巴斯（Lee Bass）向他的母校耶鲁大学捐赠2000万美元，用于开设一门西方文明的课程。五年后，耶鲁大学将这笔捐赠退回，顿时掀起了一场谴责耶鲁大学行政管理部门“激进多元文化主义”的风暴。全国性的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拿它作为文化战争中的最新冲突。《新闻周

刊》(Newsweek)报道的标题是《西方文明的陷落》(“The Fall of Western Civ”),《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 News & World Report)的专栏作家约翰·里奥(John Leo)则悲叹,“西方是如何在耶鲁消失的。”威廉·西蒙在《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保守派控制的报纸——上称,耶鲁事件充分表明“思想和道德破产已经横扫美国学术界”,是正在感染整个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疾病的症候,“敌视西方文明……蔑视捐助者和正直的标准……(是)以政治目标取代思想目标从而颠覆真正学问的越演越烈之趋势的明证。”^⑧全国性媒体报道的全部来源是一篇由耶鲁大学三年级学生帕特·科林斯(Pat Collins)在耶鲁的保守主义学生刊物《光明与真理》(Light and Truth)上所写的文章,科林斯在文章中指责学校校长阻碍“西方文明”项目的实行,还称一大帮教师甚至竭力把钱弄到他们自己的项目上去。《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引用科林斯的话后说,“毫无疑问,教师对西方文明项目意识形态上的反对”导致了退捐;约翰·里奥警告说,这一事件提醒人们注意到,现代大学的校长们为了不伤害校园左派的感情走得多么远。但是,《华盛顿邮报》记者代夫·卡普(Dave Karp)在经过详细调查之后,发现捐款的退还和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关系,只是因为行政部门办事拖拉和预算上的争吵。卡普报道说,事实上,所有卷入这场事件的人都一致认为,从来没有过要把课程脱离西方文明的想法;即使对办事拖拖拉拉感到十分愤怒的巴斯也承认这一点,有人说,“人们正在制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稻草人,这样他们才能把它撕碎。”^⑨

根据卡普的调查,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的确在事件中起了作用,但只是在促使巴斯捐款这一点上,而非退款上。巴斯是在听了历史系主任唐纳德·卡根教授的一次演讲后,决定捐款的。

卡根认为在耶鲁,自由主义的力量已经腐蚀了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正统,他为此十分忧虑;并常常就这一问题大发宏论。富商巴斯在听过老凯根的一次讲座后,决定捐款。但历史系内对如何具体使用这笔钱有争议,帕特·科林斯发现了机会。出版《光明与真理》(1953年由小巴克利创办的学生刊物)的校际研究协会(The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帮助了他,校际研究协会的使命是保证大学教授传统价值观念,避免出现他们所认为的“赶时髦”的女权主义、同性恋和黑人研究的现象。为了确保科林斯的文章能得到全国的注意,校际研究协会在杂志送到学校之前,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并交给科林斯一份记者名单,由他打电话把他们请来。捐款人巴斯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报道时,十分愤怒,而校际研究协会的总裁又亲自飞到德克萨斯让巴斯对报道确信无疑。^⑨

卡普的报道刊载于1995年6月4日的《华盛顿邮报》上,20天后,《华盛顿邮报》又刊登了几封关于此事件的读者来信。其中两封信指责卡普的报道不实。一封来自一个叫斯坦顿·埃文思(Stanton Evans)的校际研究协会成员,他曾在1994年夏天指导科林斯对历史系内就如何使用巴斯引发的争论进行研究。埃文思称,科林斯的研究和撰写文章与校际研究协会没有任何关系,坚持了严格的报道事实的标准;至于他对科林斯的指导,他自称,这并非校际研究协会的授意,更何况他并不能肯定校际研究协会就会发表科林斯的文章。另一封信来自耶鲁的一位老校友、1943级的约翰·麦克林(John K. McLean),此君似乎对整个事件过程很清楚,且与巴斯较熟。按照他的说法,并非巴斯主动向耶鲁捐款的,而是耶鲁前校长本内·施密特(Benno Schmidt)和由卡根领导的一个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十分详细的方案并找到巴斯,劝说巴斯提供资助。巴斯捐款后,在没有通知巴

斯或得到巴斯同意的情况下,历史系内的一些左派教授的确进行了努力的活动,希望把钱挪用于“性别研究”和其他“多元文化主义”项目;但遭到另一部分教师的强烈反对,双方的僵持使巴斯意在资助的西方文明项目拖延了14个月之久。巴斯本人后来知道后很生气,但又希望再给自己的母校一次机会。然而同时,左派教授建立了一个新委员会,继续抵制将巴斯的捐款用于西方文明项目。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并在1994年12月拜访了巴斯,说服巴斯同意将一部分钱用于左派教授希望的项目,作为交换,莱文勉强同意执行原先的项目。事情到此,本该解决了。但据麦克林说,巴斯在获悉一些被选来教授西方文明项目课程的教师的观点后,十分不高兴。比如,在历史系一直教授西方文明课程的戈弗雷·帕克(Geoffrey Parker)教授——他是一位很杰出的历史学家,对欧洲史、地缘政治和大战略都颇有研究——就自称是一位“英国社会主义者”,并宣扬“西方文明最主要的出口物就是暴力”;再比如另一位教授戴维·马歇尔(David Marshall)曾在《纽约时报》上说,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应当作为西方殖民压迫的典范来教。巴斯因此要求耶鲁和历史系挑选的教授需得到他的认可,耶鲁不同意,就把钱退给了巴斯。^①

无论哪种版本的说法更符合事实,单看因报道而起的争执,就已知文化战争战况的激烈了。

① Norman Podhoretz, “Neoconservatism: A Eulogy”, http://www.aei.org/news/newsID.16009_fifter./news_detail.asp。波霍雷茨的这篇讲话后来刊登在1996年3月的《评论》上; Irving Kristol, “American Conservatism 1945—1995”, *Public Interest*, <http://www.thepublicinterest.com/notable/ar->

title2.html; James Nuechterlein, "The End of Neoconservatism", *First Things*, 63 (May 1996); "The Old New Right", *The Economist*, 340/7983, September 14, 1996, S. 3.

② E. J. Dionne, Jr., "Neo-Cons: Who's 'Neo' Now?"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7, 1990, B01; Paul Starr, "Nothing Neo", *The New Republic*, 213/23 (December 4, 1995), pp. 35—38; John Ehrma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85; James Nuechterlein, "The End of Neoconservatism".

③ Sam Tanenhaus, "When Left Turns Right, It Leaves The Middle Muddled",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6, 2000, B. 7; Paul Starr, "Liberalism, Conservat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 the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New York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February 8, 1995,

<http://www.princeton.edu/~starr/libcon.html>。当然,这并不是说,新保守主义者是被保守主义基金会或大公司的金钱所收买了;只是任何一个被卷入保守主义这大漩涡或进入迷宫的人,想脱身出来怕也不那么容易,久而久之深陷其中。实际上,“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这样的例子在学者和知识分子当中还是有的。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约翰·欧林学者约翰·洛特(John Lott)发布了一项研究(调查1977年到1996年的所有美洲国家,他发现允许公民携带可隐匿武器的法律和对公民暴力攻击的下降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关关系),他的研究认为放宽对可隐匿武器的法律限制会减少犯罪;1999年,一家民间组织“暴力和政策研究中心”(Violence Policy Center)进行的调查发现,向洛特提供资助的欧林基金会与欧林公司“关系密切”,而欧林公司拥有全美最大的弹药生产企业——温切斯特弹药公司(Winchester Ammunition)。见 *Violence Policy Center, Funder of the Lott CCW Study Has Links to the Gun Industry*, 1999。笔者并没能找到反映新保守主义者在这问题看法的材料,不过《公共利益》2002年登载的一篇文章或能显露出点线索。在这篇名为“美国和英国的枪”的文章中,康乃尔大学政府系教授杰瑞密·兰波金(Jeremy Rabkin)对乔伊斯·马尔科姆(Joyce Lee Malcolm)的《枪支和暴力:英国的经验?》(*Guns and Violence: The English Experience?*)一书大加赞赏,马尔科姆的研究发现,随

着过去 20 年中私人拥有枪支越来越普遍,美国的暴力犯罪却持续下降;而随着英国近乎全面禁止私人拥有枪支,暴力犯罪却不断上升;马尔科姆的结论是私人拥有枪支有助于个人安全和犯罪控制。见 Jeremy Rabkin, “Guns in the U. S. and U. K.”, *Public Interest*, 149 (Fall, 2002)。

④ Irving Kristol, “O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1, 1977; James A. Smith, *The Idea Brokers: Thinks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pp. 180—181; Sidney Blumenthal, *The Rise of the Counter-Establishm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⑤ William E. Simon, *A Time for Truth* (New York: Berkley, 1978), pp. 208—257。

⑥ Wilfred M. McClay, “Godfather”, *Commentary*, 101/2 (February 1996), p. 62。

⑦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94—596 页;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51—853 页;陈东晓:《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与里根政府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美国研究》,2003 年第 2 期,第 37 页;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储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1 页。

⑧ 《战后美国外交史》,第 855 页、878—881 页;陈东晓:《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与里根政府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第 35—36 页。

⑨ 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Who Won the Cold War?”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Essay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6), pp. 626—628;《战后美国外交史》,第 886—905 页。

⑩ 《战后美国外交史》,第 956 页、950 页。

⑪ 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的简要情况参见 Paul Lyons, “Another Sixties: The New Right”, *Viet Nam Generation: A Journal of Recent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5:1—4 (March 1994); “Richard Perle: The Making of a Neoconservative”, 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 Think Tank 节目主持人瓦滕堡

采访柏尔的文字稿, <http://www.pbs.org/thinktank/transcript1017.html>; Alain Frachon and Daniel Vernet, "The Strategist and the Philosopher", *Le Monde*, April 15, 2003.

⑫ Murray Friedman, "The Rebirth of Neoconservatism", *Forward*, December 13, 2002.

⑬ 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op. cit., pp. 630—631; Irving Kristol, "Coping With an 'Evil Empir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7, 1985, A. 1; John Ehrman, op. cit., p. 152.

⑭ 转引自陈东晓:《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与里根政府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第34页; John Ehrman, op. cit., p. 154.

⑮ John Ehrman, op. cit., pp. 162—163.

⑯ Ibid., pp. 139—141.

⑰ Richard Bernstein, "Neo-Con Culture Warrior Looks Back With Prid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5, 2001, E. 7; John Ehrman, op. cit., p. 142; Irving Kristol, "The Old World Needs a New Ideology",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 1985, A. 1.

⑱ John Ehrman, op. cit., pp. 163—170.

⑲ Neil Jumonville, *Critical Crossings: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Post-war Ame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93—202, 211—221.

⑳ Ibid., pp. 194—198;董鼎山:《美国保守派犹太评论家的思路》,《读书》,1986年第12期;董鼎山:《“纽约文化知识圈”日渐凋谢》,《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14日。

㉑ John Ehrman, op. cit., pp. 142—149, 174—176.

㉒ Irving Kristol, "Taking Glasnost Seriously",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8, 1987.

㉓ Claudia Rosett, "Kristol's New Interest Is Foreign-Policy Forum",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4, 1985, A. 1; John Ehrman, op. cit., pp. 176—178. 关于《评论》四十周年庆的情况,见 Elizabeth Mehren, "Commentary: High Honors for Editor 25 Years Later",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31, 1985.

⑳ E. J. Dionne, Jr., “Cold Warrior Meltdown”,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9, 1990, C. 01.

㉑ Sidney Hook, “Democracy as a Way of Life” John N. Andrews and Carl A. Marsden, ed., *Tomorrow in the Making* (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 1939), pp. 31—46; 瓦滕堡《国家利益》文章的观点和穆拉夫切克的观点,转引自张睿壮:《也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2期,第45页; Ben J. Wattenberg, *The First Universal N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pp. 203—205.

㉒ John Ehrman, op. cit., pp. 153—154, 159—161; Irving Kristol, “In Search of Our National Interest”,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7, 1990; Irving Kristol, “All That Jazz”, *National Interest*, 28 (Summer 1992), p. 110.

㉓ John B. Judis, “Trotskyism to Anachronism”, *Foreign Affairs*, 74/4 (July 1995), pp. 125—126; 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op. cit., p. 631.

㉔ 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op. cit., pp. 631—632.

㉕ Ronald Bailey, “The Voice of Neoconservatism”, *Reason*, October 17, 2001. 克里斯托演讲的内容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网站上并没有记录,只有标题,见

<http://www.aei.org/events/type.past,eventID.149,filter./event.detail.asp>.

㉖ 转引自刘澎:《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朱世达主编,《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4—95页。

㉗ Quoted in Gertrude Himmelfarb, “Religion in the 2000 election”, *Public Interest*, 143 (Spring 2001), p. 23.

㉘ 朱世达:《美国价值的危机》,《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第151页。

㉙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此文是甘阳先生为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的《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选刊》所作的导言),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5—46页;潘小松:《美国“文化战争”与移民潮的关系》,学术批评网。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261&type=1005>。

㉔ 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中的后起之秀、《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编辑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曾以局内人的眼光考察过这一转变。见 David Brooks, "God and the Neocons", *Public Interest*, 126 (Winter 1997), pp. 95—101。

㉕ 对于这种弥漫全国寻找德性的情绪,1994年6月13日的《新闻周刊》特刊发霍华德·法恩曼(Howard Fineman)的特写报道《德性鼓吹者》("The Virtuecrats")。法恩曼在文章中指出,所有的美国人都同意,存在公认的好品性(good character)原则,而现在的美国社会却没能把它们教给下一代。由此,让人们深感不安的犯罪、未婚生育和吸毒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在大多数人承认文化多样性现实的同时,他们也发现,毕竟至少还存在一样绝对的东西即好的品性。所有这些加起来导致了他所说的“德性运动”(virtue crusade),法恩曼预测德性运动将带来一种新的超党派政治和一批新领导人。这些人就是德性鼓吹者,他们都认为政府的紧迫目标就是塑造品性。像迪克特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则十分怀疑克林顿夫妇追求德性的真实性,怀疑法恩曼的乐观预测。见 Howard Fineman, "The Virtuecrats", *Newsweek*, 123/24 (June 13, 1994); Midge Decter, "'Newsweek' discovers virtue", *Commentary*, 98/2 (August 1994), pp. 52—53。

㉖ 朱世达:《美国社会中的文化断裂》,《美国研究》,1999年第3期,第58页。

㉗ J. D. 亨特,《文化战争:定义美国的一场奋斗》(安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㉘ 普鲁士完成德国统一之前,天主教的基地在德意志南部,奥地利是其保护人,新教的影响主要在北部,普鲁士可作代表。他们分别支持大、小德意志的统一方案,当俾斯麦击败并驱逐奥地利离开统一霸业后,天主教会及教众从过去享有奥地利的保护、占着德意志主流教派的地位,突然变成一个失去政治照顾的少数派。在统一运动的后期,天主教徒越来越感到焦急。他们在普鲁士及其他几个南方邦国迅速地团结起来,致力争取生存空间。他们主张维持一个教松散而具邦联形式的统一帝国,使传

统邦国的历史权益能受到尊重。但俾斯麦统一的方向早已决定，德意志“普鲁士化”的前景已越来越明显。天主教徒更被新教同胞视为反对民族统一、缺乏爱国思想及忠于外部势力（罗马天主教会）的异己分子而不受信任。1870年春，天主教徒组成中央党，目标在保障宗教自由、免受普鲁士化的帝国及世俗化自由主义的打击。1971年帝国议会选举，中央党得到57个议席，成为统一后德国的第二大党。中央党要求帝国议会在宪法明文保证，使宗教团体在帝国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为俾斯麦所拒绝。天主教会的要求使俾斯麦逐渐改变了原先对宗教力量保持中立的态度，同时出于控制波兰人和对外政策的考虑，俾斯麦决定加强对天主教的控制。1871年7月，他撤销普鲁士文化部天主教处，抨击该部门代表罗马教廷和波兰人的利益。自此，俾斯麦发动了著名的“文化战争”，先后颁布1871年12月的《布道条款》（禁止教士以讨论国事为名，危害公共和平）；1872年3月的《学校监督法》（国家派代表监督学校）；1873年的《五月法》（取消普鲁士宪法中保证教会独立的条款、拒绝聘任没有取得国立学校及大学资质的神职人员、设立法庭裁决教会事务）；1874年的《民事婚姻法》和《户籍登记法》（必须经民事婚姻途径始受国家承认）；1875年终止对教会的补贴，并干预主教管区的行政权。在文化战争中，德国自由派一直是俾斯麦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俾斯麦和德国政府也是在“自由主义”的大旗下打击天主教会的。由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其中自由派占多数）通过的上述法律执行得十分严厉，以致几年内，普鲁士12个主教管区中，8个没有主教，其中数人入狱，其他人流亡或藏匿。自由派之所以积极支持对天主教会的压制，因为这满足了他们反教权主义的传统。以老的普鲁士贵族为中心的保守派政治力量则因为害怕这最终会损害自己的新教福音派教会的地位，而批评上述措施。天主教会及教徒坚定不移，消极对抗俾斯麦和自由派的高压政策，迫使俾斯麦在1876年以后逐渐放松对天主教的打击，自由派本身又没有力量实现他们的全部目标，文化战争最后以谈判安排告终。见郭小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116—117页；Jeremy Rabkin，“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Culture Wars”，*Public Interest*，125（Fall 1996），pp. 4—6。

② 潘小松：《美国“文化战争”的历史根源》，《博览群书》，

<http://www.gmdaily.com.cn/blqs/blqshomepage.nsf/documentview/2001-09-07-02-200D6783CB30F6B248256AE200135C66?OpenDocument>.

④ J. D. 亨特,《文化战争》,第45—47页。

④ 参见 Amitai Etzioni, “The Monochrome Society”, *Public Interest*, 137 (Fall 1999), pp. 42—56; Richard D. Alba, “Assimilation’s Quiet Tide”, *Public Interest*, 119 (Spring 1995), pp. 3—18。

④ 丁林:《美国的“政治正确”》, <http://www.nfcmag.com/2002-07-02/article/111583.htm>; Sally Covington, *Moving a Public Policy Agenda: the Strategic Philanthropy of Conservative Foundations*,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 July 1997;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和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45页。

④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和局限性》,第52页。王希先生2003年发表于《美国研究》第2期的文章,以“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为切入点对美国“国家利益”构建的分析也很有助于我们对美国“一”的理解。王希:《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问题》,《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第9—30页。

④ Amitai Etzioni, op. cit., p. 56;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Reaffirmed”, Byron E. Shafer, ed., *Is America Different? A New Look a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p. 6—7.

④ 让·克雷夫科尔,“美国人成功的原因”,罗伯特·哈钦斯、莫蒂默·艾德勒、克利夫顿·法迪曼主编,《西方名著入门》“人与社会”卷5,商务印书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1995年版,第628—639页。

④ 美国《宪法》规定:“众议员名额……在本联邦可包括的各州中,按照各自人口比例进行分配。各州人口数,按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该规定已由1868和1913年分别通过的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二款和第十六条修正案修正)(见《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51—752页。)这里的“其他人口”就是奴隶,即便自由的黑人与白人相比,地位也非常低;自由的黑人并非宪法中所说的自由人,而是与白人区分开的异

类。所以,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解决办法是将“自由的白人男性和女性”作为一类,“奴隶”作为一类,“所有其他自由人”另作一类。参见 Nathan Glazer, “American Diversity and the 2000 Census”, *Public Interest*, 144 (Summer 2001), pp. 4—5。

④7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和局限性》,第52—61页;Nathan Glazer, “American Diversity and the 2000 Census”, pp. 12—15;奥利维尔:《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闫循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194页。

④8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和局限性》,第45—52页、62—68页。另见 Clifford Wilson, “All Quiet On the (Post) Western Front?”, *Public Interest*, 123 (Spring 1996), pp. 3—21。

④9 主要参见沈宗美:《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第122—142页。

⑤0 分别转引自沈宗美:《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第121页;朱世达:《美国社会的文化矛盾》,《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第110页。

⑤1 Grant Havers and Mark Wexler, “Is U. S. Neoconservatism Dead?”, *Quarterly Journal of Ideology*, Volume 24, Numbers 3 & 4, 2001.

⑤2 Michael Novak, “Reinhold Niebuhr: Father of Neoconservatives”, *National Review*, 44/9 (May 11, 1992), pp. 39—42.

⑤3 James Q. Wilson, “The Rediscovery of Character: Private Virtue and Public Policy”, *Public Interest*, 81 (Fall 1985), p. 3.

⑤4 William J. Bennett, “Completing The Reagan Revolution: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Policy Review*, Special Commemorative Issue: The Reagan Years (Spring 1989).

⑤5 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缪青、宋丽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⑤6 Randall E. Auxier, “Straussianism Descendant? The Historicist Renewal”, *Humanitas*, IX/2 (1996); Martin Diamond, “The problem of reading in an age of mass democracy”, *Public Interest*, 144 (Summer 2001), pp. 73—

84.

⑤7 转引自 J·D·亨特:《文化战争》,第 249 页。

⑤8 Richard John Neuhaus, "The Culture War Will Continue", *Christianity Today*, 32/15 (Oct 21, 1988), pp. 20—21。

⑤9 詹姆斯·克罗宁 (James E. Cronin) 曾以极为恢弘的眼光透视过冷战结束的世界历史涵义 (world-historic significance) 及其对发达国家政治的影响,他认为,冷战的结束将改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图景,大大地压缩左派在政治上的活动空间,且迟早将改变发达国家国内政治运作的思想框架 (intellectual framework)。见 James E. Cronin, "Economics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Anglo-American Model'",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3/4 (Summer, 2000), p. 781。

⑥0 William J. Bennett, *The De-Valuing of America* (Colorado Springs: Focus on the Family Publishing, 1994)。

⑥1 Gertrude Himmelfarb, "A de-moralized society: The British/American experience", *Public Interest*, 117 (Fall 1994), pp. 71—72。

⑥2 Gertrude Himmelfarb, "A de-moralized society", pp. 57—80。

⑥3 amoral 的准确含义是与道德无关的、不牵涉道德的,和 immoral (不道德的) 的意思不同。

⑥4 Peter L. Berger, "The 19th century & after", *Commentary*, 99/5 (May 1995), pp. 66—68。

⑥5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221 页;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30 页。

⑥6 Irving Kristol, "Counterculture", *Commentary*, 98/6 (Dec. 1994), pp. 35—39。

⑥7 Nathan Glazer, "American Epic: Then and Now", *Public Interest*, 130 (Winter 1998), pp. 3—20。

⑥8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 4—5 页、167—171 页; Clifford Wilson, *op. cit.*, pp. 4—5。

⑥9 朱世达:《多元文化主义》,《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第 178 页。引

文略有变更。

⑦① Clifford Wilson, *op. cit.*, pp. 8—11.

⑦① Mark Falcoff, “America-Bashing”, *Commentary*, 93/4 (April 1992), pp. 53—54. 著名政治学家詹姆斯·W·西瑟 (James W. Ceaser) 在 2003 年的《公共利益》上撰文,考察了反美主义的五个层面及各自的思想根源,见 James W. Ceaser, “A genealogy of anti-Americanism”, *Public Interest*, 152 (Summer 2003), pp. 3—18.

⑦② Midge Decter, “The State Department vs. America”, *Commentary*, 98/5 (Nov. 1994), pp. 65—67.

⑦③ 笔者看到的是 2002 年 2 月重新发布的扩充和修订版,删去了报告初版中的姓名,但言行和单位依然保留。Jerry L. Martin and Anne D. Neal, *Defending Civilization: How Our Universities Are Failing America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Washington, D. C.: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 2002).

⑦④ Daniel Pipes, “Why Do so Many Professors Hate America?” November 18, 2002,

<http://hnn.us/articles/1013.html>.

⑦⑤ Eric Foner and Glenda Gilmore, “Rejoinder to Daniel Pipes: Fighting for Freedom of Speech”, December 30, 2002, <http://hnn.us/articles/1186.html>.

⑦⑥ David Horowitz, “Nicaragua: A Speech to My Former Comrades on the Left”, *Commentary*, 81/6 (June 1986), pp. 27—31.

⑦⑦ David Horowitz, “America Haters”, September 10, 2002; “100,000 Communists March On Washington To Give Aid and Comfort to Saddam Hussein”, October 28, 2002; “Anti-Americanism and the War on Terror”, December 9, 2002; “America Under Siege”, January 20, 2003; “The March To Save Saddam”, February 17, 2003; “The Terrorist Popular Front”, March 10, 2003; “The Fifth Column Left Declares War”, March 17, 2003; “The Second Front”, March 24, 2003; “The Doctrine of Pre-Emption: A Strategy of Realism”, April 15, 2003; “The Party of Sabotage”, July 21, 2003; “9/11 and the

'Anti-War' Left", September 11, 2003. All available on <http://www.frontpagemag.com/Articles/authors.asp?ID=4>.

⑳ 转引自大卫·坎贝尔:《暴力职能:认同、主权、责任》;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㉑ Gertrude Himmelfarb, "A de-moralized society", P. 80.

㉒ James Q. Wilson, "The Rediscovery of Character", pp. 3—18.

㉓ Walter Berns, "Taking virtue seriously", *Public Interest*, 128 (Summer 1997), pp. 122—126.

㉔ Gertrude Himmelfarb, "A de-moralized society", pp. 73—74.

㉕ Christina Hoff Sommers, "Teaching the Virtues", *Public Interest*, 111 (Spring 1993), pp. 3—13.

㉖ 刘澎:《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第95页; Jeffrey O'connell and Richard F. Bland, "Moynihan's legacy", *Public Interest*, 142 (Winter 2001), pp. 95—107; William J. Bennett, "What to do about the children", *Commentary*, 99/3 (March 1995), pp. 23—28.

㉗ James Q. Wilson, "The Family-Value Debate", *Commentary*, 95/4 (April 1993), pp. 24—28; James Q. Wilson, "Human Remedies for Social Disorders", *Public Interest*, 131 (Spring 1998), pp. 25—35; James Q. Wilson, "What is moral, and How do we know it?" *Commentary*, 95/6 (June 1993), pp. 37—43.

㉘ Richard John Neuhaus, "The Culture War Will Continue", pp. 20—21; 裴孝贤:《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第49页。

㉙ Irving Kristol, "Memoirs of a Trotskyis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23, 1977;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71—172页。

㉚ 转引自《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217页。

㉛ Nathan Glazer, "From Socialism to Sociology", <http://www.pbs.org/arguing/nyintellectuals/glazer2.html>.

㉜ Gertrude Himmelfarb, "Religion in the 2000 election", pp. 23—24.

① Norman Podhoretz, “First Things and Last”, *Commentary*, 101/5 (May 1996), pp. 62—64.

② David Brooks, “God and the Neocons”, p. 100; 尼布尔的话转引自《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第 244 页; Ronald Bailey, “The Voice of Neoconservatism”.

③ David Brooks, “God and the Neocons”, p. 100; 裴孝贤:《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 第 50 页; John J. Jiludio, Jr., “The Three Faith Factors”, *Public Interest*, 149 (Fall 2002), pp. 50—65.

④ Irving Kristol, “American Conservatism 1945—1995”; Adam Wolfson, “God and country”, *Commentary*, 102/1 (July 1996), pp. 70—72.

⑤ Irving Kristol, “Why religion is good for the Jews”, *Commentary*, 98/2 (Aug. 1994), pp. 19—21; Laurence J. Silberstein,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The Waning of the American Jewish Love Affair with Israel”,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90/2 (June 2002), pp. 192—197; Howard M. Wachtel, “Beyond Survival and Philanthropy: American Jewry and Israel”,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90/3 (September 2002), pp. 337—340; Jack Wertheimer, “The disaffections of American Jews”, *Commentary*, 105/5 (May 1998), pp. 44—49.

⑥ Bernard Lewis, “Eurocentrism revisited”, *Commentary*, 98/6 (December 1994), pp. 47—51; Glenn C. Loury, “Individualism Before Multiculturalism”, *Public Interest*, 121 (Fall 1995), pp. 92—106; Walter Berns, “On Patriotism”, *Public Interest*, 127 (Spring 1997), pp. 19—32; Charles Moskos, “Reviving the Citizen-Solider”, *Public Interest*, 147 (Spring 2002), pp. 76—85; Gertrude Himmelfarb, “What to do about education-1: The Universities”, *Commentary*, 98/4 (October 1994), pp. 21—29.

⑦ 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Foundation, *Buying a Movement: Right-Wing Foundations and American Politics* (Washington, DC: 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1996), p. 14; Bolek Kabala, “The Alternatives: A brief history and celebration of conservative newspapers on campus”, *National Review Online*, January 23, 2003,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comment/comment-kabala012303.asp>.

⑨8 Bolek Kabala, "The Alternatives".

⑨9 联谊会的自我介绍见<http://www.nas.org/nas.html>;由于笔者对斯特劳斯派的了解不多,因此,其顾问委员会中想必还有作者不知的斯特劳斯派,见http://www.nas.org/nas/bd_advisors.htm。

⑩0 *Buying a Movement*, p. 15; "National Faculty Survey: Regarding the Use of Sexual and Racial Preferences In Higher Education", 16 to 28 October 1996 (Princeton: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1996); Stephen Goode, "NAS' Call To Action", *Insight*, June 10, 2002; "Ethics, Enron, 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n NAS/Zogby Poll of College Seniors", July 2002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and Zogby International, 2002); "Today's College Students and Yesteryear's High School Grads", April 2002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and Zogby International, 2002).

⑩1 本部分主要参考 Sally Covington, *Moving a Public Policy Agenda*.

⑩2 http://www.mediatransparency.org/search_results/info_on_any_recipient.php? 16.

⑩3 本部分主要参考王希,“何谓美国历史?——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引发的辩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第4—40页。除另有注明外,均引自该文。

⑩4 Lynne V. Cheney, "The end of history",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0, 1994, A22.

⑩5 Charles Krauthammer, "History Hijacked", *The Washington Post*, Nov. 4, 1994, A25.

⑩6 Walter A. McDougall, "Whose history? Whose standards?" *Commentary*, 99/5 (May 1995), pp. 36—43; Walter A. McDougall, "What Johnny still won't know about history" *Commentary*, 102/1 (July 1996), pp. 32—36.

⑩7 William Simon, "Paying a Price for Campus P. C.",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10, 1995.

⑩8 John Leo, "How the West was Lost at Yale", *U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3, 1995; Dave Karp, "A Whiter Shade of Yal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4, 1995.

⑩ Dave Karp, "A Whiter Shade of Yale?"; *Buying a Movement*, pp. 31—32.

⑪ "The Bass Dispute at Yal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4, 1995, A. 18.

第六章 新里根外交和伊拉克战争

在波霍雷茨和克里斯托宣布新保守主义死亡仅仅几年后，这两位教父又先后分别暗示和公开宣布新保守主义并未死亡。1999年底，波霍雷茨在总结冷战后长达十年的外交政策辩论时指出，以小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为代表的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所极力鼓吹的“新里根外交”(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已经使得新保守主义者即便在保守派阵营内也成为独特的一群。次年，一位分析家就新保守主义者在 대선中支持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新动向，敏锐地捕捉到新保守主义者此举的用意：小克里斯托为支持麦凯恩不惜得罪党内和保守派阵营内的多数同道，目的在于怂恿麦凯恩打一场“争夺共和党心灵”的战争，更明确地说是争夺对共和党的控制权，或至少不让党内的力量对比不利于己；由于新保守主义者支持麦凯恩，他们在保守派阵营和共和党内都较为孤立。不过，世事难料，“9.11”使得小布什部分接受了“新里根外交”，2002年初以来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辩论则将新保守主义者对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清楚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围绕新保守主义者如何影响乃至“劫持”美国外交政策的讨论——包括最极端者的“阴谋”说——在全球范围内盛行一时，至今不衰。事情至此，老克2003年8月又出来放话说：“几年前我说，新保守主义……已被融入美国保守主义的主流了。我错了，我错的原因是我们所叫的新保守主义一直都属于那种断断续续浮

出水面的思想潜流。新保守主义并非如阴谋论者所说,是一场‘运动’;而是……历史学家马尔文·迈耶斯(Marvin Meyers)所说的那种‘有说服力的信念’(persuasion),它不定期地显现、其意义只有在回顾时方能清楚地为人所理解。以这种方式来看,可以说新保守主义的历史任务和政治目标看起来是这样的:……将共和党和美国保守主义改造为一种适于统治现代民主制的新型保守主义政治。”^①

死死生生,令人不禁有扑朔迷离之感。若细加探究,不难发现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的变化至少直接与以下两大方面的因素有关:第一,如果说最初的新保守主义运动主要是一种思想现象的话,到70年代新保守主义也表现出作为政治运动的一面;80年代以来,尽管思想性的探讨仍然存在,但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意味越发强烈。这就涉及到新保守主义者和整个保守派阵营和共和党的关系,一方面,新保守主义者与思想“敌对权势集团”的关系日益紧密,且利用这种关系,在保守主义阵营内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另一方面,新保守主义与其他保守主义政治派别的关系错综复杂,虽难以一言以蔽之,但与不同的派别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或以合作为主,或又出现纷争甚至敌对。第二,冷战结束使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如何界定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引发了长期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新保守主义者鼓吹的“新里根外交”尽管独树一帜,但并不为主流外交政策界所看重,以致波霍雷茨在1999年底感慨地说,在他们宣布新保守主义死亡后,新保守主义一词除了在极个别情况下,已经从公共辩论中消失不见了。“9.11”改变了这一切,不仅使新保守主义获得了影响美国外交的绝佳机会,也让“新保守主义”一词在全球都声名远播。

一、新里根外交

萧伯纳曾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失去梦想,一是梦想实现。不幸的是,新保守主义者在冷战后同时体会到了这两大痛苦。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及其背后的文化/道德相对主义妨碍一个讲道德的、有凝聚中心的美国的出现,这怎能不让新保守主义者着急和心痛;另一方面,当长期为之奋斗的梦想——打败那个邪恶帝国——终于实现时,举杯欢庆之余却不免有些失落。更大的麻烦出现在欢庆过后,美国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自处呢?克里斯托在1990年不断地自问,冷战结束了,世界的政治地图已经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这个时期非常非常的新,以致人们无所适从:“半个世纪以来,……是我们的敌人界定了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界定的任务落在了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处在茫然不知所措之中,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是如此。”按照他的说法,寻找敌人的过程是必要的,因为“缺乏值得一提的敌人时”,很难“明确制定外交政策。毕竟,是国家的敌人帮助定义了‘国家利益’,无论定义时用什么样的形式。如果没有这样的敌人,国家就会在大量相当琐碎的或者至少是边缘的选择中踌躇。”波霍雷茨更是担心“一个明确的国外魔鬼的消失”,因此,他把1991年的海湾战争看作是美国“使自己重新在道德上武装起来”的机会。若从这个角度观察新保守主义运动在冷战后的发展、分析其外交政策倡议倒是简便,事实上,确有一位加拿大学者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做了。按照他们的说法,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谱系可以追溯到这样一种简单的信念:民众总是需要一个敌人进行战斗,这样

他们才能时刻记得他们文化和政体的有意义和不稳定。这个信念来自于斯特劳斯的老师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自由主义的哲学敌人和纳粹的支持者。后者在1932年的一本书中曾指出：“敌人对于任何政治体的构建来说，都是至为根本的。只有相信存在一个必死之敌才能将普罗大众(populace)连成一体，并赋予政治体以意义。”无论施密特的观念是否成立，这些观念通过斯特劳斯对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影响已经深入新保守主义者的头脑之中。^②

不过，寻找敌人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另一个方面：即以冷战后美国世界地位及其威胁来自何方（这与寻找敌人有关且部分交叉，却不完全相同）的判断为基础的战略认识。尽管瓦滕堡是最早断定美国将“独步全球”并提出以扩展民主为核心的“新天赋使命”观念的新保守主义者，但更详细、更系统的冷战后美国外交倡议首先来自创立单极世界(unipolar world)一词的克劳瑟默。1991年，在《新共和》一篇题为《孤独的超级大国》的文章中，他写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单极世界中。冷战的老两极世界并没有孕育许多人曾预测的、今天仍有一些人坚持的多极世界。而是孕育出一个高度不寻常的世界结构，美国作为惟一的强国屹立于国际体系的顶峰。……在可见的未来，将没有任何国家能比得上美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历史上，这种状况几乎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对于许多人认为第一次海湾战争是多边主义典范的看法，克劳瑟默不屑一顾。对他来说，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有多个国家参与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恰恰是假多边主义的典范。那是因为美国坚

持要多边主义的伪装和外表,大多数美国人怀疑单边行动的合法性,只接受披上“世界共同体”外衣的单边行动,政治领导人为了国内原因而需要“为单边行动穿上多边主义的衣服”;但是,这种做法存在着弄假成真的危险。从更根本的层面上说,美国人对单边行动的怀疑源于美国的一个独一无二之特性:他们不喜欢霸权和帝国,他们对自己国家成为“孤独的超级大国”并不怎么热心;“这就是美国方式”,美国人总是喜欢逃避“历史放在他们肩上的责任”。所以当冷战结束时,美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求“和平红利”,比如单方面裁军。有两种逃避责任的方式:一种是反对美国搀和世界事务的新孤立主义,其中既包含越南战争催生的左翼孤立主义,也包括冷战后复兴的右翼孤立主义,以帕特里克·布坎南和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为首的所谓“古老的保守主义者”(paleo-conservatives)为代表。另一种是多边主义,多边主义者尽管认为美国必须与世界打交道,但又不愿意美国一国包办所有事情,而是希望应更多地由国际组织如安理会等以集体安全和多边行动的方式处理某些事情。克劳瑟默认为,单边主义的“退却”固然不行,多边主义“推卸责任”的最根本问题是会约束美国的行动自由,这两种做法均无助于单极世界的根本性问题:即便苏联威胁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也并非伊甸园;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若美国再“退却”和“推卸责任”,留下的只能是一片混乱。所以美国责无旁贷,必须承担起缔造一个“新世界秩序”的责任。但是克劳瑟默的新世界秩序并非老布什总统的那个将秩序放在首位的版本,1991年4月13日,老布什在莫斯科维尔空军基地强调的那些要素——和平、集体安全、武器控制和正义——本身好是好,却忽略了美国的价值观;而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激发起美国人对这个世界的使命感,就无法表明在国外进行干预的合法性。因此,克劳瑟默提出

了建立另一种新世界秩序：在世界上维护美国利益的同时、宣扬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既然美国已经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那就使用这种支配性地位和优势力量去塑造一个益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秩序；要做美国人认为对的事情，即便这意味着单边行动。他写道：“当现存的国际规则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发生冲突时，让那些规则见鬼去吧。”^③

这种极其浓厚的单边主义味道，使自由派专栏作家盖尔勃（Leslie H. Gelb）给克劳瑟默扣上了“政策一神论者”（policy monotheist）的帽子，^④然而，远比克劳瑟默的倡议更具政策实质性内容、引起更大争议且对美国实际政策有着更大影响的是当时政府内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拟订的一份战略报告。柏林墙倒塌后，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切尼（现在的副总统）组建了一个班子，希望在大战略的层次上考虑美国冷战后的外交政策。成员包括当时国防部的第三号人物、负责政策的副部长沃尔福维茨（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五角大楼的二号人物），刘易斯·利比（Lewis Libby，现切尼的幕僚长）和埃里克·艾德尔曼（Eric Edelman，现切尼的资深外交政策顾问），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和报告的撰写由沃尔福维茨全权负责。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也组建了另一个班子，与之竞争。最后确定在1990年5月21日，两个小组分别向切尼作一小时的情况简介，切尼再向布什总统汇报；之后，布什总统做对外政策演讲，揭示新的大战略。5月21日当天，沃氏先到切尼的办公室，他的汇报时间远超过一小时，但切尼并没阻止他。鲍威尔直到两周后，才得以向切尼介绍他对美国未来对外政策和防御政策的设想。而切尼在向总统汇报时，大多数采用了沃氏的观点。总统在当年8月2日做了对外政策演说，但当天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以没有引起注意。其后，沃尔福维茨小组仍在

继续工作,深化和完善他们的建议。1992年,《纽约时报》获得了沃尔福维茨小组的报告即“防御计划指南”(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做了头版报道。这份被《华盛顿邮报》称为“意在设定国家下世纪方向的秘密蓝图”的报道指出:1. 美国冷战后政治和军事战略的首要目标应是防止一个敌对性超级大国的兴起。“我们的第一目标是防止再度出现一个新的敌人。这是指导新地区安全战略的主导性考虑,它要求我们努力防止任何敌对力量控制这样的地区,该地区的资源若在稳固控制下足以产生一个全球性力量,这些地区包括西欧、东亚、前苏联和西南亚。”“这一目标还有另外三个方面:第一,美国必须显示出建立和维护一个新秩序的必要的领导能力,这个新秩序要能让潜在的挑战者相信,为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他们并不需要去渴求发挥更大的作用或采取更为进取的(aggressive)姿态;第二,在非防御领域,我们必须充分地照顾发达工业国家的利益,以不让他们挑战我们的领导地位或寻求推翻现存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第三,我们必须维持威慑潜在挑战者的机制,使他们甚至不敢去寻求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地区或全球角色。”2. 美国的另一项主要目标应该是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促进美国的价值观念。“通过促进对国际法的尊重,限制国际暴力,鼓励民主政府和开放经济体系的扩展”等来抑制地区冲突和不稳定。指南概括了几种美国利益受到地区冲突威胁的情形(scenario):“如对重要原材料的获取,主要是波斯湾的石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扩散,恐怖主义或地区冲突对美国公民的威胁,毒品走私对美国社会的威胁。”指南还建议对那些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3. 如有必要,美国必须准备单方面行动。指南没有提到通过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指南称,联盟确实有利于集体行动,但是美国应该明白“未来的联盟可能是暂

时性的”，为处理特定危机而形成，很快就会解散。因此，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认识到，“世界秩序最终是由美国支持的”，“在无法促成集体行动”或需要作出快速反应的危机情况下，“美国应该准备单独行动”。^⑤

报道立刻引起了指南是否是单边主义的争论，大多数人是谴责指南的。老布什政府的最高级官员如国家安全顾问斯克考罗夫特和国务卿贝克尔也对报告大为不满，并出面否认指南代表政府高层和总统本人的意见。切尼的人最后被迫拿出了一份经过修改的、不那么强硬的报告结束了争论。不过，当“9.11”袭击发生后，沃尔福维茨的指南稍稍改装（许多语言事实上原封未动）就变成了小布什政府2002年9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成为美国的大战略。按照冷战史家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看法，小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次历史性转变，是自遏制政策以来的美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战略。尽管沃氏的“防御计划指南”和小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都没明确提到“霸权”（hegemony）一词，但事实上就是一个维护美国霸权的大战略。^⑥

这层窗户纸由不在政府任职的新保守主义者在1996年捅破了，当年正是总统大选之年，各派专家纷纷表现，或为本党献计献策，或希望借表现为己谋得进身之道。小克里斯托和罗伯特·卡根也不例外，他们在《外交》的7·8月合刊上发文为保守派支招，鼓吹采取“新里根外交政策”、建立一个“仁慈的全球霸权”（benevolent hegemony）。他们认为，冷战后，美国形成了一种类似于70年代中期的那种“温吞水般的共识”（tepid consensus）：要求卸掉肩上自二战结束以来承担的巨大责任、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使美国外交和防御政策‘回归常态’的强烈冲动，已经导致了更为有限的国家利益界定和美国在海外参与及

防御开支的相应减少。但是,这种共识既不利于保守主义,更不利于美国。美国应该充当“仁慈地全球霸权”。更确切地说,苏联解体后,美国享有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极大优势;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应当是通过加强美国的安全、支持美国的盟友、促进美国的利益、在全世界维护美国的原则维持并提高这一优势。原因至少有两方面:其一,所谓霸权就是一个拥有优势影响和权威的领导国家,而这正是美国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美国的军事力量存在于世界上的所有重要地区,美国居于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美国观念和文化在世界上普遍深入的影响;此外,世界上的大多数主要国家(欧洲和日本)欢迎美国的“全球参与”,“喜欢美国的仁慈霸权而非其他选择”。“现在,美国盟友的主要担心不是美国居于统治地位,而是美国要撤出。”其二,大多数美国人没有认识到,他们现在享有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支配地位,正是他们不想再采取的外交政策和防御战略的产物,因为缺乏对美国至关重要利益的明显威胁。他们没有注意到,潜在的挑战者在即使考虑与美国顶撞之前,就被美国压倒性的力量 and 影响所吓退。因此,冷战后的那个被人们普遍问起的问题——威胁在哪里——被误解了。“在一个和平和美国安全依赖于美国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意愿的世界上,美国现在和未来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它自己的软弱。”“美国的霸权才是防范和平和国际秩序崩溃惟一可靠的措施。”因此,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应是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美国的霸权。为此,美国需要凸显军事优势和道德信心的新里根外交政策。新里根外交政策包含三方面的措施:1. 大力增加防御开支。当时美国的年防御开支在2600亿美元,但在小克里斯托和卡根看来,要想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角色,需要每年再增加600亿—800亿美元;因为现在并不能准确预测美国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冲突(包括现在想像不到的),

所以需要为所有可能遇到的冲突做准备。美国应当向 19 世纪的英国学习,维持“双强标准”,无论是否存在近期内的全球性威胁。“美国军事力量和任何潜在挑战者军事力量的巨大差距对美国和世界都是好事。毕竟,美国的世界角色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角色。华盛顿越能清楚地向世界显示,无论在军队规模还是在技术能力上与美国力量竞争都是徒劳的,像中国或伊朗这样怀有野心的国家打乱现存世界秩序的机会就越小。”而这又意味着美国能在长期内省钱,因为阻止战争比打一场战争更节省。

2. 提高公民参与(citizen involvement)的程度和力度。鉴于“我们社会中军队文化和民间文化日益加大的分离”,总统和其他政治领导人要教育美国公民理解,并参与到其他国际使命中去。比如经过扩大的预备役服役形式能使更多的美国人有军事经历,并欣赏军事美德(an appreciation of military virtues)。

3. 明确的道德性。“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贯穿一种明确的道德目标,应当认识到,美国的道德目标和美国根本的国家利益几乎总是和谐的。美国能赢得现在的强大地位,不是通过采取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外交政策,也不是消极地等待威胁的出现,而是通过积极地在海外促进美国的统治原则——民主、自由市场和尊重自由。”这意味着要向独裁和极权主义政权施压要求其变革,“目标不是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奇想。向独裁和极权主义政权施压的政策有着实际的目标,最终会带来战略收益。”“在全世界支持美国的原则只能通过不断地运用美国的影响来维持。”

在一些情况下,通过对友好国家的援助,可以获得这些影响。但,“有些时候,这意味着不仅支持美国的朋友和向其他国家施加不大但连续的压力,还要在伊朗、古巴或中国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最终目的是带来政权的变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应该盲目地与每一个国家‘打交道’(do business)而不问其政

权的性质。”^①

同年,乔舒亚·穆拉夫切克出版了《美国领导权的诫命:对新孤立主义的挑战》(*The Imperative of American Leadership: A Challenge to Neo-Isolationism*)一书,在书中提出了大致相似的主张。他指出,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应当是活跃的、干预主义的。美国不仅仅要充当世界警察,因为警察是从一个更高的权威那里接受指令,而在国家共同体中,并没有这样一个权威;美国是最富有、最有力量、最受尊敬的国家,有时它必须充当警察,在另一些时候,它必须充当仲裁者、教师或赞助人;简言之,美国必须接受世界领袖的角色。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喜欢让美国承担这一责任,因为他们不喜欢领袖肩负的重担;但一战和二战的历史教训证明,美国不能放弃它应肩负的责任;今天尤其不能这样做,因为冷战后的美国已经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除了颠峰时期的罗马帝国或不列颠帝国尚可比拟外,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历史上无可匹敌的力量。这种地位自然导致美国的领袖角色,若拒绝担任,世界政治仍将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之中:波斯尼亚危机正说明了联合国和欧洲都没有能力来承担这种领导责任。世界需要一个能维护和平和安全的领袖,一个能对危机作出反应、阻止或挫败侵略、处理争议和支持国际法的领袖。简言之,世界需要领袖国家以防止它变成强者任意掠夺弱者的霍布斯式混乱。那么,美国为什么需要世界?美国承担领袖责任的原因是什么?穆拉夫切克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重点批判了孤立主义。根据他的说法,孤立主义者认为,随着苏联的崩溃,地球上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威胁美国;因此,美国能够一方面最大程度地减少我们在海外的政治军事义务,另一方面继续与其他国家的商业关系。不利于美国的事态发展可能会冲击美国的贸易,使美国在经济上蒙受损失,但不会让美国损失生命或自由。但这种观

点是错误的,因为承担领导责任关系到美国的利益:1. 对外贸易并非美国经济中微不足道的部分,而是很大且继续增长的部分;忽视国际政治意味着任由美国的经济成为命运的人质。2. 如果美国撤退,继之在国外发生的大浩劫将使美国重新参与,但恢复秩序的成本将远大于维护秩序的成本。3. 如果美国依然保持对国际事务的冷漠态度,最终将出现一个敌对的大国,它将握有足够的经济和科技资源从而结束美国自然上不受伤害的地位。因此,美国的安全归根结底与维护和平和预先防止一个敌对大国的兴起有关。美国是否有承担世界领袖职责所需要的资源?美国的影响和军事力量比以往更强大,美国比以往更富有。现在,美国缺少的不是影响力、金钱或力量,而是目标;由于缺乏对美国的直接进攻或即将来临的威胁,许多美国人不愿卷入遥远的争论当中,这不仅因为自私,还因为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美国面临的局面近于一战后。既如此,美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当然应是防止大战的再次爆发。穆氏写道:“在威胁变得明显并成为现实时才去应对是很有诱惑力的,但历史告诉我们这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政策的基础不应当是赢得下一场战争,而是要防止战争的发生。”美国必须承担起领导世界之责不仅在于利益,还在于更为无形的因素。如果说,在文化战争中,新保守主义者发现了德性的话,那么在美国的世界角色中,他们则强调荣誉(honor)。穆拉夫切克强调,美国在国际上的行动应当能配得上“荣誉”这个词,荣誉也是一种德性,是自越南战争以来就受到蔑视的德性。荣誉意味着行事正当,它需要遵守诺言并应对威胁。使用力量迫使别国在双边贸易中对美国让步,并不光彩;接受北朝鲜的核武器或塞尔维亚飞机在波斯尼亚上空狂轰滥炸也不光彩。这样会削弱美国的影响,使世界更危险和不可预测;美国的力量如此地强大以致如果美国脱离国际

事务,必定会发生动乱,并最终影响到美国;二战和冷战的经验说明,即便美国选择不理睬野心勃勃的暴君,他们也会觊觎美国的财富并害怕美国的力量,他们会认为美国是他们实现目标的障碍,因而不会放过美国。因此,美国应利用冷战后的优势地位去抑制那些将会威胁美国的敌对力量,扑灭那些骚乱以免其爆发成大冲突,鼓励民主和贸易的增长,这些是领袖的负担。穆拉夫切克特地强调,美国不是帝国,美国希望且只能要的是影响,而非控制。所以,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并不同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或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尽管美国的力量有时是蛮横或压迫性的,但美国使用这些力量是为了解放、为了世界和平与秩序,而非征服。美国不是通过削弱他人来保持自己的地位,美国的一些竞争者如西欧和日本正是美国自己培养起来的。^⑧

不过,也正是在“新里根外交”出炉的1996年前后,克里斯托和波霍雷茨先后宣布了新保守主义的死亡。波霍雷茨还曾明确指出,宣布新保守主义死亡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新保守主义者在外交上没有一致的看法。他说:“新保守主义者虽然不赞同冷战结束后某些老保守派的孤立主义,同时尽管有一小部分新保守主义者仍旧支持源于冷战高潮时反共热情的扩张性威尔逊干预主义,但他们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并没有一致的立场。”的确,直到90年代下半期,新保守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冷战最后阶段出现的那两种不同趋势——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政策征伐论和较为现实的更强调国家利益的一派——仍然存在(详见本书第五章)。比如在促进民主的方式上,科芭翠克尽管认为冷战后美国的使命是扩展民主,但她更强调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她说:“我认为我们需要记住,我们有一项使命。……我们的使命是自由和扩展人权,……只有机会许可,我们将继续鼓励、支持、促进和维持新的民主国家。”“这是一项战斗,一项

在我看来美新署一直发挥最重要和最持续作用的活动。我仍将以以为,信息是最有效、最重要、最安全和最便宜的外交政策工具。”^⑥但是对于有些征伐论者来说,这样的促进民主方式未免有些“不过瘾”。

更为根本的分歧在于对外军事干预特别是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也就是说,在哪些情况下进行干预。克劳瑟默认为,即便美国的对外政策应既考虑价值观念,也考虑国家利益,但后者更重要。只有在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且干预是正义的时候,才可以进行对外干预。所以他强烈批评克林顿政府对索马里、波斯尼亚和海地进行干预的做法,因为美国在那些地方没有重大利益。他在1993年10月22日写道:“那种认为……我们应该在没有任何利益的地方付出鲜血和财富的观念……是没有脑子的干预主义的处方。”《外交》编辑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两个月后在他发表于《评论》的第一篇文章中,也警告说,美国应该以史为鉴,区分何为核心地区、何为边缘地区,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轻重地干预所有地方的事情。但是这样的看法对于罗伯特·卡根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在次年9月发表于《评论》的文章中,卡根批评了扎卡利亚的主张;他暗示,这种有选择地干预实质上只是去适应世界秩序的变化,而非积极地去塑造世界秩序;如果美国因为代价考虑而逃避全球的参与,那将很快不得不为生存而战。因此,他呼唤“全球的活力主义”(Global Activism)。在1996年的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家利益观念事实上是遗传自冷战时期,即便在冷战时期都是有缺陷的,那就是它的狭隘;这样一种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不能适应、更不能用于冷战后的美国外交。在冷战后,维持美国的优势和霸权是最重要的目标,而要成功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更为广泛的理解。穆拉夫切克更明确

地说,虽然从理论上区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相对较为容易,但在实践当中这两者是难以分割开来的。为此,他提出看待威尔逊遗产的另一种方式,更注重威尔逊的基本洞见(underlying insights)而非考虑不周的具体政策,这些基本洞见中最重要者莫过于这一点了:由于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由于美国的力量和理想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且相互加强,美国所自然、必然肩负的重任。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威尔逊是“无牙”的国际主义之父,不如说他是“罗纳德·里根一度好勇斗狠(muscular)且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之政策的先驱”。他进一步指出,

扩展美国力量和影响一直是促进美国价值观最重要的发动机。美国的力量一直是自由和繁荣在全球扩展、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关键。必然的结果是,只要美国一直拥有力量和影响,自由和繁荣就会在全球扩展,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虽然旧世界的外交家及其在美国的亲戚一直蔑视美国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认为是幼稚之举。但是正是因此,美国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事实上,美国政策中的理想主义正是其强大的源泉。

这种理想主义,“有助于激发美国人民做出巨大牺牲,在其他土地上建立(对美国)的同情,使美国力量的存在受其他政府的欢迎而非恐惧。……美国不威胁其他国家的自由或独立,只威胁他们的傲慢或帝国野心。”^⑩

很显然,无论这种全球活力主义叫什么:“新里根外交”、“后里根的里根主义”(post-Reagan Reaganism)(波霍雷茨的叫法)、“威尔逊式的里根主义或里根式的威尔逊主义”(Wilsonian Reaganism or Reaganite Wilsonism)(穆拉夫切克的叫法)甚或年

轻的迈克斯·布特(Max Boot)——此君2003年时仅34岁,是新保守主义者中的后起之秀,现为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欧林资深学者——所叫的“强硬的威尔逊主义”(Hard Wilsonism),其实质就是要建立帝国。其扩张逻辑和言辞(rhetoric)恰如熊彼得近一个世纪前讨论从布匿战争到奥古斯都时罗马的扩张和征服时所描绘的那样:

已知的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不被说成是其某些利益岌岌可危或已受到实际攻击。如果这些利益不是罗马人的,也是罗马的盟友的;如果罗马没有盟友,就虚构出几个盟友。直到最后实在无法捏造出这样的利益时——那有什么关系,那就说国家荣誉受到了侮辱。战斗总是要被赋予合法的光环。罗马总是受到思想邪恶的邻国的攻击,总是在为生存空间而战斗。整个世界充满了大量的敌人,抵挡他们确实无疑的侵略大计明显是罗马的职责。

新里根外交的说辞与罗马帝国扩张时期的说辞是何等的相似,就连诉诸于荣誉这一点都一模一样。尽管穆拉夫切克在强调荣誉时,并未将眼光投向古典时期。但修昔底德的现代阐释者、被克里斯托奉为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一大来源的唐纳德·卡根——他是新里根外交最积极鼓吹者罗伯特·卡根的父亲——在将国家利益和国家荣誉置于同等地位的时候,明确指出:“荣誉是自古典时期以来一直支配……国家间关系的一类关切与动机的名称。它包括诸如寻求名声和荣耀,逃避羞辱和困窘的渴望,……按照特定道德观念行事的决心等之类的因素。”^①

不过,新保守主义者最初在承认“帝国”这一点上始终羞羞答答,这或许是美国人的通病。同样赞许美国应朝帝国方向发

展的英国政治与金融史学家、《帝国》一书的作者福古森(Nail Ferguson)指出,尽管学术界公认与19世纪的不列颠帝国相比,美国更为“霸道”(hegemonic),但美国人就是不愿意将自己视为帝国,而是倾向于使用诸如“领袖国家”(leadership)或更具学术意味的“霸权”(hegemony)之类的词,但无论是“领袖国家”还是“霸权”只不过是帝国的另一个名称罢了。^②

笔者妄测,那些提倡在全球进行积极干预的新保守主义者之所以最初不愿使用帝国一词以及新里根外交最初没有成为新保守主义的主流,主要出于对美国世界地位的不确定的认识。尽管所有的新保守主义者都认为,冷战结束后,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不存在了,美国已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美国经济优势在许多方面被当时日本和欧洲的发展势头所掩盖,“美国衰落”的话题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十分盛行。对于那些认为美国将不会保持头号强国地位的学者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等人,^③新保守主义者恨得牙根痒痒的,一律称之为“衰落论者”(declinist)。罗伯特·卡根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指责说,美国政治领导人之所以接受美国有限的世界角色,原因之一就在于受“衰落论”思想的影响。但是,克林顿时期特别是中后期美国以信息经济为主要拉动力的快速经济增长和长期的经济繁荣,使得90年代后期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不再理会“衰落论”了,他们开始更不加掩饰了。卡根在1998年已可以使用“仁慈的帝国”一词了,他在当年发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文章中进一步阐明了美国霸权的仁慈性,以此为维护美国霸权的“新里根外交”辩护。他宣称,美国与先前的所有霸权不同,美国没有全球野心,具有非同寻常的自我克制。“自美国成为一个大国以来,将其他国家的利益等同于自己的利益一直是美国外交和防御政策最

突出的特征。”“冷战时期,美国的霸权风格反映了其国内的民主政府形式,正像苏联霸权反映了斯大林的统治方式一样。……‘民主的习惯’使得妥协和相互迁就成为美国-盟国关系的规范。这种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并非无私行为的典范。美国人有一本能的见识,这见识以他们在独一无二的民主资本主义开放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为基础,认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通过允许服从自己领导的盟友有极大的内部甚至对外行动自由而会增强。”二战后出现的一种信念已经成为美国人信念的一部分:“他们自己的福祉根本上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福祉;没有全球繁荣就没有美国的繁荣;美国的自由依赖于自由在其他地方的生存和扩展;任何地方的侵略都可能导致每一个地方出现侵略的危险;没有国际安全,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不可能的。”这种信念可称为“无私”(selfless):美国人和其他任何人民一样自私;但至少50年来,指导他们的是一种开明的自私观(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在实践中接近慷慨(generosity)。这样一种仁慈的霸权,“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好的。它肯定是比所有的现实主义安排更好的国际安排。”而破坏美国霸权将使世界上许多国家付出比美国更大的代价:“一个没有美国优势的世界将是一个更暴力、更混乱、更少民主和经济增长缓慢的世界……。”^⑭

即便一贯审慎的克里斯托也在1997年充满自信地宣称:“美利坚帝国正在形成之中。”他指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区,美国都正在成为最高主宰,而美国之成为帝国不是因为美国的野心,而是因为世界希望、需要美国成为帝国,许多问题特别是危机没有美国的参与根本无法解决。^⑮

新保守主义者的“仁慈帝国”说和促进民主的主张对于很多自由派是很有吸引力的。毕竟威尔逊主义一直是自由派的正

统信念,传统的自由派国际主义信条——越多的民主意味着对美国的威胁越少——在冷战后的新形势下复兴,并与新保守主义者的声音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新威尔逊主义”的乐章。针对冷战后日益高涨的输出美国民主的呼声,基辛格、乔治·凯南和克劳瑟默都呼吁美国不要过分受新威尔逊主义的冲动所支配,必须更为清醒地追求其在国外的利益,外交政策的制定应以国家利益而非价值观为基础;他们认为,美国沉溺于促进民主是危险的理想主义冲动的产物,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约翰·艾肯贝里(G. John Ikenberry)1999年对这种批评提出了反批评,他以几乎和穆拉夫切克相同的历史解读认为,对促进民主的现实主义批判事实上误解了过去:“特别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国外促进民主反映了对如何建立一个稳定和相对和平的世界秩序的注重实际的、演进的和透彻的理解。”艾肯贝里认为,从过去的经验看,美国在国外促进民主事实上导致了一种十分隐蔽的“自由主义大战略”(liberal grand strategy),他以赞许的口吻写道:

这种战略是以一种十分现实的理念——即其他国家的政治特征对美国实现安全 and 经济利益的能力有着巨大影响——为基础的,同时它也是把美国政治中左右两派联合在一起的大方向(orientation)。保守派视里根为捍卫自由世界、民主和自决的伟大战士;自由派强调人权、多边主义制度的作用,强调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效果。这些立场都是一个整体的部分。美国沉溺于促进民主与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理念——何为稳定、合法、安全和繁荣的国际秩序之源泉——有关。这种战略根植于美国的政治经验、美国对历史、经济和政治稳定源泉的理解,与源于欧洲经验的传统大

战略和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强调均势、现实政治和遏制——是不一样的。

冷战史家加迪斯在发于2002年12月《外交政策》的文章中和2003年1月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采访时,更进一步认为新保守主义者所提倡的仁慈霸权是可取的,他认为,相对于其他选择——旧的均势体系、联合国、无政府状态——来说,美国霸权确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赞同。“9.11”之前,来自政治光谱左右两端的人就已注意到新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外交政策大方向上的趋同。波霍雷茨曾担心克林顿当选将导致左派和右派以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为基础结成同盟,一如两次大战期间的“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n First Committee)一般。但到1999年底时,他承认他的预测错了,自由派已一改越战以来的反干预态度,而变得好战起来。波霍雷茨指出,尽管克林顿做得不好,但毕竟做了;而且以往一贯反战的自由派如戴维·里夫(David Rieff)和《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都积极支持克林顿的对外干预。对于此种现象,波霍雷茨称之为“同床异梦”:所谓“同床异梦”是指两派虽然都赞成促进民主、积极干预,但自由派只强调价值观,而提倡“新里根外交”的新保守派——波霍雷茨文中指明的人除了他自己外,还有小克里斯托·罗伯特·卡根、艾布拉姆斯、帕尔、弗兰克·加夫尼、穆拉夫切克和迈克尔·里丁——则兼顾价值观和利益,认为价值观和利益密不可分;自由派更注重多边行动,新保守派则更喜欢单边行动。著名自由派政评家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则称这种“同床异梦”为追求帝国的不明显的联盟:一边是“急于扩展美国影响和联合世界民主国家的国际主义自由派”,一边是“相信为了(保护)世界利益的扩张性美国领导权的单边主义新

保守主义者”。^⑥

在提倡“新里根外交”的新保守派成为新保守主义主流,并与部分自由派共同追求帝国的同时,保守派阵营内部在外交政策上出现了分歧。在1999年底总结冷战后10年外交政策辩论的一篇文章中,波霍雷茨指出,以往一些保守的干预主义鹰派如布坎南、爱德华·拉特瓦克(Edward N. Luttwak)、扎卡利亚、克劳瑟默、《国家利益》的两位主编罗伯特·塔克和欧文·哈里斯摇身一变成了他所说的“孤立主义者”(其中克劳瑟默被他踢出新保守派阵营),这些孤立主义者反对第一次海湾战争、反对美国干预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孤立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分野,这种分野并不在于美国是否与其他国家贸易,而在于在何种情况下与外国开战;在他眼中,孤立主义者总是认为,在不涉及美国至关重大利益的时候,美国应该做战争的旁观者。^⑦

保守派的裂痕并非全因外交政策而起,还主要涉及里根去职后新老保守派对保守主义运动控制权的争夺,90年代又因极端宗教右派的问题而使新保守派对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的发展方向渐生警觉,从而直接导致大多数新保守派在2000年大选中支持麦凯恩,发动“争夺共和党心灵的战争”。

二、何处是家园

研究美国保守主义的学者一般倾向于将美国保守主义分为四类:老右派、新右派/基督教保守派、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从50年代到70年代,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主要存在于自由至上主义者和老右派(常被称为“传统主义的保守

派”)之间。这两派的分歧后来并没有消失,但自80年代以来已经不那么引人注意了,因为新保守派进入保守派阵营引发了新的紧张。新保守派在里根竞选的最后阶段进入团结在里根周围的保守派阵营,并深得里根重用,许多新老右派从一开始就颇为不满,视新保守派为“外来户”,极端者则称新保守派为“右派阵营的左派同志”甚至“是左派打入保守派阵营的楔子”。随新的紧张出现了新的名词,80年代之前,一个不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保守派必然是“传统主义者”;之后,不是新保守派的保守主义者就必定是“古老的保守派”。传统保守派的元老小巴克利本人虽颇为欣赏这帮较有想法且能言善辩之士,认为新保守派的到来可以极大地加强保守主义的思想性和实力,《国民评论》也向新保守派敞开大门,但是其他人并不欢迎新保守派,甚至因小巴克利对新保守派的友善而颇有怨言,认为《国民评论》已经“新保守化”。新右派对新保守主义者最为不满,他们认为自己通过草根动员特别是将基督教保守力量动员起来,为里根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最终里根并没有论功行赏,弄得他们倒不如那帮“文人墨客”。所以当新右派的机关报——《华盛顿时报》——列举主要的保守主义组织和机构时,就将新保守主义者的大本营美国企业研究所排除在外。新保守派和新右派的紧张关系日益紧张,以致新右派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就曾和艾布拉姆斯互相辱骂。

在新右派的影响于80年代中后期逐渐淡去时,老右派又跳出来,攻击新保守派。1988年10月,拉塞尔·柯克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攻击新保守主义者,称他们的促进民主观念是“空想的民主全球主义”(fanciful democratic globalism)。次年9月,布坎南在古老保守派的刊物《编年》(Chronicles)上再次抨击了新保守主义的促进民主观念,他不仅蔑视国外的民主,还大声疾

呼：“冷战结束之时，即为美国回家之日。”克劳瑟默立马还击，说布坎南是威权主义者，是弗朗哥（西班牙独裁者）、马科斯（菲律宾独裁者）、皮诺切特（智利独裁者）和拿破仑的崇拜者，是孤立主义的信徒。^⑨

布坎南曾任尼克松总统的演讲撰稿人，70年代初期因尼克松批准新的社会福利计划而对尼克松不满，认为尼克松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后任里根的对外联络主任，也为里根撰写部分演说辞。1990年，他在《国家利益》上撰写题为《美国第一——第二、第三》（America First——and Second, and Third）的文章，宣称：“我们需要的是新的民族主义，提倡美国第一的新爱国主义，不仅要把美国放在第一位，而且还要把美国放在第二位、第三位。”一句话，美国便是一切，一切为了美国。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时为CNN评论员的布坎南坚决反对战争，并指责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是推动布什政府去打仗的惟一力量。1991年12月，他正式以“美国第一”为旗号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除在对内政策上反对增税和堕胎等外，对外政策方面反对向海外派兵，反对对外经济援助，反对大量向美国移民，提倡贸易保护主义，突出地提出凡事都要“优先考虑美国利益”的口号。布坎南的孤立主义情绪特别是他对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的指责，致使他和新保守派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裂痕进一步扩大，新保守派极为愤怒，他们指责布坎南为反犹主义者。令新保守主义者伤心和不满的是，其他大多数保守主义组织领导人没有人因为布坎南的反犹主义站出来反对他；接替小巴克利任《国民评论》主编的约翰·奥苏利文（John O’ Sullivan）由于过于讨厌老布什而在初选中支持布坎南，他虽然承认布坎南是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但否认布坎南是反犹主义者。按照波霍雷茨的说法，尽管许多保守派在私下里不喜欢布坎南并承认他

是反犹主义的,但在公开场合,没有人反对他。原因有二:许多里根保守派(比如新右派领导人保罗·韦里奇)及他们的选民十分厌恶老布什而不愿意批评老布什的最有力党内挑战者——布坎南;布坎南在保守主义的草根层面得到极大支持,保守主义草根运动的年轻活动家特别支持他。^②

保守派阵营内部的新老之争事实上是为了争取后里根时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控制权。在布坎南看来,也就是要将那些“窃取和腐化了保守主义运动的人”赶出去。里根去职后,布坎南就曾宣称:“在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能将这个国家带入正轨之前,他们首先必须将他们的运动带入正轨。”谁是窃取和腐化了保守主义运动的人呢?不消说,就是新保守主义者,布坎南明言:“就像自以正操纵狗的跳蚤一样,他们和(保守主义)运动的关系总是寄生的”;要净化保守主义运动,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要向这些“在最后时刻才加入里根联盟的投机取巧之辈”、“对他们帮助建立的伟大社会失望的肯尼迪—约翰逊民主党人”、“(我们)从大街上捡来的意识形态流浪儿”宣战。1994年,一位古老保守派撰写的著作更认为,美国保守主义已经因为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右派的主导派别”而“失败”。该书作者认为,新保守主义者从本质上是左派现代主义者,他们在外交上坚持干预主义、在国内坚持福利国家,而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正是导致真正保守主义的最大敌人——国家主义——的罪魁祸首;如果新保守主义的国内政策是罗斯福式的,那他们的外交政策就是威尔逊式的;尽管新保守主义者表面上承认宗教、家庭、道德、共同体和爱国主义对于建立和维持自由社会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他们并不重视“道德、社会和精神关切”,而注重“纯粹的物质和实际问题”。古老保守派不仅攻击新保守主义,还将矛头直指没有和他们站在一起反对新保守派的小巴克利和《国民评论》。布

坎南的一位忠心追随者曾说：“《国民评论》不再是右派的中心了。……事实上，巴克利是保守主义运动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²¹

从60年代末期出现时起，新保守主义一直主要是学者和知识工人的活动，而非大众性的政治运动。他们对政策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改变了美国公共政策特别是社会政策辩论的思想框架，这是他们最大的贡献之一；二是走上层路线，需要有政治领导人和政治家作为依靠，比如早先的汉弗莱、杰克逊、莫伊尼汉，后来的里根。但是在莫伊尼汉与他们决裂后，他们在民主党内的根已经被斩断了；里根去职后，他们在共和党内也暂时找不到那么欣赏他们的人了。这是他们和新右派、宗教保守派和布坎南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动员组织，对选举政治影响甚小（即便有影响，也主要是对他们的读者，而他们的读者人数是不多的）。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新保守主义者在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占据着美国公共政策的思想高地，从而可与自由派一拼；在保守主义运动的上层特别是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机构网络中，他们的确影响极大。更为重要的是，1994年中期选举前夕，保守主义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机构网络通力合作，政治家、草根活动家和知识工人们也齐心进取。1994年2月，共和党的众议员在马里兰州的萨里兹伯利开会，宣布了“美国文明基本哲学”的五条原则；后由传统基金会等思想库扩展而为《与美国定约》（The Contract with America），作为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基本纲领。²²终为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引人注目的“一边倒式”胜利：经过8年后，重新夺得参议院多数党地位；经过40年后，在众议院跃居多数党地位；并且在州长的争夺中70年来第一次占了多数。入主白宫的民主党可谓是全线败北，加之，当时因此红极一时的共和党领袖人物纽特·金里奇

(Newt Gringrich)与新保守主义者的关系一直甚佳,在一片胜利欢呼声中,老克和波霍雷茨飘飘然地就在1995—1996年时宣称新保守主义已经完全融入保守主义主流的。但是,另一方面,当看到布坎南竞选时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情景,又不免有些担忧,想想共和党内哪些政治家是自己完全可以信赖的,毕竟自己为保守主义运动和共和党做出了那么大贡献,遭到攻击时,却没有人替自己说话,伤心自是难免的。

这种复杂难解的情绪在1996年又因为新保守主义的宗教刊物《首要事务》上一群保守基督教徒的过激言论,而让新保守主义者们感到对保守主义运动发展的方向拿捏不准,仍需提防那个历史上经常过头且反犹的基督教保守主义。1996年,由新保守主义者纽豪斯主编的《首要事务》举办了一次名为“民主的终结?”的座谈会,会议主要讨论法院系统在美国权力过大的问题。与会者皆为极端保守派,大多数是基督教保守派。与会者一致认为,长期以来,法院系统已经篡夺了太多的权力,在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堕胎等问题上的强硬的自由派立场已经弄得美国社会和文化乌烟瘴气。显然基督教保守派已经对法院系统一次又一次地做出让他们不满的判决而深感不耐烦了,所以,他们说了很多过头话,比如美国政府的道义合法性已经很可疑,美国已经背弃了民主理念,并将美国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声言要与美国政府展开政治战争,建议采取“公民反抗”(civil disobedience)甚至革命方式来抵制政府。座谈会的记录发表在当年第11期的杂志上,许多新保守主义者看到后大吃一惊,希默尔法伯写信给《首要事务》编辑部,指出因为法院系统权力过大且行为不当就质疑美国政府的合法性是不能接受的,宣布辞去《首要事务》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沃尔特·伯恩斯的信十分简短,他在信中说:“当你们说美国政府在道义上是不合法的并接近

于鼓吹公民反抗和武装革命时，你们就不是在替我（自刊物创办以来一直是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代言了。我没有闲心与你们争论，我只是想通知你们，我辞去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一职，请将我的名字从报头上拿掉。”看来，伯恩斯非常愤怒。贝内特说他看到那些话时，立刻就想起了60年代后期新左派对美国的攻击；迪克特说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类极端想法完全不合新保守主义，波霍雷茨在给纽豪斯的信中说：“我变成保守主义者，不是为了成为激进派，更不用说支持鼓吹针对这个国家的革命了。”^②新保守主义似乎绕了一大圈，产生于反对激进左派对美国的攻击中，现在回过头来，又要与激进右派作战了。我们在文化战争中曾说到新保守主义者对宗教保守主义的复杂感情，他们在许多方面越来越感觉自己的立场和宗教保守主义接近，又十分欣赏拉尔夫·里德的那种较为世俗和宽容的宗教保守主义主张；加之，宗教保守主义特别是天主教保守主义和犹太教保守主义在支持以色列问题上已形成牢固联盟，他们曾对宗教保守主义寄予厚望，但像上述反政府的过激言论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由于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力量自80年代以来声势越来越盛，对共和党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对自己在共和党和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地位、对自己的形象都深以为忧。

1999年，布坎南再次参加竞选，竞选期间的颇多言论（如为纳粹德国和希特勒辩解，说美国犹太人具有双重忠诚、更忠于以色列、反对以色列）具有反犹气味。这固然让新保守主义者愤怒，更让新保守主义者不满的是，共和党领导层对布坎南的容忍。波霍雷茨忿忿不平地写道，由于害怕失去布坎南拉到的选民、害怕布坎南会去搞什么改革党拉走共和党的选票，“共和党管理者在布什先生默许下竟允许布坎南先生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集会演说。”相比之下，“与布什先生竞争共和党提

名的约翰·麦凯恩参议员已经鼓励远离布坎南。”而且，由于1996年对基督教保守主义力量的警觉，小布什恰受南方福音派势力的支持，小布什本人也是南方福音派新教徒；加之，麦凯恩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且在外交政策立场上与提倡新里根外交的新保守主义者很接近，因此，小克里斯托和罗伯特·卡根为麦凯恩的竞选不遗余力，要帮助后者打一场“争夺共和党心灵的战争”。但是，新保守主义者支持麦凯恩事实上使得他们在保守派阵营和共和党内都比较孤立，《国民评论》、《华盛顿时报》和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均对小克里斯托口诛笔伐，一位保守派直言不讳地告诉《白宫公告》(White House Bulletin)说：“麦凯恩输后，克里斯托就完了。”^⑨

三、伊拉克战争和新保守主义者 重塑中东的计划

“9.11”事件后不久，随着美籍以色列人马丁·克莱默(Martin Kramer)《沙滩上的象牙塔：美国中东研究的失败》一书的出版，美国中东研究领域爆发了一场论战，论战又因与美国国内是否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的争论交织在一起而空前白热化。这场论战以其浓厚的政治意味和明确且具体的政策涵义而将美国中东研究领域过去多年来的争论推至顶峰。美国中东研究界主要因对70年代以来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不同态度已经论战了20多年之久，论战的主题还包括阿拉伯伊斯兰地区落后和动荡的原因、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的关系、阿以冲突的性质、美国的对策等等。中东研究始自二战时期，是当时兴起的跨学科“地区研究”的一部分，而所有的地区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对外政策考虑有很大关系。最初的中东研究遵循的是现代化

范式,学者们常常研究中东地区落后的原因,并将模仿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作为解决问题方法而加以推荐,认为随着本地区更多地融入西方体系,“现代”价值观及实践将为当地的精英所接受,随之而来的将是民主和经济起飞。但是,中东国家的实际发展情况恰与学者们的预言相反。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其后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从不同的方面导致了美国中东研究界研究人员和指导范式的变化,最终的结果是,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东研究学者是来自中东国家的人(至今已占50%);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对美国中东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进入美国中东研究协会(美国最大且最有影响的中东研究学术组织)。1978年,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赛义德出版《东方主义》一书,较大地影响了美国中东研究的指导思想。简略言之,东方主义意指一种西方的东方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偏见:东方是专制的、国家的权力彻底打碎了社会力量;东方社会的专制、奴役及家长制限制了人的个性与自由,遏制了精神的发展,窒息了个人与民族的创造性;专制导致文化和经济的停滞,东方还是道德堕落、心智幼稚、缺乏理智、思维混乱、没有逻辑、不负责任、不讲信用的不成熟民族。自此,学者们独立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倾向越发明显,并批评美国外交政策从业者(practitioner)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立场。^⑤

在1994年5月26日由中东政策委员会(the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组织的讨论会上,当时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清楚地阐明了美国对伊斯兰复兴的立场,他说,美国对中东的看法是以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为透镜的,这些利益包括: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邦的和平;以色列的安全和福祉;确保能源供应;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造成不稳定的武器交易、运输;促进民主和人权;结束恐怖主义活动;促进发展、市场经济和投资机会。又说,美国政府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

talism)这个词并不恰当,为避免混淆,应使用“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来指有具体政治目标的伊斯兰教团体和运动。他指出,美国对目前伊斯兰复兴的立场是:1. 尊重伊斯兰宗教,伊斯兰教是历史上的文明运动,丰富了人类的文化;2. 伊斯兰教的观念和象征时不时为极端分子所利用,但这并不应该否定对伊斯兰教在本地区社会和政府中的适当作用的广泛研究和辩论的合理性;3. 美国作为一国政府和伊斯兰教并无冲突;4. 美国反对这种认识即认为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重新强调传统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与西方的冲突;5. 伊斯兰教复兴的某些表现是极为反西方的,目标不仅是消除西方的影响,也抵制与西方任何形式的合作或国内的现代化,这种趋势明显是与美国利益相敌对的;6. 美国政府并不认为本地区活跃的诸多伊斯兰运动受同一种(monolithic)国际控制。学术界尽管同意政府口头表达的政策,但批评政府并没有真正支持它在政策声明中赞成的原则,比如支持民主;政府言行不一,一方面以人权和民主等价值观来证明其政策目标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继续容忍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政府采取的不民主措施;批评政府与那些系统地违反人权和继续使用暴力镇压手段的国家如埃及、沙特、科威特和以色列保持牢固关系。学者还对西方媒体和政府以苏联瓦解后试图把伊斯兰教说成新的全球威胁的方式很忧虑。学术界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个词,只会导致刻板成见和以错误信息为基础的政策。有学者指出,伊朗、沙特和利比亚都被贴上了“原教旨主义”的标签,但是敌视美国的伊朗伊斯兰教革命政权、美国在该地区的最好盟友沙特的传统君主政权和易受伊斯兰教复兴攻击的利比亚社会主义政权三者究竟有多少共同之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只是一个妖魔化伊斯兰教复兴的贬义词。学者们的共同立场是:1. 西方国家

和媒体是以伊朗/霍梅尼为棱镜来看待伊斯兰教复兴的,忽视了当代伊斯兰教运动的复杂性;2. 在穆斯林社会中,伊斯兰教运动具有积极作用:提供社会服务和增强政治意识,将这些温和且受欢迎的运动定为极端主义就是使使用暴力的不分青红皂白的镇压合法化;3. 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等这样的伊斯兰教温和派组织有助于市民社会和民主冲动的发展,将他们说成是极端主义者只会使威权主义政府对他们的镇压合法化,导致某些温和派力量的极端化;4. 暴力和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组织的行为,通常是报复国家的镇压,或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和黎巴嫩的过分行为;5. 谴责伊斯兰教是错误的,美国在评估穆斯林社会的状况时,还应考虑到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发展问题、失业和财富的不公正分配;6. 在约旦、巴基斯坦、土耳其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已经参与到政治过程并融入到体制当中,所以,美国应鼓励西方与温和派对话,允许其他国家的温和派参与该国的政治;7. 伊斯兰教和民主并非不相容的;8. 世俗主义是普世价值,所有人都应当不考虑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就接纳世俗主义的假设是有问题的,“世俗原教旨主义”(secular fundamentalism)会导致压迫性和威权主义的世俗政权;9. 原则上,美国不应反对伊斯兰教法律的执行或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活动家加入政府。^⑧

美国中东政策的争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外交政策从业者和学术界之间,更重要的是,80年代以来以新保守主义者为主干的所谓“第三方”(third dimension)的发展,他们既从整体上批判主流学术界,也批评政府的具体政策,并和政府之内的新保守主义者共同推动他们所倡议的政策。和学术界不同,他们对该领域问题的兴趣并不是思想性的,目标也非知识的发展;他们主要受政策偏好驱动,希望把他们的政策偏好施加于决策过程,具有强

烈的意识形态色彩(ideological activism),因此,可将他们称为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s)。政策企业家主要由非学者、前政府官员、记者、院外游说集团成员组成,最著名的是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丹尼尔·帕普斯;也包括少数学术专家,如颇为新保守主义者推崇的中东研究权威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美籍以色列人马丁·克莱默和与新保守主义者十分接近的思想库分析家、《国民评论》资深编辑彼得·罗德曼(Peter W. Rodman)。他们的主张是:1. 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有一个集中的国际基础结构(centralized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2. 这个阴谋集团致力于毁灭西方、以色列和美国价值观;3. 这个威胁类似于全球共产主义的威胁,帕普斯曾把《古兰经》等同于马恩的著作,刘易斯则提出了伊斯兰教全球反叛的观点;4. 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是一种意识形态阐释,意在动员反美和反以情绪;5. 原教旨主义者号召穆斯林严格坚持伊斯兰教的道路,并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繁荣;6. 多少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和西方存在持久的价值观与文化冲突,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和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被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是十字军东征的继续,因此,穆斯林仇恨西方的根源是历史的和文化的,意在摧毁西方代表的所有东西;7. 所有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本质上都是极端主义者,所谓的温和派是没有能力或机会从事暴力或恐怖主义活动的极端主义者。政策企业家们共享同样的价值观,特别是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及其军事霸权,都致力于坚决遏止伊斯兰教的复兴,因为他们把以色列和伊斯兰教放在了零和游戏的环境中;致力于维持中东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现状,假设最坏情景(worst-case scenario)是不可避免的;从80年代初以来,他们的政策主张就没有变化:1. 美国必须拒绝在公开场合或以官方身份与原教旨主义者打交道,由于并不存在温和派,这一禁

令应扩展到包括所有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活动家,包括那些非暴力的和表示愿意参与政治和民主过程的活动家;2. 美国必须支持每一个与原教旨主义者“战斗”的人,即使这意味着支持压迫、违反人权、削弱民主过程,意味着与共产党人甚至反对原教旨主义政权的恐怖组织(如伊朗的人民圣战者组织)结盟;3. 美国应该采取一种积极主动的(activist)政策,既遏制又“推回”(roll back)所谓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在伊朗和苏丹已经取得的收益;4. 美国必须向原教旨主义国家施加压力削弱他们的好斗性(aggressiveness);5. 除非出现市民社会,不应在穆斯林世界促进民主。实事求是地说,“第三方”对美国中东研究主流的有些批评并非全无道理。比如大多数中东研究学者写作的论文的确如“第三方”批评的那样,冗长、晦涩难懂,充满了复杂的后现代术语;再比如刘易斯对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历史与文化的批判性分析也是很有见地的。但他们的大多数批评是非学术的、政治性的,甚至有故意诋毁之嫌。比如他们认为,由于大多数学者来自中东,所以,学者们是反美反以和同情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左派,是为伊斯兰教复兴运动辩护的反主流文化者。实际上,他们是在怀疑来自中东的美国中东研究学者的忠诚。^④

与“第三方”批评和谴责学术界主流相呼应,另一帮与利库德集团关系极密切、立场完全一致的新保守主义者至少自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就在推动推翻萨达姆政权。而之所以要推翻萨达姆政权,除了解决伊拉克本身的威胁外,还暗含着重塑整个中东的雄心。据说,柏尔在1987年离开国防部后就呼吁过推翻萨达姆。1992年,沃尔福维茨的“防御计划指南”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卡根在1995年撰文指出,鲍威尔反对将萨达姆赶下台不仅使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危险越来越大,第一次海湾战争的仓促结束还导致了老布什和克林顿总统外交政策的灾难。1996

年,柏尔及其追随者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现为小布什政府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戴维·沃姆泽(David Wurmser)——他原为现小布什政府国务院中官职最高的新保守主义者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伯尔顿(John Bolton)的资深顾问、后加入由另一位新保守主义者刘易斯·利比负责的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班子——等人,为以色列新上台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撰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新总理的当务之急是尽早采用和平和安全的新方法。……以前的‘土地换和平’是置以色列于文化、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退却之地,新政府应该强调促进西方价值观念和传统。这种很容易被美国人接受的做法包括‘以和平换和平’、‘以实力求和平’和自我依赖:均势。”报告除了提出要赶阿拉法特下台外,还认为伊拉克的未来将极大地影响中东的战略均势,因此,报告建议以色列,“通过与土耳其和约旦的合作,削弱、遏制甚至‘推回’叙利亚,以塑造自己的战略环境。而努力的中心是将伊拉克的萨达姆赶下台——本身就是以色列重要的战略目标,以作为挫败叙利亚地区野心的手段。”从新保守主义者的实际活动来看,他们希望改变中东、推翻萨达姆的具体政策目标始终是与兜售“新里根外交”一起进行的。1997年,小克里斯托建立了倡议组织“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并自任主席,罗伯特·卡根、约翰·伯尔顿是董事。其成立的《原则宣言》宣称:“在20世纪接近尾声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领导西方取得冷战的胜利后,美国既面临着机会,也面临挑战:美国有以过去几十年成就为基础的设想吗?美国有塑造一个有利于美国原则和利益的新世纪的决心吗?……(我们需要的是)一支强大且愿意应对现在和将来挑战的军事力量;一项大胆且有意在国外促进美国原则的外交政策;接受美国全球

责任的 国家领导层。……当然，在使用其力量时，美国必须谨慎。但我们不能因使用美国力量会付出代价就回避全球的领导责任。在维持欧洲、亚洲和中东的和平与安全方面，美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推卸我们的责任，我们（事实上）是在邀请对我们根本利益的挑战。20 世纪的历史应该已让我们懂得，在危机出现之前就去塑造环境是重要的，在威胁变成灾难之前就去应对威胁是重要的。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还应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进行美国领导的事业。”“新美国世纪计划”可算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分支（两个机构在同一幢大楼内办公），其中许多人曾在里根政府中任职，小布什政府的许多官员来自这里。1998 年 1 月 26 日，“新美国世纪计划”发给克林顿总统一封公开信，强烈建议改变对伊拉克的遏制政策，推翻萨达姆政权，签名者中包括小克里斯托·罗伯特·卡根、阿布拉姆斯、现在的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L. Armitage）、贝内特、福山（Francis Fukuyama）、沃尔福维茨、扎尔梅·卡里扎德（Zalmay Khalilzad）、柏尔、彼得·罗德曼、拉姆斯菲尔德、詹姆斯·沃尔西（R. James Woolsey）等新保守主义者及其同路人。2000 年，“新美国世纪计划”发布《重建美国的防御》报告，报告宣称：“本报告的基本信念是，美国应当寻求通过维持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来保持并扩展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今天，美国享有史无前例的有利战略地位和机会。如果美国不保持其军事实力，这个机会将可能丧失。”此外，报告在中东问题上提出美国必须在海湾地区的安全中发挥长久作用，为此需要在海湾保持美国军事力量的长久存在，以及不能仅仅满足于推翻萨达姆。^⑧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更清楚地知道新保守主义者改变中东的详细计划。但从以上特别是戴维·沃姆泽 1999 年出版的一部著作——《暴君的联盟》（*Tyranny's Ally: America's Failure*

to Defeat Saddam Hussein)——中,我们可以得知一个大概。在这本书里,沃姆泽描绘了伊拉克政权变更后新保守主义者改变中东的设想。尽管沃姆泽并不缺乏道德狂热,但他是一位战略思想家,他想重新组合中东的权力关系。他认为,美国在中东较大的敌人是泛阿拉伯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泛阿拉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是20世纪横扫欧洲的各种极权主义的中东版本。该地区的真正选择在“传统的阿拉伯精英和革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萨达姆、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信奉叙利亚社会党主义的泛阿拉伯主义)和伊朗的毛拉属于后一类。他写道:“无论叙利亚还是伊朗的崩溃都将对另一方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他的设想中,占伊拉克多数的什叶派在后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政府中的有意义的参与,将使得伊朗的毛拉们无法再以该地区什叶派的中心自居。(与现在美国独自以战争推翻萨达姆不同,沃姆泽当时建议应当使伊拉克国民大会强大起来,由他们去推翻萨达姆;美国独自进行战争去解放和占领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在1999年的沃姆泽看来是不可取的。仅仅四年,他们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沃姆泽的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出萨达姆下台后中东战略棋盘的一系列变化:激进学生和更为温和的毛拉的联盟推翻伊朗现政权,美国对力所能及之事进行鼓励和支持。之后,美国将劝说伊朗结束其核武器项目及停止对中东恐怖分子特别是真主党武装的支持。叙利亚则将处于土耳其、伊拉克、约旦和以色列的包围之下,无法再靠萨达姆获得石油,将被迫与美合作清除哈马斯、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和真主党武装。在叙利亚趋向于更为亲美的立场时,其卫星国黎巴嫩也将如此。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在黎巴嫩——将没有国家支持。巴勒斯坦当局在其盟友皆转向时,别无选择,只能谴责恐怖主义。沙特对美国将无所可恃,因为它不再是美

国惟一的主要石油来源和中东的军事行动基地,最终将被说服停止通过伊斯兰的慈善组织资助哈马斯和基地组织。上述图景大致可从2002年和2003年许多新保守主义者的言论中得到印证。从2002年开始,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里丁就一直在呼吁,美国在中东的真正敌人是中东的暴政——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沙特。他认为,反恐战争是老式的革命战争、是关于自由的战争,无论先打击哪一个国家(他一直建议先打击伊朗),目标都是要重塑中东。小克里斯托在布什宣布美军获胜后,于今年5月12日的《旗帜周刊》上如此这般地说:“中东或伊斯兰世界是问题的中心,北韓肯定是个危险,但它可能被遏制,它给世界造成的主要威胁是向恐怖主义者和恐怖主义国家提供致命的武器;而几乎所有的恐怖主义者和恐怖主义国家都在中东。解放伊拉克是为了中东未来而进行的第一场伟大战役。创建一个民主的、自由的伊拉克是现在的头等大事;下一场伟大战役是对伊朗。”伊朗的神权统治者正在支持伊拉克的恐怖分子,破坏伊拉克的重建,他们知道,如果美国成功地在伊拉克这个什叶派穆斯林占多数的邻国建立起“一个多元的、非神权统治的”民主制度,他们就会下台。“因此,我们必须帮助我们在伊拉克的朋友和盟友挫败伊朗支持的颠覆活动。我们必须把战斗带到伊朗,采取的手段从公共外交到秘密行动。伊朗是防扩散战争、反恐战争和重塑中东努力的焦点。如果伊朗变得亲西方和反对恐怖主义,叙利亚和沙特将会随之更容易出现积极的变化。解决巴以冲突的机会将大大提高。”迈克尔·里丁同样强烈建议:“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一部分,美国应该帮助伊朗人民推翻他们的统治者。”他指责现在的伊朗领导层,“在国内镇压自己的公民,……折磨改革派伊朗人、羞辱妇女、关闭报道这些暴行的新闻机构。在国外,伊朗现政权援助巴勒斯坦人和基地组织的

恐怖分子反对西方民主国家。”所以，美国应当抛弃它的谨慎，就像过去在冷战时期支持自由战士那样支持伊朗的自由战士。随着伊朗神权政治的终结，不仅伊朗人民能享受到民主，世界也将受益，赢得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一场大胜利。^⑧

在2000年甚至“9.11”之前，新保守主义者的伊拉克政策建议并没有得到决策者的支持甚至注意。小布什当选后，如果不是因为与部分新保守主义者关系良好的切尼负责为小布什搭班子，不会有那么多新保守主义者进入国防部、白宫乃至国务院。在小布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班子中，从一开始就存在两派，鲍威尔和赖斯是实际派（pragmatists）；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assertive nationalists），而不是新保守主义者。小布什政府内真正的区别不是鸽派和鹰派（所有人都是一定程度上的鹰派），而是意识形态家（ideologues）和现实主义者的区别：鲍威尔和赖斯是非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者，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是相对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主义者，而沃尔福维茨（国防部二号人物、国防部副部长）、柏尔（原任国防部国防政策咨询会主任，刚辞职）和利比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则是相对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家。对于拉姆斯菲尔德等人来说，国家利益以及使用力量来促进国家利益是最主要的，他对促进民主兴趣不大，这也是他为什么在伊拉克重建陷入僵局时不愿增兵的原因，并招致了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的猛烈抨击。^⑨而对于沃尔福维茨来说，国家利益就包含了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世界。直到伊拉克重建陷入僵局之前，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家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比较接近。在一定程度上，鲍威尔和赖斯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赖斯在2000年《外交》的文章中对于克林顿政府和奥尔布赖特的人道主义干预政策是不屑一顾的，她认为，“实力政治、大国和均势观念”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

核心关切。尽管2002年和2003年,鲍威尔的国务院和拉姆斯菲尔德的国防部之争被炒得火热,但小布什最相信的人是切尼和赖斯。拉姆斯菲尔德是切尼的提携者,早在70年代两人就相识了,关系一直十分密切;在一定意义上,拉姆斯菲尔德和新保守主义者都是通过切尼发挥更大的影响。切尼对除他身边的新保守主义者似乎也不怎么瞧得上,2001年初,他轻蔑地说:“噢,他们不得不去卖杂志;而我们来治理国家。”直到“9.11”之前,鲍威尔和赖斯的外交政策观念都稍占上风。即便“9.11”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新保守主义者进军伊拉克的建议也并未被采纳。“9.11”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沃尔福维茨一直在建议进军伊拉克,断言只有从政治和文化上改变中东才能击败恐怖主义,但无论是鲍威尔和赖斯还是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都表示反对。小布什政府进军伊拉克的决定大概是在美军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到2001年小布什作第一次国情咨文演说即有名的“邪恶轴心演说”期间作出的,小布什最终接受了伊拉克政权变更的观念,原因何在,尚无人知晓。根据加迪斯的推测,这可能与美军在阿富汗的经历有关:“小布什政府从阿富汗战争中得到的教益是,有时并不需要使用那么多的武力,因为改革会受到欢迎。这对于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和其他问题上的考虑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期望美军在入侵伊拉克后,伊拉克人会非常高兴。”^⑧更为重要的是,小布什政府还部分接受了新里根外交的基本构想,小布什政府2002年9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几乎是沃尔福维茨1992年“防御计划指南”的翻版即为明证。

小布什进军伊拉克的决定和伊拉克战争的迅速胜利曾让新保守主义者们兴奋异常,他们迅速地开始鼓吹下一步行动计划。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重塑中东以外,卡根和穆拉夫切克还开始强调反恐斗争中观念战争的重要性。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卡根

就指出,在军事行动结束后,美国应更大规模地开始公众外交活动。“一旦战斗停止,布什政府需要更勤奋地工作以证明战争的合法性。通过……让人们相信战争比他们原来想像的更正义,美国能够在欧洲甚至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人们的)心灵和思想。很明显,政府希望将美国军队发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公之于众……但还要做无比繁重的工作搜集相关材料以让世人了解……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残忍性质。……应在巴格达建立‘大屠杀纪念馆’,让人们记住25年来伊拉克(还有科威特和伊朗)人民遭受的苦难。……总地来说,未来美国有效的领导能力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场战争如何被世界所理解和记住。”在伊拉克的军事斗争已经结束,但针对恐怖主义的观念战争才刚刚开始。穆拉夫切克在6月9日的《旗帜周刊》上批评小布什政府只注重军事行动,而不注意“观念战争”。他建议,要注意宣扬美国的观念、主张,恢复被取消的美国之音的阿拉伯语节目,并具体提出了劝说议程的三个目标:1.“诅咒在阿拉伯世界被广泛接受的恐怖主义”;2.“对于那些认为应以敬神来取代讨伐异教徒的穆斯林,美国应予以支持(提供讲坛、鼓励和物质支持)”;3.“针对欧洲和其余世界发起一场解释运动,向他们解释我们使用美国力量的观点,为减少他们的担心,我们必须向他们解释我们使用力量的意图以及我们所接受的限制。”为此,用于公众外交的资金应恢复到冷战时期的水平;培养新的从业人员队伍和亲美、亲民主的穆斯林;重新起用冷战后外交机构改革中被并入国务院的美新署,因为国务院不适于进行观念战争。^⑥

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新里根外交重塑世界计划或建立“帝国”计划的建议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托马斯·唐纳利(Thomas Donnelly)。他提出,要利用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胜利,建立“美国统治下的持久和平”即将“单极制度化”。他说,

伊拉克战争之前的外交标志着后冷战世界的终结,1989—2003年间的根本矛盾——美国力量独步全球的现实和各种国际机构形式上的多极结构之间的不协调——已被证明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一个新世界秩序开始了。“美国在伊拉克的胜利将界定一个真正新世界秩序的开始,进入一个持久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创造能反映新现实的国际机构是必要的。”伊拉克战争结束之际,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确定下一次军事行动的对象,而是美国如何利用在伊拉克的胜利支撑,扩展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并将之制度化。他的建议是在“击退”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同时,“遏制”中国即不让中国上升到大国地位。对他来说,这必然要求防止恐怖主义国家或恐怖主义团体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无论是正式的还是事实上的。为样,唐纳利便将冷战后尤为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所强调的遏制中国纳入了以反恐为契机建立“美国统治下持久和平”的新保守主义宏伟蓝图之中,并较为清楚地勾勒出这幅蓝图的两根主线:1. 重塑中东,即便这意味着不稳定。他指出,美国在“9.11”之后已经决定,中东地区的现状是不可接受的。“他们(现政府)提供的‘稳定’本身已被证明是转瞬即逝的。如果我们必须要面对不稳定的话,让我们面对拥有更大自由的不稳定。”2. 遏制中国。“美国及其盟友能够‘遏制’中国的野心,帮助中国从共产主义转变为民主,从国际‘局外人’转变为满足于生活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中的国家。”“在中国考虑后伊拉克世界中的战略选择时,她很可能考虑与大中东地区的反美力量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毕竟,中国长期以来在该地区有利益;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需要进口更多的能源时,……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在增长。反过来说,像伊朗毛拉这样的领导层也有理由在反对美国控制中东时寻找一个大国支持者。”如何实现上述

长期战略目标呢？为了避免“帝国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的危险，“美国必须将‘单极制度化’，建立一系列新的国际机构，或至少是根本上改革现有的国际机构。即便惟一的超级大国也需要战略伙伴。”“将单极制度化”是可以做到的。首先，美国有建立国际机构的经验（二战后）。其次，许多国家如英国、东欧、印度、日本、韩国、台湾和澳大利亚等希望扩展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美国与这些国家共享的利益和原则为建立一个更大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伊拉克危机已经表明，现在的联合国和北约并不适于实现上述目标，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新世界秩序需要的是，“一系列在其目标而非程序中发现合法性的组织。”经过改革的联合国——或继任的组织——要珍视自由而非稳定，要致力于帮助受压迫人民获得他们个人的政治权利，而非容忍压迫性政权。新北约应当是一个能够为支持新目标、执行新使命提供力量的联盟，而非仅仅是一个防御性的战时联盟。此外，美国还需建立一个类似于北约的、由美国控制的多边军事机构，其地域要超出欧洲。^③

然而，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03年4月份一篇文章所言，伊拉克问题将是对新保守主义者的最大考验。美国在伊拉克重建过程中的困难已经使得他们和拉姆斯菲尔德的联盟出现破裂的迹象。10月份迪克特所著为拉姆斯菲尔德歌功颂德的书刚刚面世，伊拉克局势的越发不妙已使得拉氏丧失了对伊拉克重建的控制权，小布什总统不得不在10月初将伊拉克政策转交由赖斯负责。这引起了拉姆斯菲尔德公然的不满。紧接着，小布什政府风向猛转，政策重心从代表着单边主义的国防部转向代表着多边主义的国务院。在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占领的同意之后，美国在其后的为伊拉克重建捐款大会上同意让别的国家在伊拉克拥有相对以前更大的控制权。新保守派对

此大为不满,他们激烈地批评小布什政府在推卸责任。小克里斯托和卡根在9月15日合作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责行政当局寻求联合国支持意味着“美国领导人不愿意承担必需的军事负担”,事实上是一种“加了掩饰的麦戈文主义”。另一方面,新保守派也对执拗地不愿向伊拉克增兵的拉氏甚为不满。10月初,小克里斯托在一次讲话中,明显地将批评矛头指向拉姆斯菲尔德一直倡导的军事改革(拉氏上台以来一直致力于进行军事改革,力求将美军变得人员“更少,更狠,更高科技”)。他说,“对于我们的外交政策来讲,我们的军队规模太小了。就(小布什总统的)雄心勃勃,值得赞赏的外交政策目标来讲,以为我们可以只用从克林顿手中继承的同样数目的兵力来做我们想做的事,这有点疯狂。”小克里斯托的批评显让拉姆斯菲尔德更为恼怒,拉姆斯菲尔德同部分新保守派的这一分歧在10月16日由他撰写的一份内部备忘录被媒体曝光之后更为加剧。在这份备忘录中,拉氏对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基本战略的进展和有效性表示怀疑,提出美国“是在赢得还是输掉反恐战争”的问题。美国反恐战争的基本战略就是先发制人战略,也是新保守派的政治“宝典”,拉姆斯菲尔德如此质疑新保派的战略思想根基难怪让其他新保派对他耿耿于怀。当然,就此断言新保守派对美国具体政策的影响现在就完全消失可能有些言之过早。最近因为伊拉克重建的分歧所进行的华盛顿政治联盟的分化组合看起来在向“弃拉保鲍”的方向发展。美国国务院同新保派有联合的趋向,而国防部的“实用主义”倾向开始突出。虽然在美国是否应该打伊拉克问题上,国务院以鲍威尔为首强调以外交手段解决危机的多边主义者同咄咄逼人的新保派格格不入,但是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国务院同意新保派“既来之,则安之”的政策,帮助伊拉克建立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民主政权,使其成为中东地区的

民主样板。新保派随着伊拉克重建中的困难重重(比如伊拉克安全局势的恶化、美军不断的伤亡、重建所需的巨额费用、以及美国国内对战争的主要推动者新保守派在战争正义性、战争借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是否属实和是否因进行伊拉克战争丧失了打击恐怖主义的有利时机而致使目前恐怖活动的扩散等问题上进行猛烈攻击等)而锐气大减,处于政治守势的新保守派,不得不同国务院进行妥协,支持国务院一直坚持的扩大伊拉克重建的多边合作。10月底,小布什总统一反其最初的强硬态度,宣布美国准备同北朝鲜签订类似“互不侵犯条约”之类的文件,以及在伊朗核武器项目上允许欧洲同其进行谈判,这些都是新保派同国务院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新保守主义者鼓吹的新里根外交政策和单极世界构想来说,情况同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发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确是小布什政府两年来在外交和军事战场上取得的最大经验,小布什政府现在也的确正在反思那些渗透在“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中的新里根外交思想尤其是积极运用美国的力量重新塑造世界的设想。被小布什本人早期几乎完全接受的新保守派单边主义蓝图虽然瑰丽和宏大,但小布什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项事实是:美国人不太愿意完全由自己来承担实施蓝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正如艾肯贝理所说,“美国政治家终于发现单边主义和不管是否有伙伴参加就急切跳上战车,意味着美国纳税人要为此付出代价。当纳税人面对单边主义的结果时,政治体系就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新保守主义的大战略。”但另一方面,这种重新思考不会涉及大战略的最根本目标——单极世界构想,只表明小布什政府和美国在今后会更注意手段,对单边行动将更为审慎,将更为注意以多边主义形式(工具)来行单边主义之事实(目的),可能更倾向于以大国合作(包括在美国的监督和指导下,维持并利用其

他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为手段追求持久的霸权。霸权和大国合作、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只在理论上是矛盾的,在实践当中和历史并不必然是矛盾的。毕竟,新保守主义的“帝国”构想不仅反映了新保守派自己的想法,也为许多国际主义自由派所推崇。更为根本的是,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指出的那样,建立“帝国”的诱惑是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一枝独秀”合乎逻辑的结果。^①只要这种结构性的权势分布情况不发生变化,“帝国”的诱惑和吸引力就一直存在。鉴于大多数外交思想流派都以维持此种权势分布情况为根本目标,美国外交的长期态势仍会是建立单极世界,区别只在于方法和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的新里根外交政策和“帝国”构想只是时势使然,且已经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打了永久的烙印。

① Norman Podhoretz, “Strange bedfellows: A guide to the new foreign-policy debates”, *Commentary*, 108/5 (December 1999), pp. 19—31; Irving Kristol, “The Neoconservative Persuasion: What it was, and what it is”, *The Weekly Standard*, 8/47 (August 25, 2003), p. 23.

② Irving Kristol, “The Map of the World Has Changed”,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3, 1990; Irving Kristol, “In Search of Our National Interest”,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7, 1990; Irving Kristol, “The Challenge of a Political Reversal”,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7, 1990; 大卫·坎贝尔, “暴力职能:认同、主权、责任”, 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主编,《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Grant Havers and Mark Wexler, “Is U. S. Neoconservatism Dead?”, *Quarterly Journal of Ideology*, 24/3 & 4, 2001。这两位学者还认为,新保守主义者在90年代找到了他们需要的敌人,那就是世俗的自由派精英,由此爆发了文化战争。但这一说法不太能说过去,因为:

文化战争并非始自冷战后,只是在冷战后更激烈、表现得更明显;自由派精英虽是文化战争中的敌手,但这个敌人却无助于外交政策大方向的确立。

③ Charles Krauthammer, “Bless our Pax Americana”,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5, 1991, A. 25;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Lonely Superpower”, *The New Republic*, 205/5 (July 29, 1991), pp. 23—27.

④ Leslie H. Gelb, “Policy Monotheism”,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91; Leslie H. Gelb, “America in the World: Good Sense Instead of Slo-ga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18, 1991.

⑤ Nicholas Lemann, “The Next World Order”, *New Yorker*, April 1, 2002; Patrick J. Buchanan, “Whose War?”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arch 24, 2003; Janadas Devan, “Shaping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Neo-conservatives”, *The Strait Times*, March 30, 2003. 笔者并没能找到“指南”的原稿,所引依据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网站上的节录,“Excerpts From 1992 ‘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iraq/etc/wolf.html>。根据时任副总统奎尔幕僚长的小克里斯托的回忆,指南在《纽约时报》出现当天,他去白宫参加资深职员每日例会时,发现与会的斯考克罗夫特很不高兴。小克里斯托2003年1月14日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的采访记录,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iraq/interviews/kristol.html>。

⑥ John Lewis Gaddis, “A Grand Strategy of Transformation”, *Foreign Policy Online* (November/December, 2002), <http://www.foreignpolicy.com/issue novdec 2002/gaddis.html>; 另见加迪斯2003年1月16日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的采访记录,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iraq/interviews/gaddis.html>。

⑦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75/4 (July/August 1996), pp. 18—28.

⑧ Joshua Muravchik, *The Imperative of American Leadership: A Challenge*

to *Neo-Isolationism* (Washington, D. C. : AEI Press, 1996).

⑨ Norman Podhoretz, "Neoconservatism: A Eulogy", http://www.aei.org/news/newsID.16009,filter./news_detail.asp; Jeane J. Kirkpatrick, "After Communism, What?" *Problems of Communism*, 41/1—2 (January 1992), p. 10.

⑩ Charles Krauthammer, "Bless our Pax Americana";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Cost of Promises",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2, 1993; Fareed Zakaria, "The Core vs. the Periphery", *Commentary*, 96/6 (December 1993), pp. 25—29; Robert Kagan, "The Case for Global Activism", *Commentary*, 98/3 (September 1994), pp. 40—44; Robert Kagan, "American Power: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Commentary*, 101/4 (April 1996), pp. 21—31; Joshua Muravchik, "Blinded by Ideology? The Legacy of Wilsonianism", *Washington Times*, May 9, 1999. 穆拉夫切克在2002年1月1日《评论》讨论美国世界角色座谈会上的发言, "American power-for What?: A Symposium", *Commentary*, 109/1 (January 2000), pp. 40—41.

⑪ 迈克斯·布特的观点见 Max Boot, "What the Heck Is a 'Neocon'?"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0, 2002; and his "Imperialism", *USA Today*, May 6, 2003; Joseph Schumpeter,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trans. by Heinz Norden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5), p. 51; Donald Kagan, "Our Interest and Our Honor", *Commentary*, 103/4 (April 1997), p. 42.

⑫ Nail Ferguson, "Hegemony or Empire?" *Foreign Affairs*, 82/5 (September/October 2003), pp. 154—157. 福古森在2003年3月于美国出版的《帝国》一书中, 以对大英帝国历史的精细研究, 告诉美国人, 帝国可以成为一种正面的力量。"因为它们能够提供一种必需的架构, 作为许多诸如全球化和清廉之政府之类有益事物存在的环境。"他认为, 现在正是美国该认真反思一下的时候了, "放弃它根深蒂固的对殖民地的嫌恶, 承担起白人世界或者说文明世界的担子。"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对该书的评价, Margaret MacMillan, "Queen Victoria's Secret",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pril 20, 2003, p. 12.

⑬ 此方面的文献极多,肯尼迪和另一位自由派国际政治学家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就此问题曾在《纽约书评》上辩论,奈认为美国仍将是头号强国。实际上,奈的“软力量”说即从辩论中得来。见 Paul Kennedy, “Can the US Remain Number On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6/4 (Mar 16, 1989), pp. 36—42; 肯尼迪和奈的首次书面辩论, “What to Do about Declin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6/10 (June 15, 1989); Paul Kennedy, “Fin-de-siècle America”,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7/11 (June 28, 1990), pp. 31—40; 肯尼迪和奈的第二次书面辩论, “Is the US Declining?”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7/15 (October 11, 1990), p. 62。

⑭ Robert Kagan, “A Retreat from Power”, *Commentary*, 100/1 (July 1995), pp. 19—25; Robert Kagan, “The Benevolent Empire”, *Foreign Policy*, 111 (Summer 1998), pp. 24—35。

⑮ Irving Kristol, “The Emerging American Imperium”,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8, 1997。

⑯ G. John Ikenberry, “Why Export Democracy?” *The Wilson Quarterly*, 23/2 (Spring 1999), pp. 56—58; John Lewis Gaddis, “A Grand Strategy of Transformation”; 加迪斯2003年1月16日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的采访记录; Norman Podhoretz, “Strange bedfellows”; William Pfaff, “The Question of Hegemony”, *Foreign Affairs*, 80/1 (January/February 2001), p. 221—232。

⑰ Norman Podhoretz, “Strange bedfellows”。

⑱ Dan Himmelfarb, “Neocon-bashing”, *Commentary*, 97/2 (February 1994), p. 55; Gregg Easterbrook, “Ideas Move Nations”, *The Atlantic Monthly*, 257/1 (January 1986), pp. 66—80; Kevin Phillips, “Republicans: The Class of 86”, *The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17, 1986。

⑲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Lonely Superpower”, p. 24;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Conservative Crack-up”,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 1989。

⑳ 参见丁幸豪、潘锐:《冷战后的美国》,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96页; Norman Podhoretz, “Buchanan and the Conservative

Crack-up”, *Commentary*, 93/5 (May 1992), pp. 30—34.

⑳ Norman Podhoretz, “Buchanan and the Conservative Crack-up”; Dan Himmelfarb, “Neocon-bashing”.

㉑ Godfrey Hodgson, *The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A History of the Conservative Ascendancy in America*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6), pp. 278—283.

㉒ “The End of Democracy? The Judicial Usurpation of Politics”, *First Things*, 67 (November 1996), pp. 18—42; “Correspondence” and “The End of Democracy? A Discussion Continued”, *First Things*, 69 (January 1997), pp. 2—4, 19—24; Sam Tanenhaus, “When Left Turns Right, It Leaves The Middle Muddled”,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8, 2000.

㉓ Norman Podhoretz, “Buchanan and Anti-Semitism”,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5, 1999; Franklin Foer, “Arguing the Gop”, *The New Republic*, 222/12 (March 20, 2000), pp. 13—14.

㉔ 本部分主要得益于杨夏鸣先生的未发表论文“美国中东研究:理论、论战与影响”。

㉕ M. A. Muqtedar Khan, “Policy Entrepreneurs: The Third Dimension in American Foreign-Policy Culture”, *Middle East Policy*, 5/3 (September 1997), pp. 142—145.

㉖ Ibid., pp. 145—146, 149—150.

㉗ Joseph Cirincione, “Origins of Regime Change in Iraq”, *Proliferation Brief*, 6/5 (March 19, 2003); Robert Kagan, “Colin Powell’s War”, *Commentary*, 99/6 (June 1995), pp. 41—45;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Study Group on a New Israeli Strategy Toward 2000.”, “A Clean Break: A New Strategy for Securing the Realm”, July 8, 1996, <http://www.israeleconomy.org/strat1.htm>; PNAC’s Letter to President Clinton,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iraqclintonletter.htm>; Donald Kagan, Gary Schmitt, and Thomas Donnelly, “Rebuilding American Defenses: 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 A Report of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Washington, D. C. :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2000).

⑳ Nicholas Lemann, "After Iraq: The plan to remake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er*, 79/1 (February 17, 2003); Michael Ledeen, "The Real Foe is Middle Eastern Tyranny", *Financial Times* (London), September 24, 2002; "Regime Change Shouldn't Be Only Goal of U. S. in Mideast",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October 8, 2002; Michael Ledeen, "The War on Terror Won't End in Baghdad",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4, 2002; Michael Ledeen, "Syria and Iran Must Get Their Turn", *National Post* (Canada), April 7, 2003; William Kristol,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The War on terror continues", *The Weekly Standard*, 8/34, (May 12, 2003), p. 9; Michael Ledeen, "Iran's Next Revolution", *On The Issues* (AEI Online), June 1, 2003; Michael Ledeen, "The Tehran Regime Must Fall",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1, 2003; Michael Ledeen, "Iran: Back the Freedom Fighter", *On The Issues* (AEI Online), July 1, 2003.

㉑ 托马斯·唐纳利 (Thomas Donnelly) 在 9 月 15 日《旗帜周刊》上的文章批评了拉姆斯菲尔德和布什政府,拉姆斯菲尔德在增兵上的顽固态度可能会损害伊拉克重建和恢复的成功,也正是由于拉姆斯菲尔德的顽固才使得布什政府不得不企求于联合国。唐纳利也没放过小布什本人,翻起了旧账。“从一开始,小布什政府就一直反对更大程度地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2000 年大选后,两党亲防御的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去见小布什,要求他增加防御开支,并扩军。但小布什为了他的减税计划而拒绝。Thomas Donnelly, "Secretay of Stubbornness", *The Weekly Standard*, 9/1 (September 15, 2003), pp. 19—17.

㉒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 *Foreign Affairs*, 79/1 (January/February 2000), pp. 45—62; Janadas Devan, "Shaping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Neo-conservatives",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30, 2003; 加迪斯 2003 年 1 月 16 日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的采访记录。

㉓ Robert Kagan, "Resisting Superpowerful Temptations",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9, 2003; Joshua Muravchik, "America Lost Its Voice", *The*

Weekly Standard, 8/38 (June 9, 2003), pp. 16—17.

③ Thomas Donnelly, “Brave New World: An Enduring Pax Americana”,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April 1, 2003; Thomas Donnelly, “What’s next? Preserving American Primacy, Institutionalizing Unipolarity”,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May 1, 2003.

④ 本段论述部分采自陈雅莉,“陨落中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华盛顿观察》周刊,第40期,2003年10月30日。另参见“United States: The shadow Men”, *The Economist*, April 26, 2003; Richard S. Dunham, “Where do the Neocons Go from Here?” *Business Week*, May 12, 2003, p. 73;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America’s Responsibility”, *The Weekly Standard*, 9/1 (September 15, 2003), pp. 9—10; Robert Jervis, “The Compulsive Empire”, *Foreign Policy*, 137/82 (July/August, 2003), pp. 82—87。

后 记

本人开始动笔写作本书时,新保守主义的影响正如日中天;当书稿完成时,新保守主义也恰如深秋落叶般再无复当日高挂枝头时的颜色。时事变幻之快,未免令人感叹;更让人唏嘘的,是新保守主义的流变。

作为思想现象的“新保守主义”,本出于对20世纪60年代新激进浪潮的反动(reaction)。如果要找一个词来概括新保守主义最初的“整体精神”(ethos)，“适度”(modest)当属合适之选。适度就是反对一切过头的东西。这种适度固然或多或少地具有哲学意涵,比如强调人的局限、人性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等,但新保守主义者之所以有这些认识,并非出于哲学推论,而是从人生经历和常识中来,受其“思想真诚”(intellectual honesty)的驱使。此“思想真诚”在实际中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科学健康的怀疑精神(skepticism)。正如克里斯托曾说的,这种怀疑精神并非悲观主义,而是社会科学的产物;正由于它完全以严格的数据分析和对社会政治现实实事求是的观察为透视社会政策的棱镜,最初的新保守主义才总给“改革主义者的热情泼冷水”,才会反对一切“天启式的”(apocalyptic)东西。¹“思想真诚”的另外一面表现为怀疑所有的意识形态,无论它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在克里斯托和贝尔看来,意识形态总意味着对现实的先入为主之见,而对现实的先入为主之见最不利于真正公共利益观念的形成;因为,“公共利益并非某种预先存在的、柏拉图式的观念,相反,它来源于诸多观点的差异之中,只要这观点

是合理的。”换言之，“智慧是不戴标签的。”所以，《公共利益》的目标之一就是与所有僵化的意识形态和“对社会现实先入为主式的阐释”进行斗争。由此导致了最初的新保守主义始终处于一位评论者所说的一种紧张状态，即自由主义情绪(liberal sentiments)和保守主义分析(conservative analysis)之间的紧张。ⁱⁱ除了克里斯托之外，其他新保守主义者都像他们的教导者尼布尔和屈瑞林那样，虽因批判自由主义而常带有保守主义意味，却仍坚守自由主义之根；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与其说是保守主义的，不如说是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批评，实际上也正是屈瑞林在《自由主义的想像》中所呼唤的那种批评：此种批评最有益之处不在于肯定自由主义的普遍正确，而是将自由主义的观念和假设置于压力之下。ⁱⁱⁱ从上述意义上说，最初的新保守主义主要是一种独立的思想批判。

然而从一开始，外交事务中的新保守主义就没有多少适度精神，而更多地表现出意识形态化和道德绝对主义倾向。新保守主义者一直强调他们坚持冷战自由主义，即由小施莱辛格和尼布尔在思想界倡扬，由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这两位国务院政策规划负责人先后为杜鲁门政府所制定的坚决遏制苏联的政策。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确如此。不过，事实上存在不同的冷战自由主义。尽管尼采等四人在反共、遏制苏联和支持杜鲁门等方面是一致的，但他们对冷战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首先，尼布尔始终对外交政策变成准宗教式的“征伐”(crusade)——无论是为了自由还是为了共产主义——怀有警惕之心，他和凯南一样是一位强调均势和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者。而尼采则是典型的外交“征伐”论者，在他1949年撰写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这份决策纲领的出炉意味着1947—1949年间由凯南奠定的“现实主义遏制”战略的终结，确立了冷

战多半时间里美国看待世界的基本框架)中,决策的根本出发点是极度意识形态化的世界政治本质:“自由思想”对“奴役思想”,“自由制度”对“奴役制度”;充斥全篇的意识形态狂热和说教没有为势力范围或均势留下任何空间,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正义对邪恶的征伐,邪恶在哪里出现,美国就在哪里讨伐。^{iv}其次,尽管他们都鼓吹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但尼采对斗争的阐释与其他三人是不同的。他并不像小施莱辛格那样视冷战为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斗争,而认为冷战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他更倾向于相信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夸大美国面临的危险。而新保守主义在外交上的看法恰恰与尼采而非尼布尔更为接近:认为冷战是真正的战争,强调苏联威胁的迫在眉睫和美国的危险处境,反对缓和及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反对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与中国接近的做法等等。波霍雷茨直到1999年还说:“我们认为,冷战是对共产主义的战斗,而非针对俄罗斯这个民族。中美接近将让公众对敌人的性质产生困惑,损害美国人民继续支持冷战的意愿,这种意愿一直是建立在对共产主义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反对基础之上。”^v

到70年代中期时,新保守主义在国内问题上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心平气和”。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已接受了他们过去谴责的那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观”(the ideological approach to politics)^{vi},认为政治就是观念战争:他们并不严格区分思想理论和实践,反而认为思想理论是政治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政治是应由思想理论贯穿其中的活动;相应地,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宏大事业中的“干部”而非严格独立的知识分子,愿意运用思想理论作为武器。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新保守主义者成为里根政府的“智囊”,随着新保守主义开始融入主流的保守主义运动,新保守主义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名声和影响,最初作为独立思

想批判的新保守主义已经变成了政治和思想运动。伴随权力、名声和影响而来的是独立性的丧失：原则考虑得越来越少，政治战略考虑的越来越多；对克里斯托来说，“政治可能性”优先。所以，当他认为，基督教保守主义运动更能在政治上有大进展时，他急切地想和他们结成联盟，并因此在1986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不惜批判进化论。^{vii}虽然新保守主义在文化战争中越发倾向于宗教确出于对宗教的真心“欣赏”，但政治考虑也是一大因素。同时，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化意味也更加浓厚。这一方面表现为有时几达狂热的寻找和批判“内部敌人”：除了继续批评已没有多大影响的新左派外，反共斗争中的不坚决者甚至旁观者、所有批判美国的人（无论批判是否有道理）都会遭到新保守主义者的指责、质疑和反批判。1983年2月，自由世界委员会为促进强硬的反共政治共识，反对文化中的“反美主义”，在纽约举行“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会议。与会者抱怨，美国文化的批评者对美国的批评过于严厉了。波霍雷茨在总结陈辞时，甚至宣称，思想观点上的中立正如美苏间的中立主义一样荒唐和危险。鉴于新保守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极端倾向，贝尔在整个80年代不得不多次警告他过去的旧友们不要“过度”。^{viii}另一方面，新保守主义的“口水战”越来越以自由主义本身为对象。与以往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完全不同的是，除了至今仍坚持自由主义之根的格莱泽之外，其他人已经视自由主义为最大的“内部敌人”。批评的主要目标不再是要补足自由主义，而是要摧毁之，甚至将自由主义等同于苏联共产主义。克里斯托在写于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随着美国生活中一个部分接着一个部分被自由主义精神所污染，我的冷战远没有结束，反而更加剧了……现在，那场‘冷战’结束了，真正的冷战才开始。”^{ix}

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化、极端和过度在尤为多数第二代新保守派鼓吹的“新里根外交”那里,达到了一个新顶峰。可以说,“新里根外交”版本的新保守主义除了名号、人员和部分表面主张(如对文化、观念和价值观重要性的强调)之外,其内在精神与最初的新保守主义已完全背道而驰。我们无法想像,过去那些强调“局限”和世界复杂性的保守自由派们会那么有信心地认为,美国能够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这世界,美国应该且能够建立一个“仁慈的帝国”。多年以前,尼布尔曾警告美国人,不要以为自己没有世界上其他民族行动时的那种权力欲。美国也进行过帝国主义冒险,但一个具有强烈的世界使命感的民主国家从来不愿主动承认他的行动有任何不高尚的动机。他强调说,虽然捍卫和扩大民主自治的工作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民族救世主义更有道理,但美国人必须抛弃那种天下惟有自己最清白、最正确的幻想,必须抵制那种“诋称仁义,以权压人”的诱惑。^x

现在,谁又能全然否认“新里根外交”没有“诋称仁义,以权压人”的意味呢?当人们在某一天因为某种灾难而全面重新评价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影响时,他们或许能够重新回忆起保守主义先哲们反复强调的观念:人类本身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任何一个在尘世间试图建成完美无缺的人类社会的个人或集团,都必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人类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未来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本书的写作首先主要得益于恩师陈晓律教授的推荐和指导,如果没有和陈老师近几年来平等和开放的探讨,我必定没有写作这样一本书的认识和勇气。钱乘旦教授在百忙之中,仍一直关注本书的进展,促使我尽心尽力,不敢有丝毫懈怠。好友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昆明(加州大学欧文分

校)、瞿炼等人的鼓励、帮助和支持,是在停滞不前时推动我继续向前的力量。师兄梁玉国(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为我搜集了部分材料,同事杨夏鸣(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慷慨地准许我利用他未发表的手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花蕾编辑认真细致地阅读了手稿,他对手稿中错处的矫正既让我汗颜,也让我感激;刘沁秋编辑也为本书做了许多工作。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在生活上对我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抚慰,我不可能完成本书。

吕 磊

2000. 12. 3 于南京

i Irving Kristol, "Skepticism, Meliorism,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Public Interest*,

<http://www.thepublicinterest.com/notable/article3.html>.

ii Sam Tanenhaus, "When Left Turns Right, It Leaves The Middle Muddled",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6, 2000.

iii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0), pp. ix - xii.

iv John B. Judis, "Trotskyism to Anachronism", *Foreign Affairs* 74/4 (July 1995), pp. 124—125; 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204页、220页。

v Norman Podhoretz, "Strange bedfellows: A guide to the new foreign-policy debates", *Commentary*, 108/5 (December 1999), p. 27; John B. Judis, op. cit., pp. 125—126.

vi E. J. Dionner, Jr., "Neo-Cons: Who's 'Neo' Now?"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7, 1990.

vii Paul Starr, "Nothing Neo", *The New Republic*, 213/23 (December 4, 1995), p. 37. 波霍雷茨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 Norman Podhoretz, "The millenium That Was: Science Hasn't Killed God",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0, 1999。

viii Neil Jumonville, *Critical Crossing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220, 231。在《党派评论》50周年庆祝时,全更因为自由世界委员对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和欧文·豪作品毫无道理的攻击,而直接批评该委员会。Daniel Bell, "Our Country—1984", *Partisan Review*, 51/1 (Anniversary Issue, 1984—85), pp. 630—37。

ix 转引自 Paul Starr, *op. cit.*, p. 36。

x 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